

【匈】雅诺什·科尔奈 János Kornai / 著

后社会主义 转轨的思索

R
P
T
eflections on
ost-Socialist
ransition

世界经济经典
书系
JJ

世界经济经典
书系
JJ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

【匈】雅诺什·科尔奈 János Kornai / 著

Reflections on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匈)科尔奈著;肖梦编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1

(世界经济经典书系)

书名原名: Reflections on Post - socialist Transition

ISBN 7 - 206 - 04101 - 9

I . 后… II . ①科…②肖… III .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匈
牙利 IV . F15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447 号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

著 者 [匈]雅诺什·科尔奈
责任编辑 潘丽丽

封面设计 张亚力
责任校对 晓 伶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康华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206 - 04101 - 9/F·810		
定 价	2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雅诺什·科尔奈 (János Kornai) 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高级研究所终身研究员。

科尔奈教授 60 年代曾在伦敦经济学院、苏塞克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地做过访问学者。70 年代曾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等地做过访问学者。从 80 年代开始, 他融入许多国际学术机构做访问研究与交流, 曾多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2 年 9 月当选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科尔奈教授获得过世界上不同国家授予的许多荣誉, 其中主要包括: 1982 年在美国获得政治经济学 F.E.Seidman 杰出奖; 1983 年获得匈牙利国家奖; 1983 年在联邦德国获得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奖; 1997 年被布达佩斯大学经济学系授予 John von Neumann 奖; 1997 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 La légion 国家荣誉奖。科尔奈所提出的“软预算约束”、“短缺经济”等概念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研究和讨论的论题, 他的文章和书籍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

主要著作有《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化》(1957)、《结构决策的精确规划》(1967)、《反均衡》(1971)、《急进与和谐增长》(1972)、《短缺经济学》(1980)、《增长、

短缺与效率》(1982)、《矛盾与进退维谷》(1985)、《通往自由经济之路》(1989)、《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992)、《主路与辅路：社会主义改革和后社会主义转型研究》(1993)、《争斗与希望：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稳定与改革》(1996)、《转型中的福利、选择与团结：东欧的医疗部门改革》(2001)。

前言

前言

非常高兴我关于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想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真诚地希望，这本著作与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和1999年出版的我的著作——《短缺经济学》一起，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东欧各国转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现在的状况。同时，我也希望这本集子能引起人们更深入广泛地讨论转型这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这本集子中的文献都是在1989年和1999年间公开发表的。该书前几篇文章关注的是探求一条新道路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一座新的大厦能够在旧的、僵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吗？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倡导者曾希望发现一条“第三条道路”，来建设一个既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并有所改善的新社会。这几篇文章讨论了这种尝试的结果和前景。

其余的几篇文章涉及后社会主义的发展。其中前几篇给出了实证描述和对该过程的预言，而最后两篇——对匈牙利福利制度改革的评价——实证和规范方法相结合，则是建立在我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的。

现在，当匈牙利及邻近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将要结束的时候，有人认为问题的答案是惟一的，我则坚持自己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即使由于早期历史的发展使一系列可行方案的选择余地很小，但总是存在一些选择。在

严格意义上从来就没有单一的“必修课”，那些坚持单一“必修课”的人只不过想提前减轻自己的责任。这本集子，像我以前的作品一样，主张相反的意见：那些拥有决策权力的人，应对其决策承担充分的责任。

即便我的一些文章包括了某种建议，但通常也是一些有附加条件的建议，建议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以及采纳建议的后果，我都作了一些讨论。我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预言家。即使我在努力阐述经济政策建议时，仍然是从研究者的身份进行的。我特别强调，要把赞成和反对接受该建议的观点以及与特定措施相联系的代价和风险解释得明了清晰。我试图发现隐藏在各种情况下的陷阱、自相矛盾、缺陷及恶性循环。依据不同的价值观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我希望能清楚地说明这些选择的利弊得失。

虽然一些研究涉及到所有后社会主义地区，但大多数文章的直接主题都是匈牙利。就像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一样，首先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始终是一位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激发我理论思想的灵感总是来自匈牙利的实践，而且我的建议也总是寻求帮助我自己的同胞。然而，在这些研究中，我还是试图通过考察匈牙利的情况概括出一些普遍性的结论。对其他国家来说，匈牙利有益的实践可以作为其跟随的样板，匈牙利的失败也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为避免犯同样的错误，通过考察这些教训或许是有启发的。

由于匈牙利和中国是如此的不同，由此可能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读者应该对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小小的匈牙利仅仅1 000来万居民，尚没有中国首都的人口多。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明显不同。迄今为止两国在政治结构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尽管如此，二者还是有某

些本质上的类似之处，这种类似正好都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

匈牙利的改革始于1968年，由此它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传统形式。几年后，当中国开始相同过程的时候，它的改革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都曾仔细研究过匈牙利的经验，并试图从中学习一些东西。在由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匈牙利和中国都采取了相似的、小的、渐进式的步骤，避免突然、剧烈的跳跃。

现在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有几个问题重新提到日程上来。在产权分配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改革？对国有关部门应该做些什么？如何才能硬化预算约束？对亏损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养老金和医疗福利制度应该确定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在这中间国家和个人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它们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澄清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重新认识匈牙利的经验，对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是有帮助的。匈牙利是东欧改革有成功经历中的一个，不过，其间也是进步与痛苦相伴随的。这本书没有给中国提供处方，没有说：“这是匈牙利的道路——跟上来吧！”相反，它倾向于鼓励读者逐项逐项地思考：匈牙利的方法哪些可以采纳，哪些应该拒绝，哪些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

思想观点的更新是无止境的：新的经验和问题时刻都在出现。然而，我认为，作为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我应该按文章最初的形式出版我的各项研究。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已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有些是通过批评性地引述早期著作而表达在后来所作的研究中，有些是通过随后增加脚注的形式引起读者的注意，目的是使读者能够理解我

思想的变化。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完成这本集子的人。在每篇文章中我都已提到了曾提供重要帮助的人和机构的名字。这里我想再次表达对他们的谢意，并感谢朱莲娜·帕蒂所做的出色编辑工作。我很高兴吉林人民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选集，感谢中国经济学界的同行——吴敬琏教授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一切为了本书的出版而付出热情与耐心的中国朋友。

前

言

雅诺什·科尔奈

2002年11月

目 录

1.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 10 年之后的
自我评价 (1)
2. 制度范式 (22)
3. 后社会主义转型：概览 (51)
4.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
和研究 (75)
5.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稳定化的研究
案例 (123)
6. 硬化预算约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162)
7. 后社会主义体制下财经纪律的演进 (191)
8. 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的亲和社会关系 (213)
9.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部门改革：规范
方法 (237)
10. 个人与社会的责任：关于社会问题的
访谈录 (268)
11. 匈牙利道路：专访雅诺什·科尔奈教授 (299)

Contents

目
录

1. Ten Years After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The Author's Self-evaluation (1)
2. The System Paradigm (22)
3.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An Overall Survey (51)
4. Eliminating the Shortage Economy: A General Analysis
and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s in Hungary ... (75)
5. Adjustment without Recession: A Case Study of
Hungarian Stabilization (123)
6. Hardening the Budget Constraint: The Experience of
Post - Socialist Economies (162)
7.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Discipline under the Post -
Socialist System (191)
8. The Affinity between Ownership Forms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213)
9. Reform of Welfare Sector in the Post - Socialist Countries:
A Normative Approach (237)
10.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n
Interview by Mihály Laki on Social Issues/ Struggle and
Hope (268)
11. The Hungarian Road: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ános
Kornai by Xiao Meng (299)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 10年之后的自我评价

介 绍^①

我的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从社会主义体制转轨——以匈牙利为例》（下文简称《路》）出版已经10年了。这是国际学术著作中第一本对后社会主义转轨提出综合性建议的书。10年之后，重温此书，本文旨在阐述作者对它所作的评价^②。

学术界惯于使用被引用次数等指标来衡量作品对著者的同事们的影响，并以此作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

① 为纪念后社会主义转轨开始10周年，1999年9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诺贝尔专题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发言内容即为本文的雏形。我感谢与会的各位同仁，感谢 Zsuzsaliel, Stanislaw Gomulka, Karel Koulba, Kazimir Poznanski 对发言提出了宝贵意见，感谢 Barnes Benedict, Andreea Despoa, Cec Hornok, Julianna Parti 协助我进行研究，感谢 Brian Mclean 承担了本文的翻译工作。本文为2000年4月18—2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ABCDE）”提供的最后修改稿。

② 本文主要评价《路》（1990），但在后社会主义转轨之初，我还作了其他一些演讲并发表其他一些作品，如1991年在丁伯根有关私有化的演讲（1992a），1992年我在 Myrdal 关于硬化预算约束的演讲（1993a）。这些也包括在本文所作的回顾性评价之中。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应该很满意了。数百篇著作将本书作为参考,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学者们的著作。如果作品能产生争议,作者也同样会很感激的。

然而就本书而言,被引用次数并不能说明此书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此书提供了政策性建议,这意味着必须谈及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即它对学术界以外有怎样的影响?我不像气象学家,气象学家的工作是预测天气,但天气是自然发展的。当我开始写作此书时,我期望它至少会对舆论及政策制定者产生适度的影响,进而最终影响世态的发展。

历史不是受盲目力量的作用而简单形成的,它受那些能自觉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的影响。主要的历史责任落在政策制定者身上,但同时,来自学术界的顾问也要承担第二位的责任。他们也要对他们的言论负责^①。

在90年代初期,爆发了一场有关转轨应采取何种战略的激烈的辩论。我将要谈到那场辩论,但事先强调我并不想再次挑起争端。我将把我的观点与他人相比较,但并不将矛头指向任何人。有句匈牙利谚语:“不是你的衬衫,就不要往身上穿。”^②也许这种方法能防止辩论针对个人,并将注意力集中到问题本身。

① “顾问”一词,从狭义上讲,指那些为某一政府、国家、国际组织、政党或运动正式邀请提供建议的人。转轨国家及国际上的许多经济学家在后社会主义转轨之初都曾担任此职,而我则拒绝了所有此类邀请。广义的“顾问”则指那些不受任何人的委托而作出积极的研究并且提供政策建议的学者。

② Dewatripont 和 Roland (1995) 及 Roland (2000) 对那时的争论作了精彩的总结。

就像题目所表明的，本文的重点在于自我评价。我会竭尽全力避免自我辩护和暗自庆幸，并执一种自我批评的眼光。另一方面，如果我觉得这种观点到目前为止仍是合理的，我不会碍于传统的谦虚妨碍我对自己观点的认同，

转轨开始10年后的今天，该如何评价《路》一书中观点的对错？仅是将它与事实相比是不够的。如果我的建议是错的，事态的实际发展与我的建议相符就会是不幸的，而我的建议未被采纳则是幸运的。

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来评价书中的建议，都必须评价事件本身，评价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这一评估过程离不开价值判断。我并不急于在此阐明我的价值观，以及我如何看待这一系列事件，而将在后文中逐步加以表述。最终的法官还是我自己的良知。

此书原是为匈牙利公众而作^①。最终共有16种语言的版本，且各译本间只作了略微的修改。在各种外文版的前言中都有这样一条警告：本书的政策建议不能被机械照搬到其他国家。我认为，尽管这些建议的许多方面有普遍适用性，但仍然需要适应各国的具体情况。因此，本文的重点将集中在匈牙利的实践上，并以波兰、捷克、俄罗斯的发展为补充，这样进行分析是较为有利的。

一个全面而详细的论述应包括书中涉及的所有150个问题。今天看来，我对其中多数论题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对部分论题的看法存在错误。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机会作出一个更详细的评述，但本文将只谈到两个论题。

第一个论题是所有权改革。按照我现在的信念，我当

① 匈牙利版赶在1989年国会首次自由选举之前出版。

时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二个论题是宏观经济稳定，我现在认为，自己当时的观点有对有错。

所有权改革和私有部门的发展

《路》的论述起于“市场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概念，此书摒弃了那种应保留国家所有权占统治地位、但将其与市场调节相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我的这一立场激怒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东欧的许多改革经济学家和西方许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

此书反映了作者的信条，即支持私有产权占主体地位的经济体制。在这一方面，此书的观点与源自西方的许多建议并无不同。然而，在这种总体的一致下，仍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商榷。建立这一体制的最佳路径是什么？转轨后的经济中，所有制结构是怎样的？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多种可能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哪一种模式才是我们的目标？

对这些问题有多种回答。本文简要讨论两种纯理论的战略。多数详细、实用的建议都接近两者之一，并且，辩论的焦点也在于这两种战略间的对立。

战略A 我将其称为有机发展战略（strate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它主要有五个特点：

1. 该战略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有利条件，提升私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私有部门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大规模的自由进入。这就需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予以协助：

* 拆除自由进入的壁垒。

* 保护私有产权的安全：建立制度以确保个体之间的合同得到执行。

* 积极肯定的行动并配以必要的约束对促进私有部门的发展是必需的，例如在税收和信贷政策方面。

2. 以出售为基本手段，对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国有资产必须主要出售给外部人，对那些不但支付公允价值而且承诺向公司投资的人给予优先。如果购买者为内部人，也必须支付合理价格，不能让内部人私有化演化成瓜分国有资产的隐藏形式。

3. 根据特点2，必须防止国有财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

4. 必须优先考虑产生具有如下特征的所有权结构的出售方案：

公司有一个所有者。这可以是个人、团体或国内外有私人所有权历史的公司，最好是一位战略投资者，预备向公司注入大量新增资本以支持公司发展。公众持股公司的股份可适当分散，但是，每个公司如可能，应该有一个上文所述的“核心所有者”。

5. 必须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以维持金融秩序，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必须制定包括破产法、会计法和银行法在内的新法律，并坚决贯彻执行。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的“三位一体”并不能充分保证转轨的成功——硬化预算约束具有同等重要性。

对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没有必要不计代价进行私有化或者人为地维持太长时间。随着预算约束的硬化，国有企业会经历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盈利的企业早晚会

被出售。那些价值为零或为负而卖不出去的企业，应执行破产程序，而不是被无偿分配。通过破产清算进行私有化是所有权变革中的主要手段之一。

私有部门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上升，一方面由于新兴私有产业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国有部门的收缩。国有部门的收缩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国有公司被出售给私人所有者，二是国有公司破产退出。

战略 B 我将其称为加速私有化战略。它有三个特点：

1. 最重要的任务是尽最快速度消灭国家所有制。
2. 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某种形式的无偿分配，例如，通过认股权证这种方式的私有化，使国有资产无偿及等额地分配到国家公民手中。

这种方法容许甚至鼓励经理人员接管企业。在许多情况下，其结果成为一场虚假的管理收购，因为经理人员只付很低的价格，相当于无偿地将国有产权据为己有。

3. 更偏好于形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强调的是所有公民平等分享原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利，“人民资本主义”因而得到发展。

这里只举出三个特点，而关于战略 A 则列出五个。对未提及的那两个特点阐述如下：

战略 B 的倡导者也赞成提升私有部门的地位，但在其建议中却没有强调。战略 A 的倡导者则将促进私有企业的发展放在了所有权改革的最前面。

战略 B 的支持者原则上也赞成硬化预算约束，他们在文章中没有坚持要保留软预算约束，但在建议中也没有

提到要硬化预算约束，建议中这一遗漏决非偶然。我将在论述捷克和俄罗斯的经历时回到这一点。

这两种战略最重要的不同不在于其各自有哪些特点，而在于其强调的重心不同。政治的关注、立法和行政能力、理论界的兴趣及研究活动应该聚焦在哪里？在这方面两种战略的回答截然不同。战略 A 强调新兴私有部门的健康成长，而战略 B 强调国有部门的迅速清算。

我在《路》一书和其他同时期发表的著作中，都论述了战略 A 的要点并推荐使用这一战略。除了我以外，有相当一部分人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我对以下经济学家的立场深表欣赏：Andreff (1992)、Brabant (1992)、McKinnon (1992)、Murrell (1992a, 1992b, 1992c)、Murrell 和 Wang (1993)、以及 Poznanski (1992)，当然还有一小部分西方理论经济学家支持私有部门有机发展的战略，但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经济学家常常发表具有攻击性的激进言论来宣扬推广快速私有化的战略。

10 年过后，我更加确信主张促进私有部门有机发展的战略 A 是正确的选择。过于强调私有化速度的战略 B，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次优选择，最糟糕的却是贻害无穷。

在评价四个转轨国家的表现之前，先做一个简单的统计比较，以提供一些背景信息。在私有部门的健康发展、预算约束的硬化、生产的有力重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最终结果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在这里使用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比人均 GNP 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清楚地反映了结构重组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遗留了严重的失业问题，战略 A 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尽管这意味着要采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10年之后的自我评价

取痛苦和不受欢迎的措施。战略 B 对这一问题却采取了退缩的态度。匈牙利的劳动生产率 1998 年比 1989 年高出 36 个百分点，波兰则高出 29 个百分点，捷克共和国却仅高出 6 个百分点，俄罗斯的形势十分严峻，1998 年的劳动生产率甚至比 1989 年低了 33 个百分点（《欧洲经济调查 1999 年》第 128~131 页）。

显然，匈牙利采取了战略 A^①。与前文所述的五个特点相对照，匈牙利的转轨道路最符合主张私有部门有机发展的这一战略。

匈牙利的道路无论如何不应被理想化。在出售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权力滥用的现象。尽管没有最严重的腐败丑闻曝光，但专家和公众都非常怀疑权力滥用并不少见。

然而，匈牙利经济上的成就还是使人印象深刻。成千上万的新兴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90 年代前半期硬化预算约束的措施使企业界经历了一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同时，金融纪律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公司间的债务链条被打破，私人合约的信誉得到了改善。银行部门开始得到巩固与加强。所有这些发展都极大地吸引了外资。外资的大量涌入，是解释匈牙利生产率提高和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波兰的改革主张表面上与战略 B 部分吻合，但实际

① 要说明《路》对四年一届的匈牙利政府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政客们往往并不承认他们在智力上的欠账。那时，这本书在匈牙利引起的激烈争论，不仅发生在专业学术刊物中，也发生在每天的报纸、收音机和电视中。当然许多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客和他们的顾问肯定读过这本书。

上采取了与战略 A 相近的经济政策。今天大多数波兰经济学家都认同,波兰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外,还包括大量新企业的进入、私有部门富有活力的成长、外资的涌入^①。

在 90 年代初期,捷克(也就是后来的捷克共和国)领导人是第一个要采用战略 B 的。捷克的经济学家总理克劳斯(Vav Klaus)选择了认股权证方案,并试图在国际加以推广^②。

认股权证方案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却没有产生发起者预期的效果。其中原因何在?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对此实例展开了分析研究^③。在第一阶段,国有资产被分散到上百万的认股权证所有者(voucher owner)手中,而后又在投资基金中重新集中起来。然而,这些基金缺乏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其持股公司(develope the backward companies)或进行实际的投资。它们与那些国家控股甚至国家是唯一所有者的大型商业银行纠缠在一起。这样一种所有权结构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结构重组蹒跚而行。尽管外界主张企业采取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自由企业的言辞尖锐而又浮夸,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并未得到改善。出售企业的措施带来了企业间的自然选择,与此相反,通过无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 10 年之后的自我评价

① 见 Dabrowski, Gomulka, Rostowski (2000)。

② 这一制度并不是起源于捷克共和国。它较早出现在波兰 Lesandowski 和 Szombrugs (1989) 所写的文章中, Klaus 曾在 1992 年写到有关捷克的这一计划“我们的非标准的认股权证私有化证明是迅速和有效的”(1997 年,第 72 页)。

③ 见 Coffee (1996, 1998), Ellerman (1998), Nellis (1999), OECD (1998, 2000)。

偿分配转移产权的行为却保持了原有的经济结构。

改革的结果令人沮丧。经济发展停滞，故态复萌——虽然这与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一些严重错误有关，但战略 B 看来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因素。

也许俄罗斯为战略 B 的失败提供了最惨痛的例证。在俄罗斯，战略 B 的每一个特点都被发挥到了极致：人民被迫接受了认股权证私有化方案，而同时大量国有资产被转移到了经理人员和特权官僚手中。在这种环境下，一场史无前例的“所有制改革”出台了，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所有权被“政治寡头”所掠夺^①。

所有上述情况的发生都与预算软约束的症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预算软约束渗透在经济与政治机体的每个细胞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坏。正如最近的一项研究（Pinto et al., 1999）所恰当描述的，俄罗斯变成了“不支付社会”。企业拒不向供应商付款，雇主也不用向雇员支付工资，借款者不向银行还债，而行政和司法机构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实际上，国家本身就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它常常拖欠公务员的工资、保险补助及养老金的逾期支付。

对提出这两种战略的人来说，什么是他们的思想理论的来源？应该记住，没有人能提出一个严谨的思路或者创立一个完全从假设前提下得出结论的模型。战略 A 和战略 B 的倡导者都将他们的经济学知识与直觉结合起来，或者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未来的展望融合在一起。因此，重温当时的文章，我现在的目的不是要说明脚注中所提及

① 对俄罗斯私有化的微观及宏观后果的深入批判性分析见 Black, Kraakman, Tarassova (2000)，有关自由进入的障碍见 Broadman (2000)。

的作者，而是设法领会其中的言外之意以发现激发那些思想的源泉。我意识到我对这一问题不是很确定，很有可能会对事情作出错误的解释，但是，我将试着来回答这一问题。

让我先从这一问题较简单的部分着手，当我在 80 年代末期考虑所有制改革时，哪些著作和理论对我的影响最大？

一个来源是哈耶克的著作，准确地讲是他有关市场经济发展和反对“构建主义”的思想（Hayek 1969 和 1990）。我认为，捷克经济学家曲解了哈耶克的思想，以便为其认股权证私有化寻找理论基础。哈耶克十分强调资本主义的自发性、其发展道路和制度形成的渐进性。

我的另一个理论来源是熊彼特——不是写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29）时那个对市场社会主义抱有天真幻想的熊彼特，而是将企业家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时的熊彼特（1911）。熊彼特描述的市场经济并非瓦尔拉斯意义上的完美的、均衡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实际竞争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人们生机勃勃地开创新公司、占领新市场、引进新产品。我觉得东欧在经历了令人麻木的官僚政治之后，需要成千上万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与此紧密联系的是熊彼特的另一种经常被引用的观点，即创造性的毁灭。这一概念与我的想法吻合：硬化预算约束及由此必然引发企业间的自然选择，这一过程固然痛苦，但却是必要的。

第三个来源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巩固的思想，这是我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后形成的，其中包括法国的 Amables、Feruand Braudel 和其他人的作品，它们阐明了资

本主义渐进发展的特性，并参考了对早期资本主义强制推行商法和金融纪律的研究^①。

哪些理论影响了战略 B 的倡导者，使之确信能快速“建设”资本主义？虽然他们并未提及，我也相信他们受了两位作者的很大影响。一位是马克思，另一位是科斯。我承认将此两位并列看起来很奇怪。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战略 B 所采用的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而我也称战略 B 从科斯汲取的为“庸俗科斯主义”。

庸俗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表达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所有权的变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而是充分条件。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运行所需的制度、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

真实的历史进程表明较早的转轨和后社会主义的转轨证实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远比那要复杂得多。仅仅存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巩固的充分条件。经济与社会的转型通常在各自的领域中同时进行，两者之间会发生多种相互作用。某一领域内的转变也许会在一段时期内领先于其他领域，但不会永远如此。“经济先作用于社会，社会再作用于经济”并不是普遍规律。如果要通过急剧的私有化来推动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的转型，后者可能只会非常缓慢和痛苦地进行，并付出严重的社会成本。因此，即使在这一系列制度的转型之前进行迅速和激烈的所有权改革的方案，即使在特定的条件

^① 主要见 Brandel 所作的杰出的总结（1975）。

下可行，这也不一定是最有利的顺序。

我对庸俗科斯主义的简单逻辑表述为：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无关紧要。有效率的分配最终将会出现。

这种表述充满了伏尔泰笔下潘神的乐观主义。我想如果科斯参加了这场辩论，他会对上述表述中的第二句附加三个条件（Coase 1960）。一个有效的分配将会出现，如果：

- * 交换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进行。
- * 交换是自由的，不存在阻挠重新签定合约的障碍，
- * 重新签定合约无需交易成本，或至少交易成本很低。

但如果上述条件不成立又当如何？这其实正是后社会主义转轨所面临的情况：这三个条件存在严重的问题。掌权的利益集团会阻挠产权分配的重新谈判（renegotiating）与重新签约（俄罗斯就是个例子）。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新分配过程中会出现惊人的社会成本，并伴随剧烈的阵痛与大量的受害者。

让我们回到辩论中听到的论据。

1. 战略B的支持者急于为其论点寻找道德依据。为公平起见，原国有资产必须等额分配给每位公民^①。实践证明这一论点何其虚伪。对原国有资产的初始分配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之后产权便高度集中起来。例如俄罗斯，这种分配实际上导致了一个荒谬的、极端不公平的寡头政

^① 大多数俄罗斯公众从一开始就对认股权证持怀疑态度，而且，也没指望自己的财务状况就此改善（Blasi, Kroumava 和 Kruse, 1977, 第76页）。

治资本主义^①。

以正确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并不会改变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国家财富没有减少，它只是改变了形式。国家必须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用于有效的投资，而不是被消费掉。匈牙利就用出售能源和电讯企业所得的收入来偿还外债，从而减少了支出，提高了国家信用等级，为所有公民带来了实际的利益。

2. 有机发展理论的支持者非常注重其论点的社会学依据。社会中产阶级化 (embourgeoisement) 的进程是非常必要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到特定阶段，分散的股权与机构投资者的所有权一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二者不能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超前实施。机构投资者的出现不能够代替社会阶层的剧变。

后社会主义前 10 年的时间证实了这一论据。对经济成功的衡量与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3. 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效率最感兴趣。而这方面的研究也表明了战略 A 的优越性。私有公司通常比保持国有制公司或者以前是国有制、在转轨中被私有化的公司更有效率 (Konings, Lehmann 和 Schaffer 1996 Konings 1999)。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对无效率企业的扫除、旨在建立企业秩序的新的真正所有者，乐于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投资的外国资本——这些一起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出口业绩的增长。

^① 我并不是说出售企业就比无偿奉送“干净”。在前面谈到匈牙利改革时，我讲过那其中或许也有一些黑暗交易。我在这里要做的是批驳无偿分配在“本质上是公平的”这一论据。

4. 最后是政治上的考虑。毋庸置疑，认股权证私有化方案是捷克执政党在第二次自由选举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这是东欧过去10年中发生的惟一次政府第二届连任的情况。依此为标准来衡量，私有化改革就是成功的^①。与此相反，匈牙利和波兰的第一任联合政府在第二轮选举中都惨遭失败。获胜的政治联盟基本上沿用了与前任者相同的战略A。四年后，他们因放弃无偿分配式私有化作为选举的武器而遭遇失败。所以，用不择手段维持权力的标准来判断，战略B当然更实用。

全球各地（尤其是俄罗斯）的战略B的支持者都反复强调：既然私有化的“机会之门”敞开了，就必须抓住这一机会迅速推进私有化。必须趁政府官僚仍处于彷徨中，无力反击时加紧完成这一进程，必须使所有权关系的变革无法逆转，否则就再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很难通过纯粹的逻辑和推理来判定这一观点的正误：我们不可能由原命题推论其反命题正确。例如，尽管如今看来，捷克的民主没有面临任何共产主义复兴的威胁，苏联的坦克也没有再次出现，但必须承认在1991年事情并不那样清楚。用这个观点重新评价俄罗斯当年的局势，就会引发更多的问题了。经常听到如下的论调：必须赶在共产党获取选举胜利之前就迅速推行大规模私有化，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杜马的多数席位，任何类型的私有化都不会通过。

我认为这种论调本末倒置。如果所有权关系的改革采

^① 两年之后，该届政府在其任期的中间倒台了。制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取另一条道路，其进程中没有那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滥用职权，没有浪费那么多社会资源，俄罗斯人就不会如此怀旧。一场势如山崩的所有制改革也许是不可逆转。然而，如果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产权和合同受到保护，民主形成制度，同时市场经济得到大多数人的政治支持，那么才能为“不可逆转”提供更为坚固的基础。

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当我准备写作本文时，我重温了《路》一书，对有关私有化的章节深感满意。对论述稳定性的章节感受就不同了。如果有神奇的时间隧道能让我光阴重返（带着我今天的思想），我会在此书寄出出版之前，重新修改那一章。那一章讨论了几个问题，此处我挑选其中三个加以评论。

时机的选择

在我 1989 年写作此书时，匈牙利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这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宏观经济的调整显然是痛苦的，调整时机的选择也很重要。我在书中建议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立即进行调整。之后不久这一建议重复出现在《路》的捷克语、俄语、波兰语及其他外文版中。我的主要论点是：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篇章。恰在此刻，公众选举产生的政府具有号召民众作出牺牲的道德力量，宣称政府正在设法弥补以前体制最大的疏漏也是可能的（也许该补充一点，也包括那些能最快地得以纠正的问题）。如果延误了时机，不管有没有理由，人们都会觉得是现政府而不是旧体制造成了经济的困境。

我仍然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在波兰 1990 年的巴尔采洛维奇 (Balcerowicz) 计划中采取了这种戏剧性的步骤。在本文的前一部分中,我曾几次批评了捷克政府,但在这里,我对克劳斯政府在 1991 年勇敢地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宏观政策表示敬意。

作为匈牙利公民,我对匈牙利政府拒绝这一建议感到遗憾,当时的反对派也没有一再要求政府接受这一建议。他们的决策是政治意愿而非客观经济情况。宏观经济的调整被延误了数年,从任期四年的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初一直拖到第二届国会议员们上台八个月后才开始进行。1995 年,当匈牙利已接近于金融崩溃时,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警示下,醒悟了的政府才最终着手调整措施。然而仅仅研究调整的建议是不够的,在危机降临的最后一刻,政府在还来得及采取更正性措施避免危机时就慌乱地拉响了“灾难警报”。

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如果能及早进行调整,匈牙利就不必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没有人认为政府关于调整时机的决策是理性的、从实际经济情况出发的。在此存在着道德与政治的两难选择。为政者必须权衡得失,决定是否采取不受民众欢迎的政策,付出的政治代价是否能接受。

预测

我的建议是以对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成果的预测为基础的,然而我的判断错了。我没有预见到随后的经济危机,我对未来发展的预期过于乐观。我不得不承认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更为准确。

我应该自责,因为实际上我掌握了一些能使我作出更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10年之后的自我评价

好预测的信息。比如，我至少应该更仔细地读一下《社会主义体制》（1992）这本我自己的著作。它或许能对我有如下启发：社会主义制度遗留下了一个严重扭曲的投入、产出结构。纠正这一结构就必须进行“创造性的毁灭”。然而，毁灭是迅速的，创造则缓慢得多，两者间的不平衡本身就预示着一场严重的危机。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一种特殊的行为协调机制。尽管这一机制低效运行，但它至少在运行着。随着制度的转轨，旧机制被打破，但新的市场机制尚不能承担所有的协调任务。在我后来写的有关转轨期萧条的文章中，称这种情形为制度荒原、制度混乱（institutional no-man's land and disruption）^①。

这些变化与其他一些因素一起，导致了转型地区遭受了世界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见任何经济调整或转轨要想取得成功，都不能盲目照搬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传统方案。

什么行动能一步到位

我在《路》中建议采取一步到位的强硬措施。在对这一建议作出回顾性的评价时，我将同时考虑匈牙利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经验。

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这一观念：同时采取几种调节措施的激进方案。一揽子准确的调节措施能够使宏观经济的几个重要方面立刻恢复平衡，或至少使宏观经济的

^① Oliver Blanchard (1997)，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一现象，称之为“非组织化”（disorganization）。

非均衡状态更接近可承受的限度内（例如，将经常项目逆差或预算赤字降到一个可承受的水平上）。

我现在要批评的是建议中的重点被错置了。我当初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一揽子调整措施被采用将很快取得哪些成果，而对应如何巩固这些成果并取得长远发展关注得太少。

达到经济均衡是困难的，但再次失去它却很容易。在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捷克共和国的经济有好几次似乎步入了正轨，然后却又出现波动：某些指标显示经济减速甚至绝对恶化。要想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仅靠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是不够的，还要推行深层次的全面制度变革。

《路》一书论及了所有与预算约束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方面，但我却与许多人同样错在没有充分指出其他改革的重要性。一举完成对预算平衡状况的迅速改善是容易的，例如可通过提高已有税收的税率。但要持续地改善预算状况则需要激进的税收改革、扩大税基、引入新税种并建立相应完整的税收征管体系。以上只是财税改革中较为轻松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削减政府支出，包括重组政府机构，改革教育、医疗及其他福利制度。此外还有金融方面的改革——仅仅宣布货币可兑换当然简单，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须构造一套有效的国际支付体系，建立国内外银行体系间的有效联系，确保履行国际支付协议，这一切是更为困难的工作。

宏观稳定不是一次战役，而是一场无止境的战争。稳定性不能通过突然袭击方式获得。制度变革只能通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革来逐步完成。我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很后悔当初在《路》中没有重点提出。

结 论

90年代初期的辩论是关于在“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之间的选择。当时，这是比较课程的课堂讨论中最受欢迎的题目之一，学生们不得不在他们的考试答卷中回答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不对，因此我不准备回答它。这个问题暗示一个标准：速度。我相信速度虽然很重要，但却不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标准。那时，许多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参与者就受害于对速度的迷恋^①。捷克共和国作为第一个完成经济大规模私有化的国家，曾得到了热烈的祝贺。匈牙利直到两年后、波兰或许是在三年后，私有部门作出了相同的贡献。但这又怎么样呢？社会的转轨不是赛马，成功的主要标志不是谁最先冲过了终点线。

对速度的过于重视导致了人们缺乏耐心、行为冒进和态度傲慢。“我们想做的，就能做到。”“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无偿分配国有资产和认股权证私有化的同义语，成了斯大林“大规模集体化”的翻版。这听起来可笑，但却是事实。斯大林不愿受自愿集体化的困扰、也不愿在集体化上耗费太长时间，在两三年内就把集体所有权强加于农

① 1999年5月17日，俄罗斯私有化的领袖人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在华盛顿特区的卡内基捐赠基金（Carnegie Endowment）作了一次演讲。让我从邀请机构发表的报告中引用一段话：“当问及丘拜斯在1992至1994年担任副总理推行私有化情况时，他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既缺乏公众支持而又迅速推进。其策略是尽快私有化，用一天中的每一分钟来私有化。丘拜斯曾宣称：‘我不说话，我私有化。’”

民。我不想夸大这一比较。幸运的是，在 90 年代，人们对私有化的接受是通过温和手段来完成的。然而，二者也有相似之处：所有制改革服从于政治和权力的需要，改革的推动者对渐进改革感到恐惧，急躁并且迷恋速度。

转轨只能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是革命与演进相结合的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制度或被保留，或遭淘汰，新制度建立起来。各项改革速度可以不同——某些可以一步到位，而其他改革则需要以增量变化的形式逐步推进。必须将重点放在巩固、稳定和持续发展上，而不是打破速度记录。

(王珊珊 班颖杰 译)

《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出版 10 年之后的自我评价

制度范式

一、概念的澄清^①

正如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本研究是对一个范式（paradigm）概念的应用。这个概念由库恩在他的经典文献（Kuhn 1962）中被介绍到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来。库恩没有对这个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事实上这个概念本身就引起了许多争论。

当我为这次会议做准备时，我重读了有关哲学，特别是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篇文献。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阅读经历，如果没有别的作用的话，它至少警告我要谨慎使用这一概念。因为哪怕在如何对基本概念进行解释上，作者们都没有一个一致的轨迹。各个哲学和科学史思想流派，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甚至恼怒的争论，基于他们固有的深深植根于认识论的差异而难以认同。这个结果是我要尽力

① 1998年9月3—5日，由 Wissenschaften 的柏林—勃兰登堡学院在柏林召开的“社会变迁的范式”的学术会议上，我递交了本文——作为一个讲演。我要对从会上的讨论者 Andreas Ryll 和 Helmut Wiesenthal，以及从 Agnes Benedict、Bernard Chavance、Zsuzsa Daniel 和 T.N. Srinivasan 那儿获得的有价值的评论表示谢意，我要感谢 Brian McLean 所做的出色的翻译，以及 Julianna Parti 在编辑本文时所给予的帮助。

避免的雷区。

然而,它促使我以澄清概念的方式来开始我的讨论,以避免最终的误解。我不指望对波普尔(Popper)、库恩、拉卡托斯(Lakatos)和其他人的科学史分析的正确程度的讨论做出贡献。如果我说明了在本文中范式一词是什么意思,对于一个专门的讨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在这里使用的意义上,学者们可以被认为在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中使用了同样的“范式”概念,如果他们表达了下列的一般属性:

1. 他们工作以解决相同的或接近的相关“难题”。他们从相同的或几乎相同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现实。他们试图阐述相同的、或相同类别的现象。而且,满足于对相同现象进行抽象或保持它们的晦涩难懂。那些使用共同范式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概况、观点和方法。

2. 他们使用相同或近似同类的概念框架(或许,编辑一个能够把一个作者的概念工具翻译成另一个作者的概念工具的词汇表相对容易)。

3. 他们使用相同的或相似的方法论去观察、处理经验和得出结论;他们用相同或相似的方法来支持他们的表述。

我没有说明超出这个更多的一般属性。换言之,我没有期待“范式伙伴”(partners in paradigm)从相同的公理开始并得出相同的主要结论^①。最重要的属性群被概括在观点1下:我把一个一般范式归功于那些面临相同问题和

^① Lakatos (1971) 设计的“研究程序”概念广为普及,对于许多作者而言,它比库恩的范式概念更加浓厚、完整和精确。刚刚给出的三个要点在 Lakatos 的概念中也非常清楚,尽管他也规定了其他的一般属性。所有按 Lakatos 意义上的“研究程序”工作的人赞成相同的“核心理论”,并准备做出相同的辅助性假设。

以相同办法寻求解决该问题的人。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得出了一个一般研究程序。^①

描述为三个要点的范式概念并没有精确对应库恩——该概念的创造者——所给出的定义。然而，它非常接近今天知识分子不太熟悉的一个范式的哲学含义。

许多人怀疑是否库恩的动态设计（一个范式内的标准科学，然后一个科学革命，然后一个新的范式的胜利）在自然科学史上具有一般有效性。可以肯定，库恩设计也不是社会科学史的特征。^②

在我所给定的不太严格限制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可互相替代的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并存、并扮演一个建设性和进步的角色显然是可能的。

在此我不想提倡一种非原则性的“和平共处”，社会科学史上也不乏一个范式不可改变地被另一个更具生命力范式所替代的各种例子，如果两个不同的、明显有区别的范式的主张被担心存在相同的难题，它们之间的对抗会发展起来。虽然如此，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去证明此处提出的范式要优于一些其他的范式，而是要表明它是不同的，以及这种不同是正当的。它之所以不同是它打算通过那些来自同样广为流传的范式的部分相同和部分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难题。

① 这里我故意在它的普通意义上使用研究程序这个表达词，而不是在 Lakatos 给它定义的特殊意义上。

② 这令人信服地表现在 M. 布劳格 (Blaug 1986) 的与经济学发展有关的研究中。

二、一个制度范式，而不是一个转轨范式

柏林会议的组织者要求我就“转轨范式”(transformational paradigm)进行发言。通过它可以理解什么呢？25个国家已经走上转轨之路。自从1989—1990年后，“过渡”(transition)和“转轨”(transformation)两个词被政治家、记者和学者说了、写了无数次的了。虽然如此，当我开始撰写本文时，我逐渐清楚地明白“转轨范式”一词被误解了。

讨论一个“制度范式”似乎更有用。我不想事先对这个概念进行描述，而是逐步让它自我展示在读者面前。随着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的过渡，转轨是时常地盘踞制度范式主张者心中的几个主题中的一个，这一点将显现出来。在有了一个它的子论题之后命名一个更加综合性的范式是不正确的。

就算把占有流行范式专利权的库恩的原创概念放到一旁，我们也不能忽视他的一个范式包括了一种科学团体长期坚持的普遍思考方式的观点。后来者在他们的课本上学到先前已形成的范式，这是制度范式所遇到的一个准则。它回顾一段很长的历史，并提供一个特定的具体范式提供的知识指导的研究者圈子。^①

① 就算能够定义一个“转轨范式”，它仍然不符合持续性的标准。因为一件事，即伴随着中东欧和前苏联制度崩溃而开始的转轨时期仅仅在几年前才发生。

三、一个简单的知识性历史

如果没有针对全部内容，要概述制度范式的发展在此只能留下空白。不像许多其他自然或社会科学的范式，制度范式不能只联系到某一个伟大名字，一个伟大的导致了一次科学革命的创造性人物。它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由一系列文献发展而成的。让我举出这些理论，它们在将制度范式区别于其他范式方面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殊的贡献。

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名字是马克思。在他之前也有人根据制度来进行思考，但正是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通过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而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他对比了两种形态：一个既存的和—一个他认为令人向往的乌托邦式的。他能够被认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是因为他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领域）。他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观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那以后，这些领域相互之间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主要趋势才被依据制度范式进行思考的研究者纳入其从事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中。马克思不将自己囿于检验资本主义或其他体制的某些方面的制度，而是观察其制度的总和——不是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观点。

在此，我将不展开马克思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否正确这一问题。根据本文所使用的定义，需要回答的问题一经提出，难题就需要解决，这形成了范式的主要属

性，马克思提出了许多问题，从此研究制度范式的研究者就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它提出了制度是如何变化的这一关键性问题，这就是发生在前资本主义形态向资本主义形态过渡期间的社会转轨。

在我的知识性理论的简单说明中，马克思之后的名字是米塞斯（1981）和哈耶克（1935 和 1944）。一些人可能感到奇怪，这个资本主义的愤怒的反对者和社会主义的预言家之后跟随的竟然是两个热情洋溢的资本主义的提倡者和社会主义的诋毁者。我这里谈论的不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而是社会科学家，他们对世界的观点是基于价值观和政治取向的。尽管马克思是一方面而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政治系列中相反的另一方，他们同样坚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是有意义的分析和研究。他们的思考方式产生了相同的范式的基本原理。他们考察社会联系和人的互动关系，并发现了引导特定人群按照特定方式行动的环境的重要性。由于这个或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属于制度范式的创造者之列。

在此我没有忘记说的是我没有提到哈耶克在讨论中的对手——奥斯卡·兰格。尽管要尊重兰格的理论成就，但我不得不说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著名的研究并不在获得制度范式灵感的著作中，它是一部枯燥的经济学著作。兰格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应该与他所描绘的经济机制相关联？他没有解决他所设计的公共企业的领导如何行动的问题，或者什么样的真实的社会条件将激励人们根据兰格模式在纸上所规定的“规则”去行动。米塞斯和哈耶克没有回避政治和经济是紧密相关的这一基本的重要

事实。激励、交流、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被放在讨论的最显著的位置。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思想是制度范式的突出代表,而兰格的那些研究则与此大相径庭。

在形成制度范式方面的一个重要角色是由卡尔·波兰尼(Polányi)扮演的,他把我们带回到政治舞台的左翼,尽管波兰尼并没有否认市场的优点,但他对这种机制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的关于经济可以被各种可替代的机制来协调的观点已成为了制度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市场,他对由互惠性和再分配原则所控制的协调机制给予了特别的留心。他的一篇主要著作的题目,《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2),暗示了共产主义制度崩溃后的变化并不是第一次如此的制度性变化。市场本身就是基于经常性变化的历史产物。

另一个制度范式的伟大建筑师是熊彼特,特别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一书。再一次的,题目本身就做了阐述。熊彼特试图从整体上去理解这两个制度,包括它们的政治的、社会学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方面。该书提出了制度范式的特征难题,比如,探索是什么东西使得制度具有持续性(cohesiveness),以及是什么东西开始了它的腐蚀?

熊彼特强调需要对各种分析社会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进行综合。应该做出努力去发展出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①

制度范式的主要属性被概括在沃尔特·欧根(Walter

^① Yuichi Shionoya (1995) 对于这一思想如何贯穿在熊彼特所有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关于理论史和方法论的著作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概述。

Eucken)^① 的著作中,他经常使用的“秩序”(Ordnung)概念对应于本研究中所指的制度——主要是经济活动的法律和制度性架构。他区分了两种主要的纯粹类型——中央统治经济和放任主义经济——并且对于中间道路解决方式投入了特别的关注。欧根不愿意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他认为这个词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使用得不足信了。然而,无论如何,这没有将欧根排除在制度范式的倡导者队伍之外。他的术语通过他的“范式伙伴”(paradigm - partners)一词能够容易地被翻译成不同的词语。

欧根肯定从希特勒德国和战后德国的直接经历中,以及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外界研究中得到了灵感,从而意识到政治方面的转变是如何影响经济秩序的变化。

对于制度范式的伟大先驱们我已经讲了很多,然而,依照库恩的观点,一个范式渗透到相信该范式的研究团体的日常活动中也是范式功能的一部分,承认基于它所建立的一个学科或亚学科的“规范性科学”。库恩视范式为一种控制手段,一种运用知识性学科的方式。因此,讨论任何范式必须涉及的不仅有将军、还有军官、军士和注意到同样知识性学科的普通士兵。库恩也指出,规范性科学的范式将自己显示在日常大学的教学和课本中。制度范式的

① 欧根的“经济秩序”理论被概括在他的书(1940)中,它的最成熟形式被概述在他的著作(1952)中。前一本书,而不是后一本被翻译成英文(欧根,1950)的书,顺便说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欧洲学者的思想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科学界获得极少的关注是一种不幸。尽管我很早就研究欧根的著作,当我开始本研究的第一稿写作时我也忘记了他(可能是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文献选择性引用惯例的影响)。我要感谢 Andreas Ryll 教授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遗漏。

灵魂可以在许多比较学科——比较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①——的课本中找到。

然而，在一个主流大学或冠以“比较社会科学”的课本里没有课程在追随熊彼特式观念的交叉学科精神。讲师或作者可能对自己专业之外的相邻学科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与兴趣，但是他们不得不对学术世界的分门别类作出让步。在那种程度上，按照库恩最初的意义，谈论在范式下追求规范性科学这本身是否正确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的一个特征——社会科学的交叉属性——在学院式教育中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接受。

如果我们不看教育状况，看看研究者之间的学术相互影响情况，情形会更令人有希望一些。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共同作者或相同研究团队的成员经常在一起工作。他们也就特定的主题举行联合会议。^②

让我通过谈及我自己的成果，即在《社会制度》^③一书中我所概述的，来结束这个知识性历史的回顾。在那儿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综合制度范式。我没有试图提供蒸馏形式的，换言之，哲学或科学语言的范式本身，代替的是我用制度范式的精神叙述了一个现存的、历史的形态，

① 让我提出两本最近出版的比较经济学的教科书作为例子，它们也涵盖了后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Carson (1997) 和 Chavance (1994)。

②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1998 年在巴黎由法国经济学家 Bernard Chavance 所组织召开的会议。它特意要证明存在一个广泛的学术团队在研究制度范式。这一思想可以很清楚地从会议的标题上表达出来：“经济制度的演进与转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

③ 见 Kornai (1992)。我第一次试图应用制度范式是在我的《反均衡》一书中，以一种论战的方式，许多方面的形式还不成熟或仅仅半成熟。

即历史上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我描述了它的产生、它的成熟形式、它的腐蚀和它的自我解构。如果本文的任何读者愿意了解我通过制度范式及其应用而试图表达的更多细节，他们可以去读那本书。

四、制度范式的主要属性

在知识性历史的回顾之后，让我试图概述制度范式的主要属性。

1. 依据制度范式进行思考的研究者关注作为整体的制度，以及这个整体与其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有限的、部分的分析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探索工具，但由于在这一观察角度之外，它仍然不可行。

2. 制度范式不能够被限制在任何传统的分学科中（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它必须被视为一个综合的、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流派。它对于社会功能的不同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所发生的交互影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前一节中提到的作为先驱的每一个学者都有一个最初的专业，他们是某一个主要学科的学者。波拉尼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其他的是经济学家。然而，他们的工作远远地超出了他们最初学科的界限。他们每一个都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或者说他们都是社会科学家。他们思想中的这种包罗万象不是一种偶然的冒险主义，也不是通过对相邻的学科院系蜻蜓点水般的涉猎所得。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这是决定性的因素。

3. 受制度范式引导的研究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经

济、政治或文化事件及其过程上，而是集中在这些事件或过程得以发生的更加持久不变的制度上，这些制度更多地决定了它们的过程。^① 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种制度（institutions）之间的区别，即在一个演化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制度与其他的、特别是由政府当局决定建立的制度之间的差别。“制度”的概念在本文中必须解读得非常广泛。比如，它包括有关制度中主要的法律秩序，它的道德规范以及它的产权制度，权力位置的分配，对社会成员的激励工作，以及信息结构。范式认为，社会运行的属性是否具有体制特殊性（system-specific），以及除了制度本身，它们是否也源于环境（如政治领导人的个性、日常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或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是特别重要的。

4. 制度范式需要很强的前后关系来理解现存的人类组织及产生组织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一个受到这种范式所鼓舞的研究者必须寻找一个基于历史术语的解释性理论。我们要在各种社会科学和历史的学科中寻找一种强结合。^②

5. 根据制度范式，个人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的产物。如果制度发生变化，偏好也会变。在历史回顾中其著作被提及的许多人持有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他们为保护个人自由和提倡广泛的个人选择而出来说话。然而，这与社会环境多大程度上和用什么方式来影响个人偏好的

① 在这个属性和“制度经济学”范式（见诺斯，1990）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和许多相通点。然而，我不想模糊两者之间的差别，因为制度范式和制度经济学在其他方面差异非常大。

② 心中要保持这种结合，也许把马克斯·韦伯列入到为制度范式铺平道路的伟大理论家名单中才是公平的。

科学解释是相容的。

6. 所有有关社会的范式都使用静态模型作为它们的一个工具，这只是因为方法论上的困难，没有一个学者不会意识到社会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制度范式之列的那些著作的思想与不在之列的同类著作的思想之间，区别在于前者对大变化、大转轨感兴趣。举个例子，他们调查在一个制度中存在什么样的衰败过程。他们关心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或者一种大的制度的标准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7. 受到制度范式引导的研究者意识到所有的制度都有缺陷，或者有自身所特有的机能障碍。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归因于制度，而不是磨房主的残酷。根据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不是由于社会主义执政者的残忍和偏执以及计划的不完备性造成的。波拉尼主张市场运行的失灵源于市场本身的性质。当然，马克思、米塞斯、哈耶克和波拉尼发现，识别一个他们反对的制度的问题比一个他们偏好的制度的问题要容易。熊彼特则更少具有偏见，他注意到了那些引起资本主义——他更偏好的制度——的官僚特征的问题。让我们暂时不考虑社会科学家的偏心这一棘手的问题。

无论研究者的动机如何，他们将发现，如果他们根据制度范式来思考，最大的挑战在于对其所关注的制度的内在机能障碍性特征的研究。没有哪个制度是完美的，每一个制度都拥有有害的成分，它们只能被缓和，而不能被根除，因为他们再生的倾向深深内嵌于该制度之中。

8. 每个范式都有其处理方法，以及其方法论特征。制度范式一个最明显的特征的方法是比较。通过比较一个

制度与另一个制度对应的属性、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这可以解释一个制度的某项属性。比较通常是定性的，虽然一些属性容易计量，这种计量提供了基于统计观察来做定量比较的机会。

依靠数理模型^①不是用于理论分析的制度范式的特征。这需要一个单独的验证来说明为什么不是。在几个确定的因素中，我愿意挑出其中我发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数理经济学和其他运用数理模型的社会科学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层面来操作。它们被局限于分析现实世界中一个很窄的部分，建构一个合适的模型进行数理分析便成为惟一可行的办法。制度范式的一个基础是尽可能地、全面地掌握现实世界，而不仅是现实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它准备对精确和精密作出重大让步。它的方法论是“柔性的”，而不是“半硬的”（或表面上硬的）经济范式。另一方面，它准备面对后者所回避的难题，稍后关于此将做更多说明。

五、后社会主义转轨：巨大挑战

我们面前正在飞速进行的大转轨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来检验和发展制度范式。一系列国家事实上从一个制度转向另一个制度。将全世界作为整体来看待，从前资本主义形态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的过渡经过了数个世纪。有人使

① 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制度范式启示了一篇研究文章，它是由数理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荣获诺贝尔奖的恰林·库普曼斯和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米切尔·蒙泰斯撰写的（Tjalling Koopmans 和 Michael Montias, 1968）。

用冷酷无情的暴力来描绘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形式——典型的斯大林制度，尽管如此，过渡持续了大约15年。现在，在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不到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在没有流血和暴力的“天鹅绒”革命之后，进展最快的东欧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大部分已经经历了过渡。

实实在在的历史变化过程证明了那些人所预言的将发生一个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尽管各国的过渡并不是同样的快，并且在相当多的国家内也存在着停滞和反复，但现在已很少有人怀疑转轨的方向是朝着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嫉妒他们的自然科学家同事们能够进行实验室操作。在这个案例中，历史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实验室。它来得太容易了，以至于不能说我们是否已经或正在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一个范式必须在数个主题中通过检验才能证明其可用性。最后一节将讨论基本主题中的一个：它的预测能力。让我们在这里先观察另外两个接近的具有相互关联的主题，制度范式如何通过解释能力和对日常实践的理论援助的检验。

制度范式已经证明是绝对必要的。每一个研究者依据它的概念来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官僚与自由企业、再分配与消费者主权：这些以及类似的概念提供了分析框架。就像莫里哀（Molier）的中产阶级绅士，直到哲人启蒙以后才知道自己在说散文，许多后社会主义转轨的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说着制度范式的语言，而不是他们自己学科的语言。

与制度范式有关的典型的难题已成为注意力的中心。

转轨应该保持什么速度？是否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一揽子方案可以马上采用，或者是否事情应该分几个阶段来引入？在引入需要的法律规则方面什么才是最好的顺序？孰为先孰为后？什么是经济变革所需的政治条件？而什么又是政治变革所需的经济条件？多少东西可以任其自然地、演进地转轨，而多少东西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和变革的推动来积极地完成？答案各种各样，但问题是一样的，它们不局限于一些学者。在准备全面的世界银行和美国经济研究局（EBRD）报告的研讨会上这些问题被问及，它们也被各国家政府的智囊团成员所关注。

制度范式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是基于观察后社会主义转轨研究的“客座明星”（guest star）表现出来的态度。^①在1990年的剧变之后，许多西方学术界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不甘于被置于局外。他们必须亲自过来看看，甚至提出建议。他们大多数人的热情是暂时的：他们来了、看了、得到了（或迷惑了），然后离开了。这就是我为什么称他们为客座明星的原因。他们非常像暂时离开自己的团体而出现在另一个团体的表演

① 此处关于来自国外的客座研究者扮演的角色的描写多少有点讽刺性，我本想说本土的建议者做得更好。在外国和本土专家中有人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劝告，同时两方面都有人，他们的建议被证明不太可行或完全错误。然而，在外国学者和国内专家之间他们的建议所赖以支持的范式基础存在着可观察到的差异。许多在共产党国家的大学接受教育的学院式经济学家没有受到来自西方的访问经济学家的所接受的主流范式的精神的影响。尽管他们很少受到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在崩溃之前许多年的改革争论训练了他们的思想根据同时变化的制度的各种成分来思考。

者。^① 让我们将他们区分为两类群体。对于第一类，较短的可用时间使他们不能跳出迄今左右他们思维方式的范式。这自然使他们不能发挥任何真正的影响力。然而，第二类群体的成员试图部分或全部地摆脱他们惯常的思维方式，并且有意识地或本能地采用制度范式。他们感觉到这个形势不属于一个“纯”经济学领域及其偏好的模型。他们不能遵循一个经济学家的常规，简单地假设抛开可能损害待证明法则的敏感性的任何客观存在。随意地将社会或经济的某一部分从总体中拿掉，而将实验只集中在这一部分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结果是受到那些部分和被假定抛开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影响的。由于制度中所有因素处在非常快的运动和变化中，作为一个处理问题的简单方式，静态模型的使用是无效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类“客座”研究群体准备丢下他们精确的模型和观点来听从他们一般的感觉和实在的直觉。他们的例子表明制度范式方法论缺乏基于精确的假设和定理的模型的原因并不是它的信徒不够精通数学。甚至受过良好数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建构可以对极其复杂的转轨问题得出真正令人心悦诚服的结果的模型。因此，理智上诚实一点更好。必须承认，制度范式是一个仅仅能够达到严格科学方法一半标准的方法。一方面，它要求它的说明具有逻辑一致性，陈述要受到论证和对相同或相反案例的比較的支持。另一方面，属于制度范式之列的

① 波特斯 (Portes, 1994) 运用了另一个隐喻来描述相同的现象。他们使他想起了美国内战后的投机客 (carpetbaggers)，在战后从北方跑到南方的政府官员、政治家和企业主。

著作，或者评论文章既不要求对命题严格的数理证明，也不需要建立在统计检验实验上的计量经济分析来支持它。

可以有把握地说，制度范式通过后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丰富起来。概念工具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精练，比较的范围在增大，而且适用于国际比较的计量经济分析成为了范式方法论中愈发突出的一部分。^①

一些西方研究者和顾问当然对于理解转轨问题做出了贡献，而且某些时候甚至以一种有益的和建设性的方式详细说明了现实任务。这特别有益于那些在这个领域坚持了较长时间并决定以此为专业的人。他们在实践中学到了他们的西方教育所忽略教给他们的东西。

享有很高声望的大学的学生，思想上习惯按照“假设—定理—证明”的惯例方式和最新的经济学科技巧来思考，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熟悉制度范式所应用的工具。自我提醒“我必须不能简单地问我正在抽象出什么。问一问我必须不能抽象掉什么至少也是一样重要的。我所检验的局部性问题是与整体部分相联系的？”对于他们来说还没有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学生们没有被鼓励去询问他们如何能够去观察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状态，或者比如，如果他们看到一个国家陷入危机他们该如何思考。即使学生们在他们的中学和本科教育中没有获得一丁点的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知识，他们一样可以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当然可以自愿地开阔这种知识，但是这样做不会有很大的价值和回报。恰恰相反，这可能会引起怀疑，即他们涉猎的方向太多而又都是外行。

① 对于后一项发展，例如见 De Melo 等（1997）和 Fisher 等（1996）。

对于大约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全世界人口，制度变迁是一种像腹泻一样的经历。那些居住在上转轨地区的人们不能够、并且将来也不会继续按他们以前生活的方式来生活。腹泻的感觉总体上没有影响社会科学。除了个别例外，“客座明星”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组织去继续他们曾丢下的工作。如果他们真正从根本上审视此事，他们这样做已经遗弃了空前难得的“实验室”。制度范式多多少少保持着客观的状态，而其他范式，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继续保持不受转轨的影响。

在我们的训练中不存在睁大眼睛的惊讶和与人文学科现状的内在不一致性——当某些重大事件发生时能够找到的健康心智和开放心胸的典型反应。这不是我所怀念的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我不是号召用另一种范式来取代主流范式。在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大体验之后，对于主流规范性科学而言，需要的是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它必须更明白什么是它能胜任的和什么是不能胜任的。我可能错了，但是我印象中在经济学专业里只有很少的人接受主流范式这个勉强的、更加有限范围的有效性。的确有一些人从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变革中明确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将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误解成主流经济学对其他全部的、可替代的范式的胜利。实际上，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于多种原因而获得了胜利。它的胜利是由于一些在其他事情之中的优良的特性，这些特性没有得到主流范式充分的分析和解释。

这里必须要加上一个重要的评论。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从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分析，开始研究其现象，那些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的人对于他们这种研究的局限性是有清

醒认识的。在此让我提一下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在那我说我不要求制度范式的专利权。设计它只是为了补充、而不是去代替在它们自己范围内适用的其他的范式。在这一点上，讨论主流范式的有效适用范围还是令人感兴趣的。它能对什么解释得很好？而哪些问题它不能回答或回答得很差？相反地，哪儿又是制度范式（或其他范式）适用边界？然而，我不得不延迟我对此想法的详细说明，而将它们作为另一个研究的主题。

六、一些其他的“难题”

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后社会主义的转轨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结束。转轨在各国将在何时结束的问题在此可搁置不论。转轨结束之后将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系统地消化转轨的经验。一旦我们的继承者、我们的学生来研究制度范式时，它是否会因为缺乏科学挑战而衰落？答案很明确是否定的。仍然会有许多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保持在科学议程中，并经常地向制度范式提出挑战。这些问题也将挑战补充的或对立的范式，包括那些我们在本次柏林会议上讨论的范式。让我通过列举四个需要保持后续研究的课题来解释这个答案。

1. 中国过去和将来的转轨是大难题中的一个，对此有责任心的研究者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掌握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解决方案的寻找当然要求制度范式的倡导者的参与，即使这不单单是他们所关心的。所有转轨经济出现的问题也会在中国突然出现，当然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中国巨大的面积和非常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潜力使

它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2. 制度范式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各种形式时能够有巨大的帮助。这也在演进范式和制度范式之间存在许多重叠的研究领域之中。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坚固的、统一的制度。它以很多变异的变体形式存在，在它们之中由历史来选择。演进的变革在其中发生。研究这些变异和导致的变体能够丰富制度范式的概念性工具，还有它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法论。

例如，日本、美国和德国各种不同形态如何相互区别？如果仅从经济、或者政治制度、或者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答案，或者把研究局限在一到两个制度，如政府干预或劳工关系上，这是不能找到满意答案的。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各种不同形态之间的差异，将能够对日本直到最近的不可思议的经济绩效、内涵于制度的各种原因，以及迅速出现的严峻问题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样一种理解也将更清楚地显示出美国和德国的现代资本主义道路是如何的不同。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基于制度范式——比较课程的教科书——的规范科学的证明过程。这些精华主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大”制度，以及相对较少地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同形态的比较上。在这些不同的形态的类型学上并没有一致性。作为依靠对真实历史领悟的概括而得出的适合于理论分析的理想形态的一个替代，这里仅仅倾向于一个个原型国家（比如日本、瑞典和美国）的特殊描述。明确地叙述这样一个理想形态的任务仍然存在。

3. 思索资本主义制度内的特定部分的真实状况是值得的，整体的某些问题，在某一微观层面，“大制度”被

复制。相关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由医疗保健制度改革所提供的，目前它被全世界提上议事日程。讨论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和那些提出建议的争论唤起了像我自己这样，参与过社会主义制度改革讨论的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为什么医疗保健部门的公共所有权要被保留，或者反之，要被废除？医疗保健行为由市场引导是否正确，还是应该把它留给官员？多大程度地给予消费者主权是可允许的和令人向往的？应该由谁来决定必需消费品的价格：市场、市场中某个特定的行为人，还是某些政府当局？什么是集权和分权的优势和劣势？如果医疗保健制度按照一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本质上如一些“兰格模式”经济来运行，各类行为人（医院管理者、医生和病人）的行为将如何表现？不仅是提出的问题，连现象也是相似的。在欧洲这非常真实，东欧和西欧，在那儿医疗保健多多少少是自主的，而且医疗保健部门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社会主义（最好是市场社会主义）孤岛，并且伴随着令人熟悉的各种特征：短缺、排队、申请名单、强迫替代、政府分配和定量配给。

自然地，西方国家那些参与保健制度讨论的人阅读和回应的文献是由他们的西方同事们，特别是保健经济学这一分学科的研究者所写。令人沮丧的是没有任何人注意社会主义的类似情况，即使同样问题的讨论在那种背景下数十年来一直在继续。此外，这些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已经在共产党国家付诸实现，因此，它们的结果是可辨别的。打个比方，保健改革的讨论中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完全的国家集权行为第一阶段极大地减少了管理成本，并且消除了广告和影响消费者这些竞争引起的供给成本。话虽如

此，但是这种高度集权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广泛采用，就等于彻底证明了集权是富有成效的吗？在市民主权和无力防卫方面它意味着什么呢？什么驱动力使它去创造或抑制技术发展。

使用制度范式的办法、概念工具和方法论，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来补充（而不是代替）目前的保健经济学范式是有价值的。如果这些争论的参与者吃透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讨论的文献将非常有益。人们会明白没有必要去“重新发现”所有这些问题和答案。这种研究将对于保健改革的争论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并且对那些至今被忽略的联系给予关注。

保健制度仅仅是许多微观层面的一个例子，这些微观层面能够在制度范式的框架内被当作制度来研究。

4. 我把最困难的问题放在我的讨论单的最后：“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性、历史性的转轨。在 20 世纪谈论两个大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证明是正当的，在这一观点的背后存在着广泛的共识。但是引用福山（Fukuyama 1992）的话，历史将在何处终结呢？在生产技术、人际交往、产权分配及其执行方法方面目前正发生重大变化，在 21 世纪末或 22 世纪，一个提倡制度范式的学者可能会说：“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是另一个大制度（或者几个其他的大制度），它不同于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并不赞成急于做这种表达，这也是没有根据的。需要考虑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将丝毫不变地保持多长时间。提出这种问题是演进范式和制度范式共同的内容之一。我相信制度范式对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画上界限提供了无可非议的标准。也许，但决非当然，如果要对迄今所理

解的资本主义与那些可能叫不出名的可以替代它的制度进行区分，同样的标准也是适用的。

七、预言的“缺陷”

前一部分我所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引出了一个我愿意用它作结论的课题：未来变化的问题。我所讲了这么多的东西不是要做预测工作，而是一个更窄的问题，即判断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公众同意称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发生了如此大程度的变化，以至于将它认为是另一个不同的大制度被证明是正当的。不能回避的是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制度范式的倡导者如何处理对于所有科学而言的一个基本科目的测试：预测。

简单的回答（虽然非常地且不公平地简短）是他们失败了。更精确点，不是他们所有的预测都是错误的，而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与历史不符。

让我们回到第二部分所提到过的名字，还是从马克思开始。数十年来，似乎马克思的基本预言正在实现，至少全世界的一部分：资本主义要给社会主义让路，私有产权被公有产权、市场被计划所取代。历史地来看待这件事，这样一个发展被证明仅仅是过渡性的。马克思的预言在那些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事情面前没有实现。

哈耶克预言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踏出脚步，走上不稳固的集权、国家干预和计划之路，它将不可避免地通向奴役之路。这也没有发生。在走完了这条路四分之一以后再停下来是可能的，半路返回也是可能的。这个问题取决于政治方面是否存在防治独裁的制度保证。

熊彼特的预言实际上与马克思的预言差别不大，但是他不是抱着一个预言家的热情，而是按照一个公正学者的认知来预测的。事实证明他极大地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而高估了社会主义的活力。他试图通过基于 Walrasian 经济学家的理论工作而建立的虚构模型来理解后者，而不是去研究苏联活生生的现实。

由于没有对苏联和相关国家的崩溃做出预言，“苏俄研究”（Sovietology）受到全面的责备。这个责备部分是合理的。一方面，比较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典范自以为是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要优于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许多讨论来证明它。在此意义上他们的工作暗示了一个一般的预言（相对于马克思和熊彼特的预言），即社会主义制度将逐步消亡。另一方面，“苏俄研究”甚至不能做出一个条件式预言，如什么时间、在什么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将消亡。

我也要对我自己的著作作自我评价。一方面，我认为在一个重要方面，我的著作的预言内容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我的许多东西方的同仁认为通过消除短缺的改革可以延长社会主义的生命，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指出，尽管改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它们却渐渐破坏了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它们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而不是在完善它，它们导致了侵蚀，而不是带来了稳定。

我所没有预见到的是这个侵蚀的速度和加速度。然而，妨碍我做出此预见的不是制度范式。相反，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有充分一致地和精巧地使用这一办法和方法论。我没有研究得足够深入。这意味着我未能观察到各种瓦解过程的相互影响，比如不断增长的经济困难、陷入在军备竞赛之中、在一些政治自由派取得胜利后共产主义意识形

态的觉醒、以及增长的犬儒主义和系统的腐败。用黑格尔式的术语来说,就是量变引起了质变。我们应该睁大眼睛观察跳跃和突变发生的第一迹象。

坦诚地说,虽然制度范式的阐述者不应该得到失败的记录,但是,他们在预言测试上也的确做得不好。我想我们应该为我们未来的工作学到经验教训,而不是用我前面说过的话——在别的科目上我们得了好分数^①——来安慰自己。

尽管要尽最大限度的努力来证明预言,但也不要怀抱任何狂热的幻想。历史的过程是很难于预见的,特别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基于方法论的理由,而不是作为一个借口,可以宣布,预言的范围非常局限在通过制度范式处理的调查范围内。在经常重复的现象范围内期待科学预言的可靠性才更加公平。人们经常买肉,使用好模型和可靠的统计数据才可能对肉价上涨1个百分点所减少的需求幅度做出可靠的预言。另一方面,苏联曾经形成、也曾经崩溃。尽管后一事件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没有人能够期待有一个可以涉及所有细节的科学预言,如什么时候它会发生、在它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它将如何发生。现

^① 卢布林的犹太法师享有作为一个大预言家的声誉。一天,在他的门徒面前他大叫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您看到了什么,智慧的法师?”门徒们问道。“我看到了克拉斯尼克,克拉斯尼克的犹太人居住区。”“那么克拉斯尼克的犹太人居住区发生了什么?”“我看到了火,有火正在接近克拉斯尼克!”法师的门徒拿起水桶急忙赶去帮助他们的犹太同胞。然而,当他们到达克拉斯尼克时,他们亲眼所见的是并没有火灾的迹象。克拉斯尼克的犹太人开始取笑他们:“原来你们的著名的法师也会犯错误。”于是,卢布林的犹太人答道:“的确,这里是没有火灾,但是他能够看到克拉斯尼克这么远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

在制度范式明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大的、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这类社会变革上。即使不能做出足够的预言,随后的在制度范式内的小心分析可以得出许多可推广的经验。

从对预言的评估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的确是非常适度的。制度范式可以用来解释过去和现在,推论出可以实践的建议,但是做预言时千万要十分小心。

本文并没有包括一个问题,即在社会研究中受教育获得的观点和科学主张之间的分界线将向何处延伸?^①在导言中我提及说我将尽我所能去回避科学哲学大争论的雷区。我这方面的谨慎使得我在这一点上避免分析科学行为的标准。我仅仅能够表达一种愿望,如果我们——制度范式的倡导者没有根据预言能力(或一种做作的能力上的自信)去试图测度我们预言的解释能力,将不会被排除在科学世界之外。

需要预言的现象的原因越广泛、越复杂,就越需要谨慎。做出的预言不能够超出条件的许可。知识方面的诚实要求我们甚至要节制这种谨慎的预言,必须承认,它们也是在相当程度的未知的基础上得出的。

(黄少卿 译)

^① 罗蒂在一篇纪念库恩去世的评论(Rorty, 1997)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赞誉库恩帮助揭示了这条分界线。在我的经济学专业内,相同的努力可以从麦克洛斯基的书(McCloskey 1985)中的文章中看到,它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同时我自己多次做出巨大努力,运用经济学学科所接受的讨论方式和证据来支持我的主张,除了运用其他的支持性工具之外,我同意罗蒂和麦克洛斯基的观点。这样的努力应该带着讽刺性的必要标准来看待,而且也具讽刺性的是自我承担代价。我想根据本文的基调那样是有启发的。

参考文献

Blaug, M. 1986.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Carson, R. L. 1997. *Co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Armonk, N. Y. : M. E. Sharpe.

Chavance, B.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st Systems. Economic Reform since the 1950's*.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De Melo, M. , C. Denizer, and A. Gelb. 1997. 'From Plan to Market: Patterns of Transitions,' in Blejer, M. I., and M. Skreb eds,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Transaiton Econom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ucken, W. [1940] 1965.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
alokonomie*. Berlin, Heidelberg and New York: Springer.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London: William
Hodge, 1950.

Eucken, W. 1952[1975], *Grundsatzt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Tubingen: Mohr.

Fischer, S. , R. Sahay and C. A. Vegh. 1996. 'Stabilization
and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Early Exper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2): 275 - 8.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and Lon-
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yek, F. A. , ed.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Am-

sterdam: North - Holland.

Koopmans, T.C. and J.M. Montias. [1968] 1971. 'On the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in Eckstein, A., ed., *Comparison of Economic System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ornai, J. 1971. *Anti - Equilibrium. On Economic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asks of Research*. Amsterdam: North - Holland.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hn, T.S. [1962]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atos, I. 1971.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Cohen, R.S., and C.R. Buck, eds, *Boston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VIII.

Lange, O. 1936, 1937.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1,2): 53 - 71, 123 - 142.

Marx, K. [1867 - 94] 1978. *Capital*. London: Penguin.

Marx, K. and F. Engels [1848] 1962.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Engels, Lenin, *The Essential Left*. London: Unwin Books.

McCloskey, D. 1985.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Madison Press.

Mises, L. von 1981.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

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Portes, R. 1994. 'Transformation Traps', *The Economic Journal*, 104(426): 1178 - 89.

Rorty, R. 1997. 'Thomas Kuhn, Rock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 *Common Knowledge*, 6(1): 6 - 16.

Schumpeter, J.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Shionoya, Y. 1995.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后社会主义转型：概览

有关后社会主义转型的信息多如潮水。除了日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还有数百篇专业文章发表，上百部专著出版，还举行过众多的学术会议，所有这些都针对这一转型进行评价并简要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本文不可能详细阐述某一方面的问题。我只想将所有这些信息加工处理，并尽量使其系统化。我会概括出一个概念性框架，希望该框架对分析这种转变有所帮助。

本文并不打算分析某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只想进行一般性分析，提出一些适用于整个后社会主义地区的建议。不过，有时我会以匈牙利为例进行分析。

本文并不是给那些专门进行后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研究的人看的，而是写给那些参与东欧转型经济，或至少对转型经济感兴趣的、各行业的众多知识分子的。

进行这样的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其中有三种方式尤其值得一提。第一种是对人们的愿望、希望和预期做一条理化概述。第二种是对向政治家及政府提出的建议做一

总括，对其中的一些表示赞同，对另一些进行反驳。^①最后一种是先对至今为止的转型经济进行经验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作出预测。我会尽量采取第三种方式，即实证——预测法。而不会去描述我希望看到未来的东欧是什么样的，我会按照我的假设来推测其可能的情形，而不是考虑是否我喜欢那样的东欧。

当然，我没有占卜未来的水晶球。我只是通过对几种来源渠道不同的经验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诊断。在后社会主义转型中，走在最前列的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三个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也必然会在其他转型国家中出现。同样，我们也能从西班牙、葡萄牙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近些年的历史中获取一些重要的经验。我这里仅指那些从未实行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就这一点而言，这些国家并未发生剧变，但它们确实已经历了深刻的政治转型，因为在这些国家民主已取代了专制。最后，我们也会从更为遥远的历史中吸取一些重要的教训，那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处在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建立框架之中。

在预测中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谨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预测要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修正。每一种分析都可能几种结果，即使只解释这几种结果的相对可能性也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

① 我过去已总结了后社会主义转型初期我的经济政策建议；我的1990年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是有关该问题的第一本书。这里我并不想重复我早先的建议，我只想预测未来的发展。对规范文献的一个精彩综述以及有关最初两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可以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92年的报告中找到。

转型经济的七种趋势

本文阐述了转型经济的七种趋势，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预测。我们这里的“趋势”是指社会运动的潮流和方向以及转型过程中内在的倾向、趋向和走向，而不是具体的、详细的、绝对化的预测。

趋势一：市场化

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一体化主要通过行政协作机制进行。^①协作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控制。上级部门向下级的领导发出执行某一任务的指令，同时不仅要提供完成任务的物质激励和道德激励，还要在必要的情形下实行行政强制。

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机制，但改革前，市场机制被限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而且大多数情形下都处在地下状态。后来，在发生重大政治变革前，借助于改革，市场机制应用的范围有所拓展。

政治变革之后，市场化趋势加速发展到一种很激进的程度并且显得势不可挡。命令经济不断收缩，一些国家一次性结束了命令经济，另一些国家则分步骤结束了命令经济。或早或晚，或快或慢，迄今为止由国家制定的价格将放开。产品和要素的行政配置被生产者和消费者、买方和卖方间自愿的商业合约所取代。竞争加强了，包括国内厂商与一定程度上自由化了的进口之间的竞争都加强了。

^① 有关社会主义体系的运行在我 1992 年的书中有详细的阐述。

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标准之一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中可自由定价进行交易的商品量所占的比例。一旦这部分商品占居主导地位，一旦这部分商品的比例总体上占了绝对优势，该经济体，至少在这一方面就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现在，根据这一标准，匈牙利已经可以划归市场经济体了。可以预见，市场化趋势会在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愈来愈强劲。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已看到了迈向完全竞争的成功推进（况且，所谓的“完全竞争”其实也并不是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特征）。大型国有垄断集团还会存在很长时间，而且，新的垄断企业会在旧国有垄断企业基础上涌现（或者，私有化了的国有垄断企业中会产生新的垄断企业）。外国投资者进入时常常带有明显的攫取垄断地位的意图。自由竞争仍然被许多经济因素和行政因素所制约，尽管这些制约从经济意义上看是极不适宜的。

在新的民主政体下，政府找不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要么是不需要政府时，政府过于积极；要么是需要政府管制和控制，或者需要政府有时或持续地进行干预时，政府却过于被动。

趋势二：私营部门的发展

倘若私有产权不占主导地位，市场是无法顺利运行的。从定义看，市场参与者互相自愿签约是市场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换言之，这一特征要求市场参与者有真正的自主权，制定决策无须依照官方的命令。然而，惟有私有产权才能保证这种独立性。

早在社会主义体制得到实践之前，米塞斯就警告人们

注意这一相关性。这一思想后来在哈耶克^①的著作中被着重提出。尽管有这样的警告，当时还产生了一种极富影响力的热衷于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潮，该思潮的指导原则可以概括如下：“将国家所有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这一思想的应用得到了尝试，例如，卡达尔执政时期的匈牙利，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前苏联。

市场社会主义观念所激发的改革并未按那些倡导者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他们的努力确实有助于放松陈旧的斯大林体制，也有助于让许多经济改革参与者接受市场经济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他们原本的目的，他们起初的抱负是远为雄心勃勃的。至今，所谓既优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又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制度”还未产生，不过，有人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在自己独有的基础上建立并稳定下来。

“市场社会主义”观念并未就此消失，人们还将看到它会一次又一次地复兴。但是，我认为，即使这些观念再次获得影响力，它们也注定会再次失败。

进一步的预测：后社会主义国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二重经济，即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并存。

决定这一发展步伐快慢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私营部门中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已经开始快速发展。尤其是在服务业、国内商业、国外贸易、建筑业和金融领域，私营经济增长极为迅速，而且私营经济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也在上升。

^① 米塞斯（1935）和哈耶克（1935）。

不论所考察的国家是大是小，成千上万家新型私营企业都在“涌现”出来。我们看到大的国内投资者已经出现，尽管开始时很少，但随后就频繁地出现——这些大的投资者是在已经发生的国内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兴起了，在一个曾经几乎消灭了中产阶级、终止或者说逆转了资产阶级化过程的社会中出现了。这个新的中产阶级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自由民”根基，包括由企业家、业主、经理组成的一个新的“实业阶级”。

这一过程的进行始终伴随着外资的进入，并随着外资的进入而深化，外资的进入大多又必然与著名大公司、大银行、大跨国公司发生关系。新的“实业阶级”从一开始就接触到了国界外的经济生活。

甚至到今天，还呈出一幅极为多样的画面，按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私营部门，仍是各式各样的。其中既有中小公司，也有大公司；既有落后的“巴尔干式”作坊，也有现代超级工厂。它们中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准合法的、有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但它们互相并存，互相掺合，互相渗透。这一过程的发生就像某种细胞的繁殖，或像灌木丛中闪电般涌出的上千种草木。

与此同时，国有部门一直在萎缩，一直萎缩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部门一般具有的微小规模。这种萎缩以各种方式进行。一些国有企业转移到私人手中，或者原封不动地转手，或者重组后转手。这种所有权的转换过程可能是通过政府出售企业的产权，或者是将企业的产权无偿分配给特定的人群（比如，分配给该企业的雇员；或者分配给那些参与改革的人以补偿他们先前被没收了的财产；

或者分配给所有参与无偿私有化运动的公民)。各种私有化计划可能分别独立进行，也可能互相配合进行。

然而，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外，国有部门还在以其他方式萎缩。一些国有企业关闭了；另一些虽然存活下来了，但其部分资产已被卖掉或清理，企业的规模大大萎缩。当它们的自有资本被逐渐用完时，许多企业就发生了“资本分化”现象，同时我们还面临另一种现象：盗窃国家财产，尤其是其“智力资产”、人力资本和其有价值的商业网络和商誉，其中大部分案件都钻了法律的空子。国有部门的缓慢萎缩伴随着财产的损失和人性的煎熬，这个过程在许多方面是以极不道德的方式进行的。与此同时，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又在低效运行。人们希望，在私营经济的压力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会提高效率，然而，这是毫无保障的。

对上述情况，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计算。一种只衡量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进程：以国有部门的最初比重为基础，计算每年转入私人手中的比例。这一过程很可能会持续很久。另外一种，也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计算方法则较为宽泛。只衡量私营部门的增长，包括新“出现”的私营部门和已被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然后，我们比较私营企业的增长和国有企业的收缩，而不管这种收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私有化、清理、减产或资产流失。这两个过程的特征尽管恰好相反，但几年之后，它们会共同导致私营经济的比重高于国有经济。例如，可以断言，匈牙利的私营经济在今后几年就会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其他国家，发展速度可能各不相同，发展私营经济所需时间的长短根本上取决于上述两种发展过程的相互作用。

政府可能积极地加速这一进程，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政府的笨拙与低效而使产权关系的转换过程更慢、更痛苦。但是，最终任何政府政策的错误都不可能“阻滞”所有权的改变。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其自身内在的动力，而不是靠政府命令。^①

趋势三：宏观非均衡的再生产

受旧体制的影响，政治转向后的新政体产生了严重的宏观不平衡。以下四种非均衡频繁出现：商品严重短缺，通货膨胀不断上升（或受到抑制），财政预算赤字和外债。这四个问题中，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同时危害着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且使问题激化。^②

某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非均衡如此严重以至于无路可走，只得同时采取一系列稳定措施，而这些措施又会招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其他国家的政府可以在较为激进的、快速的稳定战略与渐进的、缓慢的稳定战略间进行选择。由于担心遭到政治上的反抗，大多数政府往往选择了后者。

大部分专家都同意以下预测。

对克服社会主义体制下最痛苦的症状之一——严重而

① 对后社会主义转型中市场化的类别及产权关系转换过程，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展开了争论。我赞同强调在协调机制方面进一步转型的观点，而且，产权转换不可能通过激进的行政手段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通过演进方式进行整体发展。相似的观点参见 P. Murrell (1992) 和 K. Poznanski (1992) 的文章。

② 东欧地区宏观状况的分析和有关问题的理论综述参见前面提到的联合国的调查报告 (1992)。

普遍的商品短缺，大家都较为乐观。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的组合来解决：私营经济的快速增长，企业的自由发展与进口的自由化可以从供给方面使超额需求得到满足；同时，放开的价格、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的财经纪律和对工资上涨的控制均会抑制需求。比如，我们可以说匈牙利已不再是一个商品严重短缺的经济体了；至多只在一两个部门存在商品的部分短缺。这一地区的其他许多国家虽然还未达到这一步，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大概都会解决商品短缺问题。

但是，对通货膨胀及其主要诱因的预算赤字则较为悲观。抑制或快速降低通货膨胀需要激进的措施：大幅削减公共开支，限制信贷和名义收入增长的速度。这可能会暂时达到目的，并大幅度地降低通货膨胀率，但常常会伴随着生产萎缩，出现失业甚至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最终，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制定者的持续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反击衰退的措施，重新启动经济，降低失业率，但却会再次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曾经被减速甚至被消除的通货膨胀又面临着一次又一次加速的危险。

另一方面，倘若政府不是通过通货膨胀手段即印钞来为预算赤字融资，而是发行债券，这又会挤出信贷市场上的私人投资者，从而，推迟经济的复苏。另外一条路是利用外国贷款为预算债务融资，但这又会增加外债。

失业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及。无论先前的体制引致了其他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它确实维持了充分就业，而且，事实上还存在长期的劳动短缺。经济体制变革带来的另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超额需求转为超额供给——劳动力短缺转变为失业。这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正如我前面谈到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可能会引致生产萎缩。国内需求结构的调整又会使一些企业减产甚至停产，国内需求结构的调整是与外贸结构的变化相关的，而外贸结构的变化又部分源于把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经互会的解体。私有化，甚至只是要求国有企业有较高利润率，都迫使经理们解雇大批职工以对付企业冗员问题。这些因素既可能分别导致失业问题，又可能因为过剩效应而加剧失业问题。一个地方生产的萎缩会同时导致其需求的减少，其需求的减少又会进一步引发另一个地方生产的萎缩，如此反复，连续不断。

关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作出两个预测。一方面，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会消失，而且经济结构转型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的数量会逐渐固定下来。另一方面，还会出现进一步的衰退，比未来长期平均的、“正常”的失业率更高的失业率还可能会存在几年时间。

先进工业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经常面临经济周期波动的两难困境：用来对付失业问题的努力可能引致通货膨胀，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的努力又可能提高失业率。即使一开始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情形更糟，因为一开始——政治转折点——其经济体就面对着严重的或被强行抑制的通货膨胀。整个社会陷入了一个个痛苦的陷阱之中：无论试图解决哪一个问题，都会同时使其他问题加剧。因此，宏观稳定与均衡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政府迫于社会紧张局势的压力（这种紧张的局面事实上恰恰就是经济问题引起的），而不进一步采取必要的、严厉的、连续的政策，政府就会面临进一步使社会遭到损失的

危险。政府通常更倾向于采取“胡乱应付”的政策来拖延对问题的解决。这就意味着社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得继续忍受宏观非均衡的痛苦。

趋势四：一个立宪政体的发展

基于私人所有权占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如果缺乏一个必要的法律基础结构（设施），是不可能运行的。私有产权必须得到保证，私人合约的遵守要得到保障，企业与公民要得到保护，使他们不会遭受官僚的任意干预。同时，经济体的许多方面都需要政府的监督或管理，尤其是在那些私人合同的生效和私人企业的活动已产生外部效应时，这时，外部效应已超过了当事人的直接交易费用。政府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对银行和保险机构进行监督，保证反垄断法的实施，保护环境。

相信以下预测是有理由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结构毫无疑问会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因为转型经济需要这样的法律基础结构。但是，其建立的过程是漫长的。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我们应区分清以下三种不同层次的政府活动。

第一层次是立法。这可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先订立的几十条条文必须重新修订，因为，熟悉现代市场经济法规的律师才刚刚出现，议会成员自身对立宪政体中的立法者的工作还不熟悉，还没有经验。但是，尽管有重重困难，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可以完成。

第二层次是执法。这一任务可能更艰难。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司法律顾问必须重新学习他们的业务。法院受理的商务审判与诉讼案件已经堆积如山；对审判时间和

民事过程的拖延损害了人们对法律的维护和对合同的遵守。

第三层次，也是最后一层次，是公民意识的转变。这项任务可能最艰巨，历时最久。先前的缺乏合法性的制度摧毁了人们对法律的信守；他们只受变幻莫测的压制的影响。对私人合约的维护也同样是不够的；在经济生活中不遵守诺言和不还债几乎被认为是很自然的。那些巧妙地规避管制的人很受仰慕，因为这是惟一的生存方式。在这一方面，改进公共道德还要花很长时间，在此之前，法规的破坏、对公众信任的背叛、逃税、商业欺骗或腐败都注定会存在。

趋势五：民主制度的发展

对空洞的口号每一个人都很熟悉，这些口号常常用简单的词语来描述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关系。但事实上，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

我想介绍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在东欧，从社会主义制度向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废除东欧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就涉及到一党专政这一特殊说法，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或者独裁政治形式。在这样的制度下，享有垄断地位的执政党提出的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纲领。在这个体制里，反资本主义并不是那种在其意识形态和纲领中占第二位或第三位的要素，而是直接体现为她的首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 1989 年、1990 年之前东欧的改革都是不完全、不连贯的的最简单的解释。很多人认为，建立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根

本条件是废除东欧共产党的政治垄断。一旦这一条件得以满足，铲除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主要障碍，转型过程就开始安全地走上必由之路（见前面论述中趋势一和趋势二的评论）。

第二种观点：所有的议会民主政体都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毫无例外。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的议会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不过，各种民主政体的经济体在很多方面各不相同。比如，有的经济体中公共部门所占比例较大，有的较小，但没有一个经济体中公有部门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整个经济的主体。有的经济体中政府控制的再分配的比例大一些，有的小一些，但所有这些经济体中，市场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调节者和综合者。

要想稳定民主制度，就必须保证个人的自由和自主。其中最重要的是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和对私人合约的保护。在国有部门占主导或取得绝对地位的地方，职员个人失去了“退出”的机会，因为到最后只有一个雇主：国家。完全的国家所有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

但是，相反的观点是什么？每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都是一个民主政体吗？很显然不是。

第三种观点：并不是所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都是民主政体。这种经济形式是与许多种独裁政治和其他专制体制相容的。你只要想想希特勒的纳粹、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的韩国。事实上，一些独裁统治可能与非常有效率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结合在一起。

由此产生的争论在后社会主义国家频繁地出现（如果没有出版，至少也在私下里议论）：

在由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由独裁政治体制来领导具有明显的优势。转型伴随着混乱，因而需要“法律和秩序”，这时，只有靠一个严厉政府才能保证“法律和秩序”。转型还会造成社会局势紧张，但为了转型成功，坚持既定的经济政策是重要的，尽管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一个支持严厉的行政管理的理由是，它能打破任何群众武装力量的反抗。坚持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智利的皮诺切特。

这个论点并非毫无道理。特别是在一个社会转型的伟大变革时期，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民主的传播，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二律悖反。是否在所有情形下都存在这种二律悖反还不能确定。我们希望，东欧地区面临这种艰难选择的国家越少越好，遭遇这种痛苦选择的国家越少越好，但决不能忽视这两难选择。在确实面对这种两难选择时，选择可持续的民主，即使牺牲一定的经济成就，也是明智之举。

绕了一圈之后，让我们从实证回到预测。我提出最后四种趋势时还有些疑问或者说信心不足（也就是说，并不是没有保留或充满信心的）。现在，我要进一步阐明自己的保留意见。在东欧，尽管有些国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未遇到阻碍，有些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扼杀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并未排除，一定程度上的或完全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还会出现、独裁统治还会存在。社会紧张局势持续时间越长，问题变得越尖锐，这种情况发生的危险性就越大。东欧的每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信奉者都必须时刻警

惕地捍卫民主，国际团体也应如此。

趋势六：民族团体的重新定义

社会主义政体下，东欧的民族问题被抑制了。旧体制下同样也存在着民族问题，但这样的问题从来都不可能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民族问题至多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较松的地方偶尔有所爆发，然而即使在那些地方，人们也只能半遮半掩地表达他们的意见。

1989—1990年，共产主义制度在东欧崩溃，尤为重要的是在苏联，共产主义制度首先从实质上被弱化，然后彻底毁灭。这个发展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东欧国家的民族主权得以恢复，前苏联各地区的民族主权得以恢复。先是德国，继而是苏联占领了该地区将近半个世纪后，这些具有主权的国家的领土上不再有外国军队驻扎（不过，必须立即补充说明的是，这里仍有例外）。^①

新形势有几个方面的影响。这里，我只想谈其经济影响。在先进的工业国和后社会主义地区可以观察到一些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尽管从地理学的角度看显然不太准确，但为简洁起见，我们称经合组织国家为西方，后社会主义国家为东方）。在西方，凝聚力在稳步加强。各民族经济体制正在向共同、和谐、一体的方向发展。跨越原有国界的商品、资本、货币、劳动力和知识的流动正变得越

^① 在取代了苏联的部分作用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军事控制下，巴尔干地区仍有大批外国驻军。在前南斯拉夫疆界内进行战争期间，新成立的国家的边界还有争议。按原有边界来考察，那些自认为具有独立主权的新国家内仍有外国占领军。

来越自由。另一方面，在东方，一种巨大的离心力突然爆发。从前超国家的大联合体解体了；出现了分离和独立的趋势。新的、保护起来的国界构成了经济障碍，而这在以前是不起作用或只起一点作用的。

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评价后一种趋势，那么，这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根据专家或经济学家的标准，大规模的统一体比分离的、分裂的、小的民族经济体更有效率，因为这些小经济体减少了相互合作，而且总是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起来。几乎像其他任何一种阻碍资源自由配置的障碍一样，正在出现的新局势很可能会降低利用经济资源的效率。

不过，本文并不打算从这一角度对转型进行评价。本文的目的在于预测而不是建议。所以，主要的问题是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

首先，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是重新定义民族国家。只有这样做之后，才能谈超国家体的发展或者加入已经存在的超国家体的问题。一个超国家机构（可以是一个货币联盟、一个关税同盟、一种劳动或资本自由流动的计划，也可以是一个更充分的一体化计划）的形式只能是自愿的行为，当这些国家的合法政府都认为该统一体将对自己的人民有利时，才会形成这样的统一体。外在地施加向心力，外在地把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一体化计划之外强加给最近才开始感受自主权的国家，这是极为错误的。^① 回顾一下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一方面，经互会崩溃了，因为它是苏

^① 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外贸和经济合作的问题，参见 I. Illes, K. Mizesei 和 I. Szegvare (1991) 及 P. B. Kenen (1991)。

联强加给东欧各国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也解体了，因为在许多方面它们是人为的产物，是压迫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很稳固了而且试图在更广泛的一体化形式上取得进展，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稳定而完整地发展的，是随着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逐渐地、自愿地放弃它们的部分主权而发展的。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独立与分裂的趋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区域合作对参与合作的各国在经济上是有益的，但区域合作的趋势还是会很弱。尽管总预测的方向是这样的，但在这一总趋势下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最理想的情况是，相互间的独立、分离与排斥是通过和平的文明协议来实现的。最可怕的是试图重新瓜分领土的局部战争。即使没有战争，邻国间激烈的争论所造成的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也可能一直存在下去，邻国反对某国不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抗议会引致该国对这种批评的激烈反对和对自身主权的强烈捍卫。像这样的现象，在东欧地区的历史上还可以找到许多，这些现象使国家间相互不信任，减少了进行地区合作的机会。

在我看来，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加速“欧洲化”是可取的。但是，与我文章的总的性质相一致，我进行的是预测而非抒发我的愿望，所以，我必须说，我并不指望“欧洲化”有快速的进展。

目前，还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欧共同体有许多标准，包括对经济活动的法律管制、质量标准、关税及税率。任何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与经济活动，在每一方面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欧共体的标准。

同时，明显地看到，社会上还存在强烈的抵制，官方

公开讲话中似乎听不出来，但可以从各种隐藏的形式、从各种隐语中看到这种抵制；有人还要求刹住实际变革的车轮。东欧还存在相当有影响力的团体，他们煽动人们反对反民族的“西化”，传播对“外国”资本的疑虑。当国际组织要求具体国家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时，他们煽动民族情绪。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着敌对情绪。如果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意味着对新移民设置更高的障碍，那谁还想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呢？如果向东方出口有利可图，商界就对东方表示友好，但在向东方开放自己的进口市场方面，他们就不那么积极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预期“欧洲化”的进程、东欧成为欧洲共同体有机组成部分的进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机构的进程会很慢的原因。

趋势七：福利提高中的不公平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这些趋势怎样影响人类呢？原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人们遭受商品严重短缺的痛苦。但是，与此相伴随的是充分就业和适当程度的社会保障和经济保障。一定程度的平等是社会的特征。特权阶层的范围很小。即使其余的人不以同样的方式生活，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被限制在一个一成不变的较低的水平之内。

由于巨大的转型已经使后社会主义国家从过去的状态下转变过来，人们的平均物质福利水平可能会有所改进。可是生活水平不会立即提高；在相当长时间内，趋势三所讨论的经济问题还可能导致滞胀或公众的平均物质消费水平的绝对下降。所有这些仅指平均水平，只是一个统计范

畴，个人对此并无直接体验。

在转型初期，一些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构成了一个广大的社会阶层，其中，主要是业主、经理，许多时候甚至是普通雇员，他们的活动往往与私营企业相关。必须再说明的一点是，这一阶层中有一个更小的群体，该群体很快变得特别有钱。可是，与此同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却降低了，大多数情形是生活水平逐渐下降且降幅较小，其他情形下，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且降幅较大。

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人的生活，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相比，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业绩和运气。同时，政府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比较小。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实行的是家长式管理。所有那些评判制度变革优劣的人，只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进行，而不管急剧提高个人的地位并降低政府在决定个人命运中的作用是优是劣，但是，作为一种趋势，这种变化肯定会完成。这就使物质财富的分配以更多样的方式进行，并且，必然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

每一个地区的政府和政党都强调要保持一个社会安全体系，或者如果还未形成的话，就创立一个社会安全体系。这个体系的一些组成部分，如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和失业救济计划，已经开始在大部分后社会主义国家运行了。但是，必须承认这些体系还存在很多漏洞。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不可能留给后人一个成熟的福利制度。它们是一些前后不一致的、被扭曲的、“未成熟的”福利制度，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这些福利制度注定不能完成其旧的法律体系所规定的满足人们充分需求的福利目标。老年养

老金体系虽然涉及面很广，但主要靠养老金生活的大部分人，生活水平都相当低；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免费的卫生保健，但医疗服务设施非常落后。在福利制度最发达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建立这样的制度并且使国家的福利义务在法律上生效也只是在经过几十年持续经济发展之后才开始的。^①处在衰退、通货膨胀和高外债——换句话讲，就是宏观非均衡——之中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由政府来承担福利任务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接连不断的问题。

综合所有这些原因，对滞胀或物质生活水平的降低、失业和社会保障的突然丧失的深深不满遍布各阶层，这种不满估计还会持续很久。在这样的状况下，再要求人们作出进一步的牺牲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校正宏观非均衡还会拖延很久的另一个原因，更不用提从维护民主的角度来看不满情绪所导致的危险。

有关变化趋势的总结性评论

我已经列出了七种趋势；但还未包括所有可能的情形，不过已经列出了我认为最重要的几种情形。正如我在本文的篇首所强调的，我没有作出宿命论式的预言。我只提出几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一些两难选择，然后说明我认为哪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最大（这不同于我最喜欢哪一种选择）。变化的进程也不能预先确定。我最有把握说的是转型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其他理由，宿命论是不合理的，因为可以清楚地看到，决

① 参见 A.Lindbeck (1990)。

定变化方向与进程的因素：

1. 它们取决于政府是明智还是愚蠢，是高效还是无能。伊拉斯谟（Erasmus, 1516）建议统治者和其他的官员要“避免与野心、愤怒、贪婪、谄媚为伍。”^①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御这些诱惑还有待于观察。

2. 它们取决于反对力量的强弱，取决于这些反对力量是破坏性的，是想通过民粹主义的煽动来获取政权，还是温和的、有建设性的。

3. 它们取决于一般民众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取决于民众是否守纪律，是否能够忍受长时间的牺牲。

4. 它们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帮助，取决于帮助的范围和所采取的形式。

那么，我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就近几年来看，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以上所述的七种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绝大多数人还可以忍受目前的状况，一小部分人的状况在逐渐好转，所以，会有稳定的、全面发展的机会。然而，在另一些国家，会发生严重的动荡，乃至社会剧变。

就长期而言，我无疑是个乐观主义者。最终形成的制度可能不是一个“好社会”。它会充满缺陷，还会表现出一些令人厌恶的特征，但在物质条件和对人权的保护方面，它仍会好于先前的制度。我是一个长期的乐观主义者，因为即使政权没有掌握在最好的政府手中，也有一种

^① 引言出自他的专著《基督教国家王子的教育》，纽约诺顿出版社1968年版。

很强的、自发的内在趋势将变革向一个好的方向引导。

学者的责任

最后，我想再就学者的责任谈点看法。

我们西方的同行正试图为东方学术界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邀请东方的同行并提供奖学金，在后社会主义地区担任客座教授，通过合作研究交流经验并向东方学术机构捐赠图书、期刊及仪器——有很多可能的资助方式，这只是其中的少数几种。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多帮助，但即使这样的帮助再增加几倍，距离实际要求还差得很远。

西方和东方的学者都经常给政府、政党、运动组织、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联盟、国际机构和实业界作顾问。此类活动是很有必要的，但提出一些警告也可能有益无害。我们必须尽量以适当的方式提出我们的建议。如果我们的观点不适用怎么办？如果我们的主张对那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地方的情形不太适应怎么办？这时，不要急躁，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推行自己的主张，因为，那样可能反而使我们作为顾问的整个工作名誉扫地。还是让我们从伊拉斯谟那里寻找灵感吧：拥有一点自嘲也许有好处。

有时，形势赋予我们的责任是调解人，而不是顾问；我们的任务是想方设法将冲突的观点调和或者调解不同的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我们仍能从伊拉斯谟著作的思想中找到灵感：让我们多一点理性，多讲道理，多一点调和色彩。我们不要从所面对的风险中退缩；在敌对双方愤怒咆哮时，试图加进冷静的言辞，正是这样的人可能被双方排

斥并被当作异教徒。面对这种风险,我们仍然要为社会道德而呐喊,要为被践踏的人的自由而呐喊,要为年轻的、遭受攻击的民主制度而呐喊,要为被情感所淹没的思想和耐性而呐喊。

(杨再平等 译)

参考文献

Erasmus, Desiderius. [1516] 1968. The Education of the Christian Prince. New York: W. W. Norton.

Hayek, Friedrich A., ed.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Illes, Ivan, Mizsei, Kalman, and Szegvari, Ivan. 1991. "Valaszuton a Kozep - europai gazdasagi egyuttmukodes" (central -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t Crossroads). Europa Forum 1 (2): 28 - 42.

Kenen, Peter B. 1991.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for Trade and Payments among the CMEA Countries." IMF Staff Papers 38 (2): 235 - 267.

Kornai, Janos. [1989]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ndbeck, Assar. 1990. "The Swedish Experienc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Seminar Paper no. 482. Stockholm University.

Marx, Karl and Engels, Frederick. [1848], 1970.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pp.35 - 63.

Mises, Ludwig Von. [1920] 1935. "Economic Calculations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ited by Friedrich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87 - 130.

Murrell, Peter. 1992. "Evolutionary and Radical Approaches to Economic Reform." *Economics of Planning* 25 (1): 79 - 95.

Poznanski, Kazimierz. 1992. "Market Alternative to State Activism in Restoring the Capitalist Economy." *Economics of Planning* 25 (1): 5 - 77.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1992.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in 1991 - 1992*. New York.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和研究^①

一、引言

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典型特征之一便是短缺经济，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一个经济制度就可称为短缺经济。短缺现象是：（1）普遍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经济层面都存在（商品交易、消费者服务、生产资料包括投资品、劳动力、进出口商品及国际支付手段）；（2）频繁的。既非例外也非偶然；（3）高强度的。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和环境，以及经济过程的特点和结果都深受其影响；（4）长期的。经常发生，而不只是暂时出现^②。

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伴随着短缺经济的消除。

本研究从两个层次探讨这一问题。一个层次是一般分析，这里不考虑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特定历史形势。另一个层次是对匈牙利发展的研究，就像上面所讲的。虽然偶尔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和研究

① 我要对那些对本研究的初稿作出过评论的人表示感谢，尤其要感谢下列提出过宝贵意见的人：弗朗西斯·贝特等。我的研究受到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OTKA），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布达佩斯大学高级研究院的资助，对此我也表示感谢。

② 科尔奈（1992d），第233页。

我会参考其他国家的情况，但我并不试图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比较分析。本研究在一般和匈牙利两个层次上会有所交替。

本研究是我有关短缺经济问题早期研究的继续，我关于这个题目的研究开端于《经济管理中的过分集中》，最初总结于《短缺经济学》，最后全面总结于《社会主义制度》一书。写作本文时我假设读者对短缺经济的文献已很精通，对其使用的概念也非常熟悉^①。

只是在过去 15 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爆发的短缺才引发了大规模有关概念工具、短缺衡量和短缺原因的讨论。本研究并不想提供这一领域的理论历史，或阐述各种观点是如何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或否定的。在开始此次研究后我本人的观点也曾发生许多变化。我曾试图运用从他人那里学来的东西来修正和推进自己的思考，并同时进行综合^②。正是朝着这个综合的目标，我在《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写出了和社会主义经济相关的章节，这项与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在和未来相关的研究也是在同样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

许多作者都在研究如何在后社会主义制度下消除短缺经济。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并非主要的研究题目，只是将之和其他题目一块儿研究。我尤其要提到柏格和萨克

① 见科尔奈 (1959) [1957]，第四章 (1980) 和 (1992d)，有关短缺的扼要论述，我推荐读者看科尔奈 (1992d)，第 11、12 和 15 章，及 van Brabant (1990)。

② 当写作《短缺经济学》时我对早期的作品已有深入研究。有关参考资料见科尔奈 (1980) 第 29~30 页和第 133 页，及科尔奈 (1992d) 第 228 至 229 页。

斯(1992),拉斯基等人(1993),罗萨提(1993)和朱可夫斯基(1993)的成果,它们对我的工作有启发性效果。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描述了消除短缺经济的现象。第三部分是原因分析,第四部分讨论短缺的消除和劳动力市场状况之间的关系。最后,第五部分对变化作了评价。

二、变化的现象

本部分有双重目的。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描述用于观察和衡量消除短缺经济过程的方法^①。这很重要,因为本研究接着便会提出这一过程与制度的变化联系十分紧密。因此分析一国在消除短缺经济中所处的位置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重要信息。

本研究的另一目的是描述匈牙利的特殊变化。只是从现象这一层次进行描述,从产品与服务的购买者角度进行研究。

(一) 生产者商品

长期短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由于各种投入品(物质、半成品、零件、设备或劳动力)的短缺频繁引发生产的波动、滞后甚至严重损失。生产者常常进行强制性替代;如果某些必备投入品供应不足就会使得生产陷入长期或短期停顿。在进行即时或短期调整过程中,短缺现象成为最常见的生产增长制约因素,而销售方面则没有任何困难。

^① “描述”这一用语表明我不能保证给出全面而完整的方法,只能对一些可行而有效的观察和衡量方法进行描述。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情况正好相反，那儿偶尔也会发生获得投入品方面的问题，但对生产更多的、更常见的约束是订单的缺乏和销售困难。由于这种现象，我将前者称为“资源约束型”制度，后者称为“需求约束型”制度^①。在某些情况下，造成有效约束的不是物质资源本身，而是供给使用者的数量。因此“供给约束型”和“需求约束型”制度可以或多或少地作为前一对概念的同义词使用。真实经济中从不只出现一种情况，在微观层面上供给和需求都可能成为约束。当比较不同制度时，只需说明对产品的约束中哪一方占主导就够了^②。

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以及后来的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经济发生变动，从资源约束型（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匈牙利已经发生了这一过程：投入品约束已不再重要，需求约束正变得强大。因此习惯几十年来的短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已不再发生。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步一步逐渐发生的。

为了描述一下许多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经济的专家是如何在类似的概念框架内评估这一变化的，我先引述一下他们的文章。捷克斯洛伐克的转变发生得很快，温特洛瓦写道：“‘供给限制型’（赤字）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转变成完全的‘需求限制型’，虽然由于刚性原因许多结构赤字依然存在，新的赤

① 我首次于1979年的研究中发表了这一对概念。若想阅读更多的历史文献参见科尔奈（1992d）第292页。

② 在此二分法中要考虑的问题是对即时的生产增长的有效约束。至于哪些因素决定了长期内的资源分配和产量及产品结构，以及供求双方在这中间的作用就是另一码事了。本研究并不讨论后一个题目。

字也在发生。但几乎一夜之间问题就变成了销售不足。”罗萨蒂认为波兰的宏观经济变动情况是以科尔奈型供给约束经济向凯恩斯型需求约束经济的转变症状。朱可夫斯基在另一篇有关波兰的文章中描述了供求变动后这样说，资源约束体制正转向需求约束体制^①。

在资源约束体制（供给约束体制）下，生产者不确定能否获得投入品，因此产生一种囤积倾向。厂商的采购部门累积了存货，而由于长期短缺，销售十分容易，因此销售方的存货很小。需求约束型的情况则刚好相反，采购投入品十分容易而销售则相对较难。按照这一思路，投入品存货和产出品存货之间的比例便能很好地反映生产约束到底是什么。国际比较的数字显示出匈牙利的变化。两种存货之间的比率发生了显著变化^②，虽然这和成熟市场经济的一般比率相比还有差距。然而，这一指数再次表明匈牙利已经显然在消除生产中的短缺经济。

这里，改变也是渐进的。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90 年代初以来比例的改变速度加快了。

（二）消费者商品

如果本研究是关于前苏联的各成员国、波兰或罗马尼

① 参见 Vintrova (1993) 第 84 页，Rosati (1993) 第 251 页和 Zukowski (1993) 第 1175 页。

② 为避免出现误解，我要强调的是这里我不想分析总存货对总生产的比率。然而这也是个十分重要的指标，代表了生产、周转的效率和协调的便利程度。这方面东欧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表现十分差劲，但这是另一码事了。本研究的题目是消除短缺经济，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时注意力必须集中于存货的“内部组成”上，也就是投入品存货与产出品存货之间的比率，而不是存货和产量之间的比率。

亚的，就必须回忆并描述一下制度变更前的情况，那时基本食物、燃料及其他必不可少的消费者商品都呈现出严重的短缺。可以将那时的严重短缺和现在的情况作比较。在匈牙利，这些最严重的短缺早在 70 年代就结束了。在消除消费者商品和服务中的短缺经济及生产者商品中的短缺经济中已逐渐取得成果。由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产品、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批发部门，各种短缺现象较少发生，也不那么严重了。那些曾需排长队购买的商品现在队变短了，或根本不用排了。现在也很少发生强制替代了，一般而言，买者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原先要找的商品或服务。我现在要举匈牙利至今仍留有短缺经济的三组产品的例子。一个是摩托车，截至 1992 年之后就没有由于短缺而排队的现象了^①。相反，汽车交易商却持有相当多的待售存货。

第二组产品和电子、信息技术及电讯有关。20 世纪 80 年代这批由国家外贸公司进口或由国有公司生产的产品品种十分有限，短缺现象十分严重，只有通过半非法或完全非法途径进口才能得以缓解。这些进口到后来膨胀成被称为购物旅游的现象，集中购买某一组产品。1992 - 1993 年匈牙利的商品选择十分丰富，卖方通常会发生销售困难。

第三个例子是住房，提及它不仅仅是因为它对生活水

① 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如果顾客不是直接购买存货，而是提出了一些质量标准的特殊组合要求（颜色、设备等等）的话，也可能要等几个星期汽车才能交货。但这一等待期的长度只取决于组织上及技术上的因素，而不能视为短缺现象。当然，在匈牙利也存在这种技术和组织上的等待时期。

平有极大影响，还因为用它作例子可以解释清楚许多重要的概念和关系。

有些从逻辑上能够清楚分辨的现象却常常被混淆，一个是住房紧缺。如果出租公寓的潜在住户或自用房屋的潜在购买者准备支付市价，但由于供应短缺从而无法在此市价成交，那么我们可以称之为紧缺。对房屋的需求过剩了。相反的现象是：出租公寓的业主向潜在住户提供租住的权利，房屋所有者向潜在购买者提供所有权的权利，但后者却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租金或购买价格，困扰租房者的问题不是短缺，而是买不买得起。以他或她现在及将来的可能收入，他或她花不起那么多钱在住房上。也许说潜在购买者由于缺钱不能获得公寓更能通俗地刻画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住房供给会过剩。

回到住房短缺问题，需要对其性质作出更具体的描述。以刻画住房部门的特点。当住房部门出现频繁、高强度和长期的短缺现象时，可以毫无保留地称之为住房短缺（或普遍的住房短缺）。但当住房部门没有出现频繁、高强度和长期的短缺时，也可能出现某个特定地区或某种特定住房的部分短缺。

这将论述引向了下一个现象：住房选择宽度的问题。即使在出租和自用房屋的供应过剩时，也许也没有什么选择。住房是最复杂的商品之一，其质量由大量特点组成。选择将会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其中住房部门）、协调机制的改善和适应而增加。即使某组产品从整体上讲供给过剩，购买者的需求能否满足取决于交易发生的市场是否活跃及是否有效率。

最后，必须区分目前所讨论的内容和实际的住房形

势、住房的消费。无论短缺的是哪一方，或者说有效的约束是什么，是住房供给还是租户或购买者的钱包，最终的出租或买卖交易还是要发生。住房部门在某一时刻会有一定有限的住房存货，它会用某种方式将之分配出去。贫困落后国家住房中有高比例的低质劣房。许多人住在劣质房屋中。这种令人沮丧的现象在市场上出现过度需求，或者说住房紧缺时，以及市场上出现过度供给而个人没有足够的钱来创造其理想住房条件时，也会出现。

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到处都有严重而长期的住房紧缺。匈牙利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后来 1968 年改革后的几十年内，住房短缺问题逐渐得到缓解^①。即使今天，两种现象也同时存在。对国有住房的需求仍然过剩，这些住房的租金是由行政部门预先制订的，比市场租金低很多。然而在全国现有住房中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1993 年已低于五分之一，虽然在城市尤其是布达佩斯这一比例会高些。即使在这个部门，短缺也会为一个市场所缓解：现在的租户可以在接受一笔两人之间达成的价格后将租住权让渡给一个新租户。现在大部分住房已落入私人手中。90 年代的一个大变化是住房市场的某些压制性和行政性限制取消了。例如，1989 年取消了一家一房的行政性管制，私人所有住房和转租的租金也放开了。

匈牙利现在有不受管制的各种住房供应，但选择却很少，或者说住房市场不太活跃。在这个意义上，住房部门整体上已没有短缺经济特点。任何人有钱便可租住或购买房屋。按照前面的定义，这个说法与前面的论断也一致，

^① 见 D... (1989) 及 Buckley, D... 和 Thalwitz (1993)。

大部分人口的住房条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些人还生活在贫民窟中。

(三) 总 结

匈牙利经济不再被称为短缺经济。虽然几乎在每个层面上都偶尔有短缺现象发生，但成熟市场经济中也会发生类似现象。某些界定清楚的部门是在非市场、非商业性基础上（如健康医疗）运行的，在这些部门中也存在高度、长期的短缺现象，但许多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这些部门也有类似情况。然而，从经济全局看，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匈牙利已达到了市场经济的状态。

匈牙利发展的特点是这种短缺现象的减少及其后短缺经济的消除是逐渐发生的，持续了一个很长时期^①。这一过程在 80 年代后期加快了，尤其是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之后。

三、原因分析

许多人都将短缺经济的消除归因于一个因素，例如价格放开或限制性的货币政策。有人曾试图从需求、供给和价格的著名关系中推导短缺经济现象。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解释。这种解释更注重政治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狭义上的经济因素。本研究不试图只用宏观或微观因素来解释短缺经济的终结，且同时采取两种方法。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和研究

^① 在这方面中国的转轨道路与匈牙利相似。

(一) 私有化、分散化和管制放松

这里将讨论许多制度变迁^①。

(1) 更多的市场准入自由：出现了新型私有公司。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自由企业。由党和政府建立的大型生产单位和准政府性质的农业合作社独家经营着。每个新企业的产生都是迟缓和拖延的行政性决策机制的结果。某种产品和服务的短缺不会引起新企业的产生。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市场准入的自由^②。短缺应该促进新企业的进入并去满足这些短缺，因为它提供了特殊的获利机会。即使已在市场上运作的企业可以忽视短缺信号，新公司迟早能够弥补缺口。

随着越来越多公司的成立，匈牙利经济中准入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新进入的公司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发生在曾经是短缺的领域。

(2) 进口自由化。在典型社会主义制度下，进口受到严格的行政约束。当发生某种产品短缺时，官僚政治中的决策者也不会自动被说服去进口。如果他们认为合适就会进口以补短缺，但他们也可能不这么做，要求购买者去买强制替代品，或者当这也不发生时，他们便让短缺持续存在。

① 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以及之后的后社会主义转轨带来了众多其他制度变革，这些变革也有助于消除短缺经济，本研究后面的部分将提及这些变革。

② 在这里我忽略了在某些部门还存在行政管制，而且有许多强大的公司在市场中将会促进新的经营者的进入。

发达市场经济中通常没有这种进口限制，这可能会引发国内供应的短缺^①。过度需求会引发进口，因为有希望获得超出平均的利润。放开的进口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许多交易商品和服务的短缺，即使是国内生产者不能或不愿满足过度需求时。

在过去 10 或 15 年内匈牙利逐渐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进口自由化，因此到 1992—1993 年时进口已几乎不受任何行政控制。

第 (1) 点，即市场准入自由的变化使得进口弥补短缺的作用变简单了。出现了大量新式、私营的外贸公司。过去只有几家大型国有外贸公司，每家公司垄断着某种产品的进口，但现在，它们被许多大大小小的新外贸公司所替代或与它们进行竞争，这些公司试图进入每个不为国内生产所满足的市场。

(3) 指令制度的消除。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预先对国有和准国有企业制订具体的、必须完成的产量指标和投入配额。这种命令制度的复杂和刚性，以及指令制订者对用户和消费者的漠不关心增加了供应匹配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摩擦，减弱了经济的适应能力和促进了短缺的发生。

1968 年改革后匈牙利不再有指令制度，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增加了。虽然它们的自主权还会受到各种行政干预的压制，它们却比以前更灵活了。这也说明改革的社会主

^① 在发达市场经济里，也会因贸易政策而实施进口配额。通常会出于保护主义的原因限制那些国内生产者能完全供应市场的产品。因此，这种条件下的进口限制不会导致短缺。

义经济中的短缺现象要比改革前少些，也没那么严重。

(4) 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典型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和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即使它们持续亏损，政府也能保证其生存。这样，企业对价格和成本的反应迟钝：它们对相对价格变动不能作出灵敏的反应，也不努力去减少其成本。这种对于价格和成本的迟钝反应在供给和需求方都存在，使得企业的适应能力变差。

成熟市场经济中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持续的亏损和严重的支付问题导致破产并最终清算。商业行为不能建立在政府最终会救助企业这一假设基础上，因为这只是少数情况。因此企业对价格和成本的反应十分灵敏。它们试图对供求两方面的相对价格变化都作出反应，并努力降低成本。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如此，国有部门比较小，政府也还不习惯以一种家长式作风保护其企业。

从经济整体角度看，匈牙利的预算约束硬化经历了一个缓慢进程^①。这一进程牵涉到若干因素：

* 私有部门的相对规模正稳步增长，并在继续增长，这部分是通过私有化国有企业，部分是通过建立新企业实现的。私有企业自诞生以来就面对硬预算约束；绝大多数私有企业不能期望从国家那里得到资金援助。

* 曾经是以及现在仍然是国有的企业认识到他们的生存不再有保障了。

1990年的政局更迭本身就是一个警告，国有部门的特权地位将结束。新的后社会主义政局明确表示，未来属

① 见科尔奈（1993a）。

于私有部门；私有化前景使得过去那种生存的自动保护机制受到怀疑。这之后，一开始只是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清算成为经常发生的事件。1991年通过的新破产法及后来的破产浪潮最终表明软预算约束时代结束了。虽然这一过程尚未结束，软预算约束现象还在反复出现，人们对于生存的自动保护的信心却已消散。暂时或永久性国有企业的价格成本反应机制也相应增长。

(5) 价格放开；取消价格补贴。除少数情况外，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由中央制定并在长期内保持固定。生产者产品的主要分配职能由计划指令完成；由于存在上面提到的软预算约束的情况，价格的效果很低。然而，当预算硬化时，价格显然对个人消费有影响。由于消费者商品和服务的大部分有着不现实的低价，这是由预算中的价格补贴造成的，因此就会产生对它们的过度需求。

1968年改革时匈牙利就已经开始逐渐放开价格。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政局变更后这一进程加快了。这一进程尚未结束。因为政府的价格管制不仅存在于那些通常对政府干预限制极少的部门（如自然垄断），也存在于其他领域^①。然而，还是可以说，匈牙利的价格自由化程度与那些成熟的欧洲市场经济国家已十分接近。

伴随着定价的管制放松和自由化，价格补贴也逐渐取消了^②。

① 政府时不时会出于政治民心的考虑采取与价格自由化潮流完全相反的措施。一个例子是1993年对国有住房房租的冻结，这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短缺现象和这一部门中严重的融资问题。

② 消费者物价补贴的预算支出占GDP比重1986年为5.5%，1993年占0.7%。参见Murak... (1993)第39页。

结果，1993—1994年时匈牙利已经发展起一套与市场
价格体系十分接近的相对价格体系^①。

这儿我仅仅记录下实际情况。本研究并不致力于决定
这些部门达到怎样的私有化、分散化和放松管制程度才理
想。在这方面必须综合考虑伦理学、社会学及经济方面的
标准。然而，匈牙利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经验证明，如果没
有这方面的制度变革，这些部门的短缺就会存在，即使从
整个经济中也许已消除了短缺经济。

（二）提高生产的适应性

上面列出的制度变革将使得生产能在供求两方面更灵
活、及时地适应市场情况，减少摩擦。为了保留在本研究
题目范围之内，我将只讨论过度需求（过度供给是其反
面）。过度需求会引发一些能最终克服过度需求的反应：
（1）价格调整，更确切地说是相对价格升高；（2）数量调
整，也就是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下降。

数量调整可由过度需求或价格变动引起。价格变化现
在能有更强的作用，因为公司和个人现在对成本和价格都
很敏感。有些数量调整是短期的，在现在生产能力水平上
就能实现，而另一些则是长期的，需要增加生产能力。即
使现在有投资的愿望，在长期内增加生产能力也是需要时
间的。目前克服短缺的主要方法是价格调整和数量调整。

读者现在可以一点一点看到，这里描述的在市场经济

① 在第二部分中曾提到，有些部门的短缺现象（如医疗）尚未停止。
发生这种现象及其他现象的原因，是这些部门尚未发生上面（1）～（5）点
描述的制度变迁。

中有名的适应过程是如何在前面部分讲到的五条制度变化发生后迅速而广泛地成为主导的。价格与数量调整的发动机是市场准入自由和进口自由，生产者从僵化的计划命令中的解放，预算约束硬化，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以及价格的自由运动。

制度变迁的结果是产生了自亚当·斯密时代就已知的卖方竞争^①。它替代了以前以买方竞争为特点的制度。在持有瓦尔拉斯完全竞争理论的经济学家眼中，竞争的概念渐渐黯淡，失去了以往的颜色。这一名词走向一个极端，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买卖双方进行交易，价格由某种未知机制制订，产品完全标准化，等等。也许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的人更能感受到，无论在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情况下，经济中的绝大多数部门都存在竞争，因此不是人人都能得到满足：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要么是卖方比买方处于有利地位，要么反过来，买方比卖方处于有利地位。当市场上发生不完全竞争时就会发生后一种情况，不完全竞争是所有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广泛的竞争形式^②。目前匈牙利的情况也是如此。让我简单概括一下不完全竞争的主要特点。

卖方^③向买方提供一种不同质的、非标准的产品。虽然还同时有该产品的近似替代品出售（否则他或她将成为

① 见亚当·斯密（1898）[1776]，第43页。

② 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开创者有张伯伦（1962）[1933]，和罗宾逊（1933）。现代理论文献中我认为应提到的有 Dixit 和斯蒂格利茨（1977），哈特（1985），克鲁格曼（1979）和 Kuenne（1967）。

③ 本研究中此处及他处的卖方不仅仅指交易的一方，还指出售自己产品的生产者。

为垄断商)，这种产品和它们相比在质量、包装、离买方的地理远近程度、交货速度、支付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卖方是价格接受者，接受由未知定价机制制定的价格。相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卖方是价格制定者。然而，制定价格时必须考虑卖方自己的产品的价格将对需求产生何种影响，他（或她）面对的是一条下降的需求曲线，价格越高，产品需求越低。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旨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最大化利润的生产者将制定出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另一方面，产量却比单位成本最低时的产量要低。生产者会出现生产能力闲置的情况。因此，生产者在该需求价格水平上愿意多生产一些，只要买方愿意在此价格上多购买一些^①。虽然卖方不会降价，他会用其他非价格手段从其竞争者处赢得顾客。

这就使我们得出一个对我的研究题目十分重要的结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生产者互相争夺购买者，尽可能地了解其需求并努力适应这些需求，为了吸引对其产品的注意力大作广告，寻求用新的、更好的产品刺激需求，并希望用这些方法领先其竞争者。力求争取买方的偏爱，改变了短缺经济中买方试图用讨好或行贿方法争取卖方偏好的情况^②。

不完全竞争理论对这种竞争中可能导致损失的方面给

① 若采用非均衡理论术语，可以说出现了名义供给过剩。生产者愿意在需求价格水平出售比他实际能出售的数量更多的产品。

② 我在这儿要提到哈耶克的一个著名论点：市场相对于控制的优势是其对获得和使用分散信息的更强刺激。参见哈耶克（编著）（1935）。

予了经常性和十分正确的强调：生产能力的使用不足，过分铺张的广告费用，型号和设计的迅速改变等等。刚刚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买者能够强烈感受到他们的优势：卖方有着非常积极的动力从其竞争者处争取顾客^①。

这种积极性也许不是由现实的竞争者带来的，而是出于一种对潜在竞争者，那些进入市场的新竞争者的威胁意识而产生的。在竞争市场理论中探讨了这一思想^②。

熊彼特的竞争理论阐述了另一种真正的竞争的特点^③。按照他的解释，这一过程中的主角是厂商，他试图通过革新来赢得对其竞争者的成本和质量优势。

上述关注成熟资本主义的理论认为，厂商和生产者——销售者争取顾客的行为是理所当然存在的。然而在后社会主义转轨过程中这种行为只是在发展之中。在匈牙利也很容易看到这种情况，卖方竞争和竞争导致的行为正在扩散。然而也有许多生产者——销售者没能理解新形势的含义，继续着他们在短缺经济中习惯的做法。然而，卖方迟早会在新的市场形势要求下采取新行为。适应行为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

有一种仅作用于提高适应性的现象必须提到。这就是前面讨论过的五种制度变化中的预算约束硬化。长期内它使得厂商学会适应，但短期它会造成摩擦：厂商的产品若不能马上补充便会经营失败，从而造成短缺。自由准入和

① Scitovsky (1985) 和 Domar (1989) 指出了引起这些作法的不完全竞争的特点。还可参见魏茨曼 (1989) 的研究，他试图对这一现象建立模型。

② 参见 Baumol, Panzar 和 Willig (1982)。

③ 参见熊彼特 (1976) [1942]。

进口的障碍越小，这种问题就越多。

(三) 避免需求失控

除了生产适应性差之外，引起反复出现短缺经济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宏观需求相对于宏观供给的失控。这种长期反复出现的比例失调也必须在消除短缺经济之前得到克服。(二)和(三)中讨论的每种变化都构成了消除短缺经济的必要条件。

我所说的需求失控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供给的使用者并不觉得他们在其购买行为上要受到财务状况的制约(财富、收入或借贷能力)，随时准备尽可能多地购买他们能买得到的资源、产品或服务，或购买他们被行政手段允许购买的数量。实际发生的交易受限于物质供给、生产者的销售意愿，或行政配额。换言之，上面三者之一为有效约束，而需求却未受到有效约束。

当然失控的需求也有上限，有理智的人不会去购买无限数量的商品。但是这种上限很不重要，因为它们从未成为有效约束，重要的是失控的需求总会大于供给。

在典型社会主义制度下，四种宏观需求要素容易失控。而且这是因为制度的内在特点使其发生作用。这些引发需求失控的内在特点会为改革及后社会主义转轨所克服。

(1)投资饥渴的结束。在典型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阶层的每一层决策者都会受到扩张冲动的影响，从而引发无法满足的投资饥渴。总有一些部长、分支机构领导或经理乐意进行投资。长期的短缺保证了他们总是销售市场，而软预算约束又使他们不用关心投资创造的未来生产是否盈利。

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投资饥渴没能停止^①。那些管理经济的人不时用行政手段压制投资需求。只有当（一）中讨论的制度变化发生时投资饥渴才能结束。

当预算约束硬化且产品的未来销售前景变得不确定时，国有企业经理们无法满足的投资饥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私有化预期也有同种效果。

私营企业由于其自身性质从来不会受无法满足的投资饥渴的影响。它们必须权衡投资风险：目前的成本能否为将来的收入补偿，并带来远超过成本的利润。在转轨过程的不确定状态下，即便利率为正，在某些时候还非常高，私营部门的投资需求仍相当适度。

因此，从整体经济看，由制度的内在特点产生的投资饥渴已经停止，宏观需求的投资要素不再容易失控。这在匈牙利经济中可以清楚看到，投资占 GDP 的比例及其绝对数量都有大幅下降^②。

（2）出口市场的形势日益严峻。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出口产品的需求也会由于几个原因而容易失控。

那些弱币合作国本身也是短缺经济国家，许多产品都有过度需求。这说明它们不在意质量或其他标准，打算尽可能多地进口它们短缺的商品，至于本国的出口行为，东欧不挑剔的市场对外贸公司或生产企业而言都是十分适合的，因此它们也推动了出口。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许多产品的有效约束不是合作国的需求而是出口国的供给。

当然，在强币关系中合作国会有有效的需求约束。但

① 对投资的长期过度需求为拉茨科（Lackó, 1989）的一篇文章证实。

② 参见科尔奈（1993b）第 206-210 页。

是补贴形成的价格折让仍能增加需求。由于对用强币购买的进口品有需求，而经济领导层也许会受偿还外债压力逼迫他们不得不遵循“不惜任何价格和成本出口”的原则，将国内生产中尽可能多的部分用于出口。

因此，典型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特点最终引起了造成出口产品需求失控的行为。

匈牙利向强币市场的出口方向早在 1990 年政治制度变化和 1991 年经互会集团解体之前就制定了。然而，那时仍可通过不受限制的补贴分配来提高强币出口，而至少经互会市场仍是最后的依靠^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需求约束并不总是有效，而出口需求的失控倾向也从未消除。

这方面的变化直到 80 年代末期，尤其是 1990 年政局变动和经互会解体之后才完成。在那之后，预算约束硬化的速度加快，以盈利为目标的私营企业在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重上升，出口补贴下降。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不惜任何价格和成本出口”的原则了，而出口市场上的购买意图已清楚地成为真正有效的约束。匈牙利国内制度的内在特点和短缺经济中的奇特的经互会关系不再能使得出口产品的需求失控^②。

(3) 政府支出的限制。政府支出这一宏观需求的组成

① 上层经济领导人不时会对苏联出口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口作出行政限制，因为匈牙利不一定能收到合适的付款。这与低层领导乐意继续便利出口的努力正好相反。

② 以我的观点看，这种变化不能被看成普通的外部冲击。在每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都分别导致了深刻的制度变化。从国际范围看，是这种崩溃导致了这些国家间交易关系的动荡及其未来关系性质的巨大改变。

部分在典型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容易失控。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超支的倾向，因而这与制度无关，然而，典型社会主义制度与议会民主制的不同在于缺乏内在的克服这种超支欲望的机制。政府不负有公开说明的责任；事前也不反对和批评政府的支出计划，事后不检查预算的超支情况。政府预算是由公众看不到的上层领导制订的，只要他认为合适即可。由于中央银行也从属于这一领导，任何规模的预算赤字都可通过从央行借款，换言之，通过印刷钞票的通胀手段进行融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预算约束也是软的。放在议会面前的文件通常隐瞒了实际预算赤字，而且不管情况如何，议会总是会自动为党和政府领导提出的计划贴上同意的标签。

这种情况在政治体制发生变更后才得以改变^①。当然，行政性超支的倾向仍然存在，且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政府预算仍然有出现赤字的危险，大家都知道它一直就是这样。然而这一现象就发生在议会、总审计署、媒体、公众及国际金融组织（IMF 和世界银行）面前。这些控制会抑制支出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说没有克服政府需求的内在机制。

（4）囤积倾向的结束。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会观察到生产者有累积存货的倾向。倾向投入品的供给是不确定的，因此所有的厂商都试图通过尽可能多地囤积其生产

^① 1989年，也就是实行首次多党选举的前一年，政府公开承认以前的预算（以及有关外债的声明）都是假的。预算赤字和外债比先前公布的数字要大些。这一事件之后1990年发生了更为重大的变化。自那之后，显然政府的财政事务不再能轻易对纳税人隐瞒了。

资料、半成品和零件来确保工厂的连续运转。他们这样做是不受惩罚的，因为在软预算约束下他们对成本不敏感^①。这使得对生产者商品的中间需求成为另一个易于失控的重要宏观需求因素。

由于上述制度变化，这一趋势也停止了。随着各种因素逐渐使短缺经济消亡，囤积的需要也下降了。

社会主义经济中失控需求的(1)、(2)、(3)、(4)条组成要素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潜在货币外溢。虽然投资者、出口厂商、对政府支出有控制权的官员和那些积累投入品库存以马上实现其过度需求的厂商没有流动性强的金融手段，他们仍然可以在供给或行政部门允许交易发生时以某种方式寻找到资金。他们的潜在支付能力带来过度需求的压力，其效果与隐蔽型通胀类似。这种潜在的持币待购现象(Money overhang)随着上面描述的制度变化的发生已逐渐消除干净了。

总之，制度变化逐渐消除了由政治、经济制度的内在特点而引发宏观需求要素失控的机制^②。

从这一点上讲，整体制度变迁不仅应当包括(一)中所讨论的私有化、分散化和管制放松，而且还应包括本节所提到的内容：与经互会国家特殊外贸关系的结束，对政府预算和政府支出的公开控制，主要是议会控制。因此当

① 古德菲尔德和匡特(1990a)、(1990b)用数学模型证明了软预算约束、短缺和囤积倾向之间的关系。

② 这种稳定的变化并不以一种单调的单方向方式发生。当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发生时，即发生政治变化前，某些导致需求失控的倾向甚至比以前更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政治变革发生后可能会实行更有效的宏观需求限制。

本研究进一步提及制度变化时，指的是这种延展意义上的变化。

(四) 个人收入和消费的作用

宏观需求中最大的部分——个人消费，在创造短缺经济的条件方面与已经讨论过的其他四个部分存在差异。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必然导致个人收入从而个人对消费品需求的失控的内在机制。这是宏观需求中惟一个严格有效地受到行政限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行政层级中的每一层都有足够的动力来维持这些限制^①。

典型的社会主义并不必然以消费者市场的隐蔽性通胀为特点。可能会出现一种持续现象，没有花出的个人收入不能稳定积累（没有花出是因为无法花出），而个人的持币待购现象也没有改善^②。计划者们试图保持公众手中的购买力，保证消费品供应，维持制定好的消费者价格水平，以及短缺现象的惯常频率和强度。

“必然”这个词被强调了两次。这是因为某些典型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会失去对形势的控制，因此个人消费领域也会出现长期的过度需求。短缺会造成强制储蓄和持币待购的积累。由于消费者物价或多或少是固定的，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隐蔽通胀。

在开始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情况有所改变。这些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和研究

① 如果宏观需求五个要素中上节提到的四个都趋于失控，那么总需求也会失控。即使第五个也是最大的要素消费者需求受到经济领导层的严格控制，数量相当大，情况也是如此。

② 对国有部门产品的过度需求引起的强制储蓄能够部分或全部为第二经济或黑市所吸收。参见 Nuti (1986)。

国家由于受到下列因素的共同影响，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隐蔽性或公开性通货膨胀。

名义工资水平比生产率增长快得多。这方面的压力来自政治自由化、工人运动的影响，和这段时期内非常典型的劳动力短缺。弱化了党和政府只能比以前的政体在忍受工资压力方面做得更差一些。推动工资上涨的压力越大，就会产生越多的消费者过度需求。

政府要么能抵制住价格的通胀压力。这样隐蔽性通胀现象就比较普遍，要么不能（或根本不希望）抵制住这种通胀压力，比如它已宣布价格放开。在这种情况下过度需求（需求方）和补贴的取消（成本方）都会引起价格的向上运动^①。以前的价格稳定或隐蔽通胀现在为公开通胀所代替。

直到1990年的转折点之前，波兰盛行的是一种短缺和隐蔽型通胀及公开型通胀的奇特组合，其中公开型通胀已发展到相当程度。但1990年1月1日开始实施强制性稳定政策后这种局面结束了。

匈牙利的情况要温和许多，在更多的时期内以更稳的步伐前进着。80年代已经出现了显著的通胀，虽然直到1987年通胀只体现在个位数上。在那之后通胀加快了，而且1990年政局变更后更是如此。1991年通胀达到顶点，年通胀率高达35%。那以后在降低通胀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92和1993年年通胀率为22~23%。

现在应该注意一下前面一段内容的逻辑关系。它要讲

① 即使出现某种产品的部分供给过剩，其价格由于向下粘性也不会下降。价格的这种不对称行为使得普遍的价格水平更升了一步。

述的观点并不是：通胀的开始及其加快是因，短缺经济的消除是果。如果只是简单地将经济置于通胀之路上，而其他经济特点则保持不变，那么短缺经济是无法消除的。本研究的一系列论证会导出一个比这复杂得多的解释。短缺经济的消除和通货膨胀都是结果，而且实际上都是部分由一致的、共同的原因导致的结果。但是一旦通胀启动并加速，它会对短缺情况产生影响。通胀速度越快，购买者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得越快（真实平衡效果），因此只要有持币待购的情况，就都被吸收了。

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上节的话题，失控的宏观需求。消除短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个人的收入不能失控，无论是工资性质还是其他来源的收入。如果名义工资和其他收入无限制地增长，尤其是在价格自由化进程还刚刚展开的阶段，短缺可能变得十分严重（这正是波兰和前苏联及其共和国在金融改革前的情况）^①。匈牙利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在实施价格、工资和金融政策这方面匈牙利已十分谨慎。

哪些因素可以防止工资失控呢？如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预算约束都已硬化，那么企业生存和最大化其利润的利益就会抵制工资压力。在这方面发生作用的还有日益上升的失业，也就是劳动力供给过剩。直到制度变化和新的劳动力市场确立之前，为防止宏观需求失控而实行的名义工资行政限制看上去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匈牙利和波兰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企业支付的工资如被判定为过高，就会受到税收上的惩罚。这种行政限制本身并非消除短缺

① 参见李普顿和萨克斯（1990）。

经济的必要条件，没有它短缺经济也会消除。这种方式迟早会和企业自主权及资源配置效率发生矛盾。这是一种典型的转轨措施，它可以加快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

（五）货币政策的作用

为了消除短缺经济是否有必要实行限制性货币政策？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把涉及到的概念解释清楚。在目标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中，可以在以下类别中进行选择：

A类：目标是与货币需求相比限制货币供给。货币供应增长率要小于货币需求增长率，后者是由基于预期通胀和真实利率的预期名义GDP决定的。如果这是货币政策的背后意图，那么就还必须对限制程度作出决策。

B类：目标是和货币需求相比既不限制也不扩张货币供给。该政策试图确保货币供给增长率和货币需求增长率完全一致，后者是由基于预期通胀和真实利率的预期名义GDP决定的。换言之，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供给增长指数要等于预期通胀率和预期实际增长指数之积。

C类：目标是和货币需求相比扩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增长率要大于货币需求增长率，后者是由在预期通胀和真实利率基础上计算出的预期名义GDP决定的。如果这是货币政策的背后意图，那么就还必须对扩张程度作出决策。

在匈牙利的金融术语中限制一词不仅仅是指A类政策，用西方术语讲就是通货紧缩政策，而且指B类政策，在任何时刻都允许计划性的通胀率存在。事实上限制性政策只是用来控制通胀的。通胀率的增长不能快于经济政策

中制定的计划,尤其是成本推进型通胀^①。

A、B和C是货币政策背后可能的意图。即使货币政策制定者对其意图作出了清楚的决定,但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他们能够又愿意采用哪些手段来实现其目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始终如一地完成他们的目标?

匈牙利经济学者们尚未着手于用这些术语来对过去6到8年的货币政策进行分类。可以观察到的数字反映的是各种相互矛盾的意图和相互矛盾的手段之间的不一致。这段时期中绝大部分时候的结果和中间类型,即B类,适应型货币政策最为接近。A类限制型货币政策至多只在几个短时期内或多或少地起作用。1992年和1993年曾经出现过几次回到扩张型即C类货币政策的信号,但信号并不清楚,货币扩张也不大^②。

回到本研究的主题上,消除短缺经济的首要前提是实现(一)至(三)中描述过的制度变革,匈牙利已成功完成了这些变革。然而其次,这些变革必须和适当的货币政策一起发生。如果货币政策是A类限制型政策,那么它可发挥催化剂作用,加快短缺经济的消除。它在那些易于失控的宏观需求要素面前树立了另一道屏障。它有助于克服投资饥渴症,因为可用于投资的信用总量受到严格限制。它有助于克服囤积倾向,因为存货融资的信用总量也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和研究

① B类政策在经济语言中通常被称为适应型货币政策,因为它总是根据名义GDP的货币需求进行调整。这一术语比起限制型来要合适得多。

② 在提出这些论断时我运用了Balassa(1993)和Várhegyi(1993)的研究成果。

变紧了。如果行政性的定价作风仍有残留，使得通胀的可能性受到行政压制，那么降低和限制宏观需求增长的政策将有助于缓解伴随隐蔽性通胀的短缺现象。限制型货币政策有助于防止能造成工资压力的收入政策，包括纵容的工资政策。

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成是与计划的通胀率相适应的 B 类货币政策。这种政策至少不会妨碍短缺经济的消除，而且只要上面列出的制度变革完成，它也不会促进短缺经济。

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可以说消除短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实行至少 B 类或更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

当消除短缺经济必备的最低限度的制度变革都未完成时，实行 C 类货币政策显然将妨碍短缺经济的消除。某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消除短缺经济的步伐停滞或缓慢，就是因为实行了 C 类货币政策。然而，如果短缺经济已基本消除，那 C 类扩张型货币政策也不会使之重现，因为已经没有以前的制度体系了。另一方面，C 类政策还会加快通货膨胀，破坏以前取得的稳定成果。然而，这将不是短缺经济现象，而是市场经济中常见的货币政策与通胀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正是由于实行 C 类货币政策，短缺经济的消除停滞不前或进展缓慢。

（六）某些宏观关系的回顾

图 1 和图 2 描述了目前所讲的内容，它们采用了宏观经济学中常用的描述方法，用极为简化的形式表达了基本的宏观关系。

图1描述了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般情况。实际宏观产出等于宏观供给 S 。这是一种供给约束型制度。供给曲线 S 和需求曲线 D 都是垂直的，它们对价格毫无反应。代表宏观需求的垂直曲线处于代表宏观供给的垂直曲线右边；换言之宏观需求过剩。向右指的箭头表示宏观需求倾向于失控增长。 D 超过 S 的确切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D 总是要大些，因为其组成要素倾向于失控增长。过度需求不仅仅指可由购买者荷包内已有的货币支付的那部分需求，还要加上不能由购买者荷包内已有的资金支付的购买欲望。厂商或政府机构都知道：一旦这种购买实现了，国家会为之付账^①。

图2代表短缺经济消除之后的情况，和图1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是宏观需求曲线转向了。这条曲线（这是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向下倾斜。即使没有其他因素造成这种状况，所谓的实际平衡效果也会使货币拥有者减少其需求，如果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其货币购买力下降的话。对宏观供给所作假设是曲线是垂直的，换句话说与价格水平无关。

宏观需求曲线的旋转使得两条曲线相交成为可能，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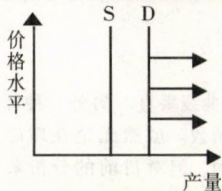


图1 短缺经济的宏观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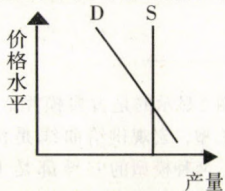


图2 短缺经济消失后的宏观状态

① 第（三）节注意到了这种特殊的持币待购现象。

言之宏观供给和宏观需求正好重合^①。制度变革启动市场机制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了这种重合。

有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这样解释图2中所示的情况：商品市场上达到了基本的市场均衡。我认为这种描述是可行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人们不能忘记，这一交点是在二维静态平面上的交点，这里供给和需求只是一个变量，即价格的函数。可能在某一时刻，在某一特定的货币价格水平上，经济中的宏观需求等于宏观供给。但是从长远趋势看，当价格上升即发生通胀时，供给下降，供给和需求在微观层面就无法重合了。因此不作仔细考察便认为图2中的经济处于市场均衡状态是错误的。

（七）短缺的自我产生

上面已经讲过，短缺经济背后有许多因素在同时发挥作用。当这种现象产生之后，人们已习惯于他们周围的短缺经济，这一现象已深入到他们的预期和行为之中，进一步加强了短缺。短缺会孕育短缺。

让我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前面也曾提到过。一个是囤积倾向：对投入品短缺的预期使得厂商采取累积存货

① 图2显示的是古典模型，宏观供给曲线垂直。另外一种著名的情况是凯恩斯模型，宏观供给曲线是价格的增函数。虽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济政策上这两种模型的差异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对目前的分析来看是哪种情况都无所谓。这里重要的是由于需求曲线旋转两条曲线相交。

有关宏观经济学的论述中都会有对两种模型的区别所作的解释。例如萨克斯和Larrain（1993），第55～76页。非均衡学派的作品中也对此作了区分，如Malinvaud（1977），第29～32页。我在这里只想简单提一下，两种模型的区别最终取决于对工资行为和劳动市场的两种不同解释。

的作法，进一步加剧了供求之间的比例失调。另一个例子是投资饥渴症，它是引发短缺的原因之一。投资者敢于胡乱投资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无需害怕为产品所累。在长期短缺经济中总是有买者的。

对短缺的预期是一种经济心理学上的自我实现现象。这也是短缺难以消除的原因之一。只有当经济参与者在长时期内明显意识到短缺真的结束了时，他们才愿意重新形成其预期并开始新的行为机制。

（八）政局变更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框架内，改革时期已开始发生（一）和（三）中所描述的制度变革。匈牙利的例子正好说明朝向消除短缺经济的首要步伐是可以在改革的延伸过程中完成的。但承认这一点也就和这一观察结论达成了一致，即这些变化最终会为政治制度变革所加速和统一，在那个转折点之前形势并不明朗；没有人能确定这些改革是最终的。这一忧虑和担心有其历史原因，尤其是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和1972—1973年匈牙利经济改革的部分停滞。

匈牙利的政局变更发生于1989—1990年，开始实行议会选举，那之后不仅组阁的党派而且那些反对党也信誓旦旦地宣布他们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从那以后，人们不再遮遮掩掩地暗指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转轨已成为正式的政府政策。这种权力结构和官方宣布的意识形态上迅速激烈的改变，促进了（一）至（三）中列出的制度变化，这最终会消除短缺。

(九) 原因分析总结

图3总结了影响短缺的因素之间的关系。为了简洁起见只列出了影响的主要方向。另外,所有这些因素都相互发生作用,而且也还会有反应性影响。因此在原因分析线路上从左到右,靠右边的因素对其左边的因素作出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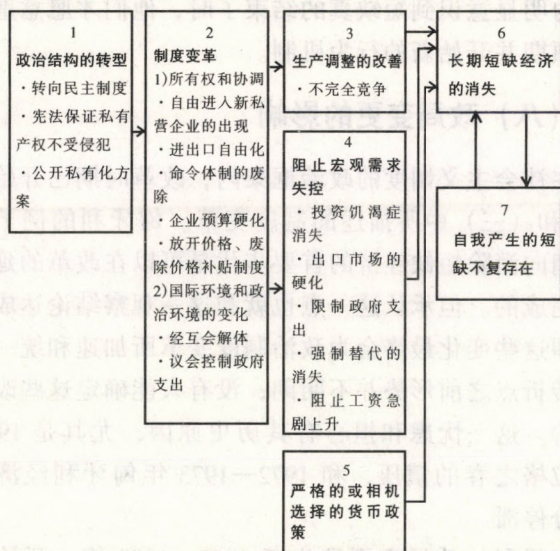


图3 消除短缺的因果链

对许多人来说主要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一旦典型社会主义制度结束，短缺经济也随之结束。然而最终原因（制度变化）和最终结果（短缺经济消除）之间会有许多因素发生作用。本研究已阐述了这种因果关系链的一种特定层级，并在图中以系统形式标出了。按照这一思路，政治结构对制度有决定性影响。这又决定了经济参与者的行

为，而这种行为最终导致了该制度下的均衡状态。

短缺经济的消除不仅需要政府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针对这一目的的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而且还需要进行微观改造，促使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符的经济主体的产生。

本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我以前的作品中曾提到的：长期的短缺经济是典型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制度特色。消除短缺经济的第一轮努力也许是在政局变更前作出的，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明朗，不够牢固也不够有力。只有当经济和政治制度变化到达一定程度时才能彻底消除短缺经济。

制度变化，包括本研究强调的特定的制度变化发生“百分之百”的改变，并不是消除长期短缺经济的必要条件。只要它们的改变能达到一定水平，就足以达到消除短缺经济的目的。我将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实行完全市场准入自由。但必须有足够的自由使得短缺能引发较快的市场进入。

(2) 不一定要对国有财产完成私有化进程。但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私有部门，能较快地弥补国有部门造成的短缺。没有必要等私有部门成为主导后再采取金融措施消除短缺。但如果私有部门没有达到一个最低比例，即使是最激进的金融稳定措施也无法在消除短缺上取得长期效果。

(3) 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目的而使进口全面自由化。但必须有一定的进口自由，以确保国内生产造成的短缺能很快为进口所弥补。

(4) 即使预算约束没有完全硬化或在很大程度上硬化，它必须达到一定的硬化程度，使得国有企业不再感觉

其生存是有保障的。他们必须感觉到有必要在市场上进行生死战斗^①。

(5) 继续前面的观点，经济环境的变化必须足以压制投资饥渴。

(6) 即使某些价格保持不变，必须有足够高比例的自由浮动价格使价格水平能发生大幅变动，因此供求至少能在宏观水平上达到相等。

匈牙利自 1968 年开始逐渐实现这些要求。政局变更后的头几年内便已达到了所有重要方面的要求。自 1992 年以来，匈牙利经济便不再能称为长期的短缺经济了。

波兰在短得多的时期内以一种集中方式消除了短缺经济。就像一场突然的休克。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统治的最后几年内已经开始了温和的但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历程；私有部门已经相当大了。另一个原因是 1988—1989 年政治制度更替后实行了稳定措施，这使得人们相信，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能再有反复，如国有企业特权地位的取消，市场准入自由，私有财产的保护和鼓励，等等。

另一方面，前苏联的后继共和国却在尚未达到上述最低要求之前实行了激进的稳定措施，例如私有部门仍很初级，而国有部门又受到过多保护，市场准入自由、竞争和对需求的调整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因此，这些国家出现短

^① 经互会的市场崩溃后匈牙利国有企业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使它们在出口和进口上不得不作出迅速改变。这发生在破产法通过和破产浪潮发生之前，也就是预算约束硬化之前。波兰 1990 年 1 月采取措施后的经历和这一经历类似。

缺和通胀共存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①。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得出结论，短缺经济的消除可以在长期内渐进进行，也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对供求比例的突然改变实现。但后一种发展方式要想永久消除短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必须预先达到一个最低水平。

长期短缺经济的消除是制度变化的结果。这一说法也可倒过来：“看一国在消除短缺经济上走了多远，以及该国的消除工作是否持久，也是其制度变革进行到何种程度的反映。”

这并不是衡量制度变迁进展的惟一方式，但这却是最重要的衡量方法之一。“向市场经济转轨”一语通常在政治和公众生活中使用。现在只要一国经济不以长期、普遍和四处渗透的短缺为特点就可以称为市场。因此只要辨明一国在消除短缺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就能得到简单、有形和易于量化的指标来确定它在建立市场经济中做得如何。

如果用这种方法，那么匈牙利的进展已相当大了。按照前面的思路，匈牙利经济已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运作时仍然会有摩擦，它们不够成熟，但它已成为主要的协调机制。

四、短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

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产品（和服务）市场。现在我们稍稍将思路转移到劳动市场。对它也进行一番分析和研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和研究

^① Kolodko 和 McMahon (1987) 以波兰 1990 年以前的经验为基础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短缺通胀”（与“滞胀”相类似）。

究。

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市场的长期短缺在长期内恰好和劳动市场的供给过剩相吻合。落后农业的一大特点是公开失业或隐蔽性的就业不足。但这种劳动力过剩以及其他储存劳动力的要素迟早都会为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强制性增长所吸收，因为历史会提供足够的时间让这一过程得到理顺。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发生过吸收过剩劳动力的现象。这一时期的经济语言是这样说的，外延增长阶段（依靠逐渐开发使用新资源的阶段）已经结束，现在该是内涵增长阶段了，必须通过对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和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增长。

社会主义经济踏上内涵增长阶段时，增长便缓慢下来，实际上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开始停滞。经济不能提高其对生产投入的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提高要素生产率上表现很差。每种发展和增长的路线都是针对外延增长制定的。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生产中的每个决策者受扩张冲动的影响，不仅希望获得更多的投资（投资饥渴症）还希望获得更多的人力。在经过外延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短缺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现象，劳动力市场上呈现出卖方市场的情况。

众所周知，厂商内部对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很低：工作上存在失业。在软预算约束下，人们没有降低成本、节约劳动力的积极性。这种情况随着劳动力的囤积更加强了，就像囤积投入品的倾向一样。由于劳动力短缺是永久性的，因此储存劳动力是值得的，以防由于某个工人意外缺勤引起停工或将来某项工作无法完成。因此过剩的劳动力

也不会解散。

除了这些经济上的考虑外,还有政治上以及道德上保障就业、工作安全感等方面的因素。

当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时,几乎每个国家都呈现出长期的劳动力短缺^①。这也成为短缺经济综合症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进程中,产品和服务短缺的消除和劳动力短缺的消除是同步的,事实上过度需求转变为过度供给。失业现象出现而且不断加剧。直到1990年5月匈牙利的职位空缺还超过了求职人数。那之后,失业人数稳定上升,1993年2月失业率达到13.6%的高峰。那之后失业率有所下降,1994年4月失业率为11.8%。其他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也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类似情况^②。

刚才的语句中说这两种现象同时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独立发生的。事实上结束产品短缺的同样的原因也消除了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然后随着这一进程的继续,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剩,并且这一过剩还会显著增加^③。现在我将举出一些因素,但也许并不全面:

(1) 宏观需求失控的制止,宏观需求的饱和和衰退,投资饥渴症的消除等也导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和强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和研究

① 有关匈牙利劳动力短缺的衡量和趋势,参见 Fazekas (1985)。

② 在某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失业上升得很慢,有一些迹象表明这确是事实,因为改革没有以一种前后一致的方式实行。预算约束仍然是软的,那些本应倒闭的企业仍然生存着,并且保留着本已过剩的劳动力。

③ 为避免误解,我想加上一点,我并不想说物品短缺的消除是引起劳动力短缺消除从而失业产生的原因。在我看来物品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的消除可归于同样的原因。

制性增长的高峰时期相比，新工作机会少多了。

(2)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旧工作消失了。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使得企业的生产更具成本意识。虽然在制度改革前国有企业曾经无视失业现象，它们现在却越来越负担不起了。同时，政治环境的改变和政府对于保证充分就业和工作安全的放弃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减员。现在新型的私有企业不再会雇佣多于必须的劳动力了。

(3) 这种从劳动力短缺到失业的颠倒为伴随改革的衰退所加快。在 a. 促进短缺消除的变革、b. 生产的下降^①和 c. 失业的出现和加剧，三者之间出现了有趣的联系。对宏观需求的控制（以及其他针对这一目的的收入和货币政策）使宏观供给也受到了影响，这是由于乘数作用的结果。衰退使得对劳动的需求也下降了。消费者需求下降得更快，因为失业的上升更大地降低了宏观需求。衰退不仅使劳动供给过剩，而且使产品市场也出现供给过剩。或者，即使供给过剩没有以产出存货的增加这种形式明确地表现出来，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也会增加，这样名义供给也过剩了。实际产量比潜在产出小很多。因此以前过度需求型经济已明确变成与其相对的供给过剩经济。

上述评论只是简单触及了转轨的机制和动力，以及从短缺到过剩的转换。要想清楚解释为什么失业会持续这一问题则超出了本研究范围。有些能部分进行解释的原因是很著名的。我无法将它们全部列出，只能举出一些。

(1) 由于产业结构经常调整，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的

^① 产量下降背后有许多原因；本研究提出的程序只是这一复杂因果关系中的一个要素。参见科尔奈（1993b）。

组成不相匹配。调整的幅度越大、速度越快（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些调整在长期内都很剧烈），摩擦性失业越严重。

(2) 对雇主而言保持低水平雇员数目支付高一些的工资是更有利的，因为对失业的担心会促使工人们表现更好（效率工资理论）。

(3) 那些受到雇佣的人会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工作，即使更高的工资水平使就业更加困难（内部人—外部人理论）。

(4) 如果就业水平太高，已十分接近实际充分就业，会引发工资上升和通胀压力，因此经济就从其高就业率处吓跑了（自然失业率假设）。

(5) 不完全竞争和凯恩斯型失业之间存在某种联系^①。

我在这里只列出了一些最有名的理论的名字。现在已有了对上列理论（以及其他一些未被提及的理论）的综合^②。问题是这些理论综合起来能否说明长期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点。

在这一点上出现了许多困难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大量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讨论，长期的短缺经济确是一种特定制度的特点。长期

① 这种联系已为哈特（1982）所作的一个不完全竞争的特殊模型所证明。

② 在理论综合这一方面最大的进步是 Phelps 的书《结构性滑坡 (Structural Slumps)》（1994）。除了一些表述方式和术语的重大区别外，此书和本研究的观点是一致的。Phelps 的论证似乎也支持了这里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比较。

产品短缺（在某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一个伴随物是长期劳动力短缺。

我的猜测是，资本主义制度有相似的制度特点，即频繁出现实际和名义供给过剩，伴随不完全竞争的生产能力过剩，以及长期失业。假如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是短缺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的特点可以被描述成过剩经济。

市场经济的微观市场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市场相比更接受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供给等于需求）。当然，市场经济也会有偏离瓦尔拉斯均衡的时候，其正负偏离和社会主义经济正好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需求过度（实际和名义）的现象比供给过剩要更频繁、严重和持久。

我只能说“猜测”，而不敢用比这更肯定的说法，很难确定这些现象中哪些是周期性的，哪些可归于为适应变化而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摩擦，哪些是制度本身形成的。

虽然以商业周期和失业为题的文献数量众多，而且以观点多样、争论激烈为特点，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些问题的制度方面的讨论却很少。对多数西方的经济学家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是如此，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十分奇怪的^①。对制度特点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历史观点，另一方面还需要把资本主义同其他不同的制度进行比较。后社会主义改革为这种历史比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

^① 提出这种问题的一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极端左翼分子。然而对那些信仰这一制度的人而言这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问题。在本研究最后一部分我将再回头讨论这一点。

五、评 价

最后让我们来评价一下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将短缺经济的消除划分为好的和不好的呢？我不想只作出一个最后结果，而是将这些效果仔细分析一下。

（一）消费者福利

在长期短缺经济中，消费者的福利不仅由最终消费的商品决定，而且也由购买前后的其他条件决定。

在买方市场上，卖方是主要承担交易事务的一方，努力搜集信息、寻找买方，而卖方市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每个家庭都得花好几个小时的业余时间排队和寻找商品^①。

即使最终购买行为发生，强制替代也是常见现象。用效用理论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购买人必须满足于低一些的效用。跨期中当购买人不得不因为短缺而推迟消费时也会发生同种情况。当购买人完全放弃购买意图时消费者福利的损失就更大了。

购买者由于受不到丝毫保护而感觉很糟，他们必须忍受卖方的粗鲁对待，他们必须对卖方显示谦卑，讨好卖方甚至向卖方行贿。

^① 当然，卖方之间的竞争并未完全免除买方寻找和获得信息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权衡大量定性指标和相对价格来选择替代品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经济越发达，选择范围越大，选择也就越难做。

短缺经济消除后消费者的这些福利损失将不复存在。

这种变化是不能用综合指数来表示的。常规统计数字只显示消费的数量和内容，而不显示消费过程中的费力和失望带来的损失。

最误导的作法是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使用实际工资指数。当一种按照官方宣布价格十分便宜却无法买到的商品现在变贵了，但是在自由市场上买得到时，这种涨价到底说明了什么？^①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种变化降低了实际工资指数，但无疑增加了个人福利和购买者的效用，如果短缺引发的损失感也是决定福利经济心理因素之一的話。

虽然从统计上很难或几乎不可能觉察到消除短缺经济的有利现象，但问题在于经历了变化的个人对之如何估价。他们以后对消除短缺经济的估价可能会比改变短缺造成损失之前还要低。今天的匈牙利购买者们对短缺的消除已经习以为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为之过于兴奋。用效用理论的话来讲，我得说，一种不利条件（购买者感受到的短缺经济条件）的消除所带来的效用不等于（这儿是小于）同种现象存在所带来的负效用^②。促成这一改变的政治家对此当十分气愤并认为人民不知恩图报，

① Berg 和萨克斯（1992）的一篇文章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一问题。

② 在描述消费者行为的常规效用函数中没有表达出这种不对称性。对这种不对称性的建模会有很大的技术困难，需要对理论进行深刻修正。

和经典物理学一样，经济学在其理论中作出了可逆性假设。但当考虑时间的不可逆性，物理学的某些分支领域便出现了很大的进步。这方面的经济学修正却尚未开始。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已有一些作品将不可逆性引入了理论。参见某些演进学派代表的作品：Arthur（1984），Marshall（1961）[1890]，Nelson 和 Winter（1982）。

但这并不会改变人的本性，那些曾经在肉铺前苦苦排队并对扔向她的任何价格的、无法选择的一块肉都会感到十分欣慰的家庭妇女们，现在对于众多选择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会对高价感到不安和惊讶。如果她手上的钱有限，无法购买到她想要的肉时，那么她对肉品短缺的结束就更不会心存感激了。

这个例子不仅说明了当进行制度比较时人们的健忘，而且也说明了市场制度改革的分配效果。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设在每种制度下都向购买者提供相同数量和品种的商品，但这组商品无法满足所有潜在购买者的需求。两种制度都会采取特定的选择标准来决定谁能获得这些商品而谁不能。在短缺经济中，选择过程中会混合许多不同的原则：成绩、对当局的忠诚及在层级中的地位、需要、关系和贿赂、排队的时间，以及机会。国与国之间、不同时期之间和不同市场之间这些标准的特定组合会有不同。市场经济中也有不同的标准，但收入状况（这又是为多种因素决定的）与购买愿望的实现之间显然有正的相关关系。在这里金钱说话是最有份量的。

（二）安全感

造成短缺经济的社会制度特点同时也在价格、工资、就业和福利措施方面带来了稳定。本研究前面已经分析了这些特点，现在从它们对人们的安全感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考察。短缺经济的消除破坏了这种安全感。

价格和工资曾受到严格的集中管理，在长期内由计划制定，其刚性使得经济的适应能力差，也严重损害了其效率。但同时它也使得家庭在预测其财务状况时的安全感增

加。而市场的价格、工资、汇率和利率的波动就远没有那么可预测了。

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国家再分配按清楚明白的规则向人们提供福利服务，虽然这种服务只是低水平的。由于这种服务是免费的或基本免费的，从而引发了各种福利产品的短缺。当这些服务转化到市场上时，短缺现象不见了，但是作为其结果，政府保证提供的福利被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

就像第四部分曾仔细讨论过的那样，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上节中被视为消费者在产品市场获得的每一项收益（对供给寻找的减少、更多的选择、无需对卖者低声下气）都构成了雇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损失。他们现在必须寻找工作；他们不能对工作挑三拣四；他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不断恶化的境地。同样一个人，现在作为消费者是赢家，而作为雇员则是输家。

（三）公民的依赖性：官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没人事前能“计划”好社会主义制度将是短缺经济。但短缺经济形成后，它对党和政府的统治及官僚层级的权力是十分有益的^①。短缺严重损害了个人的选择自由。它是使得个人依赖国有生产企业和党与政府的官僚制度的重要保证之一^②。消费者和企业经理人员的日常经验都证明

① 在短缺出现的原因之中，Shleifer 和 Vishny（1992）的研究中强调过这一点。

② Fehér, Heller 和 Márkus（1983）的书中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需求上存在独裁。

了这一点。公众集体对于高层领导的决策也毫无防备，这些决策对于供给、需求、价格、工资以及短缺的规模和分配等事务有决定权。

短缺经济的消除使这种无防备结束了。我并不要神化买方市场，我也不认为它体现了无限的消费者主权。消费者的口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产者影响，而且常常受其操纵，但是生产者也只能在某个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市场是一种能在很大程度上按照消费者偏好调节生产的机制，即使有时会有摩擦。当生产者试着推行某种新产品时，消费者至少可以通过其购买选择来表达其赞许；生产者无法强制购买者。

今天的议会和政府即使是在民主制国家运行，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限制消费者欲望。但需要加上的一点是，制度越民主，它就越不能左右消费者。

因此最终，短缺经济的消除增强了权利和自由^①。

当讨论官僚主义和经济参与者的关系时还应指出另一种现象：腐败。短缺经济中已存在腐败现象；买方将寻求途径通过向卖方或进行分配的官僚行贿来获得他想得到的商品和服务。随着短缺经济的消除和私有企业的扩张，现在方向发生了改变，卖方现在希望通过腐败来获得政府订单。另外，当私营企业主的成功部分取决于政府官员的特定行为时也会发生腐败，这些官员有权决定谁能以何种条

① 更确切地讲，这加强了伦理学中所讲的负自由，即人们从某些事物（例如，国家对其生活的压制或干预）中的解脱。正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去做某事）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取决于人们能够支配的资源 and 商品，换言之，取决于一般福利和收入分配。

件获得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获得国有房屋或地点的租赁权，得到允许进行某种受到政府管制的业务活动等等。现在有许多富有的商人都花得起钱进行贿赂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消除，压制放松了。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却带来管理放松的副作用。腐败的规模更大了，也更明显了，尤其是在转轨尚不够巩固的时期。

(四) 增长、质量发展和技术进步

目前有关改革利弊的讨论都来自对两种状态的静态比较。现在还必须加上对制度运行能施加影响的效果的讨论。

改革似乎在初期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例如，这种影响可以用总产出指数来衡量。社会主义制度初期的快速增长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投资饥渴症，它和其他一些因素都来自这样一种预期，即任何产出都能售出，经济增长永远不会受到有限需求的阻碍。在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这一旧驱动力不再发挥作用，而来自利润驱动的新力量还很微弱。另外作用于此的还有伴随转轨产生的衰退效果。

与此同时，市场制度的改革强制生产效率发生良好的变化。某些效果很快便明显了，使得企业在日常活动中也能体会得到。以前获得投入品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取得原料、半成品和零件的难度小了很多。劳动力短缺结束了，出现了失业现象。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这将迟早有利于经济的更快增长。

然而更重要的是长期效果。短缺经济所作的最严重的和最致命事情是和其他因素一起推迟了技术进步。它使得经济活动丧失了通过竞争产生的驱动力。社会主义制度在

两种制度的竞争中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在长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落后了。

通过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比较，我得出结论，情况终会改变，卖方市场会转化为买方市场。我相信，别处扩散的技术革新迟早也会促进后社会主义地区技术的发展，而且这里也会出现真正天才、前沿的技术革新。这里我只能表达我的信心。我们仍需等待事实来证明或否定这一预测。

（五） 评价的总结

改革，以及包括在内的短缺经济的消除是有利的和有害的、受人欢迎的和令人痛苦的变化的结合。我试图用一种客观方法展示有利的和不利的效果。经济从一条正常轨道转到另一条，正常，这个形容词也表明这些道路并不是理想化的、纯粹的、有着极端特点的理论模型，而是好坏参半的实际历史组成。两条道路都有许多特点，对这些特点的评价取决于作出判断的个人或团体所持有的价值观。

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判断：按照我的价值观，改革的优点超过了其缺点。我把短缺经济的消除视为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成就之一，虽然我也很清楚要为之付出高昂成本。

可以设想，有相当比例的人在其他价值观基础上将作出不赞成改革的价值判断^①。对这种现象有多种解释，对某些人而言，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历史健忘性，他们对于短缺造成的痛苦和损失的记忆被冲刷掉了。对于另一些人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和研究

^① 在1991年的调查中，59%的答卷人认为，应该保持低价，即使这意味会出现某些产品的短缺。参见 Lázár (1993) 第43页。

而言，这是因为他们在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所造成的再分配中处于失利而不是获利一方。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公众的态度，进行制度比较的研究者采取的决定性标准是长期效果，尤其是短缺经济的消除会对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趋势造成的影响。但是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关心，只是不耐烦地等着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

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对消除短缺经济没有足够重视，即使这是后社会主义转轨中最重要、最明显和长期内最重大的发展。

(陈楚玲 译)

消除短缺经济：匈牙利发展的一般分析和研究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 稳定化的研究案例^①

一、简介

1995年3月12日，匈牙利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宣布了一项严格的调整和稳定化方案（下文将称之为ASP 95）^②。截止到本文写作的时候（1996年6月），这一方案的实施

① 本研究获得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OTKA）的支持。本章的第一版本曾提交于OECD-CCET研讨会（1996年5月29-30日）：中东欧转轨及发展——90年代的教训。同以下各位的讨论使我受益非浅：László Csaba, Zsuzsa Dániel, Rüdiger Dornbusch, John McHale, Csaba László, Judit Neményi, Gábor Oblath, Jeffrey Sachs, György Surányi, Georg Winckler 和 Charles Wyplosz。其中一些人同时还阅读了本论文的初稿，非常感谢他们所提出的有价值的评论。

② ASP 95的部分工作在前财政部长László Békesi的主持下就已进行。整体改革规划是在新任财政部长Lajos Bokros和新任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György Surányi的主持下完成的。ASP 95由Csula Horn首相在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陪同下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

一年以来，Bokros在设计、解释和实施改革规划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改革方案也因此被称为Bokros方案。我之所以在本文使用ASP 95这一“非人称化”的词语，因为改革的责任是由首相所承担，而且政府、议会多数派和中央银行需要共同为改革的后果（成绩和失误）负责。Lajos Bokros于1996年2月离任，然而新任财长和政府继续实施其改革方案。

已经持续了 15 个月。本研究试图对其迄今为止的后果进行评价和思考。

“调整 and 稳定”这一词语可以应用于许多种类型的经济政策方案。它通常包括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措施以及其它。然而，对于匈牙利的改革方案，其主要目的是克服严重的经常账户和预算失衡，防止发生内外债危机。因此，“调整 and 稳定”这一词语的含义与通常意义不同。

15 个月是一段不长的时间。我们在为改革的早期成功欢欣鼓舞的时候，切记要保持谨慎和理智，因为改革的成果很容易化为乌有。实际上，我认为本文的标题更确切的来说应该是：“迄今无衰退的调整”^①。牢记这一点，我们可以来评价截止 1996 年 6 月为止的改革成果^②。我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可以超越匈牙利特定环境并可能对他国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迄今为止改革所导致的后果以及实施改革的成本和代价。第三部分研究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仍可在未来使用。最后，第四部分展望改革尚面临的任务、对改革成果的威胁以及匈牙利的发展前景。

① 实际上，可能在实施 2 年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实施 3 年之后，一项改革方案的成效才能被完全评估。在 Alesina 和 Perotti 的研究（1995）中，如果在采取财政改革措施 3 年后，公共债务与 GDP 的比例有明显的改善（至少 5%），那么这项措施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

② 关于改革的全面评价主要载于匈牙利的日报和周报以及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内部报告。在本章我将试图引用这些文章，如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1996a）和财政部报告（1996a）。更详细的研究请参见 Köves（1995b）和 Oblath（1996）。

二、成就和代价

表 1 列出了匈牙利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下文将加以讨论。

表 1 1993—1995 年匈牙利宏观经济指标

指 标	1993	1994	1995
1. GDP(年增长率, %)	-0.6	2.9	1.5
2. 人均 GDP(美元) ^a	3745.0	4046.0	4273.0
3. 居民消费(年增长率, %) ^b	1.9	-0.2	-6.6
4. 总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 %)	2.0	12.5	-4.3
5. 出口(年度指标) ^c	-13.1	16.6	8.4
6. 进口(年度指标)	20.9	14.5	-3.9
7. 贸易差额 ^d (百万美元)	-3267.0	-3635.0	-2442.0
8. 经常账户逆差(百万美元)	-3455.0	-3911.0	-2480.0
9. 净可兑换货币债务(百万美元)	14927.0	18936.0	16817.0
10. 可兑换货币储备 ^e (占经常项目下进口量的百分比)	59.4	60.2	78.8
11. 失业率 ^f (%)	12.1	10.4	10.4
12. 就业率 ^g (%)	42.2	40.2	39.5
13. 广义政府收支差额(GFS 差额 ^h , 占 GDP 的百分比)	-5.2	-7.6	-3.6
14. 通货膨胀率(年度消费者物价指数)	22.5	18.8	28.2
15. (雇员)毛平均收入(增长率, %)	21.9	24.9	16.8
16. (雇员)净平均收入(增长率, %)	17.7	27.3	12.6
17. 人均真实工资(年增长率, %)	-3.9	7.2	-12.2

注: 本书完成时对此表数据进行了更新。

^a 根据匈牙利年均官方商业汇率转换而得。

^b 居民的真实最终消费。

^c 出口和进口数据基于海关统计。进口数据包括 1993 年为弥补早期债务而从俄罗斯进口的军火。

^d 经常项目下与贸易相关的支付。

无衰退的调整：
对匈牙利稳定化的研究案例

^e12月31日数据。

^f年底登记失业人数与前一年积极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比例。

^g1月1日数据。

^h关于财政方面的详细数据和解释请参见 *Struggle and Hope* 第四章表 4.2。

ⁱ全职雇员的毛平均收入:1993年和1994年的数据来源于雇员20人以上的组织,1995年的数据来源于雇员10人以上的组织。

^j原文疑有遗漏(译者注)。

资料来源:

第1行~第10行:中央统计局报告(1996f),分别参见第224页、第223页、第224页、第276页、第276页、第324页、第324页、第325页、第324~325页。

第11行: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1996b),第57页。

第12行:中央统计局报告(1995c),第4~5页。

第13行: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1996c)。

第14行~第17行:中央统计局报告(1996f),分别参见第313页、第75页、第77页和第86页。

(一) 避免临头大难

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匈牙利经济出现了许多喜人的发展。让我们来列举部分最重要的变化:价格和外贸基本上完全自由化,大量私有企业建立,国有企业私有化大步推进,生产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外贸根据欧共体崩溃之后的变化进行了调整。1994年,GDP重新开始增长,而此前由于1990年的剧变引发了严重的转轨性衰退。

然而,在匈牙利的经济发展中同样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方面。社会主义体制导致匈牙利的宏观经济状况十分糟糕,最令人头痛的是巨额外债。从这个意义上讲,匈牙利经济的起点低于大多数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1990—1994年执政的政府未能完成许多艰难的任务,而1994年

掌权的继任政府在采取行动之前也犹豫了好几个月。到1993年，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9.0%。当这种状况在1994年又一次出现，甚至达到9.5%的时候，匈牙利的外部融资就有可能出现严重困难。不断高起的预算赤字部分与此有关。根据国家账户的统计数据，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8.2%。^{①②}

经济失衡导致了匈牙利的内外债增长加快。不断增加的偿债成本使得经常账户赤字和预算赤字加剧，政府因此不得不借入更多的资金以弥补赤字。1994年冬季，由于匈牙利宏观经济金融表现不佳，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对其失去信心。而在此之前，由于总是能够按时偿债，在东欧所有国家中，匈牙利一直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宠儿。我在此所描述的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之为“自我推进”。由于举债状况恶化导致匈牙利形象受损，而这又使得它进一步陷入债务螺旋上升的困境。

在第五章中，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继任政府为何会犹豫徘徊，为何会延期那些越来越不可避免的激进改革措施，此处不再重复。只有那些未来的历史学家，穿过政治的迷雾，才能发现什么样的政策影响最终结束

① 数据来源：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1995a），第172页和第234页，并请参见表1、表2和表3。

② 关于匈牙利1993—1995年宏观经济状况的论述，推荐读者参考 Antal（1994），Békési（1993，1994，1995），Csaba（1995），Erőds（1994），Köves（1995a，1995b），Lányi（1994，1995），Oblath（1995）和世界银行报告（1995b）。关于ASP 95的评论，可以参考 Bokros（1995a，b和1996）以及 Suráni（1995a，b和1996）。至于本人的观点可以参见 *Struggle and Hope* 一书的第二章（该章成文于ASP 95宣布之前）和第四、第五章（均成文于ASP 95实施过程中）。

了几十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习惯指导方针。1996年1月发生的墨西哥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匈牙利政府推进激进改革的决心。国际金融出版物中曾经有一个猜测：墨西哥之后将会是谁？令人不安的是匈牙利排在了首位。

1995年3月，匈牙利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预防性改革措施，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防止一场如不进行调整和稳定化改革就可能发生的灾难。关于这一点，我将利用表2和表3加以说明。表2比较了墨西哥和匈牙利的宏观经济表现，而表3则表明了其他一些国家发生危机时的表现以及他们与匈牙利采取ASP 95之前类似时期的状况。^①

表2 宏观经济指标对比：匈牙利对墨西哥

指 标	墨西哥		匈牙利	
	1994	1995	1994	1995
1. GDP(年增长率, %)	4.5	-6.2	2.9	1.5
2. 实际私人消费(年增长率, %) ^b	3.7	-12.9	-0.2	-6.6
3. 工业产值(年增长率, %)	4.8	-7.5	9.6	4.8
4. 制造业就业人数(就业人数的年变化率, %) ^c	1.0	-2.9	-9.1	-5.3
5. (雇员)实际收入(年增长率, %) ^d	4.1	-12.4	7.2	-12.2
6. 通货膨胀率 ^e	7.1	51.9	18.8	28.2
7. 经常账户差额占GDP之比(%)	-7.8	-0.3	-9.5	-5.4 ^a
8. 外债净额占GDP之比(%) ^f	32.2	36.1	45.9	38.4

注：本书完成时对此表数据进行了更新。

^a 预测数据。

^b 匈牙利的数据采用的是GDP中家庭最终消费部分。

① 关于拉美危机和金融失衡，我主要参考了如下各位的文章：Cooper (1992)，Dornbusch 和 Fischer (1993)，Dornbusch、Goldfajn 和 Valdés (1995)，Dornbusch 和 Werner (1994)，Krugman (1991)，Little 等 (1993)，Sachs (1996)，Sachs、Tornell 和 Velasco (1995)。

^c 墨西哥的数据是用当年 12 月份与上年 12 月份相比。匈牙利采用的是雇员平均人数增长比例；匈牙利 1995 年的数据只针对那些雇员 10 人以上的企业。与匈牙利统计可比的墨西哥全国就业和失业数据无法得到。关于匈牙利的数据可参见表 1 第 11 行和第 12 行。该表表明在匈牙利制造业失业率上升的同时其它行业失业率有所下降，因为总体的就业和失业水平基本保持不变。关于墨西哥不同行业就业状况变化的数据无法得到。

^d 对于墨西哥采用的是制造业雇员月实际收入增长率，对于匈牙利采用的是每个雇员的实际工资增长率（请参见表 1 注释 j）。

^e 对于墨西哥采用当年 12 月份数据与上年 12 月份数据相比。

^f 墨西哥的外债净额仅包括公共债务，而匈牙利的数据则为公共债务和私人外债之和。

资料来源：

墨西哥的数据由 Miguel Messmacher 从如下来源进行收集或计算：第 1 行、第 3 行和第 4 行来自 1994：Banco de Mexico (1996) 表 II - 16、表 II - 13 和表 II - 9；第 2 行来自 OECD 报告 (1996) 表 3；第 5 行来自 OECD 报告 (1997) 第 58 页；第 6 行来自 Banco de Mexico (1996) 表 III - 1；第 7 行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 (1997) 第 426 ~ 429 页、Banco de Mexico (1996) 表 IV - 1b；第 8 行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 (1997) 第 426 ~ 429 页、墨西哥财政部 1994 年报告 (1995) 和墨西哥财政部 1995 年报告 (1996)。

匈牙利的数据来源：第 1 行和第 2 行同表 1 第 1 行和第 3 行；第 3 行来自中央统计局报告 (1996e) 第 8 页；第 4 行来自中央统计局报告 1994 年报告 (1995d) 第 143 页，匈牙利国家银行 1995 年报告 (1996b) 第 56 页；第 5 行同表 1 第 17 行；第 6 行同表 1 第 14 行；第 7 行和第 8 行来自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 (1996c)。

表 3, a-e 某些拉美国家发生危机和进行调整的不同阶段

关于这 5 个分表的通用解释：年份 0 代表该国经常账户赤字最严重的年份，这一年在每一个分表的第三列标明。在所有的分表中，这些国家的顺序都是按照 GDP 下降的最大规模由高到低进行排列的。（智利 1982 年的 GDP 下降速度为 14.2%，排在第一位。）所有分表均由 Miguel Messmacher 整理制作。

表 3a GDP 年增长率 (%) (正数表示增长, 负数表示下滑)

国家	经常账户赤字最大的年份	调整年份	-4	-3	-2	-1	0	1	2	3	4
智利	1981	1982	9.9	8.2	8.3	7.8	5.5-14.1	-0.7	6.4	2.5	
哥斯达黎加	1981	1981	8.9	6.3	4.9	0.8	-2.3-7.3	2.9	8.0	0.7	
阿根廷	1981	1981 ^a	6.2-3.3	7.3	1.5	-5.7-3.1	3.7	1.8	-6.6		
巴西	1982	1983 ^a	5.0	6.8	9.1-4.4	0.6-2.9	5.4	7.9	7.5		
墨西哥	1981	1982	3.4	8.3	9.2	8.3	7.9-0.6-4.2	3.6	2.6		

注:^a 代表本币贬值的年份。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5)中与各个国家相关的表格。

表 3b 经常账户差额占 GDP 的比重 (%)

(负数表示赤字, 正数表示盈余)

国家	经常账户赤字最大的年份	调整年份	-4	-3	-2	-1	0	1	2	3	4
智利	1981	1982	-5.3-7.1	-5.7	-7.1	-14.5	-9.5	-5.7	-11.0	-8.6	
哥斯达黎加	1981	1981	-7.5	-10.3	-13.8	-13.7	-15.6	-10.4	-9.9	-6.9	-7.4
阿根廷	1981	1981 ^a	3.2	2.8	-0.5	-2.3	-2.8	-2.8	-2.3	-2.1	-1.1
巴西	1982	1983 ^a	-3.5	-4.8	-5.5	-4.5	-5.9	-3.5	0.0	-0.1	-2.0
墨西哥	1981	1982	-2.2	-3.0	-4.0	-5.4	-6.5	-3.4	3.9	2.4	0.4

注:^a 代表本币贬值的年份。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5)第 154-155 页以及与世界银行报告(1995c)第 464-466 页。

表 3c 实际汇率的增长率 (负数表示本币升值, 正数表示本币贬值)

国家	经常账户赤字最大的年份	调整年份	-4	-3	-2	-1	0	1	2	3	4
智利	1981	1982	-10.6	-6.7	-4.2	-16.0	-7.9	81.9	-3.4	27.4	13.6
哥斯达黎加	1981	1981	2.2	0.9	2.3	-4.1	239.3	-37.5	-16.3	2.6	1.2
阿根廷	1981	1981 ^a	-16.0	-34.4	-30.8	-30.4	96.2	168.6	11.4	10.3	-39.9
巴西	1982	1983 ^a	1.1	48.2	-4.4	4.7	6.2	66.0	13.8	4.1	-40.9
墨西哥	1981	1982	-5.9	-7.4	6.9	-10.8	-3.3	96.5	-14.8	12.3	22.2

注:实际汇率的增长率 = $(1 + \text{名义汇率变动率}) \times (1 + \text{美国通货膨胀率}) / (1 + \text{本国通货膨胀率})$

^a 代表本币贬值的年份。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5)中与各个国家相关的表格。

表 3d 通货膨胀率(%)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均变化,正数表示物价指数上涨)

国家	经常账户赤字最大的年份	调整年份	-4	-3	-2	-1	0	1	2	3	4
智利	1981	1982	91.1	40.1	33.4	35.1	19.7	9.9	27.3	19.9	30.7
哥斯达黎加	1981	1981	4.2	6.7	8.7	18.4	36.9	89.4	33.0	11.8	15.1
阿根廷	1981	1981 ^a	176.0	175.5	159.5	100.8	104.5	164.8	343.8	626.7	7672.1
巴西	1982	1983 ^a	38.7	52.7	82.8	105.6	97.8	142.1	197.0	226.9	145.2
墨西哥	1981	1982	29.0	16.2	20.0	29.8	28.7	98.8	80.8	59.2	63.7

注:^a 代表本币贬值的年份。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5)第 122 ~ 123 页。

表 3e 私人消费的年变化率(%) (正数表示上升,负数表示下降)

国家	经常账户赤字最大的年份	调整年份	-4	-3	-2	-1	0	1	2	3	4
智利	1981	1982	16.6	9.8	14.2	14.4	15.5	35.6	-8.1	25.2	-5.6
哥斯达黎加	1981	1981	11.9	9.1	2.0	-2.5	-3.1	-7.9	3.7	7.5	3.1
阿根廷 ^b	1981	1981 ^a	2.5	-1.4	14.0	8.0	-3.9	-6.2	4.1	3.8	-6.8
巴西	1982	1983 ^a	2.3	9.6	6.6	-4.2	3.9	0.7	5.2	2.7	6.8
墨西哥	1981	1982	0.3	9.3	9.9	9.4	8.3	-6.5	-7.0	4.4	4.1

注:^a 代表本币贬值的年份。

^b 阿根廷的数据运用的是全部消费。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报告(1995c)第 12 ~ 13 页和第 104 ~ 105 页。

在此,我并不想过分强调匈牙利与其他国家的类比。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严格来说是独特的历史。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匈牙利和表 2、表 3 所列的国家在特定发展阶段存在很大的相似性:^①

1. 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贸易逆差,进口超过出口。此外,贸易失衡导致经常账户出现问题。

2. 在表 2 和表 3 所列的一些国家中,预算赤字导致宏观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3. 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主要原因)在于实际汇率的上升和因此导致的本国币值高估。

^① 为简略起见,表 2 和表 3 并未包括所有表明相似性的指标。

4. 这些国家曾经吸引了大量不同形式的信贷资金和投资。长期以来,他们对贷款者和投资者来说具有很大吸引力,其金融形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贷款者和投资者的信心。

上述这些是我想预先强调的。匈牙利与表中其他国家存在以上四个方面的相似点,然而在其他国家发生的灾难并未降临到匈牙利的头上。

尽管每一次危机都有所不同,但几乎所有的危机的发生都是一个典型的积聚过程。情况类似于在拥挤的大厅里发生火灾:慌乱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所有的人都冲向狭窄的过道,大家互相践踏,出口也被堵住了。^①当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纷纷收回自己的资金和投资,从而导致混乱无序的资金流动。正是由于惊慌才加速了危机的发生并加剧了危机的程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危机的发生如此突然。匈牙利恰恰成功避免了这种恐慌的发生。^②

当危机发生时,最剧烈的后果是在短期内生产严重衰退和并发的失业急剧增加(见表2和表3)。这是一个通过总需求的快速紧缩来减少国内吸收量并纠正吸收和生产间比例失衡的残酷过程。ASP 95使得(或者更谨慎地说是迄今使得)匈牙利避免了这一衰退。由于匈牙利尚未从1990年后的转轨性衰退中摆脱出来,所以如果没有ASP 95情况将会更加糟糕。将表1与表2、表3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匈牙利的国内生产在1995年甚至有温和的上升而非下降,其

① 请参见金德尔伯格(1978)。

② 关注墨西哥危机的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避免过分提醒公众和政府警觉危机。警告可能会通过自我预期实现而引发恐慌。要采取措施避免危机而同时又使得匈牙利公众和国际商业界保持信心、避免恐慌是有一定困难的。

失业率也基本保持不变而非飙升。熟悉危机历史和稳定化政策的匈牙利国内外经济学家对这一成就表示了赞赏,但普通民众却并不持相同看法,尽管这是 ASP 95 改革成功之处。对于老百姓来说,避免一场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危机并不能有一种成功的感觉。一些人甚至不负责任地认为,如果遭遇与墨西哥同样的命运对匈牙利反而是一件好事。这种极端观点认为,如果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对匈牙利施以援手的话,匈牙利就可以获得债务豁免并走出经济泥潭。^①实际上,除了距离美国如此之远的匈牙利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帮助令人怀疑之外,还应看到,尽管得到援助,墨西哥在危机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 宏观经济结构调整

ASP 95 除了起到短期的危机预防作用之外,还着手采取一些必要手段纠正宏观经济的结构失衡,因为这些失衡是潜在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人们期望 ASP 95 会在中长期内同样取得成效。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表 1 所列的主要变化:

1. 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经常账户赤字。这一赤字曾经连续两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但是 1995 年其绝对额比 1994 年急剧下降,占 GDP 的比重也下降了 4 个百分点。净债务与 GDP 的比例也有了很大的改观^②(见表 2 第 7、第 8 行)。

① 关于这些观点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Kocsis (1995)。

② 经常账户差额并不包括中长期资本流动差额。因此外国直接投资这一重要项目并未出现在经常账户中。然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尽管没有改善匈牙利的经常账户,却改善了其净外债状况。在计算净外债时,储备是资产方的一部分,而资本流入会导致储备增加。因此在保持经常账户逆差的同时削减净外债是可行的。

2. 在前一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出口量在 1995 年又增长了 8.4%。因此，ASP 95 可以起到促进出口的作用。同时，在前一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进口量在 1995 年下降了 3.9%（见表 1）。

3. 国内吸收发生紧缩，但是正如我上文提到的，生产并没有衰退，反而有所增长。结构调整使得这一情况成为可能。在需求方，尽管消费减少，但是出口比例上升，投资也有小幅增加。在供给方，国内生产的比重上升而进口所占比例下降（见图 4 和图 5）。

4. 预算赤字（总体财务统计差额，即 GFS^① 差额，占 GDP 的比例）削减了 4 个百分点。

5. 企业的平均赢利水平从 3.8% 增加到 8.2%。^② 赢利企业的利润增加，亏损企业的损失减少。政府预算占信贷资金的份额下降而企业借款的份额上升。这些情况都有助于企业改善对增长前景的预期。

① 关于 GFS（General Financial Statistics）的解释，请参见表 4 的注释。

② 此处的数据是用企业“用于投资目的的自有资源”除以 GDP 得到的。“用于投资目的的自有资源”的定义是折旧加上税前利润减去公司税。数据来源于财政部报告（1996a）第 20 页。

Szentgyörgyvári 和 Baar（1996）第 18 页给出不同的定义：税前盈利水平等于总收入与总成本之差除以总收入。就匈牙利企业的平均水平来看，这一指标在 1992 年为 -3.2%，1994 年上升到 3.3%，1995 年上升到 7.2%。

总供给量的年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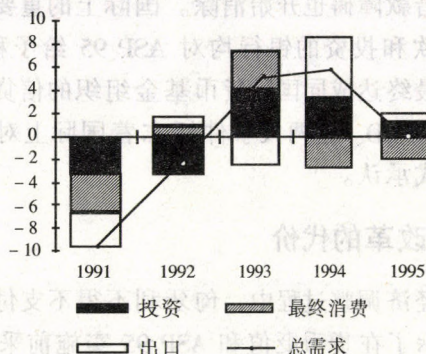


图4 引起总供给量变化的因素

注：本书对所用数据进行了更新。由于基于不同的预测，本图中1995年的基础数据与表1和表2中有所差异，尽管其变化是朝着同一方向进行的。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

总供给量的年变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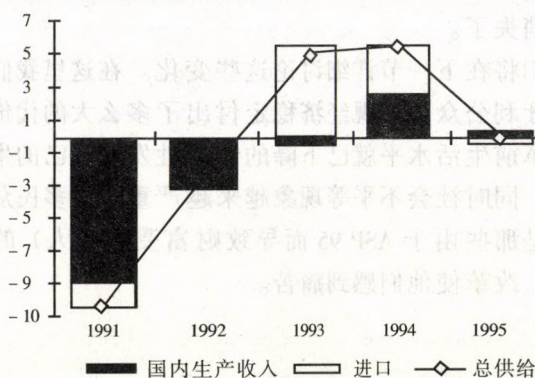


图5 导致总供给发生变化的因素

注：请参见图1注释。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家银行发布的信息。

ASP 95 提高了金融界对匈牙利的信心,其信贷评级开始改善,借款障碍也开始消除。国际上的重要研究报告及在东欧贷款和投资的银行均对 ASP 95 给予积极评价。匈牙利不但最终达成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协议,而且还被纳入 OECD。这两大事件标志着国际上对匈牙利改革成果的正式承认。

(三) 改革的代价

在宏观经济调整过程中,匈牙利不得不支付沉重的代价。图 6 显示了在货币贬值和 ASP 95 实施前采取的其他措施(如提高能源价格)之后,通货膨胀是如何加速的。然而,通货膨胀率还是保持在温和的、可控的状态,而且现在相对 ASP 95 实施后的颠峰状态已经再次缓和。名义工资率的增长同价格水平的增长严重偏离,导致实际工资率大幅下降。同时,由于预算支出紧缩,许多福利都减少或消失了。

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这些变化。在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匈牙利公众为宏观经济稳定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许多在改革前生活水平就已下降的老百姓发现自己的生活更加窘迫,同时社会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民众(当然主要是那些由于 ASP 95 而导致财富受损的人)的安全感下降,改革使他们感到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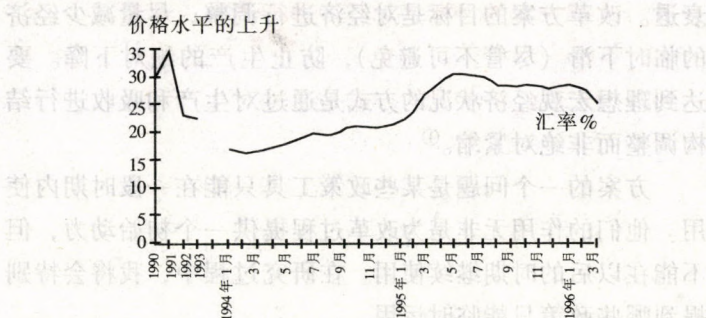


图6 消费物价水平

注：1990—1993年的数据表示当年物价水平相对前一年的增长率；1994—1996年的数据表示当月的物价水平相对去年同期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1991—1993年数据来自中央统计局报告（1995d）第286页；1994—1995年数据来自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1996b）第67页；1996年数据来自中央统计局报告（1996b）第63页。

三、改革方案所使用的政策工具

由于匈牙利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在ASP 95中可使用的政策工具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匈牙利是在实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才刚刚进入后社会主义转轨阶段的。尽管它同其他具有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例如一些南美国家）在经济状况和问题方面非常相似，我们也必须注意其历史的独特性。

匈牙利政府和中央银行在ASP 95中同时使用了几种政策工具。其经济方针是非传统的，不但采取了常规的政策工具，而且配以其他非常规工具。ASP 95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并不遵循简单地通过紧缩总需求来恢复经济均衡的教条主张。如果按照这一主张，有可能导致生产的严重

衰退。改革方案的目标是对经济进行调整，尽量减少经济的临时下滑（尽管不可避免），防止生产的绝对下降。要达到理想宏观经济状况的方式是通过生产和吸收进行结构调整而非绝对紧缩。^①

方案的一个问题是某些政策工具只能在一段时期内使用。他们的作用无非是为改革过程提供一个初始动力，但不能在以后的时期继续使用。在研究过程中，我将会特别提到哪些政策只能临时运用。

（一）汇率和外贸政策

在 ASP 95 实施之前，匈牙利政府和中央银行已将其货币福林 (Hf) 进行了数次贬值，但在每两次贬值之间却保持了固定的汇率水平。这一汇率政策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尽管名义上贬值，福林的真实汇率却是上升的。这一趋势在某些时期是加速的，比如说 1991—1992 年（请参见图 7 和 Halpern 和 Oblath 的相关研究）。^② 另外，汇率政策具有不可预见性。没有人能预先得知福林何时贬值以及贬值的幅度有多大。滞后很久的汇率调整会不断地延期，这使得投资者很难进行合理的商业计算。在 ASP 95 宣布之前，福林贬值的预期越来越强，对其投机性袭击也已出现。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在 ASP 95 中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步，福林贬值 9%。匈牙利政府采用了预先宣布的爬

① 这一观点正是我在 ASP 95 定型之前写的一本书（1994 年，匈牙利出版）政策主张的核心思想。

② 请参见 Halpern (1996) 和 Oblath (1995)。

行盯住汇率制度，并很快收到成效。在这种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提前较长时间（6~12个月）宣布货币贬值的速度。^①一开始，月贬值幅度为1.9%，此后则逐渐下降。到1996年，月贬值速度将会是1.2%。

在确定汇率水平时，货币政策当局试图或多或少地维持由初期贬值所产生的实际汇率，阻止本币的实际升值。当局所宣布的名义贬值率基于对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认真预测。^②这就要求：给定生产率的可能变化趋势，当局必须在支出方面预测名义工资率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限于计划的通货膨胀率之下。

预先宣布的爬行盯住汇率制度需要同恰当的利率政策相配合。如果利率不是足够的高，那么投资者就有可能大规模地将其持有的福林转换成外币并从匈牙利抽走，汇率就有可能暴跌。

迄今为止，所宣布的汇率水平一直都得到坚持，这对匈牙利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成就。中央银行允许汇率在所宣布水平的上下2.5%之内波动。如果银行间货币市场的汇率水平超出这个波动范围，中央银行就会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间市场的汇率从未超出这一范围。在主要服务于老百姓和外国投资者的地下黑市或者半地下黑市（grey currency market），汇率的波动也局限在上下2.5%之内。在私人储蓄领域，人们趋向于从储蓄外币转向储蓄福林。从1996年1月开始，匈牙利货币实现了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利稳定化的研究案例

① 关于预先宣布的爬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分析，请参考 Kopits (1995)。

② 此处国外通货膨胀率用反映匈牙利外贸构成的一系列货币的平均通胀水平表示。

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① 这些情况的出现减少了外汇投机，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福林的信心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

在一开始和后来持续的贬值措施使得福林的名义汇率大幅下降。1995年12月的名义汇率水平比12个月之前下降了30.6%。不过，由于通货膨胀率的加速，真实汇率水平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如图7所示）。如果以工业批发物价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实际汇率水平相对于上面所提的时期下降了5.5%。如果剔除季节因素并以单位劳动成本为基础，1995年前10个月的汇率水平同比下降了17.1%。^② 此处我们不考虑衡量方法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福林的名义贬值率都超过了通货膨胀率，从而提高了匈牙利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③

除了本币贬值和实行新的汇率制度外，ASP 95还采用了其他手段来调节对外贸易。对进口客以8%的附加费用，这实际上增加了现有关税的影响。ASP 95规定政府不得采取限额办法来限制进口，但是通过征收附加费可以使政府在两年的时间内暂时遏制（为国际协议所允许）失控的进口，同时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④

① 匈牙利货币福林的可兑换性不仅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第八条条款“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标准，而且还符合OECD关于特定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要求。

② 参见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1996a）第25页。

③ Szentgyörgyvari 和 Baar 的研究对真实汇率和竞争力的衡量以及匈牙利在此方面的状况和问题作了非常好的介绍。

④ 分析表明某些商品如私家车的进口大大增加。因此政府对其征收额外的消费税（同时也征收进口附加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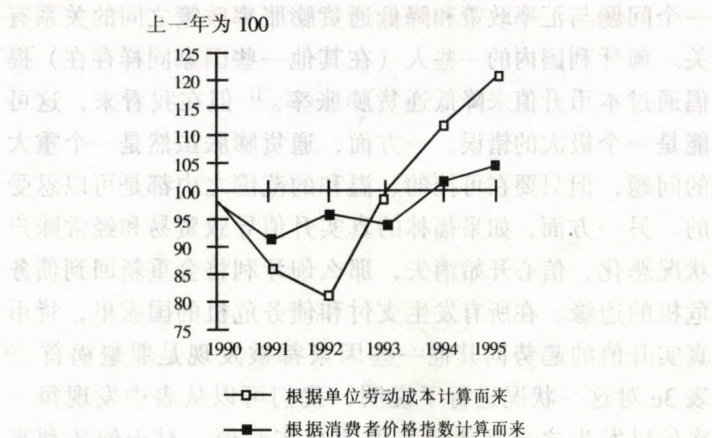


图 7 实际汇率变动图

注：指数大于 100 表示同前一年相比本币实际贬值，指数小于 100 表示同前一年相比本币实际升值。

资料来源：Szentgyörgyvari 和 Baar (1996) 第 2 页。

所以说，ASP 95 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对称的。一方面，它强调抑制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歧视性，因为限制的主要是消费性进口需求。收取的进口附加费用被补偿给那些使用进口产品进行投资或进行出口生产的厂商。这表明 ASP 95 的目的是鼓励投资和促进出口。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并非可以滥用。关于进口的限制性措施仅仅当存在国际支付危机时才能被正当使用。如果这一政策被永久化，那么就会导致相对价格的扭曲、损害经济效率。所以，当政策结果稳固之后，匈牙利必须降低关税和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导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关于未来将实施的汇率制度存在着持续的争论，其中

一个问题与汇率政策和降低通货膨胀率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关。匈牙利国内的一些人（在其他一些国家同样存在）提倡通过本币升值来降低通货膨胀率。^①但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方面，通货膨胀虽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只要在可控的、温和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忍受的。另一方面，如果福林的真实升值导致贸易和经常账户状况恶化，信心开始消失，那么匈牙利将会重新回到债务危机的边缘。在所有发生支付和债务危机的国家里，货币真实升值的趋势同其他一些因素都被发现是罪魁祸首。^②表 3c 对这一状况进行了说明，我们可以从表中发现每一次危机发生之前都伴随本币的真实升值。对于匈牙利来说，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真正地、永远地摆脱目前的困境，这一点对其他小型开放经济体同样适用。小型开放经济体竞争力的提高必须借助不同的政策工具，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详细讨论。但是汇率政策必须首先得到改善。

① 在目前的汇率制度下，这相当于使得预先宣布的本币贬值率大大低于预期通货膨胀率。预先宣布的汇率水平将会起到名义固定器的作用，降低通货膨胀率。

② 请见 129 页①里所引用的与危机相关的文献。匈牙利可以从 Dornbusch, Goldfajn 和 Valdés (1995) 的研究结论中吸取教训。在第 251 ~ 252 页中，他们写道：通过使本币贬值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来降低通胀率是使得本币实际升值的常用手段。由于实际汇率的下降是粘性的，这样本币的实际升值就很难通过工资 - 物价的下跌来恢复正常，最终会导致本币的崩溃和大幅贬值。在许多人看来，通过本币真实升值来使得通货膨胀率下降而又不增加失业是一条捷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在本币崩溃和大贬值之后，通货膨胀率将会比开始时更高。

(二) 收入政策

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消费的大幅下降。传统的方法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调节过程来完成的。伴随着生产的急剧下降,通过劳动市场的机制,失业率大幅上升,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由于存在工资刚性和劳动力市场调节的摩擦性,这一现象的发生会经历较长时间的延误。实际上,相对于存在无摩擦和无延误的情形来说,失业率需要有更大程度的上升才能达到宏观经济意义上必需的工资水平。关于“工资曲线”^①的实证文章表明要使得工资率下降10%,失业率必须上升一倍。这一经验数据主要建立在对一些特定国家的地区性差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并没有必要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今天的匈牙利。然而,这一数据表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只有当业已很高(超过10%)的失业率大幅上升,才会导致宏观经济中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构成发生变化。

与此不同的是,ASP 95 采取了政府直接干预这一非传统的方法来降低实际工资。对于工资的中央计划控制在1992年废止。此后,雇主和雇员组织以及政府每年都要就工资、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政策进行谈判。但是,协议即使能够达成,也没有约束力。1995年初,谈判按时举行,但进展缓慢且没有成效。ASP 95 的宣布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雇主们给予了谨慎的支持,但劳工组织却意见不一。不同行业的劳工组织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反应:从强烈抗议、罢工、游行到无奈接受。匈牙利的非传统的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稳定化的研究案例

^① 例如 Blanchflower 和 Oswald (1994)。

改革方案不同于其他国家，如 Israeli，改革一开始并未取得劳工组织的赞同。^①

政府单方面地对财政预算支持的组织（公共管理、军队、教育和健康部门）以及主要由政府控制的企业实施名义工资上涨控制。为简便起见，此处我们并不详细讨论政府实施的不同的工资上涨控制。在 1995 年，一般的限制比例是 15%。当然，工资的上涨要大大慢于消费者物价水平的突然上涨。政府并不干预私有部门的工资水平。然而，由于私有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很大程度上面对相同的劳动力群体，私有部门的雇主或多或少会采取与政府部门雇主相同的工资政策。

表 1 表明实际工资下降了 12%，这意味着为了维持现有的就业水平工人们在实际工资方面做出了重大牺牲。在企业层次和全国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上，都曾经发生过工人们自愿做出这种牺牲的情况。ASP 95 实施之后，工人人们的牺牲是由两大因素导致的：其一是政府干预，其二是未预期因素。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一个论断：经济行为的主体会基于通货膨胀是否符合预期而做出不同的反应。他们会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工资需求，但对于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却无法做出相应调整，原因是已存的工资合同杜绝或至少是限制了调整余地。^② 因此，未预期通货膨胀的效应也会导致实际工资水平的大幅下降。

我们可以说，收入干预政策与汇率政策同样可以促使

① 请参见 Bruno (1993)。

② 关于未预期通货膨胀的影响，请参见 Sachs 和 Larrain (1993) 第 349 - 352 页。

ASP 95 发挥成效（迄今为止）。然而，收入政策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值得怀疑。国有部门的相对比重将会下降，这将会缩小与 1995 年所采用的干预政策相似的政策工具的作用范围。另外，对于这一收入政策的抵制也不应被忽视。

并非仅仅收入政策的作用范围在减少。我们同样需要考虑这些政策工具有多大吸引力。关于收入公平的评价标准对其提出了疑义。被影响的收入实际上是针对那些最容易受影响的人，这样不仅损害了那些由于政策影响而收入下降的人，而且违背了其他人对于公正的看法。

（三）财政政策

在 ASP 95 实施之前的一段时期内，政府预算赤字呈现增长的趋势（请见表 4）。有人担心政府债务将会螺旋式上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讲，螺旋式上升意味着由于预算利息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将会增加；由于财政不断增长的借贷需求会产生“挤出效应”而导致利息上升，从而增加政府的利息支出负担，如此循环往复^①。

ASP 95 阻止了财政赤字上升的趋势并开始加以扭转。最重要的变化当属基本预算（primary budget）的实际支出大幅下降而实际收入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基本预算赤字转为赢余。^② 这就使得公共财政的巨额债务负担得以减

① 关于匈牙利政府债务状况最好的著作请参见 Borbély 和 Neményi (1994 和 1995)。

② 关于 ASP 95 中财政政策的详细分析请参见 Oblath (1996) 第 81 - 84 页和第 95 - 97 页。

轻，自发的螺旋式上升也得以打破。^①

表4 广义政府 (the general government) 财政赤字
和总债务 (占 GDP 的百分比)

指 标	1992	1993	1994	1995 ^a
1. 广义政府基本 GFS 差额	2.1	-1.6	-2.7	1.7
2. 广义政府借款需求				
SNA 体系 ^b	-6.9	-5.5	-8.2	-6.6
GFS 体系	-6.0	-5.2	-7.6	-3.6
3. 广义政府总债务	79.2	90.0	87.6	87.7
合并总公共债务 ^c	65.2	83.4	82.5	86.5
国内借款	12.1	23.2	23.3	24.5
国外借款	53.1	60.2	59.0	62.0
国际储备	15.7	21.9	20.2	32.9

注：广义政府收支的概念既包括中央政府资金，又包括预算外资金、社会保障资金、社会医疗保险资金和地方政府资金。国民收支账户 (SNA) 和总体财务统计 (GFS) 的主要区别在于：在 SNA 体系下，私有化收入和国家贷款的偿付并不被视为收入，因此政府的借款需求不能如同在 GFS 体系下那样随之减少。此外，在 SNA 体系下国外贷款被视为收入，而在 GFS 体系下则被视为融资。

^a 预测数据。

^b 调整的 GFS 差额 (扣除私有化收入以及贷款与偿付额之差)。

^c 合并总公共债务包括广义政府总债务 (包括国内借款与国外借款之和) 以及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外债。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 (1996c) 和匈牙利国家银行发布的信息。

财政预算领域发生的变化包括采取措施降低特定的普遍福利或者基于经济状况调查而区别对待，具体如下：

① 广义政府 (General government, 关于其解释可参见表 4 注释——译者注) 总债务占 GDP 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而合并总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 (见表 4)。如果这两个指标都大幅下降将是令人高兴的，这可以使得该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更接近欧盟成员国的标准。

1. 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尽管学费仅占教育成本的一小部分,但最起码它表明了这样一个原则:由于接受较高水平教育从而获取高收入的群体应该为其教育投资负担部分成本。遗憾的是,相应的教育贷款体系尚未建立。

2. 同“需要原则”(principle of need)相适应,孕妇福利和家庭补贴的范围缩小了。

3. 牙病治疗开始停止普遍的、广泛的免费。免费项目仅仅适用于特定的群体(如儿童、青少年、老人和有需要者)。对于药品企业的补贴减少而且更具有针对性。

4. 通过提高一般退休年龄,工作年限得以延长(匈牙利的退休年龄曾经非常低:女 55 岁、男 60 岁)。

但实际上,匈牙利政府在福利改革方面采取的手段迄今几乎并没有成效。^①很不幸,政府采取的某一两项措施过于匆忙而缺少足够的准备。^②即便这样,改革措施也具有象征意义。匈牙利过去 30 年的改革是朝着同样的方向的,即年复一年地增加已经过多的国民福利。福利体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禁地,没有一支政治力量愿意进行痛苦的改革。^③现在的情况表明进行改革是可能的,这也呼唤着福利领域改革思路的产生。尽管改革的进程刚刚开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稳定化的研究案例

① 上文所列的特定支出减少政策对 1995 年的财政状况几乎没有影响。其效果在 1996 年才将真正显现,1997 年将更加明显。

② 令人遗憾的是某些改革措施的最初方案同宪政原则相冲突因而被议会法庭 (Constitutional Court) 所否决。

③ 请参见 Struggle and Hope 一书第 5 章第 3.3 部分。

始,人们已经开始着手设计和争论不同的福利改革方案。^①

国际经验表明:如果财政改革更多基于削减支出而非增加收入,则改革更容易持久。^②这一经验尤其适用于匈牙利这样一个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请见表 5)。ASP 95 采取了激进的改革方案。1995 年每增加 1 福林的财政收入就减少 3 福林的财政支出,因此预算赤字得以下降。^③

财政改革任重道远,改革中还伴随着对政府职能的重新认识。目前通过行政方式承担的许多职能是以纳税人的支付为代价的,必须完全或部分地转交给市场、赢利性和非赢利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的自愿组织。

表 5 广义政府财政收支差额和总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

国家	年份	合并广义政府支出		
		经常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	总支出
立陶宛	1993	22.0	2.6	24.6
哈萨克斯坦	1993	—	—	23.5
爱沙尼亚	1993	30.2	2.0	32.2
俄罗斯	1993	—	—	32.9
美国	1992	36.3	2.5	38.8
罗马尼亚	1992	37.0	4.4	41.4
英国	1991	39.7	4.1	43.8

① 请参见世界银行报告(1995a)。关于福利领域改革的评论,部分可参见 Andorka、Kontradas 和 Tóth (1995), Augusztinovic 和 Martos (1995), Ferge (1995, 1996a 和 1996b) 以及 Struggle and Hope 第八章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K 1997), 及该书第八章注释 33。

② 请参见 Alesina 和 Perotti (1995), Giavazzi 和 Pagano (1990, 1996)。

③ 数据由本人根据匈牙利国家银行报告(1996b)第 110 页相关资料计算而得。

法国	1992	46.2	4.6	50.9
捷克共和国	1993	41.4	6.8	48.2
加拿大	1991	48.3	2.2	50.5
德国 ^a	1992	45.7	4.9	50.6
乌克兰	1993	50.4	1.7	52.1
奥地利	1992	46.8	5.5	52.3
比利时	1992	50.7	3.1	53.8
荷兰	1992	52.7	3.8	56.5
挪威	1990	53.2	3.5	56.7
匈牙利	1994	55.1	6.7	61.8
丹麦 ^a	1993	58.9	2.8	61.8
瑞典	1993	67.6	3.3	71.0

注：^a 数据是暂时的或预测的。

资料来源：Horváth（1996）第 11 页。主要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4a）；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4b）；哈萨克斯坦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c）；乌克兰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d）；俄罗斯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e）；匈牙利的数据根据财政部出版物资料计算而得；德国和奥地利的 GDP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报告（1995c）。

（四）货币政策和储蓄

选择了（一）所述的预先宣布的爬行盯住汇率制度之后，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大大缩小。匈牙利政府选择的汇率制度在给定时期内实际上就是固定汇率或者仅仅允许汇率围绕某一固定水平有限地波动。尽管固定的汇率水平会不断发生变化，但这一汇率体制依然是属于固定的而非浮动的汇率体制。而且它意味着中央银行无法自行设置量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不得不对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进行适应。

即使这样，中央银行依然可以运用某些政策工具，如改变法定存款准备率、改变商业银行法定或自愿存款准备

金的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等。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防止通货膨胀而又不能独当一面，这一点是令人忧虑的。要防止通货膨胀，首先需要减少财政赤字和收入的流失。

尽管奉行紧缩的货币政策，ASP 95 开始对贷款资源进行结构调整而并非全面收紧。同往年相比，在 1995 年，政府部门获得的贷款比重下降而工商部门的比重上升。对贷款流向进行调整是 ASP 95 不同于传统改革方案的特点之一。

在货币领域发生的一个最令人庆幸的变化有些出人意料：尽管经济改革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居民储蓄却有所增加。居民部门的净贷款额从 1994 年的 2 940 亿福林上升到 1995 年的 3 910 亿福林，经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储蓄上升比例为 3%。^①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一段时期内，真实利率水平上升得足够高从而鼓励储蓄增加。^② 储蓄增加的另一原因可能是：当人们意识到未来具有很大大不确定性而且不能倚赖政府寻求帮助时，他们会增加储蓄。人们的这一感觉由于下列变化而得到加强：从充分就业和长期的劳动力短缺转向大范围的失业；从前的软预算约束得到加强，企业相应地面临持续的生存压力；全民福利的削减。关于国家福利泛化会导致私人储蓄减少的理论是由 Martin Feldstein 提出的^③。在西方，对于这一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存在着持续的争论。如今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为其提供了一条反向的检验途径。当然，要从匈

① 居民的净贷款额等于总储蓄额减去居民借款的增加（所有的数据都是流量）。数据来源于匈牙利财政部报告（1996b）表 14。

② 导致以福林计值的居民总储蓄增加的一个原因是：福林的持续贬值导致以外币形式持有的储蓄在以福林计值时会增加。

③ 请参见 Feldstein（1974）。

牙利 1995 年的相关数据中得出深度结论还为时尚早。匈牙利的储蓄还有可能由于其他因素（首先是利率和收入）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对我们的研究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居民储蓄率尽量稳定和实际总储蓄额稳固增长对于匈牙利经济的内外均衡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居民储蓄率再次下降，就会对总需求和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产生不利影响。有几种途径可以促进储蓄的增长：

首先，如果居民储蓄的实际收益率尽量保持稳定，那么将有助于储蓄的持续增长。图 8 说明很多年里储蓄实际收益率难以保持稳定。在 ASP 95 取得初步成功后，这一状况得到扭转。外国资本开始流入匈牙利，而不是流出（通常是地下进行的）。但是，部分流入资金不是用于长期实际投资目的，一些投资者倾向于仅购买政府短期债券和中期国债。由于现在的汇率制度几乎消除了汇率风险，而且匈牙利国债提供了高额的、安全的回报，因此这些投资是极富吸引力的。这一资金流入导致原本很高的利率水平明显下降，而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利率水平下降太大是不愿被人接受的。^①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稳定化的研究案例

① 投机性短期投资同时会引发其他严重问题。向本币硬通货的转换会增加本国通货膨胀压力，而对冲干预（吸收外币流入导致的过多流动性）需要支付沉重的代价。政府不可能依靠额外的外汇储备，因为外资来去如风。政府也很难确定理想的利率水平和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即使能够确定，中央银行也只能通过狭窄的、摩擦性很大的信贷和资本市场对其施加间接影响，而且这一影响还具有时滞。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请参见 Darvas (1996)，Darvas 和 Simon (1996)，Dornbush、Goldfajn 和 Valdés (1995) 以及 Sachs (1996)。

其次，改革应该继续减少官僚政府部门通过税收融资（或者类似于税收的强制性征收）支持的服务项目，并加强分散化的养老金、健康保险基金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被认为是降低税赋同时减少免费服务和转移，则将会鼓励人们增加储蓄。这对于发展一个机构投资者起着重要作用的、分散化的资本市场来说也是必需的。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稳定化的研究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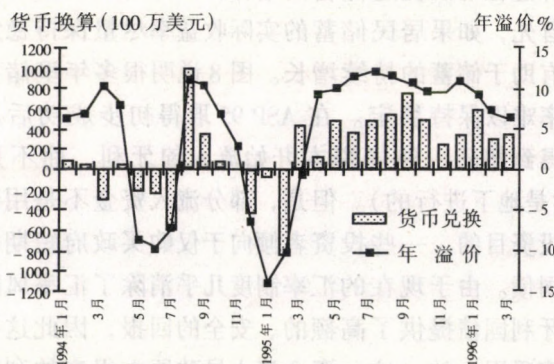


图8 货币兑换溢价

注：在货币兑换表上，负数表示从匈牙利货币向国外硬通货的净兑换，正数则表示从国外硬通货向匈牙利货币的净兑换。在溢价表上，溢价是按照年率计算的。溢价是指匈牙利政府三月期国债利率超过福林名义贬值率和国外硬通货平均利率的差额。（外币篮子根据匈牙利外贸比重加以确定）它可以代表政府债券的实际收益率。对于1994年和1995年的数据是根据事后的资料计算而得，1996年的数据是根据事前的预测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家银行提供的有关信息。

(五) 私有化

在 ASP 95 实施中并未出现一股新的私有化改革浪潮。相反,金融当局数次强调:即使没有私有化带来的大量收入,经济的严重失衡也必须得到纠正。他们正确地强调了私有化的实施不应从属于财政短期融资的需要。

为几个重要部门的私有化进行的准备工作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相关立法已经形成草案,规制这些自然垄断者的法律和组织框架在长期延迟和搁浅后也正在准备之中。一旦这些任务完成,私有化进程将会突然加快。1995 年下半年,能源和电信行业的私有化进程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取得重大进展。一些大型国有银行和制造业企业也进行了私有化。表 6 表明了 1995 年加速推进的私有化以及前些年进行的全面私有化的财务结果。

表 6 1990—1995 年匈牙利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100 万美元)

投资方式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现金形式的外资流入	311	1459	1471	2339	1147	4453
其中:私有化收入	8	329	519	1202	104	3024
实物形式的外资流入	589	155	170	142	173	117
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	900	1614	1641	2481	1320	4570

资料来源:主要由国家私有化和产权管理局 (the State Privatisation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PLC) 提供,私有化收入的数据则来源于匈牙利国家银行。

私有化企业的大部分买主是大型的西方公司,政府同他们签定的合同中要求必须使得这些重要部门得到快速发展。举例来说,几十年短缺经济的最好的证明之一就是电话的紧张。成百上千的人家需要等待好几年才能安装一部电话。从 1994 年私有化开始到 1996 年第一季度,匈牙利共安装了 650 000 条新电话线路。政府的授权合同强行规

定私有化后电话线路的数量必须每年增长 15.5%，而电信公司的业务目前已经超过这一数目。^① 在未来数年中，电话服务将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并非仅仅是一个新的外国所有者在私有化协议下开始业务发展的案例。早先已经在匈牙利取得部分企业产权的国际企业正在进行后续的新投资，这将会大大促进匈牙利经济现代化进程。

在本章，我们并不对匈牙利的私有化经验进行分析。^② 我将主要研究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1995 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包括私有化支付）大约为 46 亿美元（请见表 6）。这一规模可以与 1994 年经常账户赤字进行对比。当年，匈牙利遭遇了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失衡，经常账户赤字达到 39 亿美元。由于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因素，1995 年经常账户赤字下降到 25 亿美元。（见表 1）

对于如何利用巨额涌入资金，人们存在着争论。许多人要求按照“常规”方式进行使用也即消费。但人们最终达成共识利用重点部门私有化收入来减少政府债务。由于债务负担如此之重，利息的节省就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投资。此外，政府债务的减少对于其财务评级具有很大的正面外部影响并可以促进外国投资。

① 根据 Matáv 电信公司提供的资料。

②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请参见 Laki (1993)，Major 和 Mihályi (1994)，Mihályi (1993，1994 和 1995)，以及 Voszak (1992，1993 和 1994)。关于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见 Struggle and Hope 一书第五章第四节。

四、匈牙利经济展望

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将决定匈牙利未来的发展。政府中的每一个成员和议会多数派会赞成继续进行目前的经济改革吗？他们会不会试图改变政策，尤其是当他们考虑到 1998 年的大选时？不同的社会群体会对调整和稳定化措施的成绩和代价采取什么态度？在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力量对比？的确，改革的大多数任务需要 1998 年之后方能完成。而下一任政府和议会多数派的政治构成将会怎样？他们将会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此处，我仅仅列出一些问题，表明我认为其答案对于评价匈牙利未来的发展有多重要。尽管如此，我将回答这些问题的任务留给其他研究，而仅仅探讨匈牙利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前景并对其进行评价。

（一）漫长的改革之路

ASP 95 是一个小规模“休克疗法”案例，它导致匈牙利的某些宏观经济指标发生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国际经验表明这些改革结果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付诸东流。

在经济中的不同问题之间存在一些相互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缓解某一经济难题有助于其他问题的改善。下面我们举两个这种正向反馈或者说是良性循环的例子。当预算赤字减少时，政府总需求的下降会产生“反向的挤出效应”（“crowding-in” effect）。私有部门可以获得更多的借贷资金，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财政收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稳定化的研究案例

入，降低财政赤字。同时，政府借款需求下降会减少外债，从而改善本国的外债状况。对外债支付的利率溢价也会下降。由此可见大幅减少财政赤字是值得的。

良性循环的另一个例子是商业信心。在几个月的时间内，ASP 95 就提高了国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的信心。匈牙利的一个商业研究机构自 1987 年以来每个季度都向公司高层经理询问关于商业环境和经济预期的同样问题。根据他们的报告，^① 制造业在 1996 年 1 月所面临的环境被认为比以往几十年的任何时候都令人欣慰。这一现象由于我们在私有化部分提到的外资巨额流入而得到加强。经济信心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而持续或者最好是加速的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提高了经济信心。

然而，负向反馈或者说是恶性循环也同时存在，我们必须对此也加以考虑。下面我将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在本章的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给定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维持实际汇率需要本币保持同等速度的名义贬值。贬值会被纳入通货膨胀预期中，导致惯性的通货膨胀。要想同时改善贸易状况、防止外债增长和避免通货膨胀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通过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可能会恶化财政赤字，反过来，降低财政赤字（比如说通过增税）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对一种经济病症的治疗可能会加重其他病症。

存在相似问题的拉美国家的经验表明改革的进程可能还需要持续一二十年。经济难题层出不穷，对一种经济病症的治疗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一些国家在成功的局部

① 请参见 Kopint - Datorg (1996)。

稳定之后一而再地陷入其原有的经济困境，或者是生产大幅下滑，或者是经常收支状况恶化，或者是通货膨胀加速，或者是许多问题同时出现。从经济的角度看，智利可能是拉美改革最成功的国家，它于 1978 年从恶性通货膨胀转入温和的通货膨胀（通胀率为 20~40%）。17 年后的 1995 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一位数，同时生产持续增长（年增长率为 4.8%）。^① 这种现象发生在匈牙利身上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我们也不能对此过分倚赖。如果我们误导自己和他人认为 ASP 95 这一单一措施就足以在两三年内完成改革任务，那将是不幸的。

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危险就是盲目乐观：“经济状况已有所好转，因此不必采取像以前那样严格的措施。”这一思想诱惑着任何政府官员。实际上，在匈牙利政府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例如，国民工资支出在 1996 年初再度上升，进口支出再次增加，投资活动开始放慢。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在消极因素一出现时就采取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ASP 95 的前奏是发人深思的。一些研究改革政治经济学^② 的人员认为：除非危机已经发生，否则政治家们并不愿采取非常规的改革措施。正如我前面所强调的，ASP 95 本质上是一个预防性的改革方案，这部分支持而又部分反对了上述假说。正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并非危机本身）导致了改革方案的诞生。问题是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稳定化的研究案例

①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5）第 122~123 页和第 288~291 页；1995 年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6）第 65 页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第 184~189 页。

② 例如，读者可参见 Drazen 和 Grilli（1993）。

威胁要达到何种程度政治家们才会鼓起勇气采取行动。期望他们通过审视经济形势在危机发生或出现苗头之前就断然采取改革措施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承认难以对此给出答案。即使是统一的、稳固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法国，也倾向于长期拖延本该进行的财政改革，因为改革的结果可能是不受欢迎的。

（二）政策优先顺序选择

现在回到匈牙利的问题上来，政策制定者们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恰当地选择经济政策优先顺序并针对不同的任务给予合理的重要性。在此方面，人们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在我看来，并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或者更狭义地说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时期的通用准则。如果一国遭遇快速的或者甚至恶性通货膨胀，那么最重要的任务无疑就是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其至少要达到 30%、40% 的年率水平。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① 目前还不太清楚的是当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温和水平时应该如何选择政策优先顺序。

在温和的通货膨胀状态下，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成本非常之大。在许多情况下，必须要通过失业的大量增加和生产的大幅缩减才能达到目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看来正确的选择就是维持温和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采取谨慎和严格的措施防止通货膨胀恶化，然而政策的重点必须转向维持经济平衡、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这包括降低财政赤

^① 请参见 Bruno 和 Easterly (1995)，Fischer、Sahay 和 Végh (1996) 以及 Végh (1992)。

字、削减政府开支、防止外债增长（改善债务率指标）以及提高出口和投资。所有这些发展都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加速发展，当然其他一些条件也是必需的。作为实施上述政策的副产品，通货膨胀水平也可能会逐渐下降，前提是政府实行正确的物价和收入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其他经济目标为代价而实施激进的治理通货膨胀措施就是不明智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或许可以被认为是有兴趣的实验场。不同的政府具有不同的起点和经济政策。一些国家采用本币的实际升值来降低通货膨胀，这种状况无疑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我对匈牙利采取这一措施持反对意见，我仍然认为需要对福林的真实升值持谨慎的反对态度，因为它有可能导致贸易账户再度恶化。^①

（三）令人安慰的信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读者可能会产生我认为匈牙利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很脆弱的印象。的确，我指出了匈牙利所面临的一些危险，但匈牙利经济中有一个重要的基本因素使我对其充满信心，那就是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前文已经提到匈牙利的出口竞争力有所提高。这一提高部分地是由于汇率的变动，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实际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类似匈牙利这样一个出口推动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尤其如此）。

表7比较了几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生产

^① Darvas 和 Simon (1996) 持相同意见。

率。^① 在此方面，匈牙利的发展状况最令人满意。原因当然很多。尽管产权的转移慢于其他被称之为“大规模私有化”（mass privatisation）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产权被无偿分割、分配），匈牙利的私有化进程^② 逐渐产生了真正的所有者。所有权主要集中于私人 and 已存的企业手中，他们可以对管理层施加真正的控制并采取利润激励机制，这也有助于在许多公司内部进行大规模的重组。

表 7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

国家	平均劳动生产率(实际 GDP/就业, 1989 = 100)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保加利亚	1.00	0.97	0.88	0.89	0.88	0.91
捷克共和国	1.00	0.97	0.88	0.89	0.88	0.91
匈牙利	1.00	0.98	0.92	1.05	1.11	1.16
波兰	1.00	0.92	0.91	0.98	1.00	1.07
罗马尼亚	1.00	0.95	0.83	0.77	0.81	—
俄罗斯	—	1.00	0.89	0.74	0.66	0.57
斯洛文尼亚	1.00	0.98	0.95	0.93	0.92	0.96

资料来源：Mchale (1996) 表 1 的计算，根据下列资料：欧盟报告 (1995)，EBRD 报告 (1995) 以及 OECD 出版物《短期经济指标和转型经济》的各版。

在匈牙利，预算约束真正得到加强，几个同市场经济相容的、有助于加强财务纪律的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括破产法、银行法和会计法。尽管由于在起初制订时过于极端化，破产法中的一些规定曾经引发严重的问题，但是很快就得到纠正。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自然选择过程，仅仅

① 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率比较，请参见 McHale (1996)。

② 请参见 Struggle and Hope 一书的第五章第四节。

那些真正适合的、有效的和赢利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①

同以上变化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在职失业”现象的消失。这一痛苦过程已经在匈牙利出现，并伴随着一些人由于失去工作而产生的痛苦。而其他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似乎试图推迟这一进程。

关于上述所有变化的一个共同解释是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匈牙利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占有所有东欧国家的一半。除了产生宏观意义上的积极影响外，它还有利于引进新产品、技术、管理方法并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组织程度。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并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其他领域也必须有良好的发展（我们已经在此研究中详细加以阐述了）。然而，理论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健康、稳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也已经为世界经济史的广泛实例所证实。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对匈牙利经济前景保持信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它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姜世明 译）

无衰退的调整：对匈牙利稳定化的研究案例

① 遗憾的是，这一趋势还并不完全明朗。财务状况恶化的企业倒闭的比例比以前更低，一些企业不佳的财务状况转化为银行不良贷款的形式，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对这些银行加以援助使其避免破产（即使这样，我们必须承认随着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的清算，银行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政府的帮助）。并不能说匈牙利已经克服了软预算问题。

硬化预算约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一、引言：概念说明^①

如果我的听众是那些专门研究社会主义体系或后社会主义转轨的经济学家们，那么我的演讲可能是正当其时。不过，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听众从事的领域很广，所以我的演讲最好还是从对一些概念的说明开始^②。

预算约束的概念与微观经济学中的概念类似：家庭开支不能超过其可获得的资金来源。同一概念还可以应用到其他组织，例如企业、非盈利机构和地方政府。本文要给在微观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概念添加一些性质。硬化预算约束意味着，一个开支大于收入的组织将无法维持下去。

① 我非常感谢与艾瑞克·马斯金（Eric Maskin）、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和许成钢就本专题进行的令人鼓舞的讨论。我还要向 Andrea Despot 等人和 Assen Vassilev 在研究上给我的帮助表示谢意，谢谢 Julianna Parti 专心而认真的编辑工作以及 Brian McLean 出色的翻译。我的研究得到了匈牙利国家研究基金之 265 号项目的资助。

② 对这些概念的更详细的解释和对资料的全面研究参见科尔奈（1998）以及马斯金和许成钢（1999）。

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是本人对社会主义体系进行分析的著作（科尔奈，1979，1980）中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指一种状态：国有企业即便持续亏损也能生存下来，因为国家总是不断地、仓促地给予救助（以下将以 HBC 和 SBC 分别表示硬预算约束和软预算约束）。

这个概念有时会被误解，因此甚至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次性援助也被看作是预算约束的软弱无力。实际上，政府对企业不断地——而不是一次性地——实施救援才能算作软预算约束。在软预算约束的状态下，若企业发生亏损，则其管理人员就会期望得到援助，并且这种期望将决定他们的行动。

虽然理论分析中常把 HBC 和 SBC 看成两种纯粹的状态，但实际上预算约束的硬与软是分不同程度的。硬软程度反映了一个组织的管理部门在发生亏损时对政府援助的预期有多么强烈，或者说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观概率。

SBC（软预算约束）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症，它深深地嵌在一国经济的政治环境和法律框架以及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中。如果预算约束的软弱无力已经很普遍，它就会像癌症一样在经济中扩散，造成极大的破坏。

本文的主题就是那些正经历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国家中的 SBC 综合症。我不打算提出一种纯粹的理论分析，本文的着眼点放在了与那些以纯粹理论分析为研究方向的著作不同的适当地方。本文的主要目标是研究与主题相关的

广泛的经验资料^①。尽管我们的东道国阿根廷或者其他拉美国家可能对 SBC 综合症还不了解,但本文的探讨还是没有包括这些国家。

我们将重点放在企业行为上,对于其他组织只简单地提一下。

我演讲的其余部分可分为三大块。第二部分描述了有关现象,第三和第四部分分析了这些现象的原因及后果,第五部分对经济政策作出了一些结论。

二、现象

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 1989 至 1990 年开始后社会主义转轨时的最初状况就是极为严重的软预算约束。社会主义体系到处弥漫着 SBC 综合症。硬化预算约束的第一步,一般来说是在共产主义体系崩溃后的转轨期出现的。不过,这一看法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 不同国家预算约束的硬化程度有很大不同。在这方面,匈牙利走在了最前面,而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后苏联共和国排在末尾。

* 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预算约束的硬化程度是不统一

① 特别是谢费 (Schaffer, 1998) 所做的全面研究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RDB) 所作的总结性报告。其他重要著作包括 Anderson、Korsun 和 Murrell (1997) 对蒙古的研究, Bonin 和谢费 (1995) 对匈牙利的研究, Claessens 和 Peters (1997) 对保加利亚的研究, Earle 和 Estrin (1998) 对俄罗斯的研究, 李和梁 (1998) 对中国的研究, Perotti 和 Carare (1996) 对罗马尼亚的研究, 赖泽尔 (Raiser, 1997) 对波兰和中国的研究, 以及 Sjöberg 和 Gang (1996) 对中国的研究。

的。不同部门的硬化程度是不同的。

* 虽然趋势是对预算约束进行硬化,但其变化不是匀速的。时而加速,时而减速放慢。有时甚至完全停滞或者倒退。

硬化预算约束的第一步是引入强制建立金融纪律的法规^①。首先需要有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破产法和保证私人合同得以执行的商业法规,还要有规定实施现代会计准则以及管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方面的法律。那种想等这些法律建立起来之后再硬化预算约束的想法是不好的。

待这些法律令人满意之后,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保证这些法律能得到严格执行。这需要有迅速而有效地进行审判和惩处合同违约及金融违纪行为的法庭。在有权进行审理的案件中,法庭会不得不宣布某些企业已经没有清偿能力,并且如有必要可以命令对其进行清算。需要有律师专业地为债务人和债权人提供代理,有官员来执行法庭判决和组织拍卖,有专门进行重组和清算的人员和机构等等。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初没有一丁点这类传统上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机构。

表8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强化HBC的法律框架方面所取得成就的排名。在这里,要想对每个国家在后社会主义转轨中的其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作出说明是不可能的。不过,熟悉这些地区的人会指出,表8的国家排名与这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其他方面所取得进展的名次是多么地相似。如:可参见德梅罗(de Melo)和伽尔伯

硬化预算约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① 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和加强破产法规的情况参见《EBRD转轨报告》(1998, 39~43页和105~116页)和伯尼奥克斯(Bumiaux, 1996)。

(Gelb) (1996), 德梅罗、邓尼泽 (Denizer) 和伽尔伯 (1997) 以及《EBRD 转轨报告》(1997) 的 98~111 页。^①

表 8 破产行为和金融管理的有效性

	破产行为	银行		社会保障	
		范围	有效性	范围	有效性
匈牙利	有效	4	4	4	4
波兰	有效	4	3	4	4
爱沙尼亚	有效	3	3	4	2+
保加利亚	部分有效	4	4-	4	3
克罗地亚	部分有效	3	3	4	3
捷克共和国	部分有效	3	3-	4-	3
斯洛文尼亚	部分有效	4	3	3+	2+
拉脱维亚	部分有效	3	3	4	2
罗马尼亚	部分有效	3	2+	3	3
立陶宛	部分有效	3-	2+	3	2
马其顿	部分有效	3	3-	3	1
亚美尼亚	部分有效	3	3-	2+	1
吉尔吉斯斯坦	部分有效	3-	2	1+	1
格鲁吉亚	部分有效	2	2	1+	1
斯洛伐克共和国	无效	3	2	3	2
俄罗斯联邦	无效	3-	2+	3	2
哈萨克斯坦	无效	2	2	2+	2
乌克兰	无效	2+	2	2	2-
阿尔巴尼亚	无效	2+	2	1+	1
阿塞拜疆	无效	2	1	2	1
乌兹别克斯坦	无效	2	1	2	1
白俄罗斯	无效	2	2	1	1
塔吉克斯坦	无效	2+	1	2-	1
土库曼斯坦	无效	2	1	1	1

资料来源:《EBRD 转轨报告 1998》,第 42 和第 112 页。

经济学家们通常研究企业的破产和清算频率——这是商业周期的一个量度。这一频率越高,则表明经济中存在

① 当然,没有人会认为预算约束的加强是实现后社会主义转轨成功的惟一因素。最多也只能说,它对转轨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正是本文的其余部分试图证明的。

衰退。但是，在研究俄罗斯的数字时，这一传统观点会造成混乱。虽然俄罗斯的生产急剧下降，但企业却没有破产。对此的解释是，破产和清算频率不只依赖于经济是否有活力亦或呆滞，而且还取决于预算约束的硬或软。给一定的宏观条件，预算约束越硬，破产和清算就越普遍。表9在这方面对走在改革前沿的三个欧洲国家进行了比较。这三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捷克共和国的破产和清算要远远少于匈牙利和波兰，这表明前者的预算约束要更软一些。

表9 1992—1996年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的破产情况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捷克共和国					
申请破产数量	350	1098	1816	2393	2990
完成破产数量	5	61	290	482	725
重组	0	1	2	2	6
清算	5	60	288	480	719
匈牙利					
申请破产数量	14060	8229	5900	6461	7477
完成破产数量	1302	1650	1241	2276	3007
重组	740	510	90	21	9
清算	562	1140	1151	2255	2998
波兰					
申请破产数量	4349	5936	4825	3531	3118
完成破产数量	910	1048	1030	1030	984
重组	98	279	235	287	173
清算	812	869	795	743	811

注：现在已经可以得到匈牙利1997年的清算数字：3761，又有了进一步增长。

资料来源：Balcerovicz, Gray 和 Hoshi, 1998。

俄罗斯的数据显示该国每一家二流公司都是亏损的，并且亏损比例仍在上升，但是这些亏损企业仍在经营

着。

软预算约束有几种手段，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 财政补贴。国家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效益低下的企业发放财政补贴。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国政府进行财政补贴的过程都是类似的。这是弱化预算约束的一种最明显和最可行的手段。为什么当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宣布引入市场经济时其财政补贴的规模会有一点削减，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参见表 10）。

表 10 1989—1996 年预算补贴

（单位为 GDP 的百分比）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阿尔巴尼亚	6.6	13.9	17.8	4.3	0.0	0.1	0.0	—
保加利亚	15.5	14.9	4.2	1.8	2.2	1.4	1.1	0.8
克罗地亚	—	—	1.7	1.3	1.2	1.6	1.6	—
捷克共和国	7.8	—	—	4.9	4.2	3.5	2.4	2.0
马其顿	—	—	—	—	—	3.4	2.9	2.2
匈牙利	—	7.0	5.7	4.0	3.8	4.5	3.8	3.8
波兰	10.2	7.3	5.1	3.2	2.3	3.3	3.0	1.7
罗马尼亚	—	7.0	9.1	13.0	6.8	3.8	4.1	4.3
斯洛伐克共和国	7.8	—	—	5.2	4.7	4.2	3.7	3.3
斯洛文尼亚	—	—	2.8	2.8	2.2	1.9	1.7	0.8
爱沙尼亚	—	—	2.8	1.8	1.5	0.9	0.5	—
拉脱维亚	—	—	1.3	0.3	0.0	0.1	0.4	—
立陶宛	—	14.0	5.5	2.1	1.3	1.3	0.9	1.0
亚美尼亚	—	—	—	—	16.7	12.8	0.9	—
阿塞拜疆	—	—	—	10.8	3.8	3.8	1.9	2.0
白俄罗斯	—	—	—	9.2	15.0	6.5	3.4	3.7
格鲁吉亚	—	—	—	—	25.7	12.7	0.2	0.0
哈萨克斯坦	—	—	—	3.3	2.3	1.7	1.0	—
摩尔多瓦	—	—	—	5.2	2.8	2.0	—	—
俄罗斯联邦	—	—	—	10.4	3.0	1.8	1.3	—
乌克兰	—	—	—	—	11.0	7.0	—	—
乌兹别克斯坦	—	—	—	8.7	6.3	1.6	1.2	—

资料来源：《EBRD 转轨报告 1997》，第 83 页。

2. 软税收。这一不那么透明的手段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就是直接制定软税收规则：例如，税率可能是不统一的，政府偏好的部门或企业就可以享受低税。第二种软税收形式的税法是统一的，但是免税的合法方式就不是公开的了。最后一种——第三种形式的拙劣方法是，有些企业干脆就不用纳税。在表 11 所示的中国一个乡镇的企业群中显示了所有这三种形式。在这里，所谓的集体企业（由地方政府所有）比非集体企业享受了更软的预算约束，这是无需赘言的。本研究在后文中将再次回到对这方面的研究。

表 11 中国乡镇企业

	1988		1989		平均	
	亏损企业	盈利企业	亏损企业	盈利企业	亏损企业	盈利企业
企业数目	36	433	55	559 (1)	—	—
获得免税的企业百分比	13.9	9.3	12.7	8.2	13.3	8.8
欠税企业百分比	16.9	15.0	25.5	14.0	21.1	14.5
已付税金总额的百分比	72.5	70.7	71.0	66.2	71.8	68.5
集体企业	73.3	61.1	62.3	57.3	67.8	59.2
非集体企业	70.7	100.0	80.9	90.9	75.8	95.0

资料来源：Sj erg 和刚，第 25 页。

Schaffer (1998, 99 页) 挑选出来的显示出负收益的波兰企业超过 20%。他指出，1993 年，这些企业对国家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债增加了 11.3%，而就波兰全部企业平均而言的这一比率仅为 0.5%。

最应引起警惕的例子又是俄罗斯的数据（参见表 12），这些数据显示出该国的欠税额飞速增长。

表 12 1990—1996 年欠税余额

(单位为期末欠税余额占 GDP 的百分比)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保加利亚	4.7	6.7	10.3	10.9	12.2	11.1	13.4
摩尔多瓦	—	—	—	—	9.6	8.2	10.4
波兰	1.1	4.1	5.3	5.3	4.5	3.6	—
罗马尼亚	—	—	1.5	1.5	4.2	4.6	5.1
俄罗斯联邦	—	—	1.7	1.7	2.5	3.5	10.0

资料来源:《EBRD 转轨报告 1997》,第 83 页。

3. 软银行信贷。目前这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软化预算约束的最重要的一种手段^①。依照谨慎原则进行放款的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它们更偏好那些承诺按期还款的盈利企业。如果亏损企业也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贷款,那就说明预算约束开始软化了,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就只不过是帮助效益低下企业解困的一种手段。由 Gao 和 Schaffer (1998) 所作的一项研究在这方面对中国和匈牙利的企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指出,中国的亏损企业获得了巨额的银行信贷,相反在匈牙利,银行若如此来选择放款对象是非常罕见的。

Perotti 和 Carare (1996) 利用一个数量经济模型对罗马尼亚的银行贷款扩张、贷款企业的规模和盈利性以及贷款企业原有负债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用作者的话来说,“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似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的降低和商业及银行信用的拖欠额的增长而增加 (3

① 已有人对银行系统在弱化预算约束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理论研究,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者是伯格洛夫和罗兰 (1997, 1998)。对后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经验进行论述的还有邦尼和谢费 (1995)、佩洛提和克拉雷 (1996) 以及谢费 (1998)。

页)。”“对银行的欠债似乎是获得信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实践中,这种关联作用还在增强。”

通常这只有在贷款企业无力履行信贷合约发生之后才暴露出来。一个国家银行部门信贷总额中不良贷款的比例越高,企业部门的预算约束就越弱。表 13 显示了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显著差别。

表 13 1994—1997 年不良贷款情况
(占贷款总额的百分比——期末)

	1994	1995	1996	1997
爱沙尼亚	4	3	2	1
匈牙利	18	10	7	4
格鲁吉亚	24	41	7	7
哈萨克斯坦	—	15	20	8
亚美尼亚	34	36	23	8
吉尔吉斯斯坦	92	72	26	8
克罗地亚	12	13	11	10
波兰	29	21	13	10
摩尔达维亚	16	9	17	10
拉脱维亚	10	19	20	10
乌克兰	5	13	12	11
斯洛文尼亚	22	13	14	12
白俄罗斯	8	12	14	13
保加利亚	7	13	15	13
土库曼斯坦	—	11	11	14
阿塞拜疆	16	22	20	20
立陶宛	27	17	32	28
捷克共和国	34	33	30	29
斯洛伐克共和国	30	41	32	33
阿尔巴尼亚	—	35	40	49
罗马尼亚	19	38	48	57

资料来源:《EBRD 转轨报告 1998》,第 133 页。

4. 软商业信用。在企业之间进行的大多数交易中,

买方一般都是待货物收到之后再付款。并且，买方付款时间超过合同约定的付款期也是很常见的，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很巩固的国家也是如此。这种惯例有效地促使卖方向买方提供非自愿的商业信用。

非自愿的商业信用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如果非自愿商业信用的比例很高，付款期很长，并且商业信用的拖欠额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则表明这是一种 SBC。在这方面，又可以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坏典型，该国商业信用拖欠额正迅速增加。

5. 工资拖欠。这是对付款风纪的一种极为粗暴的践踏。如果一家企业没有挣到足够的钱以弥补实际成本，它就会通过将工资拖欠几个月发放以降低成本。这在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是最常见的，不过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这种现象。

上面列示的这五种手段可能会同时采用，互相起到补充或替代作用。谢费（1998）对后社会主义转轨期的不同预算约束弱化手段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主要根据东欧国家的经验得出如下结论：软税收和软银行信贷发挥着主要作用，而企业间的软商业信用的作用正日趋加大。在俄罗斯和其他一些正遭受严重的金融问题煎熬的后苏联国家中，不同手段的相对重要性与这一结论有所不同。在那些国家，软商业信用和工资拖欠的比重也很大。

亏损企业的管理部门可能会通过“狡猾的”、操作性很强的方式来采取各种预算约束弱化手段，通常是将在当时障碍为最小的手段作为主要采用的手段。如果想认真完成硬化预算约束的任务，在这面对后社会主义转轨的经济政策有一个重要的教训：仅仅在某一个方面取得成

功——例如削减国家补贴或建立统一的税务法规——是不够的，需要同时在所有方面开展斗争；应该封住所有那些软资金可能会从中渗出从而使那些没有活力的企业生存下去的裂缝。

在匈牙利可以观察到硬化预算约束的这种最新做法。表 14 和表 15 显示了匈牙利纳税观念和企业间支付风纪同时获得了改善。然而，数据显示出即便是匈牙利也离 HBC 制度相去甚远。

表 14 匈牙利金融纪律的改善——主观评价

	平均分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拖延偿还对其他公司的债务	1580	1561	1552	1631	1466
拖延支付社会保险缴款	1532	1564	1536	1615	1517
拖延缴纳税金(增殖税、公司等)	1631	1642	1500	1544	1479
拖延偿还银行信贷	1266	1196	1133	1202	1155
有付款责任的企业客户的拖延	3230	3124	2900	2886	2931
N	390	499	628	450	323

注：访问调查的调查对象按照他们所认为的每种情况的显著程度来打分，分值范围为 1 至 5 分。回答 1 表示这种现象不显著，如果回答 5 表示这种现象完全得到体现。

表 15 匈牙利金融纪律的改善——违纪频率 (%)

		1996	1998
公司是否有过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	否	83.3	90.2
	是	16.7	9.8
	总体	100.0	100.0
	N	393	298
公司是否有过未按期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行为？	否	17.7	6.8
	是	82.3	93.2
	总体	100.0	100.0
	N	293	299
最近两年公司是否有未按期付款的行为？	否	38.7	27.1
	是	61.3	72.9
	总体	100.0	100.0
	N	293	296

迄今为止的讨论还仅限于企业。有必要简要地讨论一下 SBC 综合症在其他组织中的情况。

当政府把银行从金融危机中解救出来时，通常也会出其不意地引起公众的注意。在大多数案例中，政府的援助是为防止灾难性的挤兑效应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这些行动包括向银行注入巨额的、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纳税人口袋的资金。很多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并且其中有些国家的情况比以前更严重了。

各种各样的准国有或预算外机构、大学、中小学、医院或者甚至是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基金，时不时地都会因为其正常收入不能弥补支出，或者其支出超过了拨款——这违反了财经纪律，而失去偿债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惩处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但是却几乎会自动地去弥补他们所造成的损失^①。

大多数国家的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形也类似^②。超支、超出预算拨款和债务累积在地方政府是经常发生的。中央政府一般最终都会解救那些处于破产边缘的地方政府。

① 匈牙利正常的“预算外”国家养老金和医疗基金应该从其缴费收入中来负担支出。然而，这些基金几乎每年年终时都出现赤字。而这些赤字在法律上是由国家预算弥补的。这是两种规模很大的 SBC。

② 威尔达森 (Wildasin, 1997) 从理论高度对地方政府中存在的 SBC 问题进行了研究 (基于美国——而不是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所作的研究)。

钱颖一和罗兰 (1998) 指出，财政地方分权 (“财政联邦制”) 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一种预算约束的硬化。

三、原因

试图给像 SBC 这样复杂的综合症找出仅仅一种解释因素只会使人误入歧途。显然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比作的癌症一样，单一的因素可能足以导致疾病，但也许这个因素是由其他几个同时发生作用的、互相促进的因素造成的。

动 机

一家企业试图软化其预算约束的动机很简单：它想生存，即便它是亏损的，或者，如果还不存在致命的财务风险，它还想改善其收入低靡的状况。需要作出解释的是施援者的动机。让我们重新回到对企业和国家关系的讨论上来，对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得出一些论述。这些看法还远不成熟，这里只分析出几种动机：

1. 救助企业的国家机构可能是由政治考虑驱动的。如果亏损企业停止经营，其雇员就将失去工作。在社会主义崩溃之前，政治家们对此还不是很关注，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长期的劳动力短缺，而不是失业。在社会制度改变之后，这种情况就完全逆转了：高的失业率开始出现并加强。而且，在建立多党制及党派竞争之后，政治家们必须要更加敏锐地关注公众的看法。如果众多的工厂关门大吉，从而导致（全国性的或在一位特定的国会议员或地方政治家所在地区出现的）失业浪潮，就会搞坏政治气氛，执政党会把选民吓跑。

2. 另外一个重要动机也许是担心形成负面影响。如

果一家陷于困境的企业是垄断的或近似垄断的，则如其破产就会带来供给问题（Segal，1998）。某个企业可能是某几家企业的惟一或差不多惟一的用户，因此如果该企业土崩瓦解就会导致其他一些企业破产。在命令经济下，政府可以下达指令以防止这种停业效应，但在分权的市场经济下就很难避免。

一家企业停业在财务关系方面也会导致与生产领域类似的问题。一家企业的破产清算会给其他一些等待该企业支付货款的企业带来困难（参见在上一部分所讨论的非自愿性商业信用问题）。

大企业对负面影响的担心特别强烈，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太大以至于不能失败”。这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很容易理解的，甚至在那些大踏步地对预算约束进行硬化的国家也是如此。最大的企业及银行部门经常会表现出这种 SBC 综合症。

3. 施援机构和被援助单位的领导之间可能有私人关系。这些私人关系可能是建立在政治纽带的基础上的：受困企业可能是执政党的政治“客户”，因此政治家们和商人们会互相提供支持^①。另外，这些私人关系也可能是建立在通过某种“老伙伴网络”形成的私人联系基础上的，当然，还可能是建立在简单的腐败基础上的。这三种类型的关系相互间并不排斥，两种甚至三种关系可能同时发挥作用。

^① 这是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的一个特别之处：政党力图在商业领域建立自己的“客户”网，籍此希望促进相互间的支持。一方面，政治家们将获得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会试图利用公共供应合同和对施援机构施加影响来帮助其客户。

4. 另外一种施援动机可能是为了维护上级权威(白重恩和王一江,1996)。负责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指中央或地方国家机关的最高层领导;对于私有联合企业来说,指经理办公室中的人物)可能会最先出错,没有选择明智的方案或者发出了错误指令。如果遭受打击的企业完蛋了,则会暴露出上级的最初错误并损害上级的个人权威。

以上这四种可能的动机的共同特征是,施援机构的领导会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的理智告诉他们,经济的高效运行要求 HBC。而另一方面,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得他们又决定支持 SBC。受其支配企业对高效运营的要求是与其他要求相抵触的。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动机值得研究。

5. 可能会形成这种状态:可以勉强地说是施援机构的经济利益促使其向受困企业施援。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1995)的一项创新性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①。在他们设计的经济模型中,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集权经济的:一家垄断银行,其特征是集中制定决策,决定只向那些能够迅速实施并保证盈利的新项目放款。它事先作出声明:如果它发现投资已失败,就将停止对该项目提供资金。然而,该银行并不掌握可以事先筛选出那些

^① 已经发表了几篇应用了德瓦特里庞-马斯金模型或其改进模型的重要论文,这些论文对各种 SBC 情况进行了理论分析。例如,德瓦特里庞、马斯金和罗兰德(即将发表),钱颖一(1994),以及钱颖一和许成钢(1998)。

还有一些理论研究是运用不同于德瓦特里庞-马斯金模型的方法完成的。例如戈德菲尔德(Goldfeld)与匡特(Quandt)(1988)以及科尔奈与威布尔(Weibull)(1983)。

会达到该银行所规定的失败界限的项目。其后，事实证明银行并不能信守先前的承诺。对那些即将失败的项目投入的初始投资已成为沉淀成本，银行不得不去“追逐自己的资金”。如果它停止注资，毕竟要比继续对项目提供资金从而不能自始至终地信守承诺的损失要大。项目发起人知道会有这种结果，而这种结果也鼓舞他们在即便是他们已经估计项目会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去寻求银行信贷。由此一种典型 SBC 状态就出现了。

理论分析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部门是分散化的，由于小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再融资，则这种状态就会少发生一些。在分散化银行体系国家，投资者不会预期有这种结果，这意味着没有 SBC 的预期，并且只有那些效益良好的项目的投资人才敢举债^①。

在各种金融—实业集团和联合企业中，类似的动机也很强烈。虽然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找不出这类例子，但是预计问题最终还是要出现的^②。

SBC 综合症出现的概率越大，政府、银行和大型工业企业之间的联系越紧密。

① 佩洛提（1993）运用一种不同于德瓦特里庞—马斯金模型的理论方法证明，银行对其先前的债务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兴趣。这是他们收回其前期贷款的惟一机会。因此，他们通常的优先贷款对象是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他们的早期债务人，而不是那些效率更高的私有企业中的潜在的新借款人。

② 黄海洲和许成钢（1999）发现，这种类型的 SBC 情形可以说在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金融—实业集团内实行一种特殊的再分配，从而以优势企业为代价来帮助虚弱的企业。那些人为地使之继续生存的企业，如果被置于市场竞争中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

所有权关系与 SBC

我们完成了因果分析，并且，特别是从第五种动机来看，讨论一下预算约束的硬软是如何与所有权关系联系在一起是很重要的。

一些研究后社会主义转轨的经济学家们往往给出一个过于简单的答案：造成 SBC 的原因是公有制，因此只需私有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要加上我个人的观点，我本人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简单。尽管我也强烈地认为公有制与 SBC 以及私有制与 HBC 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我一开始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同样会染上 SBC 综合症。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已经进行 10 年了，现在是重新回到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了。

如果国民经济中公有制占了绝大部分，则不可避免地就会导致预算约束的高度软化。这也正是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实验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官僚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财经纪律和实现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转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二、三、四种动机就会充分发挥作用。私有制是促使预算约束的各种硬化形式在企业界成为主导力量的一个必需条件。

如果实现了私有制，人们会希望对剩余的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能够强硬起来。尽管就像私有部门占主导地位所

具有的某些副效应一样，这并不会自动发生^①，但不能否认私有部门与 SBC 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可能表现为：在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中，政府无法在幕后用纳税人的钱实施救援活动，因此对国有部门（其产量只占社会总产量的一小部分）的预算约束也会或多或少地硬化^②。

考虑一下刚刚说过的，私有部门的主导地位是 HBC 的必要条件。持续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私有部门的扩张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带来了整体经济中预算约束的硬化。

私有部门占主导地位是 HBC 制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是从后社会主义转轨中得出的一个主要的教训。马瑞尔及其同事通过对蒙古的经验数据进行整理得到表 16，该表表明了国有企业是多么地希望被拯救，尽管私有部门也有这种想法。

表 16 蒙古企业对软预算约束的认识

企业类别	没有政府援助	政府援助不到 50%	政府援助超过 50%
全部	73.1	13.2	13.6
没有国家股份	80.7	13.5	5.7
少数国有股份	77.4	12.9	9.7
多数国有股份	57.7	12.8	29.5
中央政府所有	52.9	15.7	31.3
地方政府所有	72.4	10.3	17.2

注：企业经理们被问道：“假如不利的市场条件导致贵公司收入突然下降，这样您可能不得不解雇工人。（国家和地方）如果政府援助贵公司，这样您就不必因为财务上的原因而解雇工人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第二列是对那些认为政

① 在一些从未经历过共产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组织仍会对国有部门表现出 SBC 行为。经济学家们通过对诸如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已经多次得出这个观点。例如，可参见 Majumdar (1998)。

② 这种现象是很明显的，例如在波兰的国有企业中就是如此。参见平托 (Pinto)、贝尔卡 (Belka) 和克拉耶夫斯基 (Krajewski) (1993)。

府援助能够弥补不到 50% 的损失的企业数的统计,第三列是对那些认为政府援助能够弥补超过 50% 的损失的企业数的统计。

资料来源:Anderson, Korsun 和 Murrell, 1997 年,第 27 页。

有必要重新回到表 9,该表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三国的停业数据进行了比较。由于在这三国最后几年中经济是增长的,因此破产企业数目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经济周期上的原因。这种趋势大体上表明了预算约束已经得到了硬化。

尽管这三个国家停业企业的数目都增加了,但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数字要大于捷克共和国。这三个国家私有部门的规模大体相当:90 年代后半期这三个国家私有部门的产出占社会总产出的四分之三。不过,这三个国家对国有部门私有化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捷克主要是采用认股权证私有化方式,也就是采用一种对国有企业分散化的方案,然后分散化的资产又由仍为国有性质的大银行发起和管理的投资基金集中起来。所以,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脐带并没有最终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仍然使 SBC 状态得以维持。而匈牙利和波兰的私有部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地建立新企业而得以扩张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多是通过出售的形式完成的,只有极为有限的免费分配。因此资产会逐渐转移到那些有真正所有权观念的人,或者是战略投资者手中,而不仅仅是大型外国企业。这些新型的所有人与国家的联系更少,并且对国家援助的期望也更少。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在匈牙利和波兰,私有化主要作用(尽管不是惟一的)的发挥是建立在破产和清算基础上的。这意味着作为组织形式的企业不再是以其原来的、国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在清算过程中,新的所有人购买了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并且按照新所有者的理念进行运营的一家或多家企业出现,取代了国有部门。这一过程从一开

始扫清了从原有的具有未偿债务负担的 SBC 制度转向 HBC 制度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①。

在考虑私有化和 SBC 关系时需要记住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匈牙利和波兰企业外国所有人的比例较捷克共和国高，而本国所有人的比例较捷克低。李稻葵(1998)已经从理论上证明，对内部实行私有化，预算约束会趋向于软化。

最后，正如表 9 中的停业数据间接表明的，匈牙利和波兰的私有部门达到支配地位所经历的过程要比捷克的私有化进程对预算约束硬化所起的作用更大。这种作用强烈地刺激了企业重组——这对劳动生产率有积极影响^②。我们将在后文中重新讨论这种相关关系。

前面进行的关于私有化与 SBC 现象之间关系的讨论在俄罗斯的例子中得到了清晰的证明。该国的免费分配方式和内部私有化比捷克走得还远。很快，短短数年之后，这种私有化进程的西方和本国的始作俑者便自豪地宣称，前苏联国家的私有化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确实如此，但在俄罗斯，SBC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了，这损害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在后社会主义转轨开始时，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当中就传播着一种观点：在东欧地区完成三大任务是必不可少的

① 关于这种类型私有化的重要性，参见佩洛提（1993）。

② 如果将按照典型的“捷克道路”进行私有化的企业与采用由战略投资人成为大股东（“波兰和匈牙利道路”）的方式实现私有化的企业进行比较，这一结论也可以从捷克的数据得到更进一步地、间接地支持。维斯（Weiss）和尼基丁（Nikitin）（1998）借助数量经济学模型利用捷克的统计资料证实，从大股东角度而言的所有权集中要比从信托投资角度而言的所有权集中带来更好的企业经营效果。

和足够的。不过，人们已经发现，稳定性、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三位一体”毕竟是不够的，硬化预算约束是与之同等重要的一项任务——正如俄罗斯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俄罗斯政府差不多是在改革进程的起始阶段就执行大规模推行自由化的政策。前面提到的私有化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早。虽然稳定工作要拖后一些，但到 90 年代中期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显著地下降了。俄罗斯最缺乏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一整套制度环境。这包括很多方面，但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说硬化预算约束和严肃财经纪律就足以成为制度环境了。不过，如果说建立 HBC 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是国民经济的大多数环境的核心，这似乎并不过分。那需要行政部门的每一位官员和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位行为人都能严肃地处理诸如合同、担保、债务、税收之类的问题。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严重问题，正如俄罗斯的情形。

硬化预算约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四、后 果

本部分并不打算作出完整的分析，而只是介绍 SBC 的一些影响。

1. 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并不仅仅是依靠国家法律法规的行政执行，最根本的是行为人之间的相互信任。SBC 综合症及其附带的财经纪律的松弛（在很多方面相互重叠的一系列现象）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市场行为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受到了损害。卖方不信任买方，债权人不信任债务人，税务机关不信任纳税人，雇员不信任雇主。如果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作为所有人、债权

人和雇主没有诚实地偿付债务从而做了一个坏的榜样，那么会进一步地损害信任关系。

预算约束的软弱无力和财经纪律的松弛破坏了对国家货币的信任。这会导致经济中的法定货币更加软弱。表 17 又以俄罗斯为例列示了这一过程。

表 17 1990—1997 年俄罗斯货币供应 (M_2) 与 GDP 的关系

比率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M_2/\text{GDP}(\%)$	91.3	53.6	21.5	12.8	11.0	9.8	114.4	11.1

注：相对应的是，美国 1996 年 M_2/GDP 比率为 102%。

资料来源：Aslund, 1998 年，第 316 页。

预算约束的软弱无力会刺激形成棘手的拖延和支付关系中持续的、强烈的冲突，这阻碍了从一个集权化的、官僚主义的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一结论附带地提供了一种用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转轨进展情况的分析准绳。如果一国的经济已经有目的地采取了硬化预算约束的进程，则可以间接地表明该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2. 预算约束的软弱无力意味着市场竞争通过淘汰没有生存能力的组织而进行的自然选择不再发挥作用。因此，这使得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激励力量失去了效用，并且使低效率得以保持下来。如果一家亏损企业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获得援助，那么它就会推迟进行痛苦的重组——这通常会解雇大量雇员，并且可能还会关闭工厂和遣散一些管理人员。对于一家 SBC 状态下的企业来说，满足国内外消费需求并不是必须的，它更关心的是能否得

到潜在的施援机构的宠爱^①。

克里森斯和彼特斯(1997)运用一个数量经济模型对保加利亚盛行的 SBC 综合症进行了分析。他们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315 页):保加利亚许多企业的亏损是多么地难以处理。在实行 HBC 制度的市场经济中,像这样的公司就应该进行改组或实行破产处理了,但两位作者所研究的企业仍可以拖延调整并且即便亏损也仍在经营。

我们最终可以看到,预算约束越硬,促进经济增长的适应能力、竞争能力和生产效率就越高。好榜样是匈牙利、波兰和爱沙尼亚,而坏典型是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②。

3. 持续的 SBC 综合症会影响到信用市场的状况,特别当软信用是预算约束软化的主要手段时。企业不负责任地进行借贷,因为它们觉得,即便自己是信誉低下的债务人也照样可以生存下去。在信贷市场上有很大的需求压力,并且如果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未能进行有效地抵抗——SBC 综合症表现出的软弱无力,则银行就会仓促地办理信贷以满足这种膨胀的信贷需求。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形成金融“泡沫”的主要机制,它

① 有些观点将 SBC 理论和“寻租”理论联系起来。参见克鲁格(Krueger, 1974)。

② 可参见前一部分所讨论的关于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可比数据。克里森斯和詹科夫(Djankov)(1998)通过对七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分析而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罗马尼亚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坏典型,但是近年来,随着政府努力对预算约束进行硬化,罗马尼亚的经济在这些方面已经有所改善。当然,这些努力对宏观经济的有益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表现出来。

不能说明投资的真实风险。失灵的、过低的资本价格会产生错误的信贷需求和投资目标（黄和许，1998）^①。

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失控的信贷需求和被迫满足这种需求的信贷供应将使已经在很多国家存在的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甚至加剧。

4. SBC 综合症对财政状况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当“国家补贴和软税收”这两种财政软化手段为 SBC 的主要手段时。如果亏损企业是国有的，那么它们肯定就不能对国家预算中的收入部分作出贡献，而不论这些亏损企业的所有者是谁，它们都不会纳税。相反，大规模的救助和不那么明显的经常性救助增加了国家开支。从这个方面来说，SBC 预示着持续的财政赤字，而最终这些财政赤字通过另外的转化形式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

也可以借助预算约束的软化程度、救助频率和财政或货币负担来反映一国经济是否正遭受金融危机的情况。如果确实发生了金融危机，则大规模的企业停业只会使问题恶化，这样，救助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这将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就像正在扩散和恶化的癌症一样，SBC 综合症会自我增强。

甚至即便不是在每个例子中都会发生危机，但是一些些软弱但却是持续的 SBC 综合症将导致第一至第四点所列示的有害后果。

① 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地区所发生的臭名昭著的 SBC 事件表明，这种短暂的快乐其实是很难抵御的。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其处于财务危机边缘时得到了援助。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在前一部分中介绍的实施援救的第二种动机——担心负面影响——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理由，但这种施援的长期影响是在这个金融领域加剧了 SBC 综合症。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导致施援的因素及其有害后果分别进行了讨论。实际上，支持和反对意见会同时出现在那些有权决定是接受亏损企业或其他组织破产清算还是向其投放安全带的人们的面前，通常会使他们面临棘手的两难选择。

现在是把前面对 SBC 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探讨的章节中的思想联系起来的时候了。SBC 综合症部分地，可以由对决策制定者（例如中央或地方政府，或联合企业的管理部门）起激励作用的不同目标相互间的冲突来解释：决策者的偏好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决策制定者之间也会有争执，当决策制定者们追求各自的目标时，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会分别地影响陷于困境企业的生存机会。

本文并不想创立一种一家之言的结论性观点。没有人能够旗帜鲜明地否认允许对陷于困境的企业或其他组织进行救援的环境的存在。在有些例子中支持实施救援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例如一家企业的破产会带来极为痛苦的社会后果或者会激发严重的互相呼应的骚乱。那些面临这类决策的人们应当记住的要点是：尽管干预可以带来舒心的一瞬和有其暂时的理由，但是其长期影响一定是有害的，因为干预会增强人们对 SBC 的预期。

五、一些结论

本文对最近 10 年来的经验进行了简要回顾，这可能会鼓舞人们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下面可能是其中的一些研究任务：

* 对 SBC 的坚持和对硬化预算约束的抵抗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由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来解释。因此，在 SBC 过程开始之前，会达到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这需要交叉学科的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理论联系起来，并创造出可以解释这种状况的新的通用性理论。

* 正如前面提到的，硬化预算约束是有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同时也有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这对于建立可以对具体的成本收益问题作出说明的模型应该是有用的。

* 利用本文所提及国家的观测及测量结果，我们只能将不同定义的、经过特别观测得到的指示器并列起来，并用一些轶事型证据作为补充，这样试图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得到结果是拼凑出来的，我们希望这种结果或多或少地可以真实可信地反映出经济的实际状况，但它不是精确的描述。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对任何时期预算约束软硬进行说明的国际性通用指示器体系。需要有一种可以得到能够反映出一国 SBC - HBC 综合症变化情况的复合指标的方法。有一套可以作为进行更严格地纵向和国家间的横向比较以及数量经济分析基础的、由说明某方面情况的指示器和综合指示器组成的适用的指示器系统。希望有关的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发展银行（EBRD），能够承担起将与之相关各种观点统一起来的组织任务。在下一阶段撰写关于更广泛的历史趋势及关系的、具有更严格理论基础的研究报告之前，需要完成这些工作。

在介绍了一些研究成果的内容之后，除了本文已经提出的一些结论之外（这里不再重复），我们有必要再得出

一些结论，同时我们还想得出一些有关经济政策的结论。

SBC 综合症是由长期的——而不是零星的——施援行为所导致的。对救助的期望牢牢地、深深地刻在经理们的头脑中。法律上的迅速而激进的转变并不能消除这种情况。即使这样做看起来似乎取得了硬化预算约束的成功，但由于产生软预算约束的动机仍然存在，因此 SBC 综合症仍会复发。复发的风险是永远都无法消除的，对此要做持续不懈的斗争。

对所有经济行为人都应耐心地进行最广泛的知识再教育。应当通过始终如一、纪律严明的实践——而不是夸夸其谈——来消除这些人以往对救助的预期，并用一种相反的观念——最根本的是要遵守财经纪律——来取代这种预期。

在对 SBC 综合症本身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显然应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步必须是由立法机关来进行，但立法机关目前还没有采取行动。它们应当使严肃财经纪律和强制实施 HBC 的司法活动得到加强。每一个国家机构都应当避免采用软化预算约束的手段，从而为实施 HBC 作出自己的贡献。作为所有者、债务人和雇主的国家，在遵守财经纪律上应当作出表率作用。

不能只有教育目标，而需要有一些范例。应当公开地反对，向那些试图施加政治压力或想把自己财务上的失败与政治关系联系起来的一些企业及其他组织提供援助。不过，硬化预算约束不能仅仅局限于几个引人注目的破产清算事件中，需要始终如一地在大量的日常细节工作中应用 HBC 原则。这通过保证补贴、税收准则以及借款条件的透明性来有效地实现。

这是非常需要的，这样公众就会逐渐明白，如果为了使没有活力的企业生存下去而软化预算约束，纳税人的钱（对银行来说是存款人的钱，对于联合企业来说是股东的钱）是如何被使用的。施援行为越透明，对施援行为的斗争也就越容易。这对于媒体——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当中的学术开拓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王塑源 译）

后社会主义体制下财经纪律的演进^①

财经纪律，在我看来，就是以下四条简单规则的强制实行：

1. 买者：购物付钱。
2. 债务人：欠债还钱。
3. 纳税人：照章纳税。
4. 企业：以本抵支。

在市场经济下，这些规则是不言自明的，但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下，就完全不同了，现实与这些规则还相距很远。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规范为基础的，即主要靠强制性的计划命令，特别是按投入配额完成生产指标。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学会遵守新纪律是本研究的主题。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匈牙利的经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提及其他国家。但是，就我的观点而言，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一般性的问题，在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

^① 本研究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匈牙利”研究课题的一部分，得到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助。同时，我要感谢以下各位的帮助：Ammanaria Balogh、Bela Bartfai、Imre Ferto、Erzsebet Gem、Marianna Hollo、Maria Kovacs、Laszlo Murakozy、Sandor Piskolti、Jane Prokop。还要感谢 Gyorgy Rozsahegyi 为本演讲收集资料。我非常感谢 Brian Maclean 和 Julianna Parti 对我的匈牙利教材的精彩翻译。

避免地会出现。因此，在文章的结尾处，我设法得出的是
一些一般意义上的结论。

一、国家与企业的新合约

分析问题需要一个概念框架。假定国家与企业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合约，我们先来看看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本文不涉及那些财经纪律明晰的领域，比如在官僚主义体制内部或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交易）。事实上，这些关系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具体的“保险合同”。

改革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合约使保险公司（即国家）承担了全部损失。如果一个企业发现自己陷入财务困境，国家会无条件地对其进行紧急财政援救。紧急援救有多种方式：增加财政补贴，减免税收或延期支付税赋，重新安排贷款期限，或提供新的软贷款。国家还要保证那些长期亏损企业的生存。所有这些脱困方式的采纳均不断地违犯了前述第2、第3、第4条财经纪律（贷款纪律、财政纪律和市场成本—收益纪律）。在我先前的著作中，这类现象被称为“预算约束软化”。保险理论中一个人所共知的副作用即道德风险在这里明显存在。倘若决策者知道保险公司会赔偿其所有损失，它们就不会费力去避免亏损，在本文中这就意味着企业没有足够的激励提高效率来避免亏损。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企关系是由另一种不同的保险合约来确定的。这样的政策使保险公司只负担部分损失，而让投保人负担主要损失。这样，毋庸置疑，损失被自动地、无条件地得到补偿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只有

在某些特殊部门（如银行业），国家才会承担可能发生的大部分损失。国家作为“保险人”无论是只对这些特殊部门进行补偿，还是也对其他部门进行补偿，对亏损的补偿只能是在严格的约束条件下进行。这样，企业的生存就不需要政府来担保；长期亏损的企业迟早必须从经济领域退出。财经纪律 2、3、4 也要得到严格执行。用先前的术语讲，就是要实现“预算约束硬化”。

有迹象表明，匈牙利正在向一个具有长期保险合约特征的市场经济发展。表 18 似乎是对此现象的一个证明，该表数据表明，补贴已大幅减少——占 GDP 的比例从 12% 降到 3%。而且，表 19 和表 20 的数据又显示了申请破产的企业数与申请清理的企业数的剧增，这表明政府进行紧急援救的企业数在减少。1976—1982 年间^①，每年平均有 26 家企业停止运行，即使如此少的数目，大多数情形下，也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停止运行。对比更为明显的是，1992 年仅一个月内申请清理企业数就多于 1986—1988 年间任何一年内申请清理的企业数。当然，实际上政府与企业间并无书面合约。不过，“合约理论”作为理论经济学中一个新兴的分支，已经发现许多非书面合约的例子；风俗和习惯性行为诱使当事人遵守合约条款^②。第一方都期望对方继续按习惯行事，而

① 参见 J. Kornai 和 A. Matits (1987, 第 100 页)。

② 见克尔 (G.S. Becker, 1992, 第 338 页) 在他的有关传统与习惯性行为的研究中有如下陈述：“与过去的选择直接相关的习惯、嗜好、传统和其他偏好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因此上也决定着可预测的将来的行为。事实上，习惯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可能是长期合约和其他显性承诺机制的很好的替代品。”

且，他自己也遵守非书面合约。这样，这种社会关系便建立在一种牢固的长期预期之上^①。

表 18 政府预算和企业部门的流量

年份	企业部门上缴预算	国家预算拨给企业	净预算流量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1987	29.6	12.3	17.3
1988	20.4	9.9	10.5
1989	15.4	6.7	8.7
1990	16.2	4.7	11.5
1991	12.4	2.8	9.6
1992	9.8	2.7	7.1
1993	10.0	2.6	7.4

注：（在编辑本书时修正了本表的数据。引用的是修正后的数据。）1993 年的数据来自政府项目。第一列包括国有企业上交政府的净利润和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所交的利润税。第二列不包括消费。

资料来源：L. Murakozy, 1993 年，第 25 页和 39 页。

表 19 1992 年和 1993 年申请破产的企业数

年份和月	提出申请破产的企业数	官方正式宣布可以破产的企业
1992 年 1~3 月	786	285
4 月	2259	205
5 月	201	465
6 月	145	482
7 月	154	300
8 月	113	69
9 月	151	104
10 月	150	190

① 为了分析长期隐性合约，即基于“博弈规则”基础之上的一种不断更新的社会关系，使用最多、最普遍的数学模型是“重复博弈”模型。有关的理论描述参见 D. Fudenberg 和 J. Tirole (1991, 第 147~206 页)。更流行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此类理论的模型参见 T. C. Schelling (1978, 第 115~133 页) 和 K. Binnmore (1992, 第 345~381 页)。

11 月	118	225
12 月	154	175
1992 年总计	4231	2500
1993 年总计	987	887

注：(修正表) 第一列表示申请破产的企业数。第二列表示公开宣布可以破产的企业数。法院将负责在官方公报上公布此类信息。

资料来源：1992：匈牙利财政部（1992，第 4 页和第 7 页）和绍洛伊 (T.Szalai)（1993，第 79 页）；1993：Penzugyminisztium（财政部），（1994，表二/3.3）。

表 20 申请清理的企业数

年份和月	申请清理的企业数	法院正式宣布清理的企业数
1986~1988 年	/	159
1989 年	/	141
1990 年	/	233
1991 年	/	526
1992 年 1~3 月	2617	120
4 月	1281	161
5 月	837	202
6 月	927	166
7 月	699	219
8 月	701	210
9 月	797	482
10 月	782	211
11 月	751	223
12 月	692	223
1992 年总计	10084	2227
1993 年总计	7242	2593

注：(修正表) 第一个数据的时间段为 1986 年 9 月 1 日至 1988 年 12 月 31 日。

第一列数据记录申请清理的初始企业数。第二列数据指官方正式宣布可以清理的企业数。正如破产过程一样，法院负责在官方公报上公布此类信息。

资料来源：1986—1991 年的数据来自 M.Mora（1992，18~23 页）；1992 年：财政部（1992，第 5 页和第 9 页）以及绍洛伊 (T.Szalai)（1993，第 79 页）。

1993年：匈牙利财政部（1994，表2/3.3）。

在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典型旧合约下，当遭遇金融危机时，企业可以完全肯定政府会出面帮助摆脱困境。但是，如果这种长期预期不够稳定，比如说，当事一方（这里假定是政府）突然改变了其习惯性行为，结果会怎样呢？关于偏好、习惯及预期的突然改变的信息，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心理学均未能给出充分的、可靠的答案。单单这一点就使本文所研究的问题难以找到答案。

上面描述的概念性框架为我们讨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结构。下面我们先来讨论政府行为，然后再讨论企业行为。

二、政府行为

（一）冲突的目标

要使政府改变原有的长期合约，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政府有改变该合约的政治愿望。它是政治目标的函数。政府确定其政治目标时必然要考虑其经济约束，并且必须权衡其可能的利弊得失。下面我们先来看强化财经纪律的好处。

1. 一个顺利运行的信贷系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但如果不能保证人人信守合约，信贷系统就不可能形成。

2. 社会主义转型期内许多重大问题的产生都与预算平衡相关。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一就是改进税收征集制度。

3. 相对价格被不同的、差别税收制度与补贴所扭曲。改变这一状况有助于发现更可靠的价格信号。

4. 严格的财经纪律将使那些长期亏损的厂商退出市场。一旦建立了能真正反映成本及资源相对稀缺状况的相对价格体系，这种退出现象的发生就会恰到好处。此外，

财经纪律还鼓励那些存活下来的老企业和那些新出现的企业降低成本，并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

总之，严格的财经纪律为提高效率提供了一种较强的激励机制。但匈牙利的经验也表明，改革的一些好处会立即显现，另一些好处则要滞后一段时间才显示出来。

最令人惊讶的是，经互会解体后匈牙利生产的迅速调整。世界银行的两位工作人员德尔维（K.Dervis）和康登（T.Condon）在他们 1994 年的研究“出口或者毁灭”中，对当时匈牙利企业所面临的威胁进行了阐述。表 21 是一张出口业绩展示图，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很短的时期内，匈牙利对欧共体的出口就增加了一倍。

表 21 产品出口地

年 份	欧共体	转型和非市场经济国家	其 他
		占总出口的比重	
1987	20.1	56.5	23.3
1988	22.6	51.2	26.2
1989	24.8	47.3	27.9
1990	32.2	37.7	30.1
1991	45.7	23.6	30.7
1992	49.8	23.3	26.9

注：（修正表）。

资料来源：Ko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中央统计局，1993，第 106 页）。

强制实行较严格的财经纪律对生产重组的效果虽然不太突出，但尤为重要，这一过程被称为重建、重购。破产司法程度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要倒闭了，因为提出破产申请后，法院先为企业出具允许其延期清偿债务的执行令，在法院作出最后判决前，企业可以延期支付其债务。在此期间，如果可能的话，企业可以重新理顺其事务。这一过

程常常伴随有全部或部分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动以及对新的、更为优秀的经理人员的任命。如果只为讨债主的欢心，企业会尽可能地出卖它的资产。但是，清理过程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对其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进行不负责任的破坏。通过清理，先前的大企业常常被分成了几个小企业，原来的各种资产也被出售。破产和清理均能为原有企业的私有化与新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最后，严格财经纪律所产生的最不明显、费时最久、但很重要的一个效果，就是人们观念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随后还会提到。

现在，我们来看平衡表的另一边——成本。

严格财经纪律，包括破产、清理诉讼案的层出不穷，导致了生产的锐减。这当然不是所有社会主义经济体毫无例外地出现经济衰退的惟一原因，但毫无疑问这是造成经济萎缩的原因之一。

整个工厂的关闭显然导致了工作岗位的减少。再者，存活下来的企业也力图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结果又必然是裁员。表 22 显示了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状况。1990 年 5 月以前，岗位空缺数仍大于寻找工作人数。但此后指数便向失业倾斜，而且，呈逐月上升趋势。对于一个几十年来已习惯了充分就业（事实上还是劳动力短缺）的国家来讲，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失业的出现与失业人数的增加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失业救济金只能部分地减缓这种痛苦。而且，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失业引致的经济上的损失，还有失去工作保障引致的心理上的伤害。

表 22 工作岗位空缺数与失业

月份	等级岗位空缺数	等级失业人数	失业率 (%)
1990 年 3 月	34 048	33 682	0.7
6 月	37 859	43 506	0.9
9 月	26 969	56 113	1.2
12 月	16 815	79 521	1.7
1991 年 3 月	13 583	144 840	3.0
6 月	14 860	185 554	3.9
9 月	15 351	292 756	6.1
12 月	11 529	406 124	8.5
1992 年 3 月	15 124	477 987	8.9
6 月	25 346	546 676	10.1
9 月	25 634	616 782	11.4
12 月	24 097	663 027	12.3
1993 年 3 月	35 760	697 585	13.4
6 月	30 771	657 331	12.6
9 月	35 784	669 761	12.9
12 月	28 089	632 050	12.1
1994 年 3 月	33 341	610 994	12.2

注：(修正表) 1992 年 1 月开始，失业率的定义已调整为西方劳工统计定义。

1990 年和 1991 年的数据还是按旧定义计算的，未重新计算。按新定义计算，失业率应该更低一些。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家劳动中心，1991—1994 年。

再者，社会主义体制下，尤其是改革前，企业不单单是一个为人们提供工作的雇主。企业还提供各种各样的福利服务：公寓或宿舍、食堂餐饮、度假、医疗保健、幼儿园及托儿所。当企业成为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雇主时，企业必然会卸掉这些包袱。因此，工作保障失去的同时，坚固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被瓦解了。

表 23 1992 年布达佩斯法院担保偿付的案件

年份	案件数	财偿总价值 (匈牙利福林: 10 亿)
1988	11 000	6
1989	31 000	19
1990	64 000	45
1991	61 654	43
1992	31 470	38

资料来源: 布达佩斯经济庭前任庭长皮斯科利特 (S. Piskolti) 提供。

收益与成本的矛盾导致目标的冲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宏观稳定转向有关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问题。控制通货膨胀要求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但这会使失业率上升;同样,降低失业率的措施又会加速通货膨胀。这种两难选择也同样存在于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而且给这些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匈牙利的年通货膨胀率已大大降低了,但 1992 年和 1993 年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仍然高达 22% ~ 23%,同时,其失业率已经上升到 12% 多。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影响更大,因而更严重的两难选择问题:效率与保障的两难选择问题。从短期看,改进了效率;但从长期来看,效率的改进可能同时伴随着充分就业与工作保障的丧失、原先由企业提供的福利设施所保证的社会保障的瓦解。

国际经验比较表明,在处理这种艰难的两难选择方面,匈牙利已经尽可能地加强了财经纪律并实行了硬预算约束,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效率。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也正在向同样的方向发展,不过,对一些问题,他们至今仍然举棋不定,比如,是否引进现代破产法并将其贯彻始终。一个极端的反例是,1992 年后半年,为了维护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或者,可以至少保证这些企业为其工人和职工正常付薪,俄罗斯中央银行将数

额巨大的贷款发放给了这些企业。

(二) 信誉与承诺

我们再回到更一般意义上的讨论。假定政府决定从现在起实行严厉的财经纪律和硬化企业预算约束。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政府是否会将此政策坚持到底？即使政府承诺说要将此政策坚持到底，企业会相信政府的承诺吗？本文一开始就提到，实行新合约的一个条件就是政府应该有基本的信誉，在我们讨论的具体的上下文中，信誉特别地指政府“不进行紧急财政援救”的承诺。冲突与合约理论特别强调信誉，尤其重要的是威胁的可置信度问题。匈牙利在这方面做得如何还不太清楚；目前还存在许多稀奇古怪模棱两可的事情。

现在，我们回想一下尤利希斯与妖女的故事^①。妖女们迷人的歌声会诱惑那些水手，使他们遭遇灾难甚至毁灭。当尤利希斯的船靠近妖女的海岛时，尤利希斯用蜡塞住了他的船员的耳朵，告诉他们把他绑在桅杆上，这样，他就可以抵御诱惑了。他越乞求他们把他放开，他们就应该把他绑得越紧。

现在，再从诱惑和承诺的比喻回到匈牙利的现实中。先来看诱惑。现实中存在着某种力量诱使政府放松财经纪律，发放软贷款。政府背后的政治力量能凭借财政紧急援救手段充当企业的资助人，来赢得客户。他们可能迫于政府压力及工业集团或地区集团的要求而妥协。他们一直关

^① J. Elster在《尤利希斯和妖女》(1979)一书中，多次使用这一比喻来对诱惑和承诺进行哲学分析。

注着下一界的议会选举和地区选举,这样,财政紧急援救手段就可以帮助他们廉价地赢得选票。

这确实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政治诱惑,其影响可以明显感觉到。因为实行严厉的财经纪律,特别的议事程序已经出现有好几次了,其中,大多是通过双方讨价还价来达成协议。软预算的痕迹还明显可见。尤其危险的是,特殊议事程序的频繁出现会严重降低政府实行严厉财经纪律承诺的信誉。

尤利希斯的绷带的作用主要是靠约束和事先承诺生效,也就是说用约束和事先承诺来绑政府的手。绝对的、完全的“不进行紧急财政援救”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对宏观经济调整的需求和对消除政治紧张局势的需求。但是,政府必须保证紧急财政援救不会频繁进行,也就是说,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出现。企业申请援救的要求和程序都必须由法律来确定,而不是靠事后的行政讨价还价过程。而且,只允许进行暂时的财政援助,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援助方式(延期支付税收欠款,重新安排到期债务,预算补贴,等等),援助都必须遵守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该表规定严格确定的资助数量和救助的最后期限,该期限不应该太长。这里,每一次援救都不应该是关起门来的秘密协议,而应该是完全公开的,所以,这种援救是处在议会委员会和媒体的监督之下的。

遗憾的是,政治家们的行为方式常常是不同于荷马笔下的尤利希斯的。他们不会像尤利希斯那样让水手将自己的手脚绑起来。相反,他们竭尽其所能让自己的手脚自由,因为,他们还需要更大的行使权力的空间。正如赫希曼所言“不可预测就是权力”^①。对于政治家来说,模糊

① 参见 A. O. Hirschman (1977, 第 50 页)。

可能比清晰更好。

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人士是否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种有约束力的承诺，而且保证政府遵守其承诺。不管怎么说，检验政府信誉的惟一办法就是看未来几年内，政府是否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证坚持实行严厉财经纪律的承诺。

(三) 强化约束的机制

现在，假定存在持续实施财经纪律的政治愿望。但保证该政策有效实施的方式仍是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纪律是靠官僚体制自身来实施的，常常采取随意的、专断的方式。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形成一种立宪政体，这一点是与财经纪律密切相关的。

我们先从立法开始讨论。在这方面，匈牙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会计制度、银行法、破产法已经在运行了。立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实验过程。某一具体的法律条款可能有很多错误，迟早总会要修定，这就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法律意识、法人意识更难以形成^①。

① 破产、清理规则中，极具讽刺意义的、值得一提的是“自杀条款”。一旦企业显然无力偿还其债务，负责该事项的企业经理就有义务提出破产申请。如果某些经理未能及时提出破产申请，这一行为就可能被证明给企业造成了损失，他（她）本人将被民事法庭提起诉讼，偿付赔偿金。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这一条款有很强的诱导力诱使企业经理提出破产申请。

这一“自杀条款”加剧了破产风波，以至于最近政府撤销了该条款，同时对破产法的一些细节进行了修订。这一修订是否已严重弱化了破产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尽管已经采取了必要的立法措施,但如何使法律生效仍是一个问题。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的数量在急剧增加。但称职的司法人员还远远不够。不仅缺少法官,也缺少破产管理官、注册会计师、律师、经济师以及对破产、清理、拍卖、兼并、分离和重组有经验的称职的工商管理人員^①。

我们再看一个企业违犯财经纪律的例子:企业购物不付钱。卖者要求法院向债务人发出一种付款保证的通知。并提出警告:如果债务人仍不付款,法院就要进行公开拍卖。表 23 的数据表明,此类案件的数量在 4 年之内增长了 5 倍。从法院发出付款通知到官方执行官开始对债务人的大部分资产进行拍卖之前可能是 3~4 个月的时间。

难怪一些企业家觉得他们必须自己处理此类事务,而不是诉诸法律。据媒体报道,有那么一两家不太出名的企业就是用很古怪的方式专门收债的企业:派几个年轻力壮、像拳击运动员一样的人去债务人的家里,至少使用威胁性的语言提醒他还债^②。在另外一些案件中,债主电话给债务人说,如果再不还债就要打他,或者警告说会毁坏他的财产,或者会袭击他的家人。可见,实施财经纪律时会出现恐吓手段。

恐吓方式是令人吃惊的,也是无法容忍的。但是,不

① G.S.Becker 和 G.J.Stigler (1974) 在一项有关法律实施的研究中表明,实施法律的机制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改变之后对社会成员是有益的(在实例中明显如此),实施法律的机制在其规模、方法以及组织形式方面都可以向更符合人们要求的方向调整:比如,由于建立了必要的激励机制,此类活动的有效性可能得到改进。

② 1986 年的具体例子,参看 1992 年 10 月 19 日 Nepszabadsag 日报的新闻报道。

幸的是,这种方式还有可能再次出现,因为在实施财经纪律的法制基础完善以前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尽管财经纪律的法律强制是最基本的,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必须靠加强公众对经济交易的道德观念的转变^①。这就涉及到第三部分的研究,即企业行为。

三、企业行为

(一) 一个例子:企业间的强制信贷

遵照市场经济精神决定的政府与企业间的新合约,不仅要求政府改变其行为,而且要求企业改变其行为。为了弄清在匈牙利经济中,第二种变化普遍的失败是如何造成的,我们先考察一下企业间的强制信贷现象。企业B已经为企业A的生产送交了货物,买方已经收到货物,但还没付账。也可以这样说:在没有事先协议的情况下,企业A强迫企业B延长信贷,而且还不还债。这样一来,企业A就严重地违犯了财经纪律1和2。用同样的手段,企业B也同样不为企业C的货物付账,其理由之一是企业A没有付钱给它。轻视支付及债务清偿的问题迅速传

后社会主义体制下财经纪律的演进

^①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立法与司法之前,在诚实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私人合约已经普遍存在了。当第一部商法通过后,他们毫不客气地处罚了那些不偿债的人。13世纪通过的英国的商人法规定,如果债务人不偿还他的债务,债主有权扣押他的动产:“而且,如果该债务人就其债务无动产可扣押,可以找到债务人本人,并将其关进监狱,直至他同意还债或他的朋友愿意替他偿债。”见W.D.Mitchell(1969年)。有关商法的更详细的资料,参见L.E.Trakman(1983年)。

至其他企业，继而形成了长期的、互相牵制的强制信贷链^①。如表 24 所示，这种债务链在 1992 年 4 月之前一直持续增长。

表 24 强制信贷

年份	非自愿贷款企业数	强制贷款总金额(匈牙利福林:10 亿)
1979	52	7.9
1980	25	3.8
1981	27	4.7
1982	85	15.2
1983	167	33.8
1984	159	38.4
1985	127	28.3
1986	82	14.0
1987	82	14.0
1988	208	45.5
1989	314	72.8
1990	432	90.5
1991	1017	159.8
1992.4	1143	197.0
1992.12	642	104.0
1993.12	638	99.0

注：(修正表) 1991 年数值的时间为 1991 年 11 月 30 日。其他所有非自愿贷款数均指每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非自愿贷款数仅包括数额大于 25 百万匈牙利福林的数额。倘若将小规模的非自愿贷款也计算在内，总量应该会更大一些。为便于比较，假定该总量为所有大银行对所有企业的非自愿贷款，以匈牙利货币 10 亿福林为单位计算：1990 年为 144.3，1991 年为 121.4。强制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重为：1990 年 63%，1991

① 这意思是说，债主要等待欠款企业还债之后，才能清偿其债务。所以，在匈牙利，形容这一现象的词太多了，并且都很流行。

年132%。

资料来源：1979—1991年见瓦尔海吉（E. Varhegyi）和塞德（L. Sandor）（1992，第25页）；1992年和1994年由瓦尔海吉提供。数值均依据匈牙利国家银行的数据计算。

从1992年下半年起，强制信贷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这似乎表明破产风波已经开始对加强财经纪律产生正效应。另外，开始对企业与银行合作的方式进行各种尝试以解决问题。例如，借助清偿系统，可以结清一些相互间的债务，甚至可以转化为银行信贷。尽管强制信贷已经明显下降，但只要在遵守财经纪律方面没有根本性的彻底的改变，强制信贷的再次出现就不可避免。为了保证强制信贷现象只是偶然的，不是普遍的，企业必须遵守以下两条禁令：

“买方：倘若未取得卖方事先同意，买方永远不可以买货不付账。如果一直不付账以致欠了债，买方就会惹上法律方面的麻烦：卖方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扣押买方的资产。除了法律方面的麻烦，买方的商誉和企业信誉也将遭受沉重的打击，企业的信用评级也会下降。”

“卖方：在确保买方会付账及确信买方的信誉之前，千万别发货。”

第二点警告尤其值得强调。强制信贷的传播者常常以“无辜受害者”的面目出现，要求法律公正。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要求政府尽快帮助他们，好像他们是自然灾害的牺牲品。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承认市场是不“公正”的。企业家必须承担风险，事实上企业家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如果买卖做好了，他们就能赚很多钱，但如果买卖弄砸了，他们就得承担损失。如果买方碰

巧不付账，他们就得用合法的方式去讨债。如果讨债不成功，那只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如果他们还要继续干的话，对于该给谁发货，下次就会更谨慎一些。

另外，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必须适应另一种变化。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重要的是能生产多少。一旦产品生产出来了，就可以向统计部门报告。而且，产品数量作为对完成整个计划的一个贡献被记录下来。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些产品能否被销售根本不重要。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企业能销售什么，从他们的产品中他们究竟能得到多少钱。

在考察了这一有意义的例子之后，我们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分析企业的行为。现在，我们有必要将整个经济分成独立的两部分来考察：新兴的私营企业和老的国有企业。

（二）新的私营“印记”

在社会主义改革阶段和后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兴起了一些新型的私营企业，为了弄清这些企业的行为，我想从演进生物学中借用一个概念：“印记”^①（词典中，该词的定义是刻印或盖邮戳，其比喻是指一种无法消除的记忆）。通过对动物的观察，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些启示：在生产中最初的、尤其是敏感阶段形成的习惯具有极强的影响力。这些习惯深深地刻印下来，几乎完全不可能从记忆

① 参见 E. H. Hess (1973) 和 W. Sluckin (1973)。

中消除，并驱使动物不断地重复这一经验^①。

对新兴的私营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必须学会严格遵守财经纪律。但出现了对这一要求的抵制。私营企业主反驳说，如果政府依然对国有企业进行紧急财政援救，为什么政府不能援救他们的企业呢？我认为对这一压力让步会是个极大的错误。除了一些罕见的、可以证明的特例外（前面已经谈到），政府绝对不可以对私营企业进行经济援救。让它们在竞争中自生自灭。如果每年有10-15%的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倒闭了，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健康进化与淘汰的自然过程要求大量企业不断地进入和退出。

（三）旧的国有部门：从创伤中汲取教训

如果国有企业继续由政府来控制，其前景会如何呢？同样的论据使人们对此很是怀疑。长期容忍松散的财经纪律和软化的预算约束已经深深地“印”在那些经营国有企业和被国有企业雇佣的人的脑海中。有可能改变这种印象吗？

政府作为“保险公司”，如果（而且只要）合约的另一方严格地、坚定不移地遵守新的市场经济的合约，这种印象也许可以改变，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

① 小鹅走路时总是跟在鹅妈妈后面排成一列。“印记”的发现者之一Konrad Lorenz观察到，如果小鹅是在人工孵化器中孵化出来的，在它们生命的最初几小时里，它们就变得跟孵化员很熟。当孵化员走路时，它们就会跟在孵化员的后面排成一列，而不是跟在它们的亲妈妈后面，即使它们的妈妈就在它们身旁，也完全不顾妈妈的存在，它们的这种习惯会一直保留下来。

国有企业已经变得严重依赖于政府的家长式统治和不断可以得到的紧急财政援救，就像意志薄弱的人变得只能靠香烟、酒或毒品来解除自己的痛苦一样。做这样的类比思考是很值得的。那些确实想办法将抽烟、喝酒、吸尼古丁戒掉的人，究竟是怎样戒掉他们的嗜好的呢？最关键的一步是认识到它是有害的、危险的。大多数情形下，这种认识是得自于书面解释和讲座的影响，尽管许多人的最后的动力来自一次毁灭性的经历，比如，由于吸尼古丁过量，面临紧急情况时犹豫不决而招致悲剧的发生，或者，他或她自己由于对其嗜好过于上瘾而患了严重的疾病^①。

表 19 和 20 表明，长期亏损和严重的资不抵债已经对匈牙利国有企业的生存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如果这种压力一直存在下去，企业的经理们迟早会意识到遵守财经纪律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这只是事态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至于事态是否真的按这一方面发展还很难说。事实上，对嗜好的观察表明，诱惑常常很轻易地让老毛病复发。政府的老习惯——对违犯财经纪律的容忍、预算约束的软化——的每一次复发都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理们认为，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必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这样，他们也就会恢复他们的老习惯。

所以说，有了新的习惯性行为，对国有企业可能会有新的期望，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种新预期。它只能作

① I. Swenson 和 J. A. Dalton (1983) 有关诱使吸烟者戒烟的因素的研究提供了如下数据：对戒烟者的抽样调查表明，67.9%的人是由于获悉吸烟导致致命危险的统计数字而戒烟的；他们提到的例子中，57.6%是吸烟者自己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29.2%是吸烟者吸烟导致了其家人或朋友的死亡。S. Curry、E. H. Wagner 和 L. C. Grothaus 也报告了相似的调查结果。

为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众多著名论据之外的一个额外论据，因为，新的行为方式只能从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之上、并且一开始就习惯于遵守财经纪律的企业中真正产生。

四、一般结论

通过对匈牙利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在政府和法院真正开始严格实施财经纪律之前还有很长的准备期。而且还得有一些先决条件。私营部门还得发展到一定规模，如果国有企业的数量急剧下降，私营企业作为供给方和雇主，至少有能力部分地代替国有企业。市场制度和法制基础也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以便提供作为对付失业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建立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机构并充当劳动交易的中介。

当财经纪律被较为强制地实施之后，在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开始相信政府在这方面的习惯性行为已经真正彻底改变了之前，还有另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经理们主要靠他们自己的经验修正他们的预期，而不仅仅靠政府的承诺修正预期。经过几年之后，回顾历史，一旦发现一个新的、严厉的、连续的财经纪律机制已经真正地存在，企业的新的行为方式也就会巩固下来。

迄今为止得出的两点教训表明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财经纪律的巩固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也许要持续好几年。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不可能顺利发展的过程，是

一个不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就不可能完成的过程。这主要是因为这一过程有严重的副作用,比如生产下降、就业增加,也因为巨变和创伤本身就是教育过程的一部分。

实施严厉的财经纪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只有有足够的公众的支持才可能实施。假定在一定程度上,有一定数量的人意见一致,至少通过隐含的、被动的方式表达出一致的意见。换言之,这一发展要求,保证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背后袭击强化纪律的政策。

最后一点教训是财经纪律的强制是要承担风险的。强制财经纪律的副作用、生产的下降、就业的下降、失业和社会保障的弱化会造成局势紧张。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形成的市场可能造成不稳定,并且会损害还很脆弱的民主制度。而且,在东欧已经听到不止一种有关“魏玛化”的危险的警告,那里,民粹主义的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仇视在经济弊病引致的不满中找到了回应。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想就此澄清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尽管各种经济目标和福利目标的冲突依然存在,在我看来,尤其要强调将提高效率和强制财经纪律坚持到底。

(杨再平等 译)

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的亲 and 关系^①

自 1989 年以来，世界目睹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剧变。本文旨在评价过去的经验，希望对过去的正确理解有助于为将来制定稳健的政策。当然，过去经历过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多，而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或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势都还不安定。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勾画出初步的推测，并且用未来的发展来验证它。

文章中将要讨论的问题有许多政策分支。当然，关于所有制和协调机制的论述与权力、政策机构以及意识形态有紧密的联系。本文对这些问题的政治方面没有长篇论述，只有一些简短的启示。^②

一、传统社会主义与改良社会主义、改革与革命

这里需要澄清几个概念。首先，我要区别两个社会主义的原型。第一个是传统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是在斯大林

① 我要感谢 Mária Kovács、Carla Krüger 和 Shailendra Rah Mehta，他们帮助我编辑了本篇文章。同时也感谢匈牙利科学院、哈佛大学、WIDER 以及斯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

② 见我所著的有关社会主义体制的书（科尔奈，1992）。

主义统治下的社会主义。第二种是改良社会主义，即是经过演变的社会主义，比如（按年代排序）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卡达尔时期的匈牙利、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及其他此类可列举的国家。^① 改良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向政治领域的自由化迈进，在某种程度上分散对国有部门的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有部门在较大范围内发展。同时，这些国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点：共产党不与其他任何政治势力分享权力，国有部门仍旧在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经济活动的主要协调者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虽然这些机构正借助于不太僵化的政策工具进行协调。

同时，我们也要区分改革和革命。前者指在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情况下，对现存的社会主义体制作大的改革。后者则从一开始就使国家从根本上脱离社会主义。因此改革和革命的区别不在于变迁使用的手段（暴力和非暴力），也不在于速度的快慢（缓慢的进程和突然的爆发）。区分的标准是：转变是否废除了共产党的垄断权力？在这个意义上，1989年匈牙利、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先后进行了革命。东德和捷克避免了改革阶段，直接从传统社会主义开始跳跃，进行社会制度转型。

本文中，我把重点放在改良社会主义上，不讨论“后社会主义”体制变迁的问题。^② 在写作本文时，改良社会

① 有很多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描述分析的文章。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布克特（I.P. Burkett, 1989）写的南斯拉夫，科尔奈（J. Kornai, 1986）和安特（L. Ntel et al., 1987）关于匈牙利，Lu.N. Afanas（1988）、E. A. Hewett（1988）、G. E. Schroeder（1987）和 N. Shmelev（1987）关于苏联。

② 我对于革命性转型的观点在我 1990 年的书中有讨论。

主义仍然主导着最大的两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小国家。在东德，这种思想曾经对它有很大影响，不仅对开始转型时的经济环境，而且对政治决策和知识界的争论都有很大影响。因此，本文的主题——改良社会主义的普遍教训——现在应该很重要，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世界正在进行的惊人变化指出一些方向。

二、没有战略的转型

如果我们看看提到过的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实际改革阶段前无一例外没有改革的蓝图或计划。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蓝图是由学者准备的。事实上，有关转型的学术建议的第一个范本可以追溯到奥斯卡·兰格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建议，以及20世纪30年代对该思想的广泛讨论。一些蓝图也由当权领导人提出，如南斯拉夫、匈牙利、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官员。最后，还有这样的例子，有的规划由被驱逐到国外的政治家非法发表或者半非法发表，例如波兰的与非官方的团结工会关系密切的作者，还有如匈牙利和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虽然这些改良的建议是很有意义的历史性建议，虽然其中的一些建议对变迁还有些影响，但实行改革国家的实际做法从来没有和任何这些蓝图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即使官方公开发表的政党或政府的意图也得不到一贯地执行，有时，它们和最初构想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和开始的蓝本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上这种差异的例子不少：法国革命几乎没有反映出百科全书派学者们（Encyclopedists）

和卢梭（Rousseau）探讨过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与马克思或1917年参加革命的其他人士起初构想的情形也大相径庭。

但是，颇具讽刺的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大部分转变没有在中央计划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过程是在不知道最终方向的情况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现实有着历史妥协，前进和倒退交替，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交替。而且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一些变革仍不能被保存下来。打个形象的比喻，有时当人们撞击到了石墙上，才了解到改革的局限性。任何情况下，转型的局限只能在其开始后才被正确地衡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观察转型过程中那些自然演化的过程很重要。马克思用德语“自然生长”来描述自发的历史过程。这些现象的出现不是政府命令或行政压力的结果而是某些社会团体的自由意愿。

自从个体自由选择变成改革的结果，对“自然生长”变化的研究就成为最重要的方面。的确，在改革的社会主义下还存在一些禁令施加的限制，但是，自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社会团体的自主决定和偏好。

正是这一方法将本文的研究与其他研究区别开来。其他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是处理规范化问题，即使在实证分析的领域，领导和政府机关的意图和行为也在讨论之列。本文将侧重点放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自发变化？什么事情在没有领导集团命令的情况下发生了自发变化，甚至在命令禁止的情况下发生了自发发展？

三、私有部门的演变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的第一个焦点应该是私有部门的演化。首先让我们简要地指出首次提出改革建议时的情景。例如，1954年、1955年和1956年，当我开始参与东欧改革思想的讨论时，所有参加讨论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国有部门的改革。讨论围绕着如何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大的激励机制，如何分散行政干预同时又在除了最无关紧要的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保持国有制的问题。这都是那时积极推行改革的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结果，和本研究前文的叙述相吻合，经过30年的变化，历史选择了和学院经济学家开始制定的蓝图不同的道路。在所有有时间推进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尤其是在匈牙利、中国和波兰，众多私有部门的出现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私人经济活动最可能出现在私人农业。它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是土地进行了实际上的再私有化（例如，中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也可以是在所有政治变动中私有农业从来就没有被废除过而一直存在下来，如南斯拉夫和波兰。在匈牙利，家庭土地和私有农场的作用随着改革的推行而不断上升。此外，也存在一些典型的农业合作制下的家庭再承包。

除了这些私有或半私有的农业经济，我们在其他行业也发现合法的、缴税的私有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私有部门已出现在服务、交通和建筑等各行业；在制造业中，私

有企业在较小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① 私有财产产生的收入看起来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城市私有住房的租金或旅游度假地区的私人拥有的另一套住房的收入。

除了正式的私有部门,不同种类的非正式“月光”常常出现;未经注册和可能是非法的但是被容忍的经济行为散布在服务、商业、交通和建筑业。^② 经济改革经历了“自己干”的增长过程,例如靠一两个专业人员和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建造自己的房子。

在一些国家,有一些行业,如住宅业和农业,开始出现原先由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拥有的财产被售卖或出租给个人的情况。^③ 但是,实际上,私有部门较大部分的增长有时靠的是私人储蓄为基础的企业家行为,有时几乎完全依靠个体的劳动投入。

必须强调的是,政府不一定要通过宣传运动强迫市民进入私有部门。通常限制私有经济活动的禁令取消后,私有部门会因私有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而后发地成长起来。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一旦私有企业受到粗暴压制的时期结束后,私有部门立即以非常自发的形式迅速扩展。人们不必出于催促或强制而选择这样的生活方

① 由一伙人拥有并经营的私人合伙企业以及由个体或家族拥有并经营的企业都属于私有部门。在苏联,这样的合伙制被称为“合作制”,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事实上它就是私人合伙企业。

② 关于正式和非正式私有部门,参见 G. Grossman (1977), I. R. Gábor (1985), C. M. Davis (1988), S. Pomorski (1988) 和 B. Dallago (1989)。

③ 在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盛行把国有财产卖给私人 and 外国投资者。这些售卖的总量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两个国家已经跨过了社会主义改革界限,进入了真正的体制革命领域。

式。^① 实际上，他们立即被较高的收入、劳动和报酬更直接的联系以及私有部门提供的更多自主性所吸引。上述第三个原因——对私人行为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的期望——有特别的吸引力。

私营活动产生相对高的收入是因为它能够满足国有部门不能满足的需求。一个手工匠人，一家街角的杂货店，或者一家小餐馆在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经济中都属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层。但是，在这里，在长期的短缺经济环境中，同样的经济行为使这些人成为最高收入阶层，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或者贪心，而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是稀有的。他们对自己的产出所收取的价格刚好是经济中真正的市场运作的那一小部分里的市场出售价格。他们应该感谢国有部门、财政和货币制度所营造的供求环境，这种环境导致自由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官定价格。

如果考虑私有部门必须适应半拉子改革的不友好环境，那么它的发展是更加引人注目的。虽然有一些改善，但私有部门的日常活动仍然受到大量行政干预和限制。私有部门被限制进入原材料供应领域，而且几乎不能进入信用和外汇活动。原材料、信用和外汇常常是在非法或半非法的情况下暗地进行的。

对私有经济不友好的另一个标志是那些对收入差异的扩大持怀疑态度的人的嫉妒。对突然比其他人挣到更多钱

^① 也许在苏联，特别是苏联的农业部门是一个例外。对于大规模集体化和“消除富农”的可怕记忆是如此深刻地烙在集体意识中，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许多人仍然对实行农业个体化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私人经营形式漠不关心。

的人的妒忌在每种制度中都存在,但是,在一个人们从小就将平等视为最迫切需要的社会,这样的妒忌可能引起更大的不和。最后,接下来的困难就是缺乏法治对私有财产的持续保护,对执行合同的保障,同时,困难也存在于缺乏致力于表达私有部门利益的政治运动和社会组织。这些将涉及到问题的意识形态方面了。

人们能否合理地假设这样小范围私有经济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在苏联的一个会议上,要决定有多少张许可证可以发给私人出租司机的实际问题,你完全不可能反对私人出租车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公司观点,同时你也完全会认为,如果允许一些这样的出租车,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会有危险。但是,如果我们客观一点就不可能轻易抛开上述问题。

如果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经济中私有经济的主体部分称为小商品生产。笼统地说,在马克思看来,小商品生产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最实质的区别是前者只使用个人劳动的投入,可能还有这个人的家庭成员的劳动。但是后者一般都使用雇佣劳动并由此产生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剥削。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实际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常被引用的列宁的一段话的影响,即:“小生产每日每时自发地、大量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1920)。”从逻辑的角度上看,列宁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社会允许数量众多的小商品生产存在,如果这个社会允许他们积累资本并发展一段时期,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迟早会出现。想象一下,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中,私人生产者能够和国有企业一样进入信用领域或者能够得到所有的生产投入,并且得到税收政策和补贴的平等对待,会发生什么?毫无

疑问,成功的私有企业将开始积累和发展。因此,对于具体案例的小商品生产是否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实际问题的否定回答,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即政府不会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超过一定的限度。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经济中私有部门的发展不仅受到无处不在并拥有无限权力的繁琐官僚机构的阻碍,同时还和社会主义体制的意识形态前提相对立,因此受到不愿忍受重大的资本主义部门的执政党政府的限制。

在改良社会主义中,限制私有部门发展的方式各种各样。有时,这样的限制仅仅采用法律限制形式(例如,限制合法私有企业雇佣人员的最高数目或者限制对私有企业的最高投资)。阻碍私有部门的发展也采取税收限制的配合。在某个特定时间对某项特殊业务的征税范围可能非常关键,由此为当局控制私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其他的手段。例如,私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可能指出他们能够承受的最高征税界限,超过该界限,他们只能放弃自己的产业,重新回到国有企业工作。当然,这些关键的界限标准随行业的不同而不同,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随具体业务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形事实上存在并且对私有企业的生存施加了制度限制。对积累最强烈的制约是不确定性对将来被国有化和没收的恐惧。对过去的压制还记忆犹新,人们可能还害怕将来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被辱骂成“资本阶级”或“富农”。

这种情形的结果是,由于对资本积累的限制,其发展达不到规模经济。在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气候下,对个人来说,浪费掉利润可能比投入生产更合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评价中,我们经常读到家庭产业的创建者为了给后代留下丰厚的遗产而过得十分吝啬。根据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布登布洛克》描绘的情景,我们开始把浪费只与资本家家族

的第二代和以后的子孙联系起来。比较而言,由于人们十分不确定即使在他们这些创建者的有生之年,其家庭企业能否存活下去,改良社会主义国家中家庭企业的浪费现象常常会在企业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存在。

私有部门的社会环境也导致短期行为。典型的是,私有企业对向顾客树立自身产品和服务的信誉不感兴趣,因为企业老板感到第二年他们可能就不能继续经营自己的企业了。由此,产生的一个极端结果是,在完全卖方市场中,私有企业可能对他们的客户很不诚实以谋取一次性暴利。由于人们习惯了排队买东西和商品短缺,私有企业通常较容易留住顾客,即使企业的雇员不比其竞争对手国有企业(如果有的话)的雇员更有礼貌和热情。于是,不是国有制下整个卖方的服务标准提高到买方市场的水平,而是新建的小型私人企业在长期短缺经济中下降到卖方市场的水准。

为了得到必要的投入,私营企业还不得不采取贿赂手段。不仅获得投入需要采用欺骗手段,而且要用欺骗手段来保护企业不受国家肆意干预。许多加入到私营部门的个人不是企业家,而是冒险者。这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自然的过程选择。

这些环境对私有部门设置了社会地位陷阱。人们的日常经历为“反资本家”的宣传以及反对逐利、贪婪和欺骗的流行标语提供论据。^①这样的宣传加剧了以后的限制和干涉,从而导

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良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些政治家和专栏作家(有时甚至是对立派中的“新左派”)从道德角度反对高价和暴利。他们没有认识到在鼓吹引入市场机制的迫切需要的同时,又拒绝由市场机制产生的价格的合法地位,这两者是多么的不一致。

致将来的情况恶化,导致资本主义更难存活。

因此我们面对一个恶性循环。东欧改革社会主义体制需要私有部门的积极贡献,否则它就不能为民众提供商品。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显然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不能在其纯粹而严格界定的非资本主义形式中存活,它必须不仅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国内与其自认的主要敌人并存。

四、官僚体制的延续

最初的改革蓝图的中心思想是废除命令经济,也就是说,消灭官方制定的产出目标和投入配额。在改良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是两个惟一或多或少坚持完成这些目标的国家。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们只完成其中的一部分。

改革者最初的期望是,一旦行政体系被废除了,这个暂时的真空会立即由市场机制填补进去。这就是说,行政命令将立即被市场信号代替。这种思想的基本假设是在两种协调机制——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之间存在简单的互补性。^① 我在1955—1956年曾赞成这样的设想,但是后来证明它是天真的。由废除行政计划和废除直接行政协调后留下的真空不是被市场填补而是被其他间接的行政协调

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的亲关系

^① 本文中,和我其他的文章一样,使用术语“行政协调”是非价值判断意义的,在许多关于东欧的文章和讲演中“行政协调”并无贬义。它是指某些类型的控制和协调行为。这种协调机制最主要的特点包括多层等级组织的控制,下级对上级的依附以及上级命令的权威性甚至强制性。

工具所填补。^①

市场的作用即使在社会主义计划体系下也没有完全消失，当然在改革以后有所增强。但是，官僚机构的作用仍然保持很广，并且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介入进去。^② 总之，官僚的作用在选择和提拔管理人员中保持优势，在关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决定权方面保持不变。即使官僚已经减少或完全取消了对国有企业的产出和投入数量的直接行政控制，它仍然能够通过正式的政府命令和非正式的要求，通过设置行政价格，通过企业对其上级机构的强烈资金依赖来控制他们。由此，国有企业还保持对各个官僚机构如生产管理部、外贸管理当局、物价控制办公室、金融当局和警察等等的强烈依赖。党组织也频繁地干预企业事务。虽然有了改革，但依赖强度没有变化。

在我们对私有部门的描述中，使用了“自发”或者“自然发展”的词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官僚体系的存续

① 后一概念首次出现在 Kalman Szabo、Tamas Nagy 和 Laszlo Antal 的著作中。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验的检验过程引起我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行政调节机制（可能包括直接或间接控制）被废除或者崩溃以后，可能出现真空。在某种情况下，例如无政府状态下，一种使人困惑的“无人乐土”现象可能在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的边缘发展起来。

② “官僚”这个词同样是非价值判断的，没有任何贬义。它表示等级组织对全社会经济事务的控制，不仅包括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而且包括政党和群众组织的职能机构。换言之，“官僚”代表了社会中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某个特定群体，“行政协调”则表示不同于其他协调机制，如：市场协调机制。虽然官僚和行政协调在概念上有区别，但这两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官僚使用行政协调方式来统治其权力控制对象。

也是制度自发和自然的发展。^①东欧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在改革中不是一定要尽可能多的官僚机构。相反,官僚机构甚至在试图减少它的情况下增长。苏联的改革将减少官僚机构规模作为目标,但是,实际经验使我们无法对抑制官僚机构的自然增长保持信心,即使采用激烈的方法也不能奏效。自我繁殖的官僚机构可以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观察,如果它在某个地方以某个特定的形式消失了,它将以另一种形式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

许多因素解释了官僚控制的持久恢复。一个是和官僚地位相联系的所有物质优势,即经济利益、特权和对短缺商品和服务的获得,更重要的是权力的吸引力。这里我们又涉及了政治的问题。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各自在经济中占有的作用,不是简单地在两种中性控制方式之间进行最有效的分工的问题。官僚体系统治着社会主义经济。允许市场真正地在经济中起作用意味着自愿牺牲一部分官僚权力。

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结果是官僚体系的自我再生产的特有制度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施加了一定的限制。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考虑对改革的支持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如果国家对私有经济活动更能够容忍,那么对改革的支持是广泛而坚实的。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里选择或者至少希望选择作为企业家或雇员到私营企业工作组成的所有居民。

另一方面,没有人是影响深远的国有部门权力下放的

^① 和以前一样,这里的术语“自然”不是像美国广告宣传的那样,是良好、健康、非人为的意思。文中的“自然”表示在没有政府支持,甚至有时在政策规划反对的情况下,从社会自身产生一种结果的现象。

绝对赢家。每一个与国有部门有关的人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既是赢家也是输家。官僚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可能通过他的上司得到更多的自治权，但是同时，可能对他的下属失去控制权。父爱主义的减弱和伴随而来的预算约束的硬化同时成为管理者和国有企业职工的优势和劣势。他们获得了自主权，但是同时失去了保护。虽然，人们一般不鼓励或者不关心保护别人，但他们通常希望自己得到保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对保护的这种矛盾情绪在关于自由贸易的复杂态度中体现得最充分。当自由贸易使得公司在外国市场中以最低的关税推销其产品时，自由贸易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当自由贸易使得外国竞争者进入这家公司的国内市场时它就很不受欢迎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仅仅是管理者而且每个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个人对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和保护都有这种矛盾的感情。虽然高税收不受人欢迎，但补贴——即使企业现在没有获得但将来可能获得——因此也不会遭到坚决的反对。短缺，对于作为购买方的公司很不方便，但对作为售卖方的公司却很适合。

这就产生了高层的官僚、经理以及工人都对竞争或者国有部门的市场化缺乏热情的现象。一些开明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更硬的预算约束和更少的父爱主义来改善经济绩效。然而，就公众来说，并没有罢工和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增加经济效率或者减少国家保护。

结果，国有企业的权力下放没有群众基础。因为一方面保持官僚地位有很强的诱惑，另一方面，对他们拥有的东西没有明确的反对，最后的结果是官僚协调持久地再产生出来。

五、社会组织形式的选择

讨论了私有部门和国有部门以及改良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和市场协调的作用以后，让我们从一个更一般的角度来研究主题。参看图 9。

当提及国有制“1”时，在我们头脑里出现的是官僚集权的国家所有制的经典形式，“2”表示私人所有制，A 和 B 分别表示行政和市场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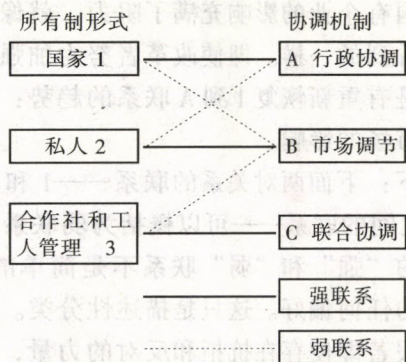


图 9 强联系和弱联系

所有制和协调机制之间存在两种强的联系：经典的、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由国有制和行政控制组成；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由私有制和市场控制组成。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可被看成历史上的标准模型。私有制下的经济单位在市场中既作为卖方又作为买方而从事经营时，它们受经济收益驱动并对成本和价格很敏感，这是非常自然的。同样地，国家控制下的经济单位是由使用行政工具的官僚

进行操作的。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改良社会主义经济中，私有部门，虽然一方面受制于市场，但也受制于官僚控制，用从2到A的线条表示。由于官僚控制和私有部门根本不一致，所以试图将官僚控制强加在私有部门上，不会也不可能顺利推行。

此外，还有通过市场去协调国有企业（从1到B的虚线）的断断续续的尝试。这是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中心思想。但是，事实的结果是不可能减少官僚机构的主导影响。市场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充满了阻力，就像我们在研究的前面部分看到的一样。即使改革者努力加强1和B之间的联系，还是有重新恢复1到A联系的趋势：行政协调渗入，排挤出市场的影响。

总结一下：下面两对关系的联系——1和B之间的联系，2和A之间的联系——可以概括为弱联系。

注解中的“强”和“弱”联系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也不表示我的任何偏好。这只是描述性分类。根据研究的一般思想，假若即使存在抗拒和反对的力量，它们仍然自发地出现并占主导地位，那么这样的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的联系就是强的。这是基于特定所有制形式和特定协调机制各自对应的自然联系和关联而得出的结论。形容词“弱”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并且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抗更强的联系的影响。不管改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喜欢与否，弱联系总是被强联系一次又一次

地排挤。^① 如果是社会组织的其他形式，情形又如何呢？首先，让我们看看所有制问题。图9中的第三栏表示合作社和工人管理，我们必须强调非私有，但是也要强调社会所有制的非官僚特征，像在真正的公民或工人管理的例子中发现的一样。^② 合作社社会主义的思想长期以来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于协调机制C，所谓的联合协调机制是一组潜在机制的集合名称。既不通过行政也不通过市场，而是基于自治、自由联合、互利互助、利他主义或相互自愿调节基础上的协调机制，从反面来定义可能更容易一些。社会主义论著中充满这样的建议：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建立在合作制、非市场、非官僚的联合协调的基础上。在提出这样的传统思想时，马克思恰巧碰上了“乌托邦”这个贬义词。这种思想的早期代表是普鲁东（Prouden）、傅立叶（Fourier）（一定程度上）、欧文（Owen）和其他人。

那些文献常常没有将合作社和自治的财产形式（3）与联合机制（C）进行搭配。一些作者把重点放在3，另一些则放在C，有时候，也有人把两者放在一起。这种思

① 值得注意的是1、2、A和B之间还有其他很多组合。例如，如果经济中私有部门强大而且稳定，2和B的联系就成为主要的一种，经济中的某一部分可以成功地成为1和B的联系。换句话说，在一个根本就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国有部门可以被调整以适应市场规则。

② 根据目前的论述中使用的概念，苏联的私有经济合作制不能被看成真正的合作。它们属于所有制形式2而不是形式3。

想常常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讨论中。^① 南斯拉夫的经历是试图使社会主义既不完全依靠国家也不完全依靠私有制，既不依靠官僚也不完全依靠市场，也就是说，保持 3 + C 的联系。虽然南斯拉夫的试验是很不完备的，但是，这个经历没有导致最终的结果。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政治领导人强迫进行转型。虽然开始的时候，上层发起的运动受到至少部分群众的热情支持，但是，接下来的制度化和强制推进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与中央政党路线的任何偏离。因此事实上，南斯拉夫的主要形式有些类似所有制形式 3 的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对这些形式的真正力量得出任何结论。

相反，让我们运用前面的标准，看看合作社和联合协调是否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过程中是自发的、自然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因为真正的自愿合作、自愿调节和其他联合协调形式的建立在这些国家中是不被禁止的。制度对小型合作的容忍远甚于私有经济行为。利他主义和非商业互惠在任何制度都是合法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3 和 C 的形式存在而且甚至在官僚集权的塔尖存在，这些形式没有在命令体制废除后得到很大的发展。当其他形式允许与国有制并存时，只有私有制很快生根。虽然废除直接官僚控制留下了短时间

^① 当然，合作制不仅可以和协调机制 C 联系，也可以和市场调节联系。例如，南斯拉夫经历过所有制形式 3（自治）和调节机制 B 和 C 共同联系（市场和联合协调）的过程。经济的一部分是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同时，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代表之间安排了所谓的“社会契约”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些契约设想用来在两者之间进行自愿调节。虽然官方政策选择强调机制 B 和 C，事实上，行政协调机制 A 一直都很普遍，而且是潜在的主导力量。

的真空，但是，这个真空已经主要被间接官僚控制和市场协调形式填补了。合作社和联合协调最多只起到了辅助的作用。^①

总结我们关于社会组织形式强弱的一般结论。所有制形式 1 和 2 是很强的，而 3 没有什么拥护者。同样，协调形式 A 和 B 广泛适用，而 C 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运行。与 1 和 A、2 和 B 之间的强联系相比，从所有制 1、2、3 到协调机制 A、B、C 的所有其他联系都是弱的（图 9 用虚线只表示了四种潜在弱关联。当然，还有其他的形式存在）。

关于这些所有制形式的强弱程度、协调机制的强弱程度以及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联系的强弱程度的假设，其有效性是一个实证的问题。正如导论所指出的，本项研究没有提供实证证据。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上述一般结论的有效性可以被检验。根据已有文献中的或未来展开的实证研究报告，我们可以接受、修正或者摒弃这些假设。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可实证的假设检验的有效性都必须严格地与对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的政治和道德偏好的规范问题分开。

必须承认，关于一些形式和联系的强弱观点是对一小段时间中的一个小样本进行观察而得来的。也许二三十年后，研究人员可能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停止了，历史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历史总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只要经验没

^① 在许多带有某种政治思想，如政府活动的行政性分权、地方政府作用的增强、参与式民主和自治以及各种形式的合作思想，等等的论著中，所有制形式 3 和协调机制 C 对上述方面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记住这些关于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强弱程度是值得的。

完全能够理解各种社会团体和知识潮流鼓吹财产形式 3 和协调 C 以及他们之间各种关联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那些提出这种建议的人不抱错误的希望，不试图取消非国有和非私有制以及非行政和市场协调的主导地位，那么这种努力是会具有有益的效果的。隐藏这些形式最多只能对强形式起辅助作用的观察结果，且是不诚实的。

对规范的含义

没有任何对第三种形式所有制和第三种协调机制的研究能使人们逃避真正抉择。因此，我们的确必须决定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相对重要性。和这两者紧密联系的是对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这两种协调机制的相对重要性的选择。

这里需要一个防止误解的说明。在讨论改革思想时经常可以看到，对某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证（描述）分析产生的批评性命题会得出一个规范性的偏差。这个规范性偏差的逻辑结构是：“如果你说现象 A 有负作用，那么这就暗含了一个价值判断和一个规定的建议：消灭了现象 A 就消灭了负作用，因此现象 A 必须消灭。”这种思路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即使假设可以证明 A 是有负作用，也不应认为：（1）在给定的条件下消灭现象 A 是完全可行的；（2）消灭现象 A 是消灭其负作用的充分条件。

现在我们又回到本研究的主题上。我希望避免我的实证分析中有规范性偏差。关于国家和私人所有制都是有活力的形式，其中之一或者和行政协调或者和市场协调有强

联系的实证（描述性）表述，并不意味着对这些形式采取某种清晰的经济政策立场。这些实证描述并不意味着改革社会主义必须要放弃国有制而转向私有制，或者相反——放弃私有制、建立国有制的主导地位。本研究也不意味着我们面对一个在相互排斥的形式之间进行“不是……，就是……”类型的选择：不是国有制加行政协调，就是私有制加市场调节。但是，本研究体现的思想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推论：

1. 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可以在同一个社会里共存。但是，在改良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共生状态，其中充满了功能不良的特征。

2. 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在实际中的地位，相应地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的相对强度取决于那些采取相应立场的人的价值体系（可能是一个人、一个运动、一个政党或者一个社团）。一个人对于国有制或私有制的态度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经济或者效率考虑上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的以及感情上的吸引或厌恶都会强烈地影响选择。

本研究不对这些价值判断作出评价，也不对支持可能选择的政治和道德标准进行评价。^① 本文只试图做以下的工作：在关于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各种强弱联系的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提出条件性的预测。

本研究是提请人们注意：我们不要有幻想和错误的希

^① 我在1990年的书中已经陈述过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我强调过私有部门份额持续增长的必要性。本研究仍然是正面分析为主。

望。一旦一个国家的国家所有制占了大部分比例，这个国家是处在“一篮子安排”里的，这个篮子里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大量的行政协调。另一项必须提请注意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真正希望市场协调的比例更大，并且持续增长，这个国家必须接受更大比例的私有制。希望的协调机制（例如，市场）如果没有相应的所有制（例如，私有制）的巨大支持，它是不会出现的。同样地，一个国家不能在没有相应的协调机制（例如，行政协调）下，得到希望的所有制形式（例如，公有制）。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改革与社会经济变化的实际政治问题。

3. 那些真正希望市场起更大作用的国家，必须允许私有活动有更大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空间，使得自由进入或退出、竞争、个人的企业家行为和私有财产有更大的空间。只有私有部门的大量扩张，才能为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创造有利的环境。向这个方向的运动——即向私有部门扩张的方向的运动——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支撑。没有这样的运动，分权和市场协调的改革口号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杨再平等 译）

参考文献

Afanas'ev, Iuri N., ed. 1988. Inogo ue dano (There Is No Other Way). Moscow: Progress.

Antal, László, Nokros, Lajos, Csillag, István, Lengyel, László, and Matolcsy, György. 1987 "Change and Reform". Acta Oeconomica 38(3-4): 187-213.

Burkett, John P. 1989. "The Yugoslav Economy and Market

Socialism."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Models and Cases*, edited by M. Bornstein. Homewood, IL and Boston, Mass.: Irwin, pp. 234 - 258.

Dallago, Bruno. 1989.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the West and Eas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Models and Cases*, edited by M. Bornstein. Homewood, IL and Boston, Mass.: Irwin, pp. 463 - 484.

Davis, Christopher M. 1988. "The Second Economy in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Models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Berkeley - 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USSR, no. 12, July.

Gábor, István R. 1985. "The Major Domains of the Second Economy." In *Labour Market and Second Economy in Hungary*, edited by P. Galasi and Gy. Szirúczy. Frankfurt and New York: Campus, pp. 133 - 178.

Grossman, Gregory. 1977. "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26(5): 25 - 40.

Hewett, Ed. A. 1988.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ersus Efficienc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Kornai, János. 1986.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4): 1687 - 1737.

Kornai, János. [1989]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W. W. Norton.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nin, Vladimir Ilych. [1920] 1966. Left - 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Perkins, Dwight Heald. 1988. "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2): 601 - 645.

Pomorski, Stanislaw. 1988. "Privatiz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 under Gorbachev I: Notes on the 1986 Law on Individual Enterprise." *Berkeley - Duke Occasional Papers on the Soviet Economy in the USSR*, no. 13. October.

Schroeder, Gertrude E. 1987. "Anatomy of Gorbachev's Economic Reform." *Soviet Economy* 3(3): 219 - 241.

Shmelev, Nikolai. 1987. "Avansy I Dolgi" (Credits and Debts). *Novyi Mir* June, 6: 142 - 158.

Tamás, Gáspár Miklós. "A Kornai - bomba" (The Kornai bomb). *Heti Világgazdaság* November 11, 11(45): 66.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 部门改革：规范方法

一、福利部门现状^①

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已开始着手改革福利部门，或至少已开始讨论应如何进行改革^②，在任何地方改变的进程都是困难重重。在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健康医疗改革成

① 许多人对本研究的早期版本（科尔奈，1996）提出了意见。1996年11月国家科学院在华盛顿召开的大会讨论了本研究的另一个版本，我要向丹尼尔·贝尔、皮特·戴蒙得、罗伯特·多夫曼、阿马蒂亚·森以及华盛顿会议的参加者和两位匿名的参考文献作者所提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我还要向布莱恩·麦克里恩对本文的翻译表示感谢。本研究是在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OTKA）的支持下完成的。

② 这里我不把福利部门作为概念进行定义。我可以通过列举它的一些主要组成部分来对它进行描述：养老金制度，健康医疗，对儿童的供应，对无人照顾的病人、老人的照顾，及出于各种原因发放的救济金。也有一些界限模糊的活动和组织，有些人将之纳入福利部门，有些人将之省略，如公共教育、政府对满足基本需要的商品和劳务提供的补助、公用住房等等。我对福利部门的解释显然是广义而全面的，因此它可以被划分为几个小部分（美国日常生活和政治中使用的“福利”一词只含有国家对某些有需要的特定人群的支付这重狭义含义）。“福利国家”负责对福利部门的许多部分进行管理和融资。除其他问题外，本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上述哪些活动和机构应由国家负责。

为政治上的失败，而保守派试图大幅削减福利支出的努力也变成了糟糕的政治行为之一。在德国和奥地利，福利支出预算中几个百分点的温和削减遭到来自立法机关内外的强烈抵制。而法国的一项类似的努力则引起了一场持续数周的罢工，致使首都陷于瘫痪。

如果在富裕的发达国家这一进程都如此艰难，那么在改革条件远远不利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什么呢？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部门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别，但它们也有某些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在制度变革之后的社会中也有体现。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曾从立法上许诺提供全面的福利。^①任何公民或雇员都有权享受这些在完全实施时或多或少都与公民权利重合的福利措施。政府的承诺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及工人的政府养老金。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福利措施，如对满足基本需要（如食品和住房）的高额物价补贴，几乎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和课后中心等。非政府性的福利措施是不被允许的。

公众对于福利部门的状况有着矛盾立场。人们认为政府的极端家长作风及相应的物质保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种照顾是满足人人基本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保证。而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许多福利措施的水平太低了。医疗是免费的，但医院的设施和提供的药品却很糟糕。住房很便宜不会有无家可归的现象，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两点几平方米。许多人只好居住在拥挤的工人公寓或多人“公用”的公寓，而许多建筑也处于报废状态。每名工人都有权领取

① 欧洲之外的共产党国家的福利制度，尤其是中国，和上述国家的类型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只讨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后社会主义转轨情形。

政府养老金，但这笔补助使得许多领取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福利的广泛享有权使人们拥有过高的期望，他们感到共产党国家没能信守诺言保证真正的福利。

1989—1991年的激进改革给福利部门带来了什么？这一地区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却带有某些重要的共同特点，这是值得强调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产出、家庭收入和消费出现大幅滑坡。本已不多的货币转移支付（养老金、抚恤金等）的购买力也呈现出令人心痛的下降。各种福利服务（如医疗）水平因资金不足而进一步恶化。许多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跌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贫困线之下。多数已经为严重的财政赤字所扰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陷入，或显然将要陷入财政危机。这意味着它们将无法履行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政府承诺。

在后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视为理所应当的安全感被动摇了。充分就业甚至劳动力短缺突然让位于大面积的持续失业。^① 改革福利国家的讨论拉开了帷幕。公众面临着丧失原先权利的前景，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希望改变制度。他们希望能够在新的制度下，在一个高得多的水平上实

① 许多作者把和失业相关的福利功能（失业保险和救济、再培训等等）作为福利部门的一部分。其他人则偏向在劳动市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背景下讨论这一题目。这取决于福利部门的任务是定义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上，还是延伸到了工人的问题上。在这里我不想对和定义有关的问题，包括对“福利部门”的定义作任何评论。然而，我必须警告读者本研究不讨论和失业有关的福利问题。任何对福利措施、政府角色和失业问题之间关系的彻底研究都需要对宏观问题，即投资和增长进行仔细的分析。显然那将超出论文篇幅的限制。

现福利。政府的承诺，由其产生的预期和最终的实现之间的差距引起了持久的压力。

随着政治、经济制度和立法体系的改革，后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大踏步的进步。福利部门却是整个改革进程中进步最小的部门。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变革。虽然在其他的政治、经济领域政府职能受到相当大的削弱和改变，在福利部门它仍然和以前一样强大，没有为私人部门或自由选择留下充分的空间。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众人皆知的特点得以在福利部门保留下来。命令经济仍然存在，与之伴随的还有中央集权、“配额”和官僚主义的协调。人们只能看到些微的市场机制。市场几乎从不发挥作用。这里盛行的短缺经济显示的常见的症状：强制性替代、排队和等候，利用私人关系或行贿方式避免官僚程序等。在国有和半国有、半公司制的福利部门中盛行的官僚作风，出于害怕其权力的削弱，强烈抵制着所有导向分权化、竞争和市场的改革措施。

改革的艰难不仅仅因为它对人们的生活会发生显著的影响。由于缺乏指引，改革往往还易偏离轨道。当要建立股票市场时，纽约、苏黎世和法兰克福股票市场的经验可供借鉴。当起草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中央银行法令时，英格兰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能够提供模式。类似的话语也适用于高等法院的职能或公司治理的规则。但谁能教给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管理一个有效的福利国家呢？没有国家能够充当榜样。毫无例外地，任何福利国家，无论是最发达的或中等收入国家，都运作得十分混乱，面临着眼前的或未来的危机。后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自己承担起设计自身需要的福利部门的重担。

二、研究目的

争论陷于一片混乱。在许多层面都发生了争论：政治家之间，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财政部的官僚和那些控制监管福利部门的官僚之间，对立的压力集团之间，以及学术界的不同流派之间。那些试图提出改革建议的人很难找到正确途径。

这部分地解释了已实施的改革计划为何缺乏原则基础。有时人们能提出一项计划背后的道理。而另一些计划则反映了截然相反的原则之间的妥协，或还没有被想清楚。

本研究试图澄清福利部门改革所应依赖的原则。它并不描述现有状况下的正确研究，它旨在为这一问题提供完全规范的解决方法。

众多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其福利部门现状和实施改革的条件方面存在差异。然而，其出发点却显示出足够的共性，使得制定适用于所有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原则成为可能。即使那些开展改革的国家对于这儿将要阐释的原则表示赞同，各国在实施细节、进展速度和使用方式等问题上当然还会存在差别。

本研究一共提出九条原则。^① 首先，第三部分提出了和基本价值观有关的原则。第四部分讨论改革后的福利部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部门改革：规范方法

① 为什么是九条呢？我不认为这套原则体现了某种完整性，也许某些原则可以省略，而另一些原则也可以加入。文字可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即使讨论只限于那些或多或少赞成研究中立场的人们，他们至少在整体世界观上赞同我的观点。作者显然对只找出九条原则表示宽慰，因为这避免了一切“十诫”一类的暗示。

门的机构应具有的理想特点。第五部分探讨了福利部门理想的分配比例。

也许从假设、辅助假设及从中得出的结论出发进行更严格、清楚的探讨要更好些。这将表明，原则不只是一条一条地列出，它们之间有着某种逻辑联系，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很遗憾我无法这样做。我采用了低一些的抽象，探讨也没有那么严格。然而我希望，即使是这些“中等程度”的抽象和不那么精确的讨论方式也能为通常的谦逊的改革建议提供一些参考。也许它至少有助于将争论从某些建议的细节转移至原则问题。中等程度的总结对于研究的目标之一也许就足够了，这一目标是为改革中分别处理的部分提供共同的原则基础：养老金改革、医疗改革、抚恤救济金改革，等等。不仅仅是出于篇幅的原因，本研究无法对这些改革的细节提出具体建议。为了解释原则，文中只参考了少数这样的建议。^①

本研究表述原则时采取了祈使句。这些号召是针对“改革者”发出的。改革者可以是政治家、官员、专家顾问、工会干部或学者。每条原则都是警句——当提议改革时都应该铭记的。本研究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信条——它和我的建议基于一整套价值观相吻合，鉴于将要阐述的原则是在我选择的价值体系基础上作出的，从而是主观的，我有理由在本研究中数处以第一人称表述观点。

① 本研究是作者领导的一项全面研究项目的成果，参加者仔细考察了匈牙利福利部门的状况、国际经验以及匈牙利国内外的改革争论。成员们也将提出改革的实施建议。在确定好原则的基础性工作之后，将对具体的再分配部门（养老金、医疗、抚恤救济等）提出实施建议。

三、伦理学假设

虽然我是一名经济学家，却不想从经济原则出发。我不属于那些人——他们提倡进行福利部门的改革主要是因为无法对其成本进行融资，而在将来也许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后面我将提及经济原则，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改革的基础。

在这里我要提出改革者们应该遵循的两条原则。^① 在改革中发展起来的机构和分配比例必须符合这些道德要求。

原则 1 (个人权力): 被提倡的改革必须增加个人在福利事务中决策的范围，减少政府的决策范围。

我认为，共产主义制度遗留下的福利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太大范围的资源被掌握在政府、政治程序和官僚机构手中，而不是个人手中。这违反了诸如个人自主、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的基本人权。^② 当随着税收融资的下降，预算中福利支出也下降时，公民不只是在收回某种权力。更确切地说，他们正在重新获得自我支配的权利。

① 我试图提出“最简炼”的解决方法，换言之，我想提出最低的要求，只要能满足作为福利改革的伦理学起点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可。

② 不少作者都曾阐释过个人自由。以赛亚·柏林 (Isaiah Berlin 1969) 的研究对区分正负自由尤为重要。个人的负自由受到一个过分活跃、比例失调和家式福利国家的威胁。社会应当朝着保护、巩固个人负自由但同时又加强其正自由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1990) 认为个人自由是社会的责任。见森 (1996)。

原则 1 不仅包括个人的决策权，同时还要求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他们必然摒弃由家长式政府替他们考虑的习惯（并且在这一解毒治疗中接受改革者的帮助）。在这之后，他们有更多的权利可供选择，但他们也必须对其选择负责，承担错误选择的后果。本研究准备参加的会议在美国举行，在那里这点要求是微不足道的，所有的公民从一出生便知道要遵守。然而，对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成长的几代人而言接受的是相反的灌输：执政党和政府对一切负责，个人必须接受他们的决策，并觉得自己受到了良好的照顾。因此当人们遇到问题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解决，而是寻求政府的帮助。政府总在那儿，因此他们无须为将来的不确定性操心。^① 福利国家的改革应该在首先确立个人自主和责任感的新的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从原则 1 还能得出，虽然没有现实社会能在缺少政府强制的情况下运作，但最好还是最小化这一干预，提倡自愿行为。家长制总是把“强制的幸福”加到人们头上。相反，应该允许人们自我发展。

原则 2（团结）：帮助受苦的人、有困难的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团结性原则说明，除了个人或团体的慈善事业外，社会应当通过国家再分配体系帮助那些受苦的人、有困难的

^① 作者在匈牙利发起的一项典型调查曾试图衡量公众对改革福利部门的态度。（见 Csontos、Kornai 和 Tóth…，1996）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如何为老年作准备？”51% 的回答者说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一问题。可见应该建立与原则 1 相符的制度，引导人们自己对其未来负责。

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能作为国家帮助的接受者的标准。我们只需说明，需要社会帮助的人比起整个社会要少得多。^①

实行团结原则要求有确定的国家帮助目标，而不是全面的享有资格——后者指作为公民权利对所有人给予的国家利益，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需要的人还是自足的人。原则 2 并不排除通过立法进行政府全面承诺的可能性，并非必须如此。对全体公民和雇员权利的承诺和道德要求并不冲突，但和经济现实冲突。后面在原则 8 和原则 9 下将更仔细地探讨这一问题。^② 原则 2 与试图使中产阶级变为税收政策和再分配的主要受益人的政治宣传相抵触。^③ 从定义上看，中产阶级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阶级。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再分配过程主要在中产阶级内部进行。在所有其他已经强劲发展起普遍享受资格的国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类似现象。真正需要救助的人从未上升至中产阶级，或者已经掉到这一水平之下。^④ 这些人才是根据原则 2 应当

① 社会救助和其他再分配方法见 Adorka、Kondratas 和 Tóth (1994)，Atkinson 和 Micklewright (1992)，Milanovic (1996) 和 Sipos (1994)。

② 美国读者将会对 1996 年调整计划实施前匈牙利的一个例子感兴趣。一名工作了两年或两年以上的母亲若在家抚养孩子，可以在两年内拿到相当于她从前工资 75% 的津贴，另外还能拿一年的另一种统一津贴。这些津贴所有的人都有权享受，即使是那些孩子出生前工资已相对较高的妇女或丈夫收入较高的妇女。1996 年的调整计划首次将这种普遍的权利改成对急需帮助的母亲的有目标的政府救助。

③ 美国政坛关于税收和再分配的争论中常带有这一特色的要求。

④ 东欧进行的争论中常听到这样的警告，以前的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们的财务状况已经在很快地恶化。团结性原则可用来支持采取行动防止恶化。但它不应采取救助金的形式，而是某种加强适应性的支持：职业再培训、工作和家庭的变更，这些都应按照新的就业结构的要求进行。

最先得到帮助的人。

原则 2 背后有一条重要要求，即社会的每一成员至少应当能够自己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应该对每个人免费或以某种优惠利益的形式提供基本物资。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这些物资。团结性原则只适用于那些连最基本的需要也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得以满足的人。

根据原则 2，人们应当考虑到将来的不确定性。虽然现在一个人也许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人，但将来他也许会成为需要依赖的人。但按照原则 1，个人必须为这些不确定性作起码的准备，如通过储蓄、建立准备金或自愿购买商业性私人保单等。只有当个人遇到了他们无法通过上述措施进行预防的问题时，才有资格享受在团结性基础上提供的政府救助。^②

原则 2 还包含了代际之间的团结，将生活的乐趣与烦恼在代际间进行合理分配。现在的这一代人必须和将来的各代人团结一致。道德规范不允许人们只享受今天的好生活，而将沉重的负担和在未来引爆的经济定时炸弹留给后代。^③

原则 2 还意味着每一公民都必须被赋予成功地实现自

① 这里我们不讨论如何确切定义“基本需要”，它应当包含何种食物，何种住房或何种医疗。不参考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无法确定这些。

② 由于将商业性的分散风险的保险和利他基础上的救助混淆起来已造成不少混乱。当两者混合被定义为“社会保险”时就更为令人迷惑了。

③ 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都有的养老金债务，将来它将达到一个无法承受的规模。例如，1994 年匈牙利的养老金债务已相当于 GDP 的 263%（见世界银行，1995a 第 36 页和 1995b 第 127 页）。

我的机会。这也是赞成政府支持公共教育的论据之一。^①对于那些不经政府救助就无法享有这一基本权利的公民我们必须团结。团结的标准也代表了“肯定性行动”，即向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积极救助，以确保其基本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它不代表任何以抹平人们之间巨大差异为目标的粗野而虚伪的努力。

原则 2 必须和原则 1 共同实施。大多数人认为“救济品”有损尊严。应该通过提供工作机会和从事有意义活动的方式对穷人进行帮助。当决定以何种形式和程度进行救助时，还要充分考虑申请人自救和适应形势的能力。

当要求实行强制性最低保险时也必须将原则 1 和原则 2 同时加以考虑。我赞成通过立法要求所有公民购买最低养老金和健康保险。然而，可以让分散的保险组织持有这些保单。这一点限制了原则 1 的运用，因为自愿行为让位于立法要求。然而这样做并不带有家长制意图，这并非将“强制的幸福”加到人们头上。这样做的动机是集体的自我利益，而非利他主义。我们知道，人道主义社会认为照顾无法得到诊治的病人或无收入的老人是其应尽的义务。这些人应当可以通过纳税人的支出受到资助。为了避免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外部效应，立法应该要求所有公民获得最低限度的保险保障。原则 2——团结性，社会的集体利他主义——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无力支付强制性保险的人而制定的。建议方案和现实制度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要么实行最低强制保险，同时允许自愿参保更高数额并通过再

① 另一有力论据是除了对个人的作用外公共教育还有巨大的外部效用。

分配方式救助穷人；要么实行全体享有资格，只通过家长制的政府再分配渠道承担所有保险事务。我认为前一种方式在原则 1 和原则 2 之间达成了一种更为健康和有效的妥协。

在结束有关伦理学起点的讨论之前，另一点评论也许是恰当的。本研究的论证过程并不发端于自由、平等、幸福、物质福利或社会公正的终极观念。终极观念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以一个“良好”社会的伦理基础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理论所关心的问题。^① 本论文并非为分析这些深层次问题而作。我希望原则 1 和原则 2 能为有着不同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观念的人提供一个可接受的广泛的平台，它们只确认了“中等程度”的伦理要求，而不是终极观念。

四、理想组织和协调机制的特点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改革原则。改革进程消除或改变了旧的组织、协调机制和游戏规则，建立起新的替代物。原则 3 至原则 7 说明了它们应该具备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原则直接从原则 1 和原则 2 得来，但还是需要其他内容来描述这些特点。

^① 有关这一题目的众多文献中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有：Berlin (1969), Buchanan (1986), Nozick (1974), Rawls (1971), Sen (1973, 1992)。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现代福利国家哲学流派的争论可以参考 Culpitt (1992)。尽管 Culpitt 偏向保持现状，他的研究对于主要的正、反意见都给予了适当评论。

原则3（竞争）：国家所有和国家的控制几乎完全垄断的局面必须停止。必须促进不同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的竞争。

原则3并未指定数量比例。它并未明确指出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各自应当占有的份额。但无论如何，非国有部门应当达到相当之众，从而结束国有部门独家垄断的局面及终止生产者（福利国家）对消费者的独裁。虽然有关效率的考虑也是赞成竞争的原因之一（见原则4），但此处得出原则3的主要来源是原则1。必须有竞争使得公民能作选择。如果他们不喜欢国有机构提供的服务，他们应当可以去非国有部门寻找。

让福利部门的共产主义继续生存会带来严重后果，它使得公民在许多领域毫无预防，虽然现在决策不由政治局作出而是来自分散的“政府部门”。哪些资源将分配于医疗，老年人将得到多少收入，这些将取决于那些相互争吵的政党为争取民心而对对手所作的妥协，或游说团体的相对力量和私下达成协议的官僚派系。原则3试图让与这些事务直接相关的人们自己有更多的决定权。至少让他们对这笔支出的相当部分能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他们希望为健康或其家庭花费多少，他们希望如何防老，等等。如果某些福利资源不再通过官僚机制由政府税收融资和政府分配，而是由家庭和个人通过市场机制决定的话，这些是可以实现的。

原则3试图将福利部门的每块部分都朝追求利润的民间企业开放。出现大量非国有医院、诊所、健康检验实验室、幼儿园、养老院等等将是十分有益的，可通过建立新组织或民间组织的形式使之实现。应当鼓励商业保险公司

将业务扩展到养老金计划和医疗保险。

除了完全国有和完全逐利的私营提供者外，还可以大量建立非国有和非盈利性组织，它们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可以是社会团体、基金会、教堂、行业协会、大型雇主、小型雇主合伙组织等。原则 2（团结）的职能可以由政府、福利部门的非盈利部分和私营慈善活动共同实现。

那些坚持完全国有化福利部门的人认为，公众需要保障，而政府也必须提供保障。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论证。有关不确定性和常识的众多复杂文献都提出了一条简单原则：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用投资组合的术语来讲，我们应该多样化。例如，将一个人所有的退休储蓄都委托给一家私营养老金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如果它有意诈骗或经营不善，被保险人就会有很大麻烦。完全依靠国家也有类似问题。当一个人退休时，当时的政治当局也许决定不再考虑他过去曾缴纳的养老金。^① 或者，养老金已为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或损害真实价值的指数化措施所侵蚀。因此最为合适的养老金改革建议是那些建立在多支柱上、允许不同养老金计划同时使用的方案。^② 医疗服务和福利部门的其他部分也需要类似的“多支柱”解决方法。

① 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情况便是如此，“现收现付”制度和养老金规则的反复变动及平均化养老金的倾向，已经使实际养老金和养老金领取者在就业阶段缴纳的保费之间只有松散联系。

② 世界银行报告《避免老年危机》（1994）是一篇出色的报告，并有许多详细提议。捷克政府和匈牙利财政部最近制订的提案也是在“多支柱”基础上作出的。有关世界银行报告的评论参见 Beattie 和 McGillivray（1995）及报告主要作者 James（1996）。Diamond（1996）也对世界银行建议作了分析和批评。

公众对于应当采用哪些支柱或支柱的组合意见十分分散。匈牙利公众意见调查的结论也显示出意见的广泛性。然而现在的危险是，建立在多数原则基础上的议会程序会使改革出现一种所有制形式和/或一种控制形式占主导。例如，会出现保持现状，即国有制占主导的情况，或与其相对的迅速、激进的完全私有化。在我看来，原则1意味着不应当强迫公众接受任一特定方案。只要可能就让公众自己选择。应当列出一张可供公众选择的“菜单”，列出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协调机制。公众应该能够学习自身或他人的经验，能够试验，并修正其意见。这是福利部门需要竞争的又一原因。在竞争条件下，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充满摩擦的政治传导过程也能通过家庭的市场选择来作出选择。

原则4（激励）：必须建立提高效率的所有制和控制形式。

这条原则是如此不言而喻简直无需论证。将它列入仅仅是因为那些支持在福利部门保持现状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常常忘记这一条。对作为福利服务接受者的需求方的公民也应给予促进效率提高的鼓励（此处和以前的作法有根本区别）。这意味着除了极少数情况外，福利服务不应是免费的。和用政府补贴迫使价格下降到市场水平之下不同，应该建立政府救济（例如救济券）帮助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①（这一般是指那些依照团结原则需要帮助的人）。

^① 目前正针对福利救济券的优缺点进行争论。参见 Culpitt (1992) 的报告。

即使国家或保险人承担了福利服务的大部分成本，接受者仍应缴纳一部分，这样他们会觉得服务不是免费的。

对需求方的合适激励包括大幅度提高保险人为福利服务融资的效率。这也是反对中央政府健康保险和养老金部门这样可怕的“累赘”进行垄断的论据之一。假如没有竞争，也就不会有对效率和节约的充分鼓励。

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供给方，即提供健康、教育和其他服务，以及照顾老人和儿童的组织。评论原则3时，我引用了个人自主作为支持竞争的论据。真希望没有人的命运会只由一个垄断组织决定。竞争在其他方面也十分有益，它能促进平等的改善、技术进步、发现和推广新的科技成果并降低成本。^①

有关激励和效率要考虑的另一方面，是积累和使用“福利储备”的最便利的形式。要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养老金制度和其他福利服务都是在国有的“现收现付”原则上进行的。家庭并不需要为安全目的进行储蓄。相反，他们必须纳税来为福利服务和为所有的投资进行融资。高度集中将导致低效率，这并非只在福利服务中见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投资项目的选择和实施。

另一种情况则刚好相反，储备的积累完全由家庭完

① 我知道盈利性和非盈利性非国有制保险人及服务提供者都会牺牲接受者（需要救助的病人、老人和儿童）利益来降低成本。然而，国有制和国家控制的部门中也会出现类似情况，除非国有部门中资金过于充裕。以牺牲福利接受者的利益来解决相对于储蓄而无限增长的成本问题，一直是福利部门最严重的困境之一。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而且仅是试一下也将需要另作一番研究。

成。每个家庭都将储备投入一个由几部分组成的组合，将一些存到银行和共同基金，一些用来支付保险公司的保费和养老金保费等等。金融部门，即信用和资本市场，将把这笔巨额储蓄以分散形式用于投资。

这两种情况显示了完全集权和完全分散的资本配置机制。虽然分散机制有许多优点，但我们仍有理由认为某些公共投资仍需通过税收融资（如，投资于基础设施或其他公共物品）^①。然而，通过历史性的比较制度分析所得出的总结性论断：允许进行分散投资且竞争占主导的制度比中央集权和国有制盛行的制度更有效率。如果为防备疾病、失业、意外事故和年老而专门拨出的储蓄占据了总储蓄的一个重大比例，那么将之简单移交给官僚机构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这笔巨额储蓄的大部分必须以一种分散方式加以利用。因此，如果按照这一思路结束对原则4激励效率的论证，那么我们便又得到了对原则3扩大竞争和非国有机构的进一步有力论据。

原则5（政府的新角色）：福利部门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立法框架，监管非政府机构和提供最后手段的保险及救助。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基本的教育和医疗。

论证政府作用该大还是该小，该在福利部门中保留还是该从中撤出是十分无效的。关键是要对政府角色作出激进的改变。让我们对已改革的福利部门中政府的职能作

① 经济学文献中有许多具体讨论支持政府选择和对投资进行融资和/或实施。

一下简单介绍：通过制定和实施必须的新法律，政府负责监督福利部门运作的合法性。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应当有权通过法庭针对政府及其机构、保险人、医院、医生、敬老院或其他机构的侵权行为作出法律补偿。

1. 政府必须建立合适的机构来对福利部门及其众多分支部门（医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实行政府规制。这一功能也必须由申诉人和用户协会、媒体及“文明社会”的监管职能所补充。

2. 政府应该保证公民委托给保险机构或养老基金的储蓄的安全。^①

3. 如前所述，非政府组织最好也能起到实现团结原则的作用。然而，政府也不能逃避其责任。我不同意某些人的说法，认为应当把它隐藏于其他公共支出之中，因此选民不会注意。^②应当公开宣布政府救助来自纳税人的税收收入，并支付给了那些最需要的人。

4. 宣布政府负责基本教育和健康医疗后，如何实施和通过何种机构实施却还是个问题。这一责任中既未包括任何要求也未消除政府所有或控制的机构参与提供服务或政府预算应当作为其融资来源的可能性。

从目前为止所讲的内容中可以明显看到，本研究并不提倡自由放任经济。它并不寻求解脱政府对福利部门的责

① 可能可以建立某种非国有或准国有机构，为公民的保险投资提供充分保护，防止某一特定保险人的失败风险。万一再保险人也无法弥补损失，那么国家如能提供最后担保也就够了。“最终保险人”的职能仍然会带来财政负担，但和提供全部的保险相比已经轻多了。

② 大多数人都和大家保持团结的思想。已数次提及的匈牙利意见调查（1996）表明许多无子女的答卷人也愿意为支持高等教育而纳税。

任，即使大部分工作要由民间公司或各种团体组织的非盈利组织完成，并且主要通过市场协调，通过竞争来促进。必须在国家的成文规定、政府和“市民社会”的监管下进行这些工作。政府在必要时也必须贡献其经济资源。

经济学家已经清楚地解释过“市场失灵”的各种情形。如果公众通过政治渠道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如他们希望养老保险中的多大比例来自政府养老金体系，哪些医院应保持国有等等，而且他们也乐意通过税收来为之进行融资，那么他们的愿望应得到尊重。第二个条件（支付相关税负的乐意程度）将讨论引向了下一条原则。^①

有关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部门改革的争论集中在原则3和原则5上。就像许多公共讨论所显示的，有关意见十分分散，但在这些意见中却已出现了一种趋势。这一点和本研究在其他几个重要方面所采取的立场截然不同。这种意见最根本的愿望是要保留1989—1990年政治制度变更前政府的作用和机构。养老金制度应当沿袭过去在“现收现付”基础上运作的集中式政府养老金计划。国有制医疗机构继续保持几乎垄断的形势，将由政府出资提供医疗，等等。对于这一观点有两条支持论据。一条有伦理政治性质，市场没能顾及社会中贫穷的那部分人，政府供应成为惟一有效和人道主义的选择。另一条是经济上的原因。如果无需支付竞争成本，也无需为非国有所有者支付利润的话。那么大型、集中式的社会保障机构的经营成本要低些。

① 公共选择理论和有关官僚主义的研究（见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Niskanen 1971，Tullock 1965）解释了政府失灵的各种形式及后果。

依照本研究的一般方法，我不在这里就相关立场作更多评论。我的论点可从各条原则中得出。

原则 6 (透明度)：政府提供的福利服务和为之融资的税负之间的联系必须对公民讲清楚。公开且信息完全的公众讨论必须成为采用实际改革措施的先导。政治家和政党必须表明其福利政策是什么，以及如何为之进行融资。

这一原则包含三方面内容。说出头一句话是因为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公民并不清楚福利国家提供服务的成本是应由他们自己作为纳税人来承担的。全世界范围内，有关税收和政府支出之间关系的理解十分模糊或错误。然而，没有哪个国家比后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多的财政幻觉，这里的人们几代以来都被灌输了健康医疗和教育是“免费”的这样一种观点。^①一旦公民意识到是纳税人在支付各项政府开支，并且能正确估计这一支出的规模时，对分权化的改革措施的抵制便土崩瓦解。他们必须了解，政治进程给予了他们选择的余地，对于整个福利部门或其独立的各部分（养老金、健康医疗、儿童抚养、社会救济等等），他们可以选择两种渠道进行支付：一是“家庭支付税负→政府预算→国家福利服务”；一是“家庭支付保费→保险人→保险人提供的福利服务”。

政府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在进行改革之前向公众，尤其是向那些直接受到改革措施影响的人征求意见，一直是个

① 例如前面几次提到的匈牙利调查显示，只有五分之一的答卷人能在 $\pm 25\%$ 的误差范围内估计出免费政府医疗带来的税收负担。样本中的其他人只能给出与实际情况偏离更大的猜测或根本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有争议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好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形势是否到了要求政府采取紧急行动的时候。福利部门的改革不是一个独立、短期的行为。它并非为避免经济崩溃或克服严重危机而进行。它意味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塑造社会面貌和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原则6的第二部分表明，有必要公开讨论这些重大改革提议并且向讨论的参与者提供全面信息的原因。

这样我们被引向原则6的第三层内容，即对政治选择透明度的要求。实际上，政党很少在选民面前明确表示对福利部门的看法，这可能是因为它们还未考虑清楚其提议，或因为它们想隐藏真实想法。本研究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范畴，并不试图讨论为什么会这样或能否改变现状这类问题。本研究只是依照规范方法提出一些要求。原则6是针对政治家们好的一面提出来的：如果你诚实面对选民的话，请坦白地告诉他们你对养老金、健康医疗和其他福利服务有何种打算。这一原则的其他对象是那些对这一题目怀有研究兴趣的学者，包括我和我的同事们。我们无意出名，也不为任何候选人工作。我们只是觉得有义务去探求和宣布福利部门改革各思路的益处和社会成本。最后，这一原则也是对公民们提出的。它提醒他们去从政治家的演说及政党的计划中明察其对福利部门的真实意图，并且带着这些理解去投票。在这一方面，很难只去探察意图而不作出投票的决定。当投票赞成某一政党或政客时，选民选择的是“一揽子”政策。当一名选民投票选A而不选B时，也许不得不忽视B的福利政策更吸引人这一事实而投A的票，因为他或她更偏好A的经济、

法律、外交及其他政策。^①

这些难点也可作为原则 1、3 和 5 的补充论据：必须减少福利服务中需用政治手段管理的部分。

原则 7 (对改革计划的时间要求)：必须留足时间让福利部门的新机构得到发展，让公民学会适应。

改革后的福利部门中会有一些共产主义制度下不为公众所知的机构。一些是新建的，如新式的私营诊所和医院，或新式的非国有养老金。另一些则可能是在改革原有组织的所有制形式时出现的，如一队医生在签订租赁合同后在公立医院中做手术。在我看来，出于多种原因改革支持者们不能让这些发展完全自发地产生。建立新机构和改造旧组织需要仔细制定新的法规，这些法规要由立法批准实施或作为机构的规章细则得以实施。某些组织也许是在政府机构的敦促下成立的。在某些情况下，也许需要政治压力来发动改革。也许有人会说，福利国家角色的改变本身就离不开政府的参与。总之，虽然制度变更的演进过程中许多要素能自发进行，但本研究并不提倡完全依赖自发变化进行改革的模式。^②

同时，我也反对不惜代价强制推行最快的福利改革的作法。在某些危机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实行痛苦而不得人心的经济调整措施。这样的措施中会有使得财政预算中福

① 如何通过全民公决进行最重要的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也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除了在少数国家外，宪法只允许在极特殊的情况下通过全民公决作出政治决策。

② 这些评论也符合制度变迁理论和经济制度的历史进程（见 Davis 和 North 1971, North 1990）。

利支出急剧下降的内容。但这和全面的福利部门改革并不是一码事。后者不是财政上的紧急救火行为，而是一项无法采用危险的高速度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必须留下充分的时间对具体计划进行细致的起草，并使其逐渐赢得政治上的支持。

有关政治支持的问题原则 6 已经讨论过。公众越了解改革的社会成本和益处就越愿意支持改革。如果可能，应该让公民有时间适应新情况。原则 2 已经提及区分不同适应能力的问题。改革者们必须冷静认识和充分理解这一事实，即人们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看看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问题。

我们有理由这样看待年轻一代。他们面临着丰富多彩的一生。让他们及其雇主将退休所需的数目存入个人账户，并将这笔钱委托给某个能够好好利用这笔资金的高效率的养老基金。照理，他们的养老金是其自己储蓄的结果。按照基本假设，即原则 1，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收入、储蓄倾向和老年时的收入之间有着密切联系。^①

然而同样的话却不能对那些已经在领取养老金的人说。对他们而言政府必须履行过去政府所承诺的一切义务。^② 他们不再能适应新的养老金制度。除了立法规定的政府义务外，原则 2，即团结性原则，也决定了社会应当

① 就像我在讨论原则 3 和原则 5 时所解释过的那样，我认为即使是对年轻人来说，一开始就在众多的养老保障“支柱”中拒绝采用政府养老金“支柱”是十分错误的。如果大多数人认为政府养老金能加强他们的安全感，而且也表明愿意通过纳税为之融资的话，就应该保留它。然而，早晚有一天政府养老金只能占到退休收入的一小部分，而这样也许更合适一些。

② 若想更多地了解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参见科尔奈（1996）。

继续实行“现收现付”制度，劳动力中的活跃部分交纳养老金提供资金。

至于中间的一代，我认为可以让他们自由选择。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将其目前应得的政府养老金（在扣除相应转移费用后）转到他们选中的非政府养老金个人账户上。

在对养老金改革作了如上评论后，让我们回到更一般的讨论领域。只要经济形势允许，变化所带来的痛苦就会减轻，通过帮助那些从改革中受损的人，适应的过程也会好些。然而，只能对那些真正无法适应的人给予无时限的救助。对其他人而言只能在短期内实行救助（例如，当取消价格补贴时可对穷人进行暂时补偿）。个人可以有一定的宽限期，但他们必须知道一旦这一时期结束他们就必须适应新环境。

五、理想的分配比例

原则 8（和谐增长）：在用于投资以直接促进快速增长的资源 and 用于经营、开发福利部门的资源之间保持和谐的比例。

在有关福利的讨论中有两种极端观点。一种观点单方面强调转轨带来的损失，没能认识到克服目前问题的最佳方法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不管对经济学家而言这是多么无关紧要的陈词滥调，但那些乐意维持福利国家现状的人却常常忽略这一点。有时这些人甚至会对这样的经济论证不屑一顾，即如果不通过充分的投资来带动持续快速增长，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到即使是目前西方社会的平均水平。

另一种极端观点在福利支出和直接促进快速增长的投资项目中单方面倾向后者。对几个国家的统计考察表明，长期内最快的增长发生于福利服务最低的东南亚国家。作者要么让东欧读者自己得出结论，要么干脆明说：如果你们想赶超西方，就得遵循东南亚模式。

作为老一代人中的一员，这种增长崇拜对我而言似曾相识。这种对增长的狂热追求促使人们采用了强制增长的战略，结果经济结构遭到扭曲，人们最基本的福利要求也受到忽视。^① 这种偏见使社会主义制度中出现了严重问题，直到今天其影响也没有完全消除。如果还要重蹈复辙将是十分遗憾的。

如果人们不是基于福利支出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是福利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来作国际比较，便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当一国的经济发展不断进步时，政府在医疗、教育、文化、儿童及老人抚养等方面的支出也应不断增加。这种关系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它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政府的政治面貌、一国的文化传统等等。但是，在整体经济发展和政府福利支出之间还是有密切联系。政府福利支出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合理比例会朝两个方向偏离：支出太多或太少。作为对斯大林时期的“过度补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后期对其福利支出放开了口子。由于受到家长制思想的影响，也为了安抚公众，政府承担起超过其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保证的福利义务。在一些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不仅政府承诺超

① 24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研究《快速增长与和谐增长》(科尔奈,1972)，它反对这种增长崇拜。

出了其承受水平，其实现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早期的一项研究中将它们称为“早熟的福利国家”的原因。^①在这方面匈牙利走得最远。

保持合理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当促进经济增长时，政府的承诺，以及政府的授权必须减少。

对我而言，我不愿冒险提出能保证和谐比例的数量黄金律。在后社会主义转轨背景下重新研究这一领域将是十分令人兴奋的工作。然而，尽管原则 8 并未提供量化方法，它却警告人们注意公然的扭曲和错误的政治标语。

这里我必须回头谈谈原则 1。将经济选择权更多地让渡给个人的一个原因是担心中央计划者能否对重大比率作出合理决策。难道政府必须干预主要的分配比例，以防止个人在医疗、教育上的错误决策吗？比如他们花太多钱建工厂。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危险。相反，人们可以预计，在全国规模上加总个人决策，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的自发、分散决策会使得福利部门的健康、教育和其他活动的支出增加，超过中央计划者的分配。^②支持干预的一个合理论点是，如果缺乏原则 2 的团结性标准指导的某些再分配方法，极端分散的决策过程可能无法为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最底层提供基本福利保障。

① 见科尔奈（1992）。

②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似乎验证了这一点。斯大林经济政策的铁腕保证政府不会在医疗、住房等上“过份花费”，而将资源集中起来用于发展重工业和扩充军备。

原则 9 (持续融资)：政府预算必须能为履行政府义务提供持续融资。

原则 8 讨论的是实际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本原则则注重探讨其财务方面。虽然这一要求是不言而喻的，但正是因为违反了这条原则许多国家的福利政府不得不结束了其“禁区”统治。

有些国家存在巨额财政赤字，包括后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虽然预算体系中明确指出了哪些收入可用于特定的福利支出，在某些福利部门的分支领域还是会发现财务赤字，至少部分如此。^①赤字已经形成，或预测表明它迟早会爆发。在这些国家的另一些福利分支部门，以及另一些国家的整个福利部门，用于支付福利服务的资金和支付其他费用的资金没有分开。政府福利支出由普通税收收入支付。因此很难确定福利支出在造成整个财政赤字过程中的相对作用。

本研究并不旨在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时候产生财政赤字的各种原因。然而，却有必要注意具体的计算方法，看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综合考虑可能发生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趋势，以及某国从立法上奉为神明的福利承诺是如何变得不堪忍受的。尤其是政府养老金体系更是四处受到财政危机的威胁。由于受到来自需求方的巨大压力，政府健康服务看上去也最终无法得到融资。对于不同国家，专家们对于融资极限和增税能否弥补这些缺口的预测也不同。第二项部分是个经济问题，增税会打击积极性并抑制

^① 例如在匈牙利，就是由两种社会保障支付来为养老金和医疗进行融资。

投资；部分是个政治问题，必须把增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降低福利支出带来的负面影响相比较。最终，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改善财政状况的需要似乎会强迫降低政府福利支出。

虽然我只在最后讨论原则 8 和原则 9，但它们和其他原则一样重要。我认为已有的有关福利部门改革的讨论有些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我仅指学术圈内的讨论。“福利国家的守卫者”一语形象地描绘了极端贫困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苦难，但也藐视了任何和谐的经济比例要求。那与他们无关。那只是一些思想狭隘的“财政”论点，富有同情心的人不会去考虑它。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阅读到许多经济观点，其中有一条提到建立“社会安全网”的必要性，但作者却没有把其提议的规则思考清楚。但双方通常都不从伦理角度出发论证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该是把我们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进行综合的时候了，没有一方有权力单独采纳社会标准或经济论点。

六、结 语

以上九条原则无法以一种清楚明白的方式建立起严格的理论大厦。然而，它们也有特殊的层次结构。原则 1 和原则 2 是最基本的伦理学假设。它们为制定组织上及微观上的原则 3 至原则 7 以及宏观上的原则 8 和原则 9 提供了指导。

如果想看看不同对或不同组原则之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兼容或在多大程度上相冲突，即它们是否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就得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原则 1（个人

自由和责任)和原则 5(政府的责任)之间并非不可调和,虽然人们把其中一条推行得越远,留给另一条的空间就越小。

有了这些抵消关系,上述理论就无法排除在各种情况下作出特定负责的选择的必要。我希望值得对这些原则作一个系统回顾。就像我在引言中所提到的,这些原则的体系及它们被汇总的方式应该起到警句和清单的作用,当起草、评估和实行实际计划、立法或法规时它能用来防止忘却任何原则。即使有时决策者必须对某些原则作出让步,让他们能够清醒地这样做,在接受妥协前和自己的良知及常识斗争一番。那些真正拥护本研究所提出原则的人,当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也不会对之作出极端的解释。^①

研究题目的选择也许能澄清如下反证。在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范围是既定的,它受到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约束。后者最终决定能够实施何种改革。如果改革者真想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那么他们就得作出让步。他们甚至需要操纵公众意见。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遵循的原则、他们的打算及这样做的后果并不总是符合他们的利益。

改革的命运通常是在政治角斗场上被决定的。我认为在学术研究的任务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

^① 按照报纸上的报道(如1996年10月15日的《纽约时报》),无家可归者将从莫斯科离开,其中一些将被迫住进首都外暂时搭起的帐篷。假如报道属实,此举将在无家可归者头上罩上屋顶,并令这一过度拥挤的城市中许多人的生活更加容易。另一方面,这一家长制做法,当以一种极为野蛮的形式实施时,严重损害了原则1:个人主权及他或她的基本人权。

究福利改革的机会。^① 在我的其他作品中我曾试图采取积极的政治经济方法研究这个问题。然而，我希望，作为对这一研究的补充，从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也是十分有益的。值得一问的问题并不是从现状看我们下面能够怎样或必须采取哪些步骤。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真正想到哪儿去。在福利部门这个特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理想的最终状态，因为答案从历史角度看十分值得争议也很不确定，而且就像我前面讲过的，没有国家能作为真正的榜样，也没有我们能遵循的现成模式。

在匈牙利或其他后社会主义地区，本研究所阐释的九条原则和任何特定政党都没有关系。不能用常用的方法将它们进行分类。它们既非“左倾”，也非“右倾”，或者用美国式术语说，它们和传统的“自由”或“保守”思想毫无关系。它们也和早先的社会民主思想不同，后者认为其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建立一个福利国家，而且因为这一任务的过分实施而受到历史谴责。本研究也不同于那些铁石心肠的激进主义，它要破坏所有福利国家的成就，更不同于那些对国家怀有偏见且偏好市场的思想家的观点。这套九条原则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温和”立场，而且虽然和传统的左倾和右倾观点不同，从这两方的观点和建议中也吸取了不少经验。我这样做的动机并非是想让双方都喜欢我的话，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一方会因此而喜欢这些建议。我制订了这九条原则，因为我相信这一套原则是一个

^① 有关改革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及降低政府转移支付的论述，见林德贝克等（1994）、林德贝克（1996）讨论瑞士经验及纳尔逊（1992）分析拉美、亚洲和非洲某些国家问题的文章。

整体。

本研究背后的思想和许多其他作者的相似，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也许现在声称这构成了一个国际潮流并不算太早，虽然这种世界观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名字。这种思想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之中。它并不寻求第三条道路。然而，它确实希望通过建立合适的组织，以确保资本主义不仅仅只有个人的外表：它还有一颗人类的心灵和人类的头脑。它寻求在个人负责、市场、竞争、私有制和利润动机的基础上能更加强壮，而且它比社会主义民主能更有力地排除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泛滥。在另一方面，它并不接受极端保守主义的任何东欧变种。它寻求不仅仅通过个人慈善行为来实现团结性原则。在某些范围内，它还能因为这一目的而支持政府再分配。它对市场不抱幻想，而且也不排斥所有的政府干预。

未来的历史经验将决定这一新兴的智力及政治趋势对福利部门的改革将产生何种影响。

(陈楚玲 译)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部门改革：规范方法

个人与社会的责任：关于 社会问题的访谈录

米哈伊·洛基 (Mihály Laki, 以下称洛基)^①：您认为过渡时期的社会问题有多重要？

科尔奈：非常重要——它是过渡时期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一开始人们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很多国家，由于过渡时期前一至三年的政治问题太多而忽略了社会问题，尽管匈牙利并不如此。

洛基：有谁能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问题已经被解决了，或者，至少已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您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差异很明显吗？如果确定是明显的，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眷恋那一段日子呢？

科尔奈：在这里必须分清国与国之间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发展到包括从中国到匈牙利在内的 26 个国家，它们的社会福利政策是不同的，因此，我只以匈牙利为例，而不是对问题作一般性结论。

在斯大林时期，匈牙利的福利制度还只处于初级水

^① 洛基现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欧大学政治学教授。本访谈目的旨在促进社会大众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应对社会福利承担的责任。

平，那时还有失业，而现在人们为之留恋的那些东西还没有出现。后来，在卡达尔时期，随着并不坚决的经济机制改革的进行，福利制度开始出现，年复一年，就有大的进步。以80年代中期为例，那时达到了充分就业，实际上是长期的劳动力短缺，软预算约束使企业的存活得到保证，与之相伴随的是，不仅就业是有保障的，而且就业者的具体工作岗位也是有保障的。只要人们遵守不成文的规则，忠诚他们的工作，他们就能获得法律规定的大量福利。这些福利采取现金的形式，包括退休金、托儿费和医药费。同时还有大量与学习或年龄有关的福利，此外，作为补充的还有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补贴以及住房补贴。而这些都是收入集中再分配制度的主要部分。所有这些组成了一个在范围、绩效和综合度方面都超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对它还有怀旧之情的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为什么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会出现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起因源于1956年的那一次创伤，当时的政治精英们被愤怒的群众攻击和驱赶，遭受了群众强烈的感情发泄。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和群众维系较好的关系。至于充分就业则是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特征，比如投资饥渴、扩张冲动和软预算约束。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即使不去刻意追求，充分就业也是可以发生的。1956年以后，匈牙利的领导人以如下的话总结所有这些：我们不欢迎示威或罢工，我们首先要采取强硬的报复手段，然后通过减少公众的不满意程度来防止示威或罢工的发生。有几个阀门可以先控制公众的不满，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一套社会权利和福利保障制度。这种通过社会福

利制度来进行重新分配的制度伴随着软预算约束。没有哪个地区或企业会步入危险境地，因为那会出现不能履行社会职能和地区失业的结果。制度上的父爱主义和软预算约束互为补充。所有这些都是在为当权者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换句话说，福利制度不是人们进步斗争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导人向前迈一步的结果。那些要求政府承担这样一种职能，即提倡更高生活水平和更大程度的家长制的压力集团，不用费力就能达到目的。因此，人们用不着上街示威，也用不着罢工。

另外一种减轻公众不满意度的方式就是允许“灰色”经济，即第二经济的发展，以便让某些人能赚钱。第一经济中的工作让每个人都得到父爱主义的保障，并且其中的工资是可靠的。而那些精明、且有多余精力的人则通过第二经济来赚钱补充收入。

自然也会有人遭受损失，但即使这样，他们的损失比在纯粹市场经济中的损失要小。当然，对于成功者来说，收益的分配也是不平均的。那个时候，我们反对特权干部所享有的诸如度假别墅、办公用车以及体面住房等福利。由于现在匈牙利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对于今天的情况，人们还是认为旧时干部的特权并不为过。旧时享受最高生活标准的那些人非常接近平均水平，而今天最富裕的人只占到5%~10%。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匈牙利还是很平等的。虽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达到人人平等，但是与今天相比，那时候匈牙利的收入分配还是较平等的。

洛基：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即1989年以后，一些人享有先发优势，他们拥有现金或其他形式的资本金、智

力资本和有用的关系。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技术和成绩取得这种地位的，而是借助于其他的品质，如对旧体制的忠诚。这种不平等，这种先发优势，已经引起很大的不满。是这样的吗？

科尔奈：让我们将问题的实证部分——确认该现象是否存在与其规范评论分开来谈。

在任何社会中，包括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那些在较早阶段便已获取并竭力保留财富的人，那些拥有可能很重要的、可以利用的关系的人，那些以智力资本形式拥有人力资本的人，具有很多优势。对于最后一种类型的人来说，他们的优势是拥有一个受过良好训练、能灵活运作的大脑，并且已经积累了包括外语和社会礼节在内的大量知识。当一个新的变革开始时，这种优势便非常明显了。

洛基：这是一个很严格的伦理判断吗？

科尔奈：让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实证分析。人们是否能保持这些优势取决于财产是否被剥夺、旧的高层领导是否被赶走。共产主义制度获胜时正是这么做的。现有财产被充公，现有个人之间的关系被打破，前一政治体制中的各种重要位置上的领导者，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都被驱逐下台。这一权利转换中的首要问题是谁能和党的书记和首长保持较好的关系。旧体制中的一切联系被完全中断。虽然不能消除那些旧领导们的智慧，但他们却可能被迫处于其智慧无用武之地的境地。

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的过渡越平和，个人受惩罚的倾向性就越小，关于报复，以及用强制力量决定如何使用他们拥有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的谈论就会越少，从旧体制

中转移过来的实际利益就会越多。

我记得 1991—1992 年间，一些曾经标榜献身卡达尔政权的人，做了西方银行在匈牙利的首席代表，有的成为有兴趣投资匈牙利的外国公司的首席顾问。我曾向一位从事商业经济研究、并很熟悉商业理念的美国同行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企业是否知道这些人过去的所做所为和污点？开始我的同事还不明白我的意思。这些人最有用的地方正是他们个人的政治背景。被西方公司所雇佣的这些人生活并且继续生活在匈牙利，他们像了解自己的手背一样了解这个国家，并且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他们早就学会了如何与西方人打交道。当然，这些有用的特点应该利用起来。于是一个平和的过渡可以保证各种联系和知识技术交易的大门是敞开的。一个选择过程发生了，旧时那些迟钝的干部不可避免要被淘汰，而那些头脑敏锐、专业技术强的干部将融入新的体制之中。这正是匈牙利正在进行的温和、渐进的体制转换的一个特点。

但从伦理上应如何进行评价呢？从我的价值观念来看，这并没有什么相冲突或自相矛盾的地方，我认为匈牙利革命（用历史术语来讲，政治体制转换是一场革命）中不流血、宽容的特点是这个国家的首要优势。缺陷是没有进行彻底的重建，包括没有根据过去的政治行为对个人进行迅猛的降级和升级。我想，匈牙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更多的是感受到变革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坏处。尽管多数匈牙利人讨厌见到那些政治变色龙，但是他们也不要求按过去的方式进行一次残酷的清洗。

洛基：我个人认为，应该区分凭个人关系获得的优势和在转换过程中通过强占或化公为私攫取国家资产而获得的优势。

科尔奈：当然，那些与过去联系较密的人似乎已建立了具有优势的初始资本，比如说住房或其他形式的资产。在这里我要作两个评论。第一个评论是：完全不能肯定剥夺资产是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最好办法，那是非常残酷的一步，对正在出现的民主来说不是一个好开端。而通过一种将所有有罪和无罪的情况都考虑在内的合法方式来进行一场综合性的剥夺工作是很难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的第二个评论与问题的分析有更多的关系。比如说，有人建立了一个方程来解释收入和资产在10年这个时段内是如何分配的。这个方程含有几个解释变量，包括显示公民在1990年是否为领导层的一员，或是否非常接近领导层，是否为某一领导成员的法定继承人。尽管这些变量可能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但和其他一些特定因素比较起来，相对来说还是不够。解释性强的变量必须是能够表明自1990年以来所发生事情的那些变量：他们是如何地幸运，他们是否浪费了启动资金，他们是否灵活、成功地将初始资金融进新的环境。

对旧时官僚借过渡阶段获取财富，我不想作一个回顾性的伦理辩护。最终只有两种过渡方式可以选择，而从伦理学角度来看，两者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国家在20世纪已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为建立新的秩序和重整政局而发生了血淋淋的剧变。这一次，匈牙利人民选择了两个魔鬼中痛苦较小的一个——一种温和的转变方式，这个过渡允许很多人保留了他们的财产。即使再反思一下，我

还是赞成这个选择。

洛基：另一方面，那些从社会主义时期过来的，遭受了相应损失的人，希望能得到某种补偿，或至少能得到国家或法律上的保证，保证他们不会再次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

科尔奈：我同意这样一个原则，它构成了在任何时候——不仅仅在政治体制转换时期，都会被提出的一个要求。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由于命运的打击，而不是由于个人决策失误而最终遭受巨大损失的人，有权从社会得到特别的赔偿。这一论据要求对旧体制下由于家庭背景和政治立场原因而遭受歧视的那些人，与由于自身能力差、或过分独立于政治而成就低下的那部分人作出区分。比如说，不能将前一类遭受政治迫害和歧视的人与那些有机会学习而没有学习的人混淆起来，这些是不同的问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教育这个获取智力资本的领域里，旧体制提供了平等的机会。

洛基：如果一个人过于懒惰而不愿学习，那会怎么样呢？

科尔奈：当你考虑到那些在1990年才二十多岁，没受过教育，对资本主义的到来尚未做好准备的年轻人时，还需要区分两种人，一种人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吉普赛家庭中的八个小孩中的一个，另一种人则是离开父母和国家生活，其所能获取的教育与技能的水平基本上由自己决定。

洛基：您是否要区分那些因选择而导致生活不确定甚至自我毁灭的人与因制度原因受到伤害的人？

科尔奈：尽管我愿意用不同的表述，但我还是同意这一问题之本旨。这是一个不考虑政治制度和历史环境的哲学问题。我认为个人的责任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为他或她的生活肩负着责任。因此，从根本的伦理标准来看，我不接受那种认为单一的环境因素就能使人们免除各种个人责任的观点。我不用衡量卡达尔的标准去衡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卡达尔政权是一种“软”独裁，它是一种家长制，允许第二经济的存在，而这种经济则扩大了各种机会存在的范围。与深受波尔布特统治和内战之苦的柬埔寨人民的情况相比，匈牙利人在政治体制转变中获取知识更是一种个人责任。匈牙利人具有更大的机动性。

不管怎样，我不否认在卡达尔政权下存在牺牲品，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一个聪明人没有上大学可能是因为家很早就搬到农村的缘故，我是不会有什么责怪意思的。尽管这样，年龄和个人性格还是可能成为一个人受教育的阻碍。许多父母被流放过的孩子在以后较宽松的年代中设法进入大学学习，事实上，今天的许多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父母在斯大林式的制度下都曾遭受过迫害和歧视，但他们自己还是设法完成了学业。

我这样说并不是小视社会环境因素，把它置于个人命运之下。我们讨论的辩证性要求我必须对问题的另一方面也进行分析。我想避免任何抹杀社会环境与相应的事实（即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包括卡达尔政权，曾对机会平等有过相反和限制作用这一事实）之间联系的情况出现。

洛基：让我们来看看社会福利制度。您关于“早熟的福利国家”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福利制度，而这超出了它的能力。

科尔奈：你所要表达的潜在意思是：相对于匈牙利的经济运行情况而言，国家通过法律赋予人民的各种权利，包括政府应该给予人民的东西，是不适当的，实际上超出了经济潜力。早熟福利国家的观点是假设经济发展、经济力量和包括国家所能提供的福利水平在内的一般生活水平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匈牙利在这方面是个特例，它提供了比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高得多的福利。

当然，这种经济总量和政府父爱主义程度之间的联系是实际可见的，因为经济总量最终限制着父爱主义的发展，相反的效果也是可见的。国家补贴越少，经济总量就越大，这一点非常明显。政府这种父爱主义的关怀需要高的社会保障税赋，这就将减少直接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

这样我们又得作出一个政治与伦理性质的判定，我不相信不计代价获取的高速增长，24年前，我写过一本书，表达我反对强制增长，提倡和谐增长的观点。但保持和谐的正反两方面的条件都被破坏了。现在回想起来，将过去几十年间出现的各种趋势考虑在内，匈牙利的问题不是强制投资，而是强制消费，结果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社会安定作为一个方面，消费和国家父爱主义作为另一方面，它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抵消作用的。更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哈萨克体制留下了一个比卡达尔体制好得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秘密警察、关押哈维尔等人，哈萨克巩固了政权。而卡达尔不同，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是

将反对派送进监狱，而是安抚人民。卡达尔给人民提供了较多的物质上的好处，但代价是更多的负债。过多的政府支出导致长期的赤字，并引起通货膨胀，而我们现在正为此付出代价。如果哪个地方出现了怨言，领导人的第一反映就是给予安抚。如果包尔绍德州出现了紧张情况，政府不仅仅是派出高级官员讲一下话，他们还给予人们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果一个企业有了困难，贷款和其他帮助很快就会到位，即使这种做法会使预算和收支情况变得更糟。如果食品短缺，政府马上通过进口予以解决，进而进一步损害预算和收支情况。这一点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正相反，为了维持贸易收支，偿还外债，他甚至拒绝给人民提供电力，他用秘密警察去对付人民的不满。上面的情况说明了两种共产党统治的不同情况。

洛基：现在似乎到了偿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们应该比别人少付一些，每个人都希望将自己的损失减至最小，在分担债务减少收益这一问题上是否存在一些可遵循的规则呢？

科尔奈：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作实证分析或观察，另一种就是建立一些规范性的原则。就第一种方法而言，可以看到两种现象，一种情况是，匈牙利经济中，在如何分担债务上，存在着可以避税的人与不能避税的人之间很明显、不公平的差异。按纳税收入计算，1994年私营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才110 000福林，这一水平比最低工资还要低，这使我纳闷，他们为什么还继续经营，而不退出来找一份可以挣更多钱的工作。

促成不平等的其他一些因素是不同阶层的人在承接和

维护他们利益时存在能力上的差异。这种能力可以通过两个层次来表达，一个层次是通过议会以外的方式，上百名机车司机或发电厂工人非常容易组织起来，因为他们的产业非常集中。他们控制了一种不可缺乏的生产，即使仅耽误几天，也会给整个国家带来很大的不便。而出租车司机，他们可以通过电台互相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使一个城市发生阻塞，甚至造成瘫痪，就像他们1990年10月在布达佩斯所干的那样。很明显，这一类可以使用那种议会外方式的人，能比那些按日计酬，永远都不可能通过罢工来瘫痪一个城市的普通劳动者更有能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另外一种层次则是通过议会方式，在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情况下，代表大的选民团体、具有相对一致利益的集团可以施加较大影响。退休人员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匈牙利1/3的选民都已退休，他们不用上街游行，他们可以通过选举决定议会的组成。通过其他对民主议会施加压力的方式可以加强选举的砝码：如代表团、地区代表的声明、政治家们公开或秘密的游说。因此，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民主议会运行的规则，甚至是匈牙利那尚不成熟的民主和正在建立之中的市场经济，你就会预测出以下结论：这两种因素，即避税的机会和维护利益的能力，是决定负担在社会不同集团之间如何分配的决定性力量。

我必须强调的是，在预测这个结论中，我并没有指出我倾向哪一种负担分配方式。这是一个实证分析，而不是一个规范性的假设。

洛基：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实证研究，您说一些集团、行业，甚至个人都处在一个能很好地维护他们利益的位

置，而其他一些则不能，因此，有些人将会成功，有些人将会失败。

科尔奈：如果游戏单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话，有两种方法能使集团和个人保证收入的实际分配偏离公认的情况。一种是逃避对国家的责任，另一种则是向国家施加压力，使国家按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在市场分配中进行干预。

洛基：这两种行为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但您是否认为在后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他们比以往更突出一些呢？

科尔奈：现在逃税率非常高，这种情况可追溯到卡达尔体制时期就开始盛行的一些行为。但公众并不认为这种行为应受道德的谴责，相反，这种行为被认作很自然，几乎每个匈牙利人都通过这样一种或那样一种方式逃税。当然，逃税的程度与过渡时期是相关的。至于第二种方法，用议会制或议会制以外的方法来施加压力，我认为两者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所有民主议会制国家中，这两者的作用差不多大小。

洛基：谁做得好一些呢？是那些采取欺诈方式的人，还是那些公然反抗的人？现在让我们将问题缩小，首先只是谈一下避税这个问题。

科尔奈：你这种表达方式过于严重。我认为最终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取额外的利润，个人和集团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两者会同时被使用。有些人是获取真实的市场利润，而有些人则通过避税获取利润，或者说获取更多的额外利润。让我们对这两种方法作更进一步的分析。

我不把法定的市场利润限制在像补鞋匠那样，从早到晚辛勤劳作所获取的、被多数人认为是应该的利润。市场功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形势越混乱，越不明朗，那些能弥合供给与需求之间缺口的人就越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市场总是回报那些机智、聪明、坚韧的人，他们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而一些辛勤劳作的补鞋匠却只能过上一般的生活。

洛基：您为什么不对暴发户和勤劳工作的资本家做一个区分呢？

科尔奈：暴利者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参与者，而市场经济的职能是满足供给与需求。只有那些对市场经济知之不深、存在偏见的人才会用“投机”这种带有轻蔑意味的字眼来形容它。这种活动对保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非常重要。

那些通过市场获取利润，而不是骗取或倾吞国家财富的行为包括各种商务活动，这其中有许多成功的进出口公司，还有一些像信息和建筑等正在迅速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正在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并获取利润，而这是以前那种专断、扭曲的供给做不到的。在那些技术发展趋势预示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的行业里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在过渡阶段，这些经济活动可以自然增长大量利润，而且，我认为事实上本应如此。

其他一些人通过避税来获取额外的利润，这里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税法规定本身就存在漏洞，每一个匈牙利公民都有权去利用它，不应有人因为这样做而被视为违法，而是应由立法和征税部门来弥补那些漏洞。

在很多情况下，钻法律的空子是和欺骗相伴随的。这

里有这样几种情况：灵活、合法的利用供给和需求的市场经济形势；钻法律空子；纯粹的纳税欺骗。这三者结合起来，结果是可以产生大量的收益。然而，当进行伦理判断时，必须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防止这些逃税活动的发生，而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但如果能把它限制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会好一些。

现在，我想把注意力放到在争论中经常会变得含糊的一些差异上来。一是在市场条件下获取的所有利润是否都是合法利润（相反的情况是逃税收入是非法的）；二是那些获取合法高收入的人是否必须与那些低收入的人保留同比例的收入，换句话说，所有合法收入是按相同税率纳税，还是按累进税率纳税。从伦理学角度，我们又进入一个公平承担税负的问题（在这里，我忽略了像纳税奖励这种与税有关的问题）。于是，我重复一下，我们希望那些靠自己在市场上的优异表现和运气而挣了高收入的人来承担更多的税负吗？不仅按比率对高收入征收高额税，而且还采用累进税率制。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去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又将我们引到一个基于社会团结原则之上的国家再分配问题。

现在，我们转向像收入分配、再分配、税负和国家补贴这样一些规范性的要求。像我和你这样的经济学家应如何向那些能听取我们意见的人提供建议呢？再分配一方面涉及到经济和技术性的原理，另一方面又涉及到一些伦理性的原则，将它们分开意义不大。人们所希望的再分配制度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那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洛基：您经常把国家描绘成一个无效的分配者，但至少在中期内，我找不出任何替代者，可以克服这些。征税主体总是国家。

科尔奈：没有国家的社会是乌托邦的想法。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待社会中的每一个行为者。比如说，对受利润驱动的企业家或企业，或者对个人，或者对普通公民，我都不存在幻想，尽管在规范性的理论中，他们都能被赋予重要作用。我对国家也不存在幻想。我认为国家是一个很脆弱的机构，但我还是赋予它很多功能，不过，至少为了弥补国家的脆弱性，必须建立一些辅助性的机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把国家当做一种“坏东西”，那也太离谱了。只是国家的功能是由一些容易犯错误的人来行使的，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这就导出一个重要的实际结论。当政府没有竞争者，当它占有绝对垄断地位时，我主张其功能尽可能地少。如果政府不得不面对竞争，情况就会立即得到改进。例如，许多国家都有国有邮政服务，而同时又有私人邮政服务的，情况是最好的。

洛基：政府教育也是同样的情况吗？

科尔奈：是的，非政府的教育也是这样的。从生到死，医疗和殡葬都是由政府和非政府共同来承担。对了，减少政府负担一直都是经济学争论的焦点。税收不能提高到那种会排挤非国有部门的职能和保护国家垄断进而使竞争不可能的水平。如果从社会总收入中抽取用于政府医疗和教育的费用太高，而非国有部门又没有立足之地并且人们没有机会为其服务付费的话，这样的征税水平就保护了

一种国家垄断。

洛基：即使有竞争，国家在再分配中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您认为国家在资源的再分配中应遵循怎样的原则呢？

科尔奈：就收入方面，我倾向于我已提到过的累进税率制。在匈牙利，我们已经经受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的最初冲击，现在是采用让富裕者多做贡献的原则的时候了，这意味着我们采用累进税率制，同时规定这一制度不能累进过度而抑制激励作用。这种征税制度的累进性质不能达到那种会挫伤工作积极性的程度，如果那样，总收益就会下降。那么，从长远来看，再分配制度主要的帮助对象从绝对意义上讲将会得到更少。

洛基：因此，不能诱导企业家们一年之中休息 8 个月，因为 4 个月的收益已将他们带到一个不能接受的税率门槛。

科尔奈：瑞典有一段时间的边际税率是 90%。如果一个医生从一个病人那里收取 100 便士，他只能留下 10 个便士。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医生便会觉得在下午继续工作不值得，还不如去钓鱼。必须避免过度的税率，累进的原则不能走向极端。也许那时瑞典的一些立法者在单纯的嫉妒的驱使下，超出合理的范围，制定了那种税制。

这又将我们带回社会主义时期的情况。长时期内社会主义制度缺乏活力的一个原因是它僵死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具有优势的一些方面——平等，给它带来巨大的倒退，从长远来看，这种倒退还超过

了那些优势。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没有发展出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社会主义制度不能适当地区分优秀和一般的表现。一个在超级明星和助理图书管理员之间没有显著差别的退休制度是需要重新斟酌的。当他们走到生命尽头时，国家“照顾”制度将完全模糊了优异表现和相对一般贡献之间的差别。我是那些从认为平等是固有的观点中解放出来的人们中的一个。

洛基：仅仅是为了更多平等的机会吗？

科尔奈：我不想现在就开始就社会公平编撰一套完整的假说。那些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而依靠社会的人应当得到帮助。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是：社会应当安排能使穷人的境况随时间的变化得到改变，他们不应被排斥在社会发展之外；他们应有自己相应的份额。这正是我所认为的公平。按照我的伦理原则，仅仅因为把高水平降格为中等水平就感到满意是不对的。在那种敌意的喜悦，即我们充满嫉妒的那种“让富人买单”的情绪和平等承担税负的正当原则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在后一种情况下，让高收入者承担累进的税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为低收入者提供资源的手段。社会主义给匈牙利留下了一种我们经常嘲笑但又很值得注意的古怪的心理。许多人宁愿自己穷，也不愿看见别人富，即使今天，匈牙利的很多人依旧存在这种心理。如果我们能够以冷静接受社会中存在有比相对高收入还高百倍的收入的态度来代替这种心理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啊。简单一点说，我们所要关心的不应当是那些有大笔钱的人，而是那些事实上很穷的人。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向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真正的

问题是：他们是如何走到那种地步的，他们如何才能好转起来。而使他们境况得到改变的主要问题则在于激励。我们必须达到一定的社会发展程度才能让底层的人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它需要 10 到 20 年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不想否认再分配的重要性，但首要的问题总是可供分配产品的量以及它们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如何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始终是第二位的。

洛基：穷人的范围如何界定？

科尔奈：穷困的衡量有很多众所周知的数量指标，如人们收入多少，等等。一个相当粗糙的首选方法是：如果一些人太穷，如果他们的收入和财产太少，以至于不能保证他们和家人的最低物质需求，他们就需要从社会的其他人那里得到帮助。实际用途中的具体指标和临界值在不同的国家中是不同的。

我想，当决定谁有权能得到社会救济这一问题时，需要建立一些更深入的、辅助性的标准。我推荐这样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们不能忽略为什么某些人不能保证他们和家人最低的物质需求，他们所选择的职业、他们的工作表现和他们的储蓄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境况。

我们不能忽略分析需要救济的境况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假设，确定申请（救济）者过去的决定在今天境况中起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他们的选择是否使他们变得依赖社会的救济，或者至少促进了这种倾向，或者说外面的环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还是因为一场事故或不可避免的疾病、自然或政治剧变或其他一些意外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标准同样或者说更加重要。申请（救济）者如何才能从他们目前的境况中解脱出来？从这种境况解脱出来，他们自己能起多大作用呢？这样做，多大程度上他们必须依靠外人的帮助呢？

这两个互为补充的标准为何如此重要？提出第一个标准时，我没有任何惩罚的目的。如果某人确实因为自己的决定而导致了糟糕的结果，我宁愿我们这个脆弱的国家从公平调配者的职责中解脱出来。然而，我认为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因为它有教育意义。我这儿所指的教育的概念不是儿时所受的教育，它与选择职业时以及在从事这一职业过程中的各种抉择是相联系的。这又将我们带回本讨论开始提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的一些东西。如果人们不能在伦理上从他们命运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他们也不能从他们的决定的结果中解脱出来。倘若他们能够的话，这将导致更多的淡漠、玩世不恭和不负责任。人们会觉得是轻率做决定，还是仔细考虑结果都没有多大关系。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人们的报酬只是部分地取决于他们的贡献。人们必须仔细考虑他们所做的工作，社会主义所灌输的那种消极服从的心理状态必须终止。

洛基：您很关注个人责任？

科尔奈：个人必须为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如果社会是慈善的，那将会减轻这种后果，但它不需要为所有的人作出补偿。个人应该考虑远一些，他们是自由的人，国家不能代表他们作决定。比如说，如果他们决定不再继续上学，因为他们宁愿早点挣钱，这很好。他们可以早点挣钱，而免去几年不挣钱的大学时间，但他们要承担这一

决定的后果，他们将不可能找到一个高收入的工作，而这份工作的收入可以弥补获取大学学位的费用。收入水平不应该定得使高素质和低素质的人几乎没有差别，那样，大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一种浪费。那些希望早点工作的人节约了5年、8年，甚至10年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得到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不能等到50岁时才抱怨他们没有上大学。除非他们有证据表明他们以前没有机会进一步学习，他们才有可能抱怨一下。我又回到同样一个问题上，他们曾有自己作决定的机会吗？一个反复被问到的问题是：在过去，他们的未来是否由他们自己掌握？我曾有意使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涉及到带有主要结果的重要决定，而不是带有有限结果的简单决定。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走出需要救济的境地，而且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所愿意看到的是，体制变换后的社会中所灌输的那种心理与社会主义时期的那种心理应该完全不同。最初的前提基本上应当是：那些为不幸所扰，或陷入困难之中的人应该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弥补损失。换句话说，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埋怨社会，或者施加压力去获取某种帮助，而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采取行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洛基：一个熟悉的相反的论据是：个人从他们的家庭和密切相关的广泛环境中获取一种关于如何开创自己生活的具体模式——一种信念。接受过去岁月的贫困生活是一种遗留下来的劣势，贫困不仅是缺乏钱，不仅是缺乏物质，而是缺乏一种动力。

科尔奈：确实是这样的，不管是在这方面，还是在其

他一些方面，我都不希望在极端的程度上宣称个人责任这一原则。在谈话的一开始我就强调这一点。

至于消极接受这一倾向，可能是有些人部分或完全地继承了它——遗传。很多人可能受环境中顺从、消极态度的强烈影响。然而，对于很多我们认为是错的，经常批评下属的性格和特征，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就我所知，实证行为科学并没有沉醉于一种统一的公式，去决定那些被批评行为多大程度上是受遗传影响，多大程度上是受儿时经历或后来环境的影响，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内在的情况。我相信所有情况下，行为实质上都是自由的、离散的组成部分，建立在这一思想上的社会将是动态运行的，从而不断地培养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对于那些愿意靠自己能力去工作的人，社会给予太多的帮助，那将只会压制潜在的积极性。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助的人。那些自助的人应当得到更多的帮助，使他们的景况变得更好。首先应得到照顾的人不应该是那些正在为自己工作的人，相反，应该是那些应给予更大激励的人。我敢说，即使对那些明显不能自救的人，比如说，那些在肉体或精神上有着严重的残疾的人，最好的、能保证他们人格尊严的帮助是尽可能提供他们能胜任的工作机会。绝大多数这样的残疾人并不希望坐着等食，他们宁愿得到工作的机会。我总是被每年在美国为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举行的特殊运动会所感动，这种活动增强了他们的尊严感。我们应帮助他们得到一辆轮椅，但我们不能鼓励他们坐在椅上期待别人更多的帮助。我视这种情况为一种特例，也是比喻社会上那些需要社会帮助的人。保障是一回事，但代替个人行为的家长制又是一回事。

这里,请允许我更正一个观点,目前为止,我已谈到了许多好像矛盾的情况:由于自己个人或外部环境的原因而陷入贫困境地的,通过自己努力和外界帮助而改变自己的处境。事实上,这些例子是两种情况的混合,有无限种组合。当然,在实践中,那种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少许帮助,而走出困境的情况,与那种基本上靠外界帮助,却又还值得给予一些激励,从而通过自己努力取得进步的情况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别。任何活动必须能得到回报。

现在,我们又转向在实践中应如何实施的问题。重复一下,我不是建议建立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来作为人们行为的伦理法庭,或按这些标准,详细地评判每一案例。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些主要法规,而这些法规必须很大程度上采用这些标准。另外,即使基本法规看上去很完善,也必须建立一种改正机制,用于处理实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为某些呼吁提供一些机会是很有必要的。从一些基本原则看,有些人应该有权得到某种社会救助,但由于法律规定或执行机制的原因,这些人又被排斥在外。因此,必须留出一些空间来处理这样一些例外的情况。

我们所谈到的一些原则都能相当成功地被用于实践之中。以社会保险为例,我不是为今天匈牙利的医疗费用或退休金制定一个具体的标准,而是讨论逐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保险制度。下面的讨论对今天一个20岁的人来讲是

洛基:你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你需要储蓄来应付生活中各种变化的情况,你可能会生病,会失业,或受一些灾难的影响,并且你会变老。主要是由你自己负责自己

的储蓄，你可以通过终生付费加入一个养老金项目的方式来储蓄，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储蓄，而且这种储蓄是自己的。不管这样或那样，你必须一辈子都储蓄。你不能将你所有的收入都花费掉，相反，你必须制定一个策略，来决定什么时候应该花钱，什么时候应该储蓄，这个策略是基于你应如何储蓄，才能应付生活中那些意外的事件这一原则。

科尔奈：在这方面，政府从何着手？让我们继续谈一下养老保险的问题。政府应该支持那些提供机构性储蓄和储备积累的机构的建立，这个动议可以通过非赢利性保险机构和基金，以及赢利性的保险公司来达到。这两者都是必要的。对某些种类的储蓄，政府应该提供诸如减税和延期交税这样的优惠，比如，就养老金而言，应在谨慎、合理、尽可能的限度内，将养老金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延期交税是合适的。不能要求人们在养老金这种支出上也交税，但不能免除他们自己的服务方面的税收。收取的养老金也应交税。延期交税和其他一些优惠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如果人们明白以后他们需要花钱，并且这些钱可从他们的应税收入中扣除，绝大多数人将乐意将目前收入中的一大部分储蓄下来。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国家必须保证（养老金）支付是可靠的。国家的职责是创立分散的保险体制的框架和监督机构，并在一定的条件和限度内，提供国家保证。这样，国家能够保证公众的储蓄不被骗取，也不会因为通胀而贬值。如果有骗子卷走公众的储蓄，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职责可以总结为建立一个文明的、可靠的、制度化的、非官方的自愿保险体制。

政府还有一个更为远大的任务。它应当为那些运气不佳或因自身的错误而未能积累足够储蓄的人提供至少最低水平的帮助。没有人希望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积累足够的储蓄的人在最后的年月里过着贫苦的生活。即使对那些曾有过长期不负责任行为或那些在生活和工作中经常冒险或只是因为背运的人，按照团结互助的原则，也应该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提供最低水平的养老金。然而，假如这种帮助实质上是从一些减少当前消费而储蓄的人那里掏钱时，我却不提倡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以纳税人的代价，提供超过按人道主义决定的最低水平的救济。

通过养老金的例子，我已经阐明了我的基本观点。政府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用纳税人的钱，为那些由于自己的错误或不幸而处于悲惨境地的人提供安全带，同时，它又必须保证自食其力者的努力不会白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必须特别强调国家在防范通货膨胀方面的任务，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假如说，通货膨胀率突然上升了，那些年老的人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很悲惨的境地中：我们储蓄了这么多年，但通货膨胀一下子就冲走了我们的养老金。这种情况的发生将是不可饶恕的。人们在这一方面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毕竟，国家是负责货币稳定的。如果执政当局的财政政策引起了大的通货膨胀，它对养老金的资金价值损失就不能不负责任。

洛基：但这正是它（政府）已做过的，而且还应做得更好。

科尔奈：幸运的是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匈牙利

利的通货膨胀还没有超过合适的限度。但在 80 年代，早期建立的养老金的真实价值的确下降了很多。目前的法规提供了一些防范通货膨胀的措施，但我不能过分强调目前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即我认为在分散化方面应走得更远一些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必须增强而不是降低抗通胀的能力。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儿我们不可能谈得很深入。

洛基：在对我们所期望的事情发展的最终状态作了概括之后，我想我们应该转入过渡时期的问题了。

科尔奈：让我们继续讨论养老金的问题。对不同年龄的群体应该提供不同的机会。群体越老，越需要更多地考虑到这个实际情况，即在建立自己的金融资源方面，他们做得少，甚至什么也做不了。他们最依赖国家养老金，在匈牙利则是由社会保险系统提供的半国家的养老金。

洛基：比如说，这种情况适用于 60 岁的人吗？

科尔奈：你可能将门槛降低了一些，毕竟，在今天，60 岁的人在精神和肉体上还能继续工作，还不能说他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了。什么都不能做的这部分人是非常有限的。

我不认为 60 岁和 62 岁的人什么都干不了，当然，他们有权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就休息，但他们和那些达到退休年龄而没有退休的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些推迟退休的人可以享受一些有形的福利。

极端的情况是那些不能再继续工作挣钱的老人，从这种极端例子到有许许多多选择的 20 岁的年轻人之间，有很

多中间过渡的情况。在制定新的法规时，必须尽可能人道地、同情地划定国家养老金、分散养老金和所得税之间的比例，以保证尽可能地按照我在讨论中提出的伦理原则收取养老金。当然，就像我已强调过的，即使这些法规运作得非常好，也总存在与一般情况不同的个别例子。因此，对这样的情况必须留出一些调整的空间。

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几十年的极权主义和家长制在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匈牙利人民必须变得习惯于在过去由国家或党为他们作决定的领域作自己的决定。这种强化的选择自由，在人们获取自信，并用与这种自由的概念相一致的、增强的责任感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之前，需要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感受到。没有哪项制度改革的运行没有摩擦。在这个谈话中，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将我们置于这几天的讨论中经常碰到的那些实际的细节问题的困境中。这些争论在没有原则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着，如果它们之中还有一些合理的话，主要说的也就是国家的金库已经空了，应该减少开支这样的内容。当任何事物都附属于社会化“感觉”时，就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我的研究是提供标准和原则，以帮助我们选择可行的改革方案。我所提出的这些标准和伦理假设可能会有争议，但就这些假设和其他一些原则，而不仅仅是一些实际细节问题进行辩论是很好的。

洛基：为什么非现金支付手段在匈牙利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我想一个原因是人们还没有习惯这种观念。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购买股票而非黄金的人那么少？为什么有些人宁愿将钱藏在床垫下？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学到

优化投资的技术。我的问题是，当创立新的保险体制、储蓄账户和其他的养老金计划时，情况是否与以前不同？越是精明的、有教养的和其他一些成功的人，越能利用更精炼、更复杂的机会，建立适合他们自己意图的赢利机构。同时，那些学习能力差的、不具备竞争能力的人则被扔到政府手上。于是，你所希望的减少和限制政府的职能的这种制度化推进的过程，将带给政府新的责任。

科尔奈：我相信，从我目前已经谈过的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自然，政府承担着大量重要的职责，同时其他方面也负有一些重大责任。然而，我增加另外一点，在许多发达经济中，很大一部分保险机构是和雇佣者相联系的。据说在匈牙利，有一段时间，铁路部门提供的福利非常好，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养老基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曾居住在一个由煤矿开采业的养老基金所有的公寓区内。一些大的雇主，如匈牙利国家铁路和邮政局，以及某些贸易或内贸组织，都有自己的养老基金和健康保险基金。这些算是分散的、非政府的机构。这些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是他们能提供养老金和健康保险金给员工，这样他们能吸引并保有最好的劳动力。这是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征，许多有竞争力的雇主提供高于均衡水平的薪水，以起到较强的激励作用；而被雇佣者则担心失去一份好工作。有一个理论可用于解释这种现象，即效率工资。效率工资的一部分是以较好福利的形式提供的非货币收入。正像我们匈牙利人似乎重新发现了热水一样，在向私有制转换过程中，许多公司里要被废弃的福利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里还存在着。

洛基：您认为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那里学习了这些东西？

科尔奈：尽管目前大量的福利制度在消失，但我们很快会发现，即使是一个企业的度假别墅，在商业上对它也是有用的。当然，公司和贸易部门会认为组织养老基金和健康保险基金是最符合其利益的，而且，雇主必须为员工承担部分医疗费，因此，他们有积极性参加那种部分或全部承担医疗费的保险项目。法律框架多少已经存在，一些法规使这些基金的建立成为可能，非赢利机构也已经出现，并飞快地发展着，据我看，在很短几年时间内，这一部分将会很牢固地发展起来。

这一过程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这曾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即政府征税，但自愿的储蓄却极度地低。通过政府预算，强制税收被用于投资，即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强制的税收，而不是自愿的储蓄。相反，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绝大部分投资的主要来源是自愿的储蓄。作为一个规律，这种分散的融资形式并不以储蓄者自己的直接投资行为来发生。储蓄者在长期的情况下，将部分钱存放在银行里，而银行接着为投资者提供长期贷款，储蓄者也可以通过持有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单的形式进行储蓄，或者将钱存入信托机构。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到上述储蓄机构中获取四分之一到一半的融资。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储蓄结构。自愿储蓄可以增加 to 税收减少的程度，当税收不停地吸收了社会储蓄的较大份额时，私人储蓄不可能显著增加。相互竞争的储蓄和投资过程有两种，一是基于强制税收的家长制国家储蓄，

另外就是基于自愿情况的分散储蓄。

不幸的是，在预算赤字庞大的时期，这种竞争变得更加突出，而改革也不可能在税收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在资金平衡表的支出方的第一项储蓄是用于减少赤字，而不是减少税收的。当赤字降低到某一可以接受的水平时，可以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收入。如果一开始就能清楚地说明：政府需要的越少，征税额就会越少，政府的职能改革就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促使自愿储蓄迅速增长的缺口。很遗憾的是，由于赤字的原因，这种情况还不能成为现实，并且在转轨时期还存在额外的困难，或许，我们最终能克服这一阶段。

洛基：人们担心，如果政府取消对某些社会福利的资助，他们将永远失去一种既得权利，一种既得利益。他们希望得到一些保证或承诺，政府的这种取消只是暂时的，这样，一段时间后，他们失去的那些利益会恢复。您如何看待这种权利恢复的可能性。

科尔奈：我倾向于认为，没有哪个为稳定和均衡目的而制定的经济手段是暂时的。为避免误解，我必须加上一点，我们所谈的是由预算支持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福利的减少，而不是实际工资的减少。实际工资永远在波动。我们希望1995年的实际工资下降只是暂时的现象。我衷心地希望随着情况的好转，工资水平能提高起来。无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都会存在工资的上涨和下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我认为你所指的不是这个，而是指法律规定的福利。

没有哪种权利被取消时会得到这样的承诺：我们现在

取消它，是因为我们现在遇上了麻烦，当情况好转后，我们会恢复它们。那些被取消的权利应该都是一开始就不该给予的，对那些在过度的家长制下实行的东西，公道点说，完全应该被废除。从伦理和经济角度来看，正在出现的这些福利制度应该是多部门的。这就是说政府也有一定的职责，即使国有部门也可提供某些服务，但这种服务不应是垄断的，也不能控制整个福利系统。这正是我们所要达到的本质目的，是单一方面的，不是在破旧立新闻徘徊。

洛基：那么，您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像下面这样同无条件地维护那些权利的人争论：“您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你们必须暂时放弃这些权利，保持安静，一旦机会出现，您的观点就会马上付诸实施。”

科尔奈：是的，让我用最高法院裁定的例子——母亲补贴，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同意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些希望得到母亲补贴而决定要小孩的人，不应该承受取消这一福利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如果提前通知公众，母亲补贴这种福利一年之后要被取消，那么，这就是合乎法律和伦理的。人们在做家庭计划决定时，必须记住，他们现在只能期望得到有限的权利。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应再改变这些权利，相反，这应该成为永久性的、有着可靠法律环境的、长期内有效的东西。

在这里，我想越过这个特殊的问题。我已经涉及到了最高法院法规，我想做另外一个评论。就像在我所使用的例子中表明的那样，我同意宪法法院暗含的一个原则：在没有给予足够的调整时间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受制于既成

事实这种情况。在这种有限、具体的意义下，既得权利不应被剥夺。对于既得权利的保护这种情况的公平性，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认为福利出现的过程，就像棘轮机一样，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而不能转到相反的方向。福利可以增加，但再取消它是不可能的，既然给了，就不能再收回。这也就是说，任何社会和政府（包括社会主义体制），只要提供了某种福利，就不能再收回它。这种关于保护既得利益的解释将会束缚未来所有议会和政府的手脚。如果匈牙利的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0%，而西欧国家只有 45%，那么，将支出从 60% 降低到 45% 而不取消国家的一些负担是不可能的。那种棘轮机原理，也就是关于既得利益的流行说法，是不能接受的。即使宪法法院也强调，它所给予的警告，不能被这样理解。法院也不反对取消早期制定的一些福利，只是要提供足够的调整时间。事实上，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伦理上，无条件地捍卫既得权利都是得不到支持的，并且，从任何经济的或伦理的原理中也推理不出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只会使社会发展走上只能给予不能收回的单行道。立法者在给予时必须仔细思考，在他们收回一些东西时也必须仔细考虑，但不能因为需要充分准备而阻碍改革的进程。在福利制度和决定政府职能改革中，我们必须稳步前进——谨慎的、人道的、并且是有策略的前进。^①

^① 在 1995 年 3 月得到议会的批准后，最高法院拒绝了政府经济节俭一揽子计划的很多部分，包括像母亲补贴这样的很多福利项目的裁减，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事先没有提供足够的调整时间。

匈牙利道路：专访 雅诺什·科尔奈教授^①

匈牙利道路：专访雅诺什·科尔奈教授

肖梦：中国经济改革的转轨已经进行了20年，对照你的文章中提出的“消除短缺经济的五条标准”，我们做的还不错，比1989年匈牙利的情况要好很多了。但是，当前仍有很多矛盾和问题有待于解决，所以特别看重匈牙利的经验，1989年匈牙利碰到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人认为面对重重困境，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要快速、全面的私有化。可是就我所知，你认为不能采用大震荡的私有化做法。这次你在中国的演讲谈到三点：一是私有化虽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二是要走人格化的私有化，而非机构持股；三是走渐进的道路，不搞无偿奉送。能说得详尽一些吗？

科尔奈：我能用私有化这个词吗？你需要把它翻译或变成其他的词吗？

肖梦：当然可以。我不需要用其他的词，我们中国的

^① 本文是1999年8月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为纪念《短缺经济学》在中国出版而邀请雅诺什·科尔奈教授夫妇来华讲学期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辑肖梦对他所做的采访，发表在当年该杂志第五期。本文得到了钱颖一教授的大力帮助。

经济学界能够坦率地讨论问题。

科尔奈：没问题？那好。那我可能会说得长一点。

在1989年对后社会主义有一个关于私有化的争论，我想回到那时候去谈。当时有一个共识，有两个平行的工作要做，一个是发展新的私有企业，一个是私有化已有的国有企业。当时不仅仅在经济学界，在政治家那里也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焦点是这两个工作哪一个是重点，应更多地强调？我们不仅可以按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分类，也可以按不同国家（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分类。按我的观点来说，主要是如何发展私有经济的问题。我认为私有化是重要的，但是没有特别的理由要急着去做这件事情。我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来谈，当时很多人认为，因为没有可能卖掉这些国有企业，人们没有钱，如果不赶快做这件事，政治上就要逆转。所以他们认为要赶快干，干的方法就是白送出去。但是我当时的看法是要发展经济，发展私有企业，当人们有了钱以后，就可以买国有企业了。第一年也许有少量的人买，第四第五年就有一些人可以买了。我虽然不是惟一持这看法的人，但在经济学领域里是绝对少数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都是另外一种看法，都是把重点放在快速私有化而不是放在发展私有企业。赞同我的观点的只有马里兰大学的一位教授和波兰的波兹南斯基教授。再让我们来看国家，匈牙利和波兰是按照第一种办法来做的。非常连续的和非常有效的全新的私有企业发展起来了，加上对外国资本的开放，这很重要，并不排除外国资本。另外一个典型是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最早实现私有化的是捷克，那时就如同赛马一样，谁先实现了私有化，好像谁就赢得了胜利。你

先做完了，你是第一！捷克当时就是想当第一。捷克确实完成了，匈牙利在几年后也完成了。显然速度并不是惟一的。

回顾历史，匈牙利在1968年废除强制性计划指令时，基本的所有权之一，即控制权的一部分已经转给了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然而，中央当局仍然以许多直接的方式干预企业。最重要的是对经理人员的挑选、任命、提升和辞退仍掌握在党和国家的手中。但是经理们成为更加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他们能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在后来的后社会主义阶段亦是如此。1988年，匈牙利是第一个通过了所谓公司法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这部法律，国有企业可以商业化并转成现代公司形式。

1990年以后，新的私营企业大量涌现时，越来越多的部门倾向于合并和兼并，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与独立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的社会学团体——在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角色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最终这些人一起形成了商业阶层。从执行计划指令的前温顺党人的队伍中逐渐产生了今天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当然这个阶层也有新人加入。这个领导层的转轨在数十年内进行，没有受到较大的干扰，在90年代转轨加速。尽管1990年执政的联盟有强烈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并且试图在许多商业位置上安插其党派支持者。它的大部分商业人士也是来自于旧的经济精英。

匈牙利的私有化常常与重组联系在一起。当时，许多国有企业都处在油尽灯枯的状况，极其需要注资：它们需要投资以进行重组。许多企业分解成较小的几个企业。这些企业有一些转变成私人所有，有一些则是混合所有权。

剩下的企业仍继续为国家所有，或许是间接的，重组后的企业交叉所有权成为其他国有企业或银行的财产，确实大量涌现了多种多样的财产组合。

私有化通过多样的技巧，以多种法律和组织的形式进行。最大和最有价值的企业由中央机构通过竞价或拍卖方式出售。对较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而言，则有一些转移所有权的简单形式。如果可能的话，股份被出售以获取现金，但是也有多种信贷安排，其中一些按市场利率计息。还有一些利率和偿还期优惠的信贷安排，以鼓励国内企业家购买。有一些企业的股份是一次性全部或大部分出售的，而另一些企业的股份则是分阶段逐步提供的。为了便利管理层或工人们购买全部所有权，有一些特殊的程序。虽然到目前为止并不多见，但还是有计划让投资公司接管一些国有企业的股份，这样购买者就可以购买混合的证券组合。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在反复摸索的实践中产生的，并不是来自于任何预先设计的单一计划或中央指令。

匈牙利的经验说明了先发展非国有部门，然后慢慢地卖国有企业，这个策略是可行的。这可以更好地对整个国有企业进行产业结构重组和重新改造。你看匈牙利的生产力比捷克高出很多。另外一个指标是关于失业的情况，失业说明了重组的程度，在波兰是15%，在匈牙利是10%，在捷克仅为3%，这说明了在捷克没有多少重组的现象发生。

这里我想解释一下“人格化”的私有化，我不想别人误解我的意思。这并不是一个大家通常使用的词汇。我先从人格化的所有制开始，举个例子，比如个体户或家族企业，总之是个自然人，第二类就是企业家，虽然此后的发

展成为大企业集团，但开始是由两三个人创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从一个官僚的计划体制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式的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种是现在已经有的私人企业来买国有企业，我也称之为“人格化”的私有化，当然这个私人企业并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法人了，这样的法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熟悉的，他才能监督所购买的企业。我非常看重新兴企业和旧的国有企业间的关系，坚信这对于转轨国家极为重要。在中国也是同样，现在新兴的私人企业将来就可以买国有企业。

再回到“非人格化”的企业，比如退休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等。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这两类——人格化和非人格化的企业都存在，而且非人格化的企业还起了很大作用，我完全知道！但是这样的机制并不能用来改造现有的国有企业，股权太分散就没有负责任的所有者，所以必须要企业家或已存在的私人企业。这是我想说的。

我不会冒险对匈牙利的战略整体上相比其他私有化战略的好坏简单地说是或非，哪怕只是暗示地说。归结起来，我只能说应用于匈牙利私有化的渐进主义，作为一个自发的、广泛扩散的、渐进化的过程，清楚地显现出了有利和不利的、有吸引力和无吸引力的特征。匈牙利式的私有化渐进主义这个词包含了一点民族的自豪感，而且至少与自嘲的成份一样多。但是看起来这个战略当然产生了作用，并将生存下来。如果任何时候的管理机关都能更加有力和有技巧，并对分权决策的机制显示出更大的信心，那么这个进程当然可以进行得更快一些，哪怕假设运用的是

相同的总体战略。然而，即使匈牙利道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当与世界历史中的其他变革相比时，它仍然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发生的。

肖梦：从转轨国家的经验来看，是否私有化就能彻底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

科尔奈：一些研究后社会主义转轨的经济学家们往往过于简单地认为，造成软预算约束的原因是公有制，因此只需私有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我要加上我个人的观点，我本人从来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简单。尽管我也强烈地认为公有制与软预算约束以及私有制与硬预算约束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但我很早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同样会染上软预算约束综合症。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已经进行10年了，现在是重新回到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了。

如果国民经济中公有制占了绝大部分，确实会导致预算约束的高度软化。这也正是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行政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财经纪律和实现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转的。

人们希望通过私有化可以对剩余的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强硬起来。可是这并不会自动发生，在一些从未经历过共产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仍会对国有部门表现出软预算约束行为。经济学家们通过对诸如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已经多次得出这个观点。当然在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中，政府无法在幕后用纳税人的钱实施救援

活动，因此对国有部门（其产量只占社会总产量的一小部分）的预算约束也会或多或少地硬化。

私有部门占主导地位是硬预算约束制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是从后社会主义转轨中得出的一个主要的教训。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转轨经济中的经验数据的整理，说明了国有企业是多么地希望被拯救，尽管私有部门也有这种想法。

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三国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由于这三个国家最近几年中经济是增长的，因此破产企业数目的增加趋势大体上表明了预算约束已经得到了硬化。尽管这三个国家停业企业的数目都增加了，但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数字要大于捷克共和国。这三个国家私有部门的规模大体相当：90年代后半期这三个国家私有部门的产出占社会总产出的四分之三。不过如前所说，这三个国家对国有部门私有化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捷克主要是采用认股权证私有化方式，也就是采用一种对国有企业分散化的方案，然后分散化的资产又由仍为国有性质的大银行发起和管理的投资基金集中起来。所以，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脐带并没有最终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仍然使软预算约束状态得以维持。而匈牙利和波兰的私有部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建立新企业而得以扩张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多是通过出售的形式完成的，只有极为有限的免费分配。因此资产会逐渐转移到那些有真正所有权观念的人，或者是战略投资者手中，而不仅仅是大型外国企业。这些新型的的所有人与国家的联系更少，并且对国家援助的期望也更少。在匈牙利和波兰，国有企业私有化——尽管不是惟一的——是建立在破产和清算基础上的。这意味着作为组织

形式的企业不再是以其原来的、国有的形式存在下去。在清算过程中，新的所有人购买了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并且按照新所有者的理念进行运营的一家或多家企业出现，取代了国有部门。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扫清了从原有的具有未偿债务负担的软预算约束制度转向硬预算约束制度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在考虑私有化和软预算约束关系时需要记住的另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匈牙利和波兰企业外部人所有的比例较捷克共和国高，而内部人所有的比例较捷克低。理论上已经证明，内部人控制的私有化会带来软预算约束。

关于私有化与软预算约束现象之间关系的讨论在俄罗斯的例子中得到了更清晰的证明。俄国的无偿奉送方式和内部人私有化比捷克走得还远。在短短数年之后，主张这种私有化进程的西方和本国的始作俑者便自豪地宣称，前苏联国家的私有化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确实如此，然而，在俄罗斯，软预算约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了，这损害了经济的健康运行。这是转轨经济的教训之一，我们不是说从法律上禁止内部人所有，只是强调外部人所有制的体制好于内部人，更鼓励外部人体制。

在后社会主义转轨开始时，在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当中就传播着一种观点：在东欧地区完成三大任务是必不可少的和足够的。不过，人们已经发现，稳定性、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三位一体”毕竟是不够的，缺少约束是转轨中最大的问题，过去人们习惯于命令经济，在新的转轨情况下，如何执行合同、履行合同的义务，这些市场经济基本的约束，人们都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硬化预算约束是与之同等重要的一项任务——正如俄罗斯的经验所表

明的那样。俄罗斯政府差不多是在改革进程的起始阶段就执行大规模推行自由化的政策。前面提到的私有化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早。虽然稳定工作要拖后一些，但到 90 年代中期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显著地下降了。俄罗斯最缺乏的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一整套制度环境。这包括很多方面，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说硬化预算约束和严肃财经纪律就足以成为制度环境了。不过，如果说建立硬预算约束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是国民经济的大多数环境的核心，这似乎并不过分。那需要行政部门的每一位官员和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位行为人都严肃地处理诸如合同、担保、债务、税收之类的问题。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严重问题，正如俄罗斯的情形。

肖梦：我关心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角色，特别是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推动制度的建立方面，匈牙利政府起到了什么作用？

科尔奈：我们必须给政府一个定义。你的问题是仅指政府的行政部门还是包括了立法部门？我从立法开始先说。匈牙利的议会制定了特别大量的法律，来支持市场。匈牙利一直坚持一个原则：不要产生法律真空，过去共产党制定的法律一直要延续到新的法律出台的时候。这叫做法律连续性原则，我们有这样一个平稳的过程。比如说商业法典，比如说劳动法，比如会计法和银行法，这个法把中央银行独立于商业银行，还有如抵押贷款的法律和保险。我们有一个宪法的法庭，这种宪法法庭在美国是没有的，但是在德国就存在。宪法法庭是为了审查和监督法律的合法性。议会只是通过法律，但宪法法庭可以决定它是

通过还是无效的。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在于不仅制定法律，还可以有选择地推翻法律。这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

政府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参与私有化的工作，私有化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专门成立了一个私有化的政府机构。在匈牙利从未运用过纯粹的、极端形式的放任主义原则。行政命令经济中的机构逐渐转变成国家监管和部管理制的机构。在许多情况下，早期的官僚机构被取消了，另一些更加适应市场的机构最终出现了，这些机构更加接近于其他市场经济中的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它强调了一个新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商业银行——银行监察团，现在匈牙利这并不是由中央银行管的。同样，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督竞争。在美国是司法部下面的一个部门来反垄断保护竞争，我们不是，我们是专门一个机构来做这件事。企业可以找这个保护竞争的部门来抱怨谁妨碍了竞争。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来负责程序，如银行和竞争等法律程序。匈牙利建立了经济竞争办公室（一个反托拉斯的机构）、保险监察团、证券监察团、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部以及全国劳动中心等机构，还建立了税收和财政办公室以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这些模仿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税收体系的税收。

在1990年以前好几年，起草与市场经济相符的法律以及废除与之抵触的法律的进程就开始了。虽然法律基础设施的转轨也是一步步地逐渐发展的，工作开始得较早以及集中的工作使匈牙利在这方面相对于本地区其他国家留有一些优势。用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总法到1992—1993年就完成了。法庭和其他的法律执行机构和司法机构，及代表企业与个人的律师一起，开始在保证这些法律执行中获得经验。我不想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在匈牙利

已经出现了市场和行政机构协作的理想结合。当然，这样一种结合是否在别处存在也是值得怀疑的。今天匈牙利的市场和行政机构的运行仍有很大的摩擦。在那些明显需要监管和法律条例规范的领域，还缺乏足够的监管和法律条例。另一方面，在行政干预泛滥的领域仍有许多行政干预，而且在行政机构不可避免的领域，它往往以懒散的、非职业化的方式工作。

讲到政府的作用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政府起到“创造性作用”，比如政府直接参加投资；一种是政府起“监督程序作用”，比如政府监督竞争的程序是否合法或维护法律的执行等作用。极端的情况是政府一点公共投资都不做，匈牙利不是这个样子，这里有个程度问题。从计划经济的起点开始，政府参与许多投资甚至是唯一的投资者，现在政府越来越多地退出了投资领域，政府的作用在于保护私有经济要符合法律的规则，所以政府主要作用是监督。

对转轨经济的政府来说，关键是使政治、政府与商业分离，不能同时担当政客、商人和官员，否则利益冲突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软预算约束。

肖梦：我还想弄明白一个问题，从反面来推测，会不会正因为匈牙利有 20 年的渐进改革，使得它有了一个比捷克好的基础？

科尔奈：匈牙利 20 年改革对现在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确实不能光说正面或负面。

先说正面影响。这 20 年的改革是一个学校，教会了

人们什么是市场经济，即使匈牙利改革是“半截子”改革，但是经理们还是学到了许多市场经济下运作的知识，好像是大学的预科，对正式上大学后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匈牙利国有企业的经理就比捷克和东德的国有企业经理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准备得更好。第二个正面影响是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些私有经济，尽管还很小、很弱，毕竟是已经发展的部门。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的。

但是，从负面来说，前面20年改革有宏观上的问题，用我的话说是“土豆烧牛肉式的社会主义”。比如为了让老百姓高兴而采取“哗众取宠”式的政策，当时为了让老百姓满意，通过借债大量进口，而不是通过出口解决问题。当我们进入1989年和1990年的时候，面临的是非常巨大的外债。而捷克像当年斯大林时期一样，非常严厉的政策，所以没有进口什么东西来讨好老百姓。另外的典型是罗马尼亚，尽管国内有能源危机，但是厉害的独裁者甚至可以出口能源。如果你比较思维方式和制度建设，匈牙利比捷克准备得更好，但要比宏观环境特别是外债方面的条件，匈牙利比捷克差很多。

政府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如果政府的行动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连续性，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政治领导人最大化的目标方程，或研究其行为显示的偏好。按照这一思路可以得到两条结论：（1）从20世纪60年代到1995年春天，先后执政的、在各方面都大相径庭的各届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2）这些政府显示出一些明显的偏好，他们希望避免冲突。他们希望尽可能地保证经济的不间断发展，并促使新兴政治力量统治下的人们不断为之继续努力。他们不想采

取激进的、不受欢迎的行动。他们以短期消费最大化为目标，愿意以一定的社会债务增加为代价。这些显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宏观经济出现的各种比例，长期的再分配让步和匈牙利经济发展的渐进性质。

还要说的是，我认为外国专家对匈牙利改革和发展所持的立场却不够前后一致，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们。长期以来，他们对匈牙利的改革，其渐进性质，以及伴随改革的政治共识与稳定，包括1990年之后这一政策的继续都持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匈牙利是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典范。但现在我却常常听到这批经济学家们说：“我们对匈牙利不抱幻想了。它曾经是榜样，但现在它的经济成果比其他那些更成功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差远了。”这些幻想破灭的人没能意识到主要的因果关系。匈牙利现在之所以展现出落后的宏观经济表现，正是因为它以前曾在匈牙利改革之路和“匈牙利式渐进主义”上徘徊了太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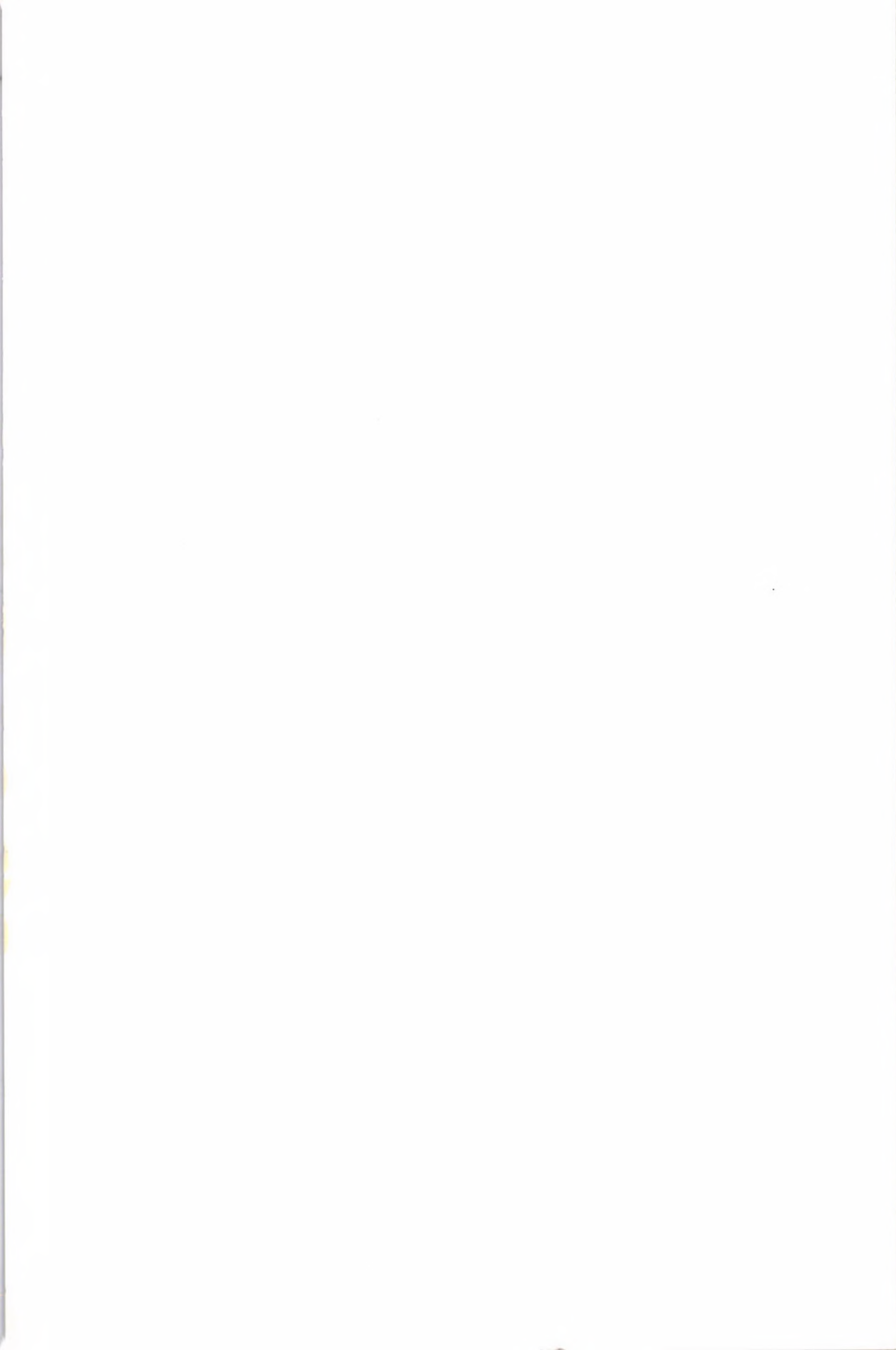
现在我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不认为改革的历程是后来匈牙利和捷克选择不同私有化道路的主要原因。比如说波兰，波兰并没有采取大规模私有化的道路，而它的前面的改革时间显然比匈牙利要短得多。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政策选择的问题。捷克的领导人精力充沛，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这并不是以前改革历史就能事先确定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领导人是有责任来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的。历史当然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在于政治家或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转轨的社会后果是有获益者也有受损者，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绝大多数人获益，这是很大的成就。但是我要提醒

的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要避免两种错误。第一，继续承诺做不到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政府放弃他的一切责任，从共产主义一下子垮到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这会影响政府在推动改革方面的威信。政府应保证人民最基本需要的安全网。东欧政府在两个极端间跳跃、摇摆，没有找到中间一个比较适合的位置。确实，这需要智慧、热情和勇气，这三个品质每一个都稀缺，合在一起就更稀缺了。

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使我了解到中国经济转轨的许多情况，很有收获。

(1999 年 6 月 26 日于深圳)



责任编辑 —— 潘丽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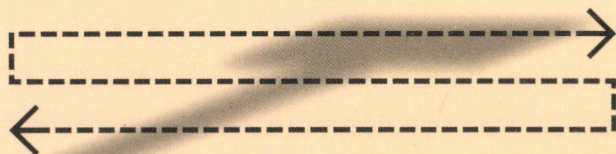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雅诺什·科尔奈是国际上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问题研究的权威学者，自80年代起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当选为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他提出的“软预算约束”、“短缺经济”等概念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们研究和讨论的题目，其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

R P T eflections on

本书是科尔奈教授最近十年关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问题研究的汇总，其中的文章是作者精选出来的，对中国目前的改革极具借鉴意义，涵盖了科尔奈教授近十年的新思想与新观点。

ost-Socialist

ransition



ISBN 7-206-04101-9



9 787206 041013 >

ISBN 7-206-04101-9

F·810 定价：20.00 元